

不轻蔑自己 格林兄弟传

1 哈脑，最初的印象

1780 年奥地利女皇玛丽娅捷列齐娅去世后，接着她的敌人及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也于 1786 年逝世了，这就结束了整个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德国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大的政治实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占领地，与这些占领地一起还有许多小公国，显贵的专制君主庄严地高居于这些公国的王位之上，他们仍然企图模仿法国国王的豪华生活，虽然革命已经可怕地向法国逼进。

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成了新纪元的火红旗帜。以公开反对诸侯独裁、专断和霸道为目的的谋反书籍也在德国出现了。莱辛的《爱米丽雅·伽洛蒂》、席勒的《强盗》和年轻的歌德与赫尔德的作品为腐蚀的封建德国带来了反抗和骚动的新鲜气息，从而惊动了易于接受自由、和平等思想的人们的智慧和心灵。历史的风雨表明，暴风雨即将到来。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法国革命开始前几年，格林兄弟诞生了。黑森邦，更准确地说，过去的哈脑公国是格林一家的故乡。远在 1650 年，他们的祖先约翰·格林就在“白马站”任驿站长。格林兄弟的曾祖父和祖父是黑森邦加尔文教教堂神甫。父亲菲利普·威廉·格林生于 1751 年，他看中了司法职业。开始担任律师，后来在哈脑担任“公国的城市和地方司书”。1783 年他与出身于一个法学世家的多罗捷娅·齐麦尔结婚。

1785 年 1 月 4 日，多罗捷娅·齐麦尔生了雅科布·格林，1 年以后，即 1786 年 2 月 24 日，他的弟弟威廉出世了。格林家的人口不断增加，后来又生了三个弟弟：卡尔、费尔季南德和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路德维希·埃米利。

在法国京城，《马赛曲》响彻了街头，人们在进攻巴士底狱，而小小的黑森城看来确实可以免罹其难。曾经扫除自己道路上一切障碍物的暴风雨般的事变暂时还没有闯入格林家的孩子们的世界。在这个德国小城的宁静的环境里，从外表看来，好像周围世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行政管理还是一如既往，中等阶层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在市民当中既没有感到过分的富足，也没有感到令人难堪的贫困。对于这些勤劳而富有人生乐趣的人来说，家庭仍然是生活的中心。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简朴生活的意义，并为以自己的劳动谋生而感到骄傲。

当然，雅科布和威廉已经记不得他们所出生的那所坐落在哈脑主要广场上的房子，因为他们的父母很快就搬到离市政管理局不远的长胡同里的另一所房子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正是这所房子是亲切的。他们经常在这里做游戏：威廉藏在楼上兼做餐厅的客厅里，可是雅科布很快就找到了他，然后，他们就跑到女仆劈木柴的狭窄的院子里。

冬天，客厅壁炉里的火苗安闲地噼噼啪啪响着，母亲不慌不忙而又高兴地用散发着稍带甜酒味的热水给孩子们洗濯，可是这种作法完全不合孩子们心意。到了春天，情况就好多了：可以把正对胡同的窗子敞开，把球扔给小孩们。阳光在邻居的屋顶上闪耀着，母亲站在窗前，欣赏着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每逢节日，母亲常常给雅科布穿上带花边领子的紫色坎肩，围上绿色围巾；威廉则穿着带红色绦带的白色衣服，卷曲着头发。不用说，兄弟俩对此

并不感到高兴。

他们更高兴的是穿上朴素的短上衣，完全自由地在隔壁花园里跑跑跳跳。他们也很想到对面的制手套作坊去。

从小时候起，雅科布和威廉就开始共同做功课。他们总是手拉着手在女仆的陪同下穿过新城的市场来到法语教师家里。有时他们在路上停下来，好奇地观看风向标——一只在钟楼尖上转动的金色小公鸡。他们也常常一起到亲戚家去。姑母是一个没有子女的寡妇，住地离他们不远。正是什列麦尔姑母教会他们认字母，同他们一起读教义问答，教他们算术。姑母当时就感到吃惊：雅科布非常认真地接受所有教导，并且非常迅速地学会了读书和数数。

兄弟俩每个礼拜要去看望祖父和祖母好几次。祖父齐麦尔曾担任过办公厅顾问，已经退休。在 7 年战争 期间他饱经沧桑，这也决定了他对生活的看法，并使他变得温和而又善良。祖父对两个孙子的才能感到很满意。有一次，雅科布朗读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使他感到非常吃惊。另外有一次，雅科布爬到椅子上，就传起道来，祖父笑了，这个孩子，大概和他的前辈一样，将来会是一个加尔文教的神甫。

在哈脑这个熟悉的环境里，人们都觉得很舒服，很安宁。冬天，有时孩子们同父亲一起坐着雪橇，沿着白皑皑的雪路，穿过光秃秃的树林；有时他们坐在生火的暖和的木房里，在明亮的烛光下，听父亲向农民解答法律问题；傍晚，他们摸着黑回到哈脑，——幸福地回到自己的家，看来，在这可怕的时刻，家里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可是有一次，他们的和平生活遭到了破坏。列奥波利德二世登上了皇帝宝座。黑森的诸侯为了保护皇帝，在法兰克福四郊集结了庞大的军队。格林一家为了观赏军队的阅兵式，乘车向军营驶来。孩子们好奇地观看列队走过的团队。他们的步伐多么整齐！他们的刀枪在阳光下多么明亮！当大炮轰鸣的时候，马车都颤动了。这才是真正表演！孩子们尽情地欣赏这壮观的表演。可是他们当时怎么知道，这种表演很快就会变成能引起致命危险的现实？甚至大人们也未必会想到，在遥远的法国京城酝酿着什么事件。在那里，雅各宾派作了多少起义的鼓动工作！国王仍然坐在自己的王位上，而且当时任何人也不知道，革命的火焰已经非常广泛地燃烧了起来。这发生 1790 年。

1756—1763 年间，英国、普鲁士、哈脑为一方，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因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普、奥争夺中欧霸权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所进行的战争。

2 施太诺——童年时代的梦

雅科布·格林 6 岁的时候，父亲在故乡施太诺被任命为行政助理和法官。施太诺位于基增格河上游，在树林密茂的什佩萨尔特山、福格利斯别尔格山和廖恩山的支脉之间，离哈脑不远。

1791 年春，一辆辚辚作响的马车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慢慢向前走着。鲜花盛开的山楂树的窗外掠过。潺潺不息的基增格河两岸的草地绿茵如毡。孩子们好奇地不时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威廉坐在母亲膝边的小箱子上，常常挺直身子，想把外面的景物看个够。群山和草地所环抱的亲切的施太诺终于出现在眼前。在这个时刻，甚至下雨的天气也未能破坏他们相逢的喜悦。烟雾在红色的屋顶上袅袅升起，还没有上升到钟楼的高度就渐渐消散了。

马车在行政助理的住宅前停了下来，当父亲不慌不忙而又高兴地打开自己未来的公馆的门的时候，母亲则在帮助孩子们平安地爬下车来。对于最小的、1 岁的路德维希·埃米尔来说，母亲的帮助是特别需要的。

这是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坚固的楼房，正门阶梯的两边有两棵椴树，第一层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朝街的窗子都是拱形的。第二层的墙架结构由不同形式的承重悬臂支撑着，从正面经过圆形塔楼就可以进到行政长官解决诉讼案件的房间。这所房子很宽敞。院子也很大，尽管还有仓库、马厩、牛栏、柴棚和各种什物。

爸爸同自己一家人搬到这里来感到很幸福。因为施太诺不是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它坐落在一条从法兰克福到莱比锡的繁华的路上，同当时的整个外部世界都有联系，格林一家在施太诺的这所房子里过了 5 年舒服生活。

在这所房子里，日子是这样度过的：雅科布和威廉住在一间浅绿色卧室里，当他们醒来穿衣服的时候，隔壁房间里的水壶就滋滋地沸腾了。父亲在作完早祷之后，还穿着睡衣坐着，抽着烟斗，而仆人则在给他梳假发辫。早饭后，兄弟二人就在客厅里跟家庭教师学习，母亲也常常到这里来坐一坐。这时，父亲就在自己办公室里办理市镇和郊区的公务。他是一个公道的行政长官，同来访者谈话十分亲切。

白天，他工作很忙，所以大家很晚才吃饭。在饭桌旁坐下来的有九个人——在施太诺又生了一个女孩洛塔，除此以外，还有姑姑、寡妇什列麦尔也搬到这里来了，吃完饭，大人们收拾客厅，刷洗餐具，孩子们也来帮忙。然后是磨咖啡粉。饭后，父亲喜欢到花园去：如果是在秋天，他就剪下一嘟噜成熟的葡萄做甜食，或者到禽舍去看看鸡鸭。作为一个操心的主人，他总要认真检查马厩和牛栏是否一切都正常。他巡视后回到客厅时，桌上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咖啡。然后家庭教师就招呼格林兄弟去学习，而爸爸就到自己办公室去工作。这样一个大家庭的主妇也是不会闲着的。在家里，她总忙个不停，不是缝补和编织，就是为第二天准备饭菜，挑拣扁豆，或者洗苹果，有很多事情要做。

下午 4 点，结束了功课，格林兄弟美好的时光到了：他们可以在花园或院子里跑一会儿。赶一赶羊羔，看一看鸽子，逗一会儿家兔，用手喂那几只几乎喂熟了的鹁鸟和红鹮。使孩子们高兴的是，家里还有几只狗，而且还饲养着两匹枣红骗马和一匹取名为“英国人”的黑色英国牡马。

晚饭时，全家又坐在一起。饭后，大家还围坐在桌旁玩一会儿罗托。有时朋友们来访，如果是相好的男朋友就一面吸烟，一面慢慢地喝酒。林务区长米尤列尔是家里的常客；他常让孩子们骑在膝上，不停地往上颠。然后打发他们去睡觉。

平淡的日常生活有时被快乐的节日所打破。这时格林助理就穿上一套饰有金黄绶带和红丝绒领子的蓝色礼服。如果准备骑马的话，他就穿上带银光马刺的皮靴和皮裤。雅科布和威廉非常高兴地仔细打量着身穿豪华礼服或者绿色猎服的父亲。啊，这位行政长官成了一个可尊敬的人！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就在楼上自己的接待室里接待他们，接待室里陈列着许多公家的贵重家具。他的前任们远非都是诚实和正派的人，人们常常给孩子们讲述：深夜，曾因可怕的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的早已死去的行政长官的幻影如何在房子里徘徊。所以，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从小就产生了一种忠诚和尽职的情操：要做一个诚实和正派的人，要珍惜和节约使用所挣来的钱。父母亲就是榜样，花钱之前，他们对每一分钱总是掂量再三。

一家人生活过得俭朴，家庭和睦，在家里有许多欢乐的场合，这就是在生日，或者在圣诞节送给孩子们作礼物的金质纪念章之类。在圣诞节前夕，孩子们焦急地等待着打开那间摆着装饰了圣诞枞树的房门，并且仔细地聆听大人们讲话。欢乐的铃声终于响了！房门打开了，一棵用金银苹果、核桃和一支支燃烧着的蜡烛装饰起来的圣诞树在屋里闪闪发光，交相辉映。为每一个人准备了一盘点心和糖果，为孩子准备的则是玩具，而到处闪闪发光的纪念章是很不寻常的礼物。

雅科布和威廉逐渐熟悉了施太诺，发现了许多新的街道和房屋，这些地方成了他们的小天地。城市中心的广场上哗哗作响的喷泉，市政管理局大楼，学校，以及圣叶卡捷琳娜教堂和古老的城堡，这些都是他们终生难忘的。市政管理局大楼是一幢石头建筑物，这里有根深的酒窖，一个堂皇的正厅和许多大会议厅，都特别漂亮。格林兄弟经常在这座建筑物附近玩耍，他们冬天互相扔雪球，夏天在很陡的房顶上监视窝里的鹳雀。离市政管理局不远，在沿街的一幢很长的房子里，住着他们就读多年的增克汉老师，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冬天，他通常穿黑色衣服，而夏天，则着浅蓝色或紫罗蓝色。一副系在绦带上的来回晃动的眼镜，是这位老教师最大的特征，而他那根粗大的竹手杖，使学生们望而生畏。他抽完烟之后，就开始上课：“喂，小淘气们！谁认得这几个词？”当他讲了深奥的道理，并让学生们把拉丁语的语法牢牢记住时，他的妻子有时从楼梯上大声喊道：“做什么吃的呀？”传来的回答是：“做肉丸子，当家的！”

在做肉丸子的时候，老师对学生用起了手杖，要知道当时还实行体罚。同其他同学相比，雅科布只受到轻微的处分。正如增克汉本人所承认的，这个学生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贪婪的求知欲”。威廉也领悟到，只要勤奋和用心，就可以轻易地避开老教师的手杖。

对于格林兄弟来说，圣叶卡捷琳娜教堂是一个有魔力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祖父在这个古老的教堂里当了四十多年神甫。当他在垂暮之年去教堂的讲坛时，每次都要经过他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坟墓，他们很早就死了，都葬

一种赌博，由袋中取出有号码的牌子置于本人手中纸板上的相同号码上，以先摆满纸板号码者为胜；亦用作教育性游戏，但号牌改为图画。

在祭坛的附近。

“铁汉”——一口旧钟，也是这座小城的有名古物——的声音响了，行政助理把节日的小礼物——糖粘核桃——发给孩子们后，就同他们一起到教堂去了。在自家的条凳上刻着父亲姓名的第一个字母——P（菲利普·威廉·格林）。雅科布在父亲面前打开了圣歌本，威廉被允许往教堂捐款钵里扔了硬币。阳光射进教堂高高的窗子，照亮了亲人们的墓石。妇女们在嗅着带来的花束或迷迭香的香味。这时，响起了庄重而又高兴的唱歌声。

祈祷之后，可以在邻近的城堡游逛一会儿，这里有石墙、壕沟和多角塔。真有点像童话里的宫殿。这里有大门和如画一般缠绕着常春藤的吊桥，风向仪显得神秘而又模糊，在风向仪的下边是模糊的石制的哥特式建筑的图案装饰。旁边有一个小礼拜堂。在建筑物的每一个房角，威严地耸立着重叠的五角堡垒。如果细心倾听，可以听到年代久远的灵魂们的窃窃私语。这是否真的就是睡美人的宫殿？如果稍有一点想象力，孩子们就会看到王子和公主，他们穿过童话宫殿的大厅走来。

施太诺城的一条主要街道和城中心一样漂亮，街上有许多框架房子。孩子们在这条街上和其他小胡同里，了解到附近艺人的劳动和技巧，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制鞍工匠、鞋匠、裁缝、屠夫和织布工人都是怎么干活的；可以观察铁匠怎么打铁；跟在放鹅的牧女和羊群后边看放牧的情景。胡同里有个面包铺，洛塔妹妹经常从那里买回新鲜的甜面包；马路上，一辆辆远道的马车颠簸驶来，到“乌贝克”客店休息。在大街上，他们可以看到板车上的几个古怪的人，他们大声报着正在开始的走软索和狗熊的演出节目。难道这一切不就是旧童话里的人物吗？当然，总是孩子们最早迎接从大街上经过的城里有名人物——药剂师先生、市司书、瓦格涅尔大夫，并且恭敬地对外科大夫戈特沙尔克先生脱帽致意。

在胡同里，还可以同朋友们一起玩。格林兄弟常常同什捷费利耶或克拉斯亨跑到城墙根前面去玩，那里有两口喷泉。冬天，水是热的，而夏天，则是凉的。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施太诺人说，老鸛正是在这里下小鸛哩。

后来，就允许格林兄弟独自出城了。那里特别吸引他们的是格林家的花园。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离基增格河不远，花园里还有一个养蜂场。两棵高大的椴树挺立在门口。花园的中心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摆着一张石桌和几条笨重结实的长椅。格林的母亲常常坐在这里照看玩耍的孩子们。五个兄弟和一个最小的身穿白连衣裙的妹妹在一起跳呀，笑呀，你追我赶地跑着。

花园里有苹果树、梨树和其他各种果树以及各种蔬菜，一句话，家民需要的水果、蔬菜应有尽有。而且到处是花——桂竹香、紫罗兰。花园很大，从这里割下的草足够供两头牛吃。

一个年老耳聋的花匠看管着花园。花园一年四季都很美，特别是复活节，孩子们在草里和酸模菜里寻找复活蛋的时候更是这样。在夏天，芳香扑鼻！在这里可以听到圣叶卡捷琳娜教堂的钟声；孩子们常常藏起来，监视着椴树上的喜鹊窝；公猫格拉乌斯在草地上逍遥自在地玩着；苹果树上挂着许多发红的苹果。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得到石头城墙、城门和城楼。

兄弟们也喜欢到郊外树林里散步。他们隐藏在僻静的树林里，凭着声音来辨认啄木鸟和椋鸟；他们觉得，好像他们能够听懂山鸟和鸫鸟唧唧喳喳在说什么。后来格林兄弟的童话集里也描写了他们第一次在施太诺附近的树林里所听到的各种声音。树林里散发着报春花、铃兰花和百里香的香味。格林

兄弟所以在一生中都是搜集各种花草和植物的爱好者，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雅科布和威廉兄弟在和睦美满的家庭和自由自在的自然环境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由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这个安静的小城而变得越来越暗淡起来了。18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法国革命和由奥地利、普鲁士及其他国家进行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所谓联合战争。黑森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长长的士兵队伍正是在通过施太诺的那条大路上伸延，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穿着各种颜色制服的士兵——法国人和奥地利人，荷兰人和普鲁士人，美因兹人和黑森人——从惊奇的居民面前走过。在 1793 年攻击美因兹的时候，孩子们觉得，他们好像听到远处大炮的轰隆声。

当然，孩子们很好奇，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在士兵经过的时候，妈妈非常为他们担心。喝醉的士兵在大街上来回游荡、掠夺、抢劫面包、肉，出卖偷来的东西。每天夜里，格林兄弟都从窗子里看到牧场上士兵们燃起的警戒的篝火；第二天，就由新的部队换班。军乐发出刺耳的声音；随军食品商贩的装满砍好的牛胴和猪胴的货车在大路上滚动。出现了许多伤兵，他们的手上和头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破布。农民的马匹帮助拉大炮。家畜突然生起病来，居民们不得已把干草和稻草，椅子和凳子都交了出去，否则，士兵们就会闯到家里，不问主人同意与否，便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世界不再是宁静的了，现在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危险。就是从父亲的公务变得越来越繁忙这点也能看出来。大人的谈话使孩子们感到害怕。他们了解到，1793 年法国国王被处死，可是后来，即 1794 年，革命者丹东和杰穆林死于断头台。这已经远不是童话世界了。周围笼罩着非常明显的可怕气氛，齐麦尔爷爷经常从哈脑给住在施太诺的孙子们寄来令人惊慌的信。

然而，行政工官家的孩子们仍然感到安全。由于爸爸的周旋，家庭得到了保护，而没有受骚扰。过路的军队宽容了行政长官和他的家人。

突然，格林一家遭到了不幸。在 1796 年新年前夕，爸爸得了肺炎。雅科布作为一个长子——他当时 11 岁——给住在哈脑的祖父写了许多满怀希望的信。可是死神毫不留情地临近了。1796 年 1 月 10 日，一家之长逝世了，终年 45 岁，死后把一个 40 岁的寡妇和她身边的六个孤儿撇在这个世界上。细心主人所收集起来的包着红绿硬书皮的书籍、公文和信件孤零零地留在书架上，无人过问。

在灰色茫茫的晨雾中，雅科布穿着一件睡衣溜到了停尸房的门前，轻轻开了一条门缝，向里边看了一眼，棺材匠正在灯光下量尺寸。雅科布清楚地听到这个棺材匠对自己的助手说：“躺在这儿的这个人，值得用一口纯银棺材”。1 月 12 日早晨，雅科布从窗子里看到，有几个男人，一只手拿着柠檬花和迷迭香，把黑棺材抬了出来。于是热爱人们同时也被人们热爱的父亲葬在城墙旁边的一个墓地里。

办完丧事之后，雅科布作为一个家长在家谱上登记了父亲的死亡。然后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亲友。这时雅科布哭了，因为父亲再也不会抚摸他的头了。

丈夫死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搬出了行政长官公馆，一家孤儿寡妇在古季斯特医院大楼里找到了一个暂时栖身之地，这是施太诺城最老的一所房子。但是这所浪漫式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是过分拥挤了。几个月之后，母亲

在“旧酒窖”附近，离大桥门不远的地方买了几间房子。她在那里住到 1805 年。

1796 年，奥地利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法国统帅茹尔丹在阿姆别尔格附近被奥地利卡尔大公击溃了，被迫退到了莱茵河左岸。法国军队在退却的时候也威胁到了黑森邦，齐麦尔爷爷在发往施太诺的信里写道：“由于大批军队从这里路过，一切都使人感到极大的惊慌和担心。”

战争的危险刚刚过去，死神又来到了格林的家里，精力充沛而又麻利的什列麦尔姑姑一直在格林家帮着操劳家务。可是就在她兄弟去世的同年 12 月，她也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一天夜里，她觉得死神来临，就要求兄弟媳妇为她祈祷，格林的母亲开始念祛病的祷文。姑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她反驳说：“不对，不对、弟媳，找一篇给要死的人念的祷文。”

父亲和姑姑的死对雅科布和威廉影响很大。他们好像大人一样，现在同母亲共同照料着家庭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当然，住在哈脑的爷爷也经常惦念着他们。不用说，在卡塞尔诸侯宫当使女的根里耶塔·齐麦尔姨母也在体贴入微地帮助自己的外甥。雅科布和威廉非常懂得自己对弟弟妹妹所担负的责任，并且也懂得必须为他们作出好的榜样。他们亲眼看到，母亲现在只是为了照顾六个孩子而活着，在痛苦的重压下，她的背已经驼了，她那清秀的面孔变得越来越苍白了，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皱纹。

在施太诺，雅科布经历了自己一生中又一重要事件。1798 年复活节前的礼拜日，在圣叶卡捷琳娜教堂为他举行了坚信礼，而且他第一次参加了圣餐礼。后来雅科布曾说：“我感到再也没有比这更虔诚的了。”

格林兄弟在这里上学的时间不长。雅科布伤心地对母亲说，他在施太诺再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哭了起来，尽管他满心爱上了这个城市——父亲的故乡。母亲想，为了两个大儿子能够继续学习，她需要考虑和决定许多事情。

3 卡塞尔的学习年代

1798 年夏，格林的母亲同在卡塞尔宫当使女的姐妹根里耶塔·菲利皮娜·齐麦尔商量：怎么样把雅科布和威廉安排在卡塞尔更高一级的学校去学习。根里耶塔的“心里充满了”对外甥们的“最纯洁和最富有忘我精神的爱护”，她同意接他们到卡塞尔，并为他们提供食宿。这样，格林的母亲除了同意孩子们走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她也未必能够给孩子们适当的学校教育更多的东西。

1798 年 9 月的一天，13 岁的雅科布和 12 岁的威廉坐上了饰有王冠的驿车，离开了施太诺。他们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他们看到薄雾在苹果树林的上空慢慢升起，心里难过极了。格林兄弟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童年。母亲跟在他们后而洒着眼泪，不断的搔动着头。

在乘坐驿车旅行时的新鲜感和频繁地更换马匹逐渐使得格林兄弟快活起来，他们满怀希望地向目的地驶去。他们先来到哈脑，爷爷齐麦尔在这里迎接了他们。在法兰克福，由总驿站长柳佩利负责关照格林兄弟。请他们吃了饭，喝了咖啡，总驿站长甚至还带他们去看了当时在美国兹京城进行巡回演出的马戏团的演出。这个马戏团带来许多野生动物，有大象、老虎、鹦鹉和猴子，等等。后来，让这两位感到惊讶不已的少年参观了蜡像馆，这里正在展出蜡雕，有许多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皇帝、国王、将军和其他历史人物。在旅馆里，晚上给他们吃了美味的晚餐，才去睡觉。第二天早上 6 点，在驿车没有上路之前，又给了他们一封交给下一站驿站长的介绍信。这样，格林兄弟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卡塞尔。

姨母作为一个宫廷的使女，没有自己独立的产业，因此就决定让两个外甥在一位宫廷厨师家里搭伙。她随即送给了自己的被监护人各种有用的小玩艺儿，如日历、丝绸钱包。雅科布和威廉对于他们在这个新世界的开端感到非常满意。格林兄弟很快认识到，在施太诺，在他们过去的教师增克汉的教学中，有些地方不十分好。当然他也教会了他们勤奋和埋头苦干。但是在进入中学（这所中学后来改为弗里德里希中学）之后，他们发现相当多的东西没有学，雅科布立即被编入一年级，而威廉不得不先补习部分课程，尔后，于 1799 年复活节前进入了同一年级。中学一般学习七八年。由于格林兄弟的勤奋和天赋，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所学的材料，跳过了几个年级，学了 4 年，就中学毕业了。

在中学学习期间，从哈脑和施太诺经常有来信提出各种建议，格林兄弟努力遵照这些建议办事。爷爷曾给两个孙子写道，他们应当经常记住他们来到卡塞尔的最后目标，应当在学业上表现出最大的勤奋，并且以自己的勤劳“为未来的幸福打下基础，从而为家庭带来欢乐”。他告诫说：“因此要回避可疑的人们，他们会带你们去干不好的事，要与有理智的人交往，从他们那里你们能够学到有益的东西，但首先要崇敬上帝，这是一切智慧的起源。对于你们这个老爷爷来说，经常接到你们关于这一切的愉快消息，该是多么高兴啊！”

但是爷爷并没有长久地接到这种消息。1798 年 11 月 22 日，一个比自己妻子的天年长得多、从来没有病过的 90 岁的老人，在睡着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爷爷的死使孙子们感到震惊，格林的母亲也承认，随着爷爷的死，又增加了许多操心的事情。她叹息道：“打击接踵而至，我这个没有用的脑袋

忙得都发晕了。”

母亲惊恐地想到，如果老天爷把她召走，孩子们将怎么办。那时大孩子们就不能再学习下去。她告诫他们要离开那些好轻举妄动的大学生，并极力提醒他们，不要参加那些对同龄人来说不足为怪的娱乐活动。在爷爷死后，她给在卡塞尔的儿子写信说：“感谢上帝，希望你们都健康。你们继续这样学习下去，我将得到宽慰，要努力在各方面都使善良的姨母感到愉快。你们这一生都报答不尽姨母对你们所表现的爱抚之情。”

雅科布和威廉都在努力作一个无愧于这种爱抚的人，并尽力不辜负长辈们的期望。从 1798 到 1802 年，在卡塞尔学习的时间里他们研究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伦理学、物理学、逻辑学和哲学，不过教学的基础是语文和历史。对雅科布来说，更高兴的是研究语言和历史，他当时已经对这两门学科特别感兴趣。格林兄弟每天在中学学习 6 个小时，此外，再加四五个小时的家庭学习。在家里，宫廷少年侍卫的教师基特马尔·什焦尔特别愉快、特别热情并且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学习法语和拉丁语。结果，两个青年人一天学习 10 到 11 个小时，事实上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雅科布贪婪地吸收和掌握一切新的东西，他在几年之后曾说：“总的说来，我们负担毕竟过重；如果有几个小时的空闲，对我们想必是非常有益的。”

尽管负担过重，雅科布以相当充沛的精力把在中学学习的几年坚持下来了。他体格消瘦、匀称，甚至可以说是优雅，而且比富于幻想的威廉更能耐劳。雅科布经受住了许多事情：既经受住了多半是坐着的、不活动的生活方式和缺乏新鲜空气的生活，也经受住了无止境的读死书的学习方法和没有任何体育活动的生活，而且健康情况没有受到多大损害。而威廉在害过猩红热之后，觉得心口疼和呼吸困难。从这时起，在去中学的时候，特别是冬天，冷风扑面时，他感到非常难受。

有时候，如果格林兄弟能够得到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他们就用它来画图画。经过独立的学习，他们成了熟练的素描画家。当雅科布和威廉后来在家里展出他们的图画时，大家都非常高兴，特别是小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利。谁知道，路德维希·埃米利后来学画是不是受了两个哥哥的影响。他作为著名的版画家和写生画家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格林兄弟也迷恋于收藏活动。有许多书籍凭他们手头的那几个钱是无力购买的，因此摘抄各种书籍就成了他们收藏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非常整齐地把文中有趣的、他们所喜欢的地方抄到一个个专门的本子里。

由于勤奋和专心，格林兄弟在中学进入了优秀学生的行列。雅科布头脑清醒，差不多总是班里第一名。当每个礼拜六进行一周检查时，他常常能出色地回答所有问题。

威廉却不是永远能赶上哥哥的。在中学，雅科布第一次碰到了不公平的事情。他知道，在法律和习俗面前人人平等。当时有一个教师对所有的学生都称呼“您”——习惯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单独对他说“你”？难道只是因为他是来自乡下吗？雅科布气忿地说：“教师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允许自己强调这种不平等，因为学生会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

在卡塞尔的教师中，中学校长里赫捷尔教授受到特别的爱戴，而且他还是公认的真正语文学家。他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待人亲切随和，既贴己又得体，因此博得了学生们的好感。还有一些人，如：副校长霍斯巴赫，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有一个名叫罗别尔特的教员，在学生中毫无威信，因此，

在他的课上学生们总是大声吵嚷。正如雅科布·格林后来所写的，这所中学“绝不能认为是这类学校中最完善的学校”。不过学生们在这里毕竟为进入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雅科布和威廉在卡塞尔学习时期的朋友当中，有未来的作家埃伦斯特·奥托·封·德尔·马利斯堡和帕乌利·维甘德。后来，马利斯堡和浪漫主义作家蒂克保持有友好关系，自己写了许多浪漫主义诗篇并且翻译了卡利杰隆和洛佩·戴·维格的作品。维甘德成了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发表了许多历史研究著作。他们的这种友谊在中学毕业之后也保持了多年。格林兄弟同马利斯堡和维甘德的通信就是这种关系的证明。

闲暇的时候，格林兄弟就同朋友们在卡塞尔散步，有时到城外去捕蝴蝶或者采集植物标本。跟同龄人一样，他们也喜欢较量力气、淘气，有时也用背包互相打闹，讲课枯燥无味的时候，就交换看各人写的诗。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做一个勤奋的、有坚定目标的学生，当然他们也不是听话的孩子。由于拮据，必须尽快从中学毕业，他们不得不非常勤奋。

格林兄弟在这个时期读了很多书，起初，不加选择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对于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他们没有辨别能力。他们特别喜欢诗和短篇叙事诗，搜集了满满的好几本，把拉封丹的明哲的寓言读得滚瓜烂熟。要拥有自己的图书的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可是因为手头不宽裕，所以格林兄弟常和朋友们到旧书摊和旧货商那里去寻找价钱便宜的读物。

在卡塞尔的学习年代，虽然经常要求雅科布和威廉努力和顽强地学习，但是也有愉快的时刻。每年秋天，在和母亲分别11个月之后，格林兄弟便回到施太诺，回到所谓“旧酒窖”，在家里住几个礼拜。因为格林家的这所住宅也附有牛栏、马厩、草棚子、不大的花园和菜园，所以对格林兄弟来说假期就意味着回到了乡村。他们还按照母亲的吩咐宰了小乳猪，而且一个个都吃得饱饱的。在这几个礼拜，母亲简直乐开了花！每天晚上，她在家里点上自做的蜡烛，让格林兄弟讲述在学校的情况。雅科布和威廉觉得在家里很好：他们像父亲那样关心弟弟妹妹的成绩，他们还讲述了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们的情况。在施太诺街头散步的时候，总是同遇到的人点头行礼。这使他们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童话世界。快乐的假期又被卡塞尔紧张的学校生活所代替。但是经常对母亲和根里耶培姨母的回忆帮助他们熬过了困难的时日。在一首简短然而真诚的诗里，兄弟二人企图把自己感激之情表达出来，在纪念1802年新年的时候，雅科布向姨母献上了这样一首押韵的祝词：

去，去，去到神圣而光明的天境，献上我感激之情，述说高尚的心地，信念的激情，和理应幸福的爱护心胸，我们在天堂的父亲一定会听到我那寓于快乐之中的热烈恳请。

对于你慈善的奖赏这里是感谢，那里是桂冠一顶。

这种感激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学习成绩上：1802年复活节，雅科布从校长手里领到了中学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书面评语写道：“鉴于这个优雅的青年富有天才和学习勤奋，应给予最高表彰，他在掌握本校所教授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方面具有少见的顽强性，此外，他不仅表现了自己天赋的爱好和才能，而且也表现了可贵而值得赞扬的以自己的劳动发展和提高上述爱好和才能的意向。”这为雅科布创造了进入大学的可能性。只有一件事使他不高兴：需要有一段时间同首先要治好气喘病的威廉弟弟分手。

4 马尔堡的大学生

1802—1804 年，这时雅科布·格林已经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这个时期德国在拿破仑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格林兄弟。这时德国的某些邦已被撤消。寺院的土地已被没收。重新划定了德国内部的边界。换了新的称号和职务。格林兄弟的祖国包括黑森和卡塞尔在内的一个不大的地方，被升为侯爵一级的领地。

当时的大学是这样：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公开表露自己，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非常了解。马尔堡大学当时共有学生二百名左右；雅科布是其中之一，他选了法学作为自己未来的专业。的确，他始终爱好大自然，爱好神秘而尚未揭开的植物界，他曾几次研究植物学。但是为了纪念父亲，他终于决定做一个法学家。父亲始终企图在孩子的心里激起对于这一职业的热爱，经常向他们解释法典上的条款和规章；他甚至抄写了自己实践中的种种不同的案例，因为这在以后可能对儿子有用。

当雅科布学习法学基础知识的时候，威廉因为气喘病的发作而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只是到 1803 年春，他才觉得好一些，于是雅科布把他带到了马尔堡。在这里威廉也进了法律系。兄弟二人又将在大学一起学习，互相帮助。当然，就是在马尔堡，威廉也定期接受医生的观察。

马尔堡是一个重要的、有趣的城市，格林兄弟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大学生活。这里有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其中包括尖顶高人云霄的哥特式圣伊丽莎白大教堂，教堂里有带画的玻璃、地下室和度勒的绘画。一座古代城堡照例高高地耸立在城市中心，从这里可以看到山谷和马尔堡四郊的壮丽景色：树林葱郁的丘陵，绿草如茵的牧场和在茂盛的草丛里潺潺流动的小溪。这种绝美的风景吸引了格林兄弟，他们跑到流泉那里，坐在一棵老柳树下，一面观察着乡村屋顶上洒满金光的太阳，一面陷入了遐想之中。

但是，很遗憾，格林兄弟用于这种游玩的时间太少了。和在中学一样，他们的时间都用在学业上了。费用和过去一样不足，正像雅科布痛苦地指出的，他们的生活有着“极大的限制”，纵然如此，他们一次也没有得到过国家的哪怕是为数不多的物质援助。要知道母亲作为一个国家职员寡妇，养育着五个儿子。可是其他学生都获得了大量的助学金，比如他们的中学同学奥托·封·德尔·马利斯堡就是一个例子，他出身于一个有钱的地主家庭，并且属于黑森贵族中受人尊敬的等级。格林兄弟只好把对当局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态度的痛苦的怨气压抑在心中。不过这同时也给了他们以力量，使他们成为更顽强、更坚定的人。雅科布认为，谁来自最下层，谁就会以自己取得的成就而比那种靠出身和财产轻易获得成就的人更值得骄傲。他们不但听逻辑学和历史课，而且还听自然法、国家法、私法和刑法等课程；学习司法方法论和法定继承程序；了解了罗马法史的秘密；债法他们也可没放过，更不用说古罗马法学纲要和罗马法典了。有时课讲得非常快，这时只能匆忙地记下它的要点，而且还有许多涂改的地方。以后就在家重抄一遍。

马尔堡大学当时大多数教师的名字对读者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弗里

德国有参加皇帝选举权的邦君。

度勒（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伟大画家。

民法的一部分。

德里希·卡尔·封·萨维尼的名字对格林兄弟及其生活和创作产生过最大影响。萨维尼是一个法学家、罗马法史专家，后来曾担任大臣，是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只比雅科布·格林大六岁，1803年，他发表了《占有权》一书，并以此奠定了法学历史学派的基础。

有一次，在萨维尼的辅导课上，雅科布写了一篇专门论述法律的论文。年轻的教授对这位大学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雅科布正确地、无可指责地解决了所提出的任务。这一评价鼓舞了雅科布。由于他有机会经常把其他学生的家庭作业带给教师，所以他们之间建立了个人接触，于是雅科布就得到允许：可以利用学识渊博的萨维尼的丰富的图书。很快，萨维尼的课程成了雅科布最喜爱的课程，对萨维尼本人他也极为崇拜。

1803年夏，雅科布时常到萨维尼家里来。经过巴尔菲尤谢尔大街一座不大的房子，进入一条狭窄的小胡同，然后像上旋梯一样，绕个圈子，走到一个公墓跟前，从这里可以看到有无数向下伸延着的屋顶和花园的美丽的城市风光。再从石墙旁边走过去，雅科布就到了一条更高一层的胡同。这里有一座房子，从远处望去好像一个贴在这一层边沿上的大鸟窝。萨维尼就住在这里。在这里，任何外界的事情也不妨碍他的学术工作。仆人打开了门，把来访者带进充满阳光的房间。这里有软座家具，明亮的四壁和挂在墙壁上的铜版画，这一切都适宜于友好而愉快的谈话。在窗外，可以看到山谷、蓝河、河两岸的草地和在遥远的朦朦烟雾中隐约可见的山峦的轮廓。

主人又高又瘦。他身穿灰色便服和一件褐色的带蓝条纹的坎肩，沉思地站在书架旁边。教授有许多许多的书。雅科布不但可以欣赏装满书籍的大书柜，还可以登上阶梯取书、读书、甚至可以把书拿走。

威廉和他哥哥雅科布一样，也非常高兴听萨维尼的课。教授讲课生动而又流畅，绝无以表面动听而又空洞无物的语言来哗众取宠的企图。他学识渊博，通晓而且喜欢文学，有时，为了使讲课生动，他朗读一些诗句或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片断。

萨维尼认真、明睿而且以人所具有的极大的敏感性把格林兄弟引进了科学研究的世界，他们正是从自己导师那里学会在研究社会现象中珍视历史主义，从他那里学会善于在各方面，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在科学探索中遵循的方法。

这个时期，青年大学生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魏玛古典作家新作品的问世。但是他们也在细心听取文学新流派——德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的主张。原来，格林兄弟同浪漫主义者第一次，也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见，是在学生时代由于他们的朋友和教师萨维尼的帮助而实现的。18世纪末，在欧洲精神生活中发生根本的历史变动和灾祸的时代，出现了开始研究过去伟大历史的新潮流。这个潮流的一些代表人物对日常生活的现实，对于古典主义的慢条斯理以及对于唯理论，再也不感到满足了，他们向往世界的无限性，渴望冲向天空。

1803年，雅科布·格林接到了路德维希·蒂克的一部由他改编并刚刚出版的《德国爱情歌手之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雅科布以后的创作命运。这部作品的序言就把人带进了德国中世纪的诗歌世界。”春天，美，激情，是这部作品中使我们百读不厌的固定主题。好像教堂的圆柱和拱门变成了尘

世的容纳所一样，宗教作为最高的本原也左右了诗歌和所有的人以同样的爱所服从的现实，诗歌不是反对某种东西的斗争工具，它什么也不证明，而且也不反对任何东西，它只不过是把自己全部真率的美事先表达出对它所歌颂的东西的信念。那个时代的、自然而天真的语言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它是一种令人迷醉的戏谑，这是对于春天，对于春天的花卉和光辉的经常的享受，这是对美女的热情洋溢的歌颂，是对于她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抱怨或者是相爱的喜悦。诗歌既不寻求信念，也不寻求某种特殊的表现，每一个词都是自然而然地，自愿地进入诗句的，可是最大的优美和华丽都在自然的朴素中或在带有音乐和韵律的儿童笑话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些关于几乎已经被忘却的德国中世界诗歌的话和蒂克对于爱情歌曲所作的评价，在雅科布的心里激起了想亲自了解用中古高地德语所写的诗歌的愿望。

1758—1759年，苏黎世的一个教授约翰·雅科布·鲍德麦尔根据海得尔堡手稿（手稿的一部分保存在巴黎）发表了士瓦本时期爱情歌手歌曲集。雅科布·格林很走运，他在萨维尼的藏书中发现了这本书：他站在书架平梯上，仔细地看一本本书脊，突然发现了他很早想读的这本书。若干年后，雅科布曾写到这次幸福的发现：“我突然看到了这本我以为永远没有希望看到的书，我记得在右边靠近进门的地方，在书柜的最里边，放着这部四开本的书——鲍德麦尔的爱情歌手的歌曲集；我抓住了它，生平第一次把它打开并且读了下边的名字：‘雅科布·封·瓦尔特君与克里斯季安·封·哈姆列君’，诗是用古怪的、一半不懂的德语写的。我产生了一种预感，我将不下十次地从头到尾反复阅读这本书，并且它对我将是经常需要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几年以后，我在巴黎图书馆要求看看印成这本书的手稿，以便看一看美丽的插图，当然某些地方要抄下来。单单是看一眼这种书就在我的心里激起了阅读我国古代诗人的原著和学懂它的那种不可遏制的愿望。”

雅科布和威廉只是根据传统和必要才学了法律决疑法。德国早期诗歌的发现和它的神交，成了他们以极其偏爱的态度关心这种图书的开端。雅科布，后来还有威廉，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德国诗歌的渊薮，而这些诗歌逐渐向他们打开了自己最美的篇章。古代的语言令人迷恋，一个不曾认识的世界以惊人的光彩展现了出来，并稍稍露出了整个中世纪诗歌的惊人丰富的宝库。兄弟二人越来越经常地把复杂的法律案件搁置一旁。科学的嗅觉经常提示他们，在过去丰富的诗歌和古人的语言中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法学是一块已经耕耘过的土地，而对古代德国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这是一块吸引着格林兄弟科研才智的处女地。在马尔堡，格林兄弟通过萨维尼认识了德国浪漫主义主要作家之一，克列姆斯·布伦坦诺和他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朋友。1803年布伦坦诺同索菲亚·麦罗结婚。1804年萨维尼又与布伦坦诺的妹妹库尼贡达结婚。在这里，格林兄弟又遇到了布伦坦诺的另一个妹妹贝蒂娜，她成了格林兄弟常年的朋友。

克列姆斯·布伦坦诺的朋友们经常在他的马尔堡的家里聚会。他们议论

《爱情歌手之歌》的重要的海得尔堡手稿写于14世纪初，它包括141个诗人的作品（共7000节）。手稿绘着不但具有艺术价值、而且也具有历史价值的图画，这些图画提供了关于当时宫廷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在30年战争时代，手稿从海得尔堡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巴黎被发现。1888年，手稿又回到了海得尔堡。

最高帝国议会成立后德国各个公国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当然，他们怀着外省人的某种骄傲心情谈到黑森—卡塞尔成了侯爵领地。但是诗歌毕竟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萨维尼的忠实学生格林兄弟以崇拜的态度看待布伦坦诺，国为诗人刚刚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哥德维，又名母亲的石像》（1801年），这部非同凡响的、独出心裁的作品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天才和惊人的想象力。谈话常常备有茶和红酒，有时谈到很晚。楼梯上笨重的银质灯盏里的灯光照着离去的人们。兄弟二人经过黑暗的马尔堡街道回到自己的陋室。

由于经常到布伦坦诺家里作客，格林兄弟越来越深信，司法和行政职业，这并不是最吸引他们的工作。研究诗歌和语言中尚未开拓的领域，在这方面说出自己的某些东西。这应当成为他们主要的事情。但是他们作为穷学生，当然了解，他们不能虚度光阴，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日常生活。每次回到施太诺，在家度假时，他们才想起忘了把最重要的一点——挣钱——列入自己的计划。

格林兄弟身穿当时大学生的普通衣服：带黑色丝绒领和翻袖口的礼服，到膝盖的皮短裤和发亮的带有马刺的高筒马靴。当他们穿着这身衣服在施太诺出现的时候，母亲感到很幸福，而弟弟妹妹也尊敬地看着他们。在家里又是给他们炸小鸡，烤带李子馅的大馅饼。他们又是拜访熟人，参加各种喜庆活动和朋友的婚礼，或者骑马到四郊——童年时代的地方——去玩。有时也到邻村去。碰到了老熟人，就谈论政治，谈论拿破仑，但每次他们都匆匆忙忙赶回家去，因为母亲在等候他们吃晚饭。母亲心想，在假期里他们能和自己在一块多呆会儿也好。可是时间过去了，为了不误学业，儿子们应该走了。又要和他们分离、母亲是多么伤心啊！

5 雅科布·格林

第一次到巴黎即将过去的 1804 年给法国——德国的西邻——带来了巨大变化。全民表决批准了元老院关于使法国变为一个继承帝国的决定。罗马教皇为波拿巴登极施行涂油式，于是 1804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以拿破仑一世皇帝的名义在巴黎接受了加冕礼。

正好在这个时候，萨维尼到许多城市作学术性旅行，曾经在一些图书馆工作并搜集了罗马法史的资料。他来到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可是他那只装着全部笔记的箱子被人偷了。萨维尼宣布箱子遗失，并答应以一百路易多尔作为对归还者的酬劳，可是箱子没有找到。这位学者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只好追忆自己的笔记和有时求助于巴黎各图书馆的藏书。这项工作要花费好多时间，于是萨维尼开始寻找助手。只有雅科布·格林，他这个最有才能的学生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他。1805 年 1 月，萨维尼向马尔堡发了一封信，建议雅科布尽快来到巴黎。

对于雅科布来说，这个建议是出乎意料的。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学期，他准备在复活节前或者万不得已已在夏天通过考试，并开始独立工作。可是心爱的教授的建议是如此诱人！要知道他将住在巴黎，住在萨维尼为自己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库尼贡达·布伦坦诺所租的那所房子里。雅科布懂得，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仅能够摘抄法学论文，而且他有足够的时间在大量手稿中寻找德国古代诗歌作品。

但是在接受建议之前，雅科布先写信给母亲和姨母齐麦尔，请求她们同意他到巴黎去。雅科布认为，萨维尼所提供的工作条件是有利的。此外，他还希望在那里获得经验，将来回国后能比较容易找到一个职位。姨母没有反对，母亲也同意了，虽然她心里还有些“担心”。她一想到驿车在严冬穿过深雪的困难，就心中不安，于是就为儿子作祈祷。

马车在梅因兹附近顺利地过了莱茵河，然后经过沃尔姆斯、福兰克塔尔、开泽尔斯劳捷伦和萨尔布吕肯前往梅次。他又像在童年时代某个时候一样，欣赏着大教堂。他在旅行日记里写道：“这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教堂，是我见到过的所有教堂中最美的，窗子很高，窗上镶着满是色调极其纯正的彩色玻璃制成的绘画玻璃。”当他过了凡尔登，到达沙隆郊外时，马恩河谷给了他愉快的印象。

当雅科布在 1805 年 2 月把顺利到达巴黎的消息终于通知母亲的时候，他的母亲非常高兴。在儿子赴法的长长几个礼拜当中，她每天夜里时常起床，看看窗外的天气如何。她在信里告诉儿子说，宰了一只二百五十磅的猪，并且做了特别粗的香肠给儿子回来吃。

哥哥走后，留在马尔堡的威廉好长时间非常忧郁并且感到十分孤单。他以苦闷的心情给巴黎的哥哥写信说：“当你走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好像撕碎了，这使我受不了。你不能想象，你对我是多么可贵。每当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家，我好像觉得，你能够在屋里从任何一个角落冒出来……”

“时间过得非常快；你走后已经过了 14 天，可以不夸大地说，我的心仍然充满了血。表面上看，好像已经习惯了，可是内心，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习惯下来。当我想像到一个广阔的世界在你的面前展现

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我只看到你在我身旁，看到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当然，对现代的读者来说，这种表示激情的语言好像是奇怪的。甚至会使人发笑。然而这种感情却是真实的，因为兄弟中任何一个人都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一部分。雅科布和威廉彼此之间联系非常密切，他们的生活、观点和命运完全不可分割，以致他们是作为格林兄弟而进入文学界的。

雅科布从巴黎给弟弟写了一封非常温情的回信：“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打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另一个人就要跟他到那里去。我们都非常珍视我们的手足之情，对我来说，离别无异于死亡。”

那时，雅科布在勤奋地完成着萨维尼的任务。除了礼拜天以外，他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仔细核对法律的原文，学习辨认旧的手抄文件并从手写材料和印刷材料中作摘录。在萨维尼的住处，则把摘抄出来的文本同他们原来的文本加以对照，进行科学分析。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雅科布就研究古代德国文学。根据威廉的要求，雅科布在国家图书馆的十六万份手稿中寻找最古老、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东西。

每个礼拜天，当图书馆闭馆的时候，雅科布就参观、了解法国京城。他很仔细地研究了这座有许多历史古迹的名城。在巴黎街头，许多种族混杂在一起，黑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法国人中走来走去，这使他感到惊讶；但是，对于像巴黎这样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居住有各个不同民族的人的现象使雅科布很快就习惯了。雅科布对四郊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吸引他的只有坐落在弗布尔·圣一日耳曼的有画廊的卢森堡宫。在画廊的收藏品里有度勒、范一艾克、贝里尼的作品和鲁本斯的许多大幅油画。在意大利人当中，他特别喜欢替善，雅科布认为他的画《情人》是一幅“绝美”的画。他像入了迷似地欣赏古希腊罗马雕刻品。他对弟弟威廉写道：“如果我再到那里去的话，我将什么事也不做，只欣赏拉斐尔的作品，欣赏拉奥孔和阿波罗并谦恭地向他们鞠躬致敬。”

是的，当年在战争中根据拿破仑的命令把许多国家的艺术珍品运到了这个城市，在这里有不少值得看的东西！帝国的京城是一座非常豪华和壮观的城市。市中心有罗浮宫的巴黎，扮演着世界豪华城市的角色。

庸俗无味的消遣和京城无聊的娱乐活动与雅科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晚上出门的话，那也只是到剧院去，并且和萨维尼在一起。当时在巴黎有十八所剧院，并且每天演出。不过很少更换演出的剧目。雅科布的法语掌握得相当好，因此可以对看过的剧目进行评价：他认为喜剧平淡无味，而悲剧常常是很可笑的。的确，他很喜欢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可是有时候，这些悲剧也使他感到枯燥无味。他喜欢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这在德国舞台上是没有的，但是他反对观众在每一个演员上场和下场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妨碍剧情的进行。当然观众花了钱会得到某种东西。为了使观众更好地娱乐，

范一艾克（？—1426）尼德兰画家，现实主义奠基人，油画发明者。

贝里尼（1801—1855）意大利作曲家。

鲁本斯（1577—1640）佛兰米写生画家。

替善（1477—1576）意大利伟大画家，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之一。

拉奥孔希腊传说里的特洛伊英雄，他的死曾是古代雕刻家们所喜爱的题材。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神之一。古希腊雕刻家常以他为题材，借他的形象表现男性的美。

当时各剧院一个晚上要演出几个剧本，一般要演四五个小时。

除了萨维尼和他的妻子之外，雅科布在巴黎很少见到别人。这时，雅科布的中学同学埃伦斯特·奥托·封·德尔·马利斯堡住在法国京城。他被正式调到他叔叔——拿破仑朝廷的黑森公使——那里暂时任职。雅科布来到巴黎之后，立刻就接到了马利斯堡为表示友好而寄来的法国悲剧作家的一部很好的作品。

雅科布虽然在了解法国文学，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德国的诗人，其中包括魏玛古典作家，关于这一点有许多他在巴黎时期的重要证明。1805年5月，当巴黎的一个杂志报导了席勒逝世消息的时候，雅科布给威廉写信说：“得到亲爱的席勒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几周之后，他在给弟弟的信里表达了自己对另一位魏玛人的深厚的敬仰之情：“歌德是这样一个人，为了他，我们德国人对上帝是永远感恩不尽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和拉斐尔齐名的人物。”

未来的计划越来越清楚了。雅科布把自己从巴黎回来以后留在里森并在那里寻找工作的果断决定告诉了姨母齐麦尔。他希望当教师。如果这种职务不是从早忙到晚，而留有时间从事科学活动，那是很不错的。

雅科布认为，只有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才是自己生活的意义所在。他所希望的并不是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是能使他把日常工作同科研活动结合起来。当然，雅科布也在考虑使母亲从大家庭的操劳中摆脱出来。威廉经常从马尔堡写信给哥哥，他赞成哥哥的想法。他在对雅科布建议同他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回信中写道：“你写信谈到我们应当永远在一起，这永远合乎我的愿望，因为我觉得，任何人也没有像你这样爱我，而我，也是诚挚而真情地爱你。”

在整个这段时间，威廉一直保持着他们在马尔堡学生宿舍的良好秩序。宿舍里添了一张新书桌。摆上了花——桂竹香，好像处于等待状态，虽然雅科布还没有通知自己回来的日期。格林兄弟的藏书在这个时期大大地增加了，订书工人对所有的书都进行了整理。

自然，很快就提出了他们将来共同居住在什么地方问题。还是在巴黎的时候，雅科布就曾幻想卡塞尔——黑森侯爵领地的京都——最能给他们提供“简朴而僻静的生活”和一起工作机会的城市。兄弟二人建议母亲卖掉施太诺的庄园，母亲同意了。

1805年8月，雅科布还在巴黎的时候，母亲就搬到了卡塞尔，住在她妹妹为他们租来的马尔克特加谢大街集市胡同的一所住宅里。根里耶塔·齐麦尔预先修理好了宽敞的住宅，甚至买了各种物品，只等格林母亲到来了。母亲很喜欢这所房子，而且离她的妹妹住地也不远。母亲开始准备两个大儿子的到来。

9月来临了，雅科布终于和萨维尼一起离开了巴黎。为了把威廉弟弟带上，他特地路经马尔堡。雅科布和威廉同母亲、弟弟和妹妹的会见是非常愉快的。一家人又到了一起！

6 不轻蔑自己就

胜利巴黎之行影响了雅科布结束大学学业——通过考试。威廉还要学习1年。格林家里年小的弟弟妹妹都上了学。雅科布明白，照料这个大家庭的担子完全落到了他的身上，所以应当考虑自己的工作。1805—1806年冬季，他试图得到一个法官或者书记的职位。1月份，他担任了黑森军事委员会秘书，薪金是三百马克银币。

军事委员会秘书的工作是枯燥的，显然，雅科布未必喜欢。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回忆起巴黎，在那里有古代手稿和有趣的研究工作，而且他不得不脱下在巴黎做的时髦的衣服，而勉强穿上挺直的军服。按照当时的习惯应当戴假发和涂发粉，雅科布也屈从了。在对巴黎搜集的手稿的研究工作中，他特别迷恋中世纪的散文和诗歌。在卡塞尔，他也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于这上面。如果他能买到珍贵的古籍，扩大自己的藏书，他就特别高兴。

充满希望的1806年的春天临近了。5月间，威廉将通过考试，并将等待委派职务。到那时格林家里将有两个人供养家庭。当然，在空闲时间兄弟俩将要从研究工作中。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没有财产而走这条道路虽说不能担保十分合适，但这是唯一可能的。不过，他们的计划不敢肯定就能实现，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1806年夏，弗朗兹二世被迫放弃了德国帝位。“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了，建立了例行的，即第四届反拿破仑联盟。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附近被粉碎之后，作为统帅的拿破仑的声望越来越高了。当黑森侯爵威廉一世满以为拿破仑不会派自己的军队反对他，然而法国人已经接近了他的京城。他们平静地逼近了卡塞尔，并于11月1日占领了这座城市。率领法国人到这里来的是拿破仑的一个元帅和皇帝的兄弟荷兰王路道维克。黑森侯爵逃到了国外。

威廉·格林曾写道：“那一天，即在此以前所存在的整个制度崩溃的那一天，将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10月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以某种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远处法国人警戒的篝火；然而，当我第二天早晨看到法国军队耀武扬威地经过旧城堡进城之前，我还不相信黑森会处于外国统治之下。很快，一切都变了样——外国人，外国的风俗习惯；在街头则是外国人响亮的谈话声。”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法学家威廉·格林还能指望获得职务吗？雅科布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在黑森被占领之后原来的军事委员会立刻被改组成部队供应委员会，由于雅科布法语说得好，他不得不同占领当局的代表进行大量的交涉谈判，但是，同侵占他心爱的卡塞尔的人一起工作是他力所不及的，于是就在1807年夏辞去了职务。当然，下决心这样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失去赖以生活的费用。但是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忍受侮辱。雅科布曾希望在卡塞尔公共图书馆谋一个职位，但是没有成功，每次都雇用了别人。

这样，雅科布就为谋取必不可少的生活费用奔波了1年。令人伤心的事变给失望的年轻人带来的只有新的惊慌。拿破仑强迫普鲁士缔结了有失尊严的梯尔西特和约，结果普鲁士失去了易北河左岸的领土。在这里建立了维斯

1807年俄国与法国和法国与普鲁士在梯尔西特签订的和约。

特伐利亚王国。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成了这个王国的国王，并且在自己的府邸——卡塞尔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他奉行的原则是：“明天照常寻欢作乐！”

正是在这时，当大家对未来失去信心，国家忍受沦亡之苦的时候，格林的家里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雅科布曾经写道：“在辞去充满痛苦和惊慌的 1807 年和迎来前途未测的新的 1 年之后，我很快就经受了生活中最重的打击。1808 年 5 月 27 日，我们亲爱的母亲去世了，她当时五十二岁。我们大家非常热爱她，而她在弥留之际感到不能自慰的是，伤心地站在她病床前的六个孩子，哪怕有一个孩子现在有物质上的保障也好。”

雅科布和威廉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一天，善良而温和的母亲的形象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她现在好像就坐在桌前，把她那干枯而又非常温暖的双手伸向孩子们。有时，她打开自己所喜欢的理查逊那部充满惊险情节的小说《葛兰底森》，或者盖勒特的剧本《害羞的牧女》，当年她自己曾经演过这个剧。

但是阅读有教益的家庭小说以及有趣的、具有田园诗意的剧本的时代过去了。大街上经常听到法国士兵的脚步声。而且不管多么大的不幸，也不能长久沉湎于丧事。23 岁的雅科布，作为家里的老大，现在既要代替父亲，又要代替母亲。弟弟和妹妹洛塔都在帮助他料理家务，虽然维持母亲所建立的秩序十分困难。这时雅科布正在找一个比较固定的工作。他认为，归根结底，除了自请为维斯特伐利亚王国新国王热罗姆效力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而于 1808 年担任维斯特伐利亚教育部总长的历史学家约翰·封·缪勒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帮助。他及时地指出了中古高地德语诗歌，特别是《尼伯龙根之歌》的重大价值，这样看来，格林兄弟的兴趣是合乎他的心意并为他所了解的。他建议国王办公厅秘书委托雅科布·格林在卡塞尔城堡——当时叫做拿破仑堡的威廉堡——管理国王私人图书馆。1808 年 7 月雅科布接受了这一职务。

法国人是宽宏大量的。对他们来说，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有几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就足够了，而且不作任何检查。办公厅秘书也放弃了对他工作上的指示，只要求雅科布一件事——在图书馆的门上用几个大字写上：“国王私人图书馆”。图书馆占满了底层所有的房间。关于薪金，开始答应每月结两千法郎，过了一段时间增到了三千法郎。工作很轻松。热罗姆和他的内侍官们只是偶尔到图书馆来。雅科布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如果他在工作时间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任何人也不会反对。国王本人是个“快活的人”，他对待自己的图书管理员很有礼貌，很好友。1809 年 2 月的一个早晨，国王来找雅科布，通知他说任命他为国务会议秘书，而图书馆的职务仍然由他兼任。新的职务为雅科布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薪金又提高了一千法郎。家里的生活开始富裕了。遗憾的是，母亲没有得到和他们一起高兴的机会。不过齐麦尔姨妈的心情是高兴的。

毕竟不能说这个年代是平静的。雅科布的新主人都是外国人，因此他所踏上的道路是不可靠的。但是雅科布暂时还没有考虑更换职位，因为他是全

即理查逊的小说《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这是一部书信体的爱情小说。

盖勒特（1715—1769）德国启蒙运动作家。

是一部约于 11 世纪末形成的记载德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大型“民间史诗”。

家的赡养人。雅科布差一点没有被抓去当兵，这曾使他感到不安。幸好，抽签没有抽中！另外还有一件操心的事，就是威廉至今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不错，他在《海德堡文学年鉴》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在学生时代就感到疾病的痛苦，在母亲死后引起了他的更大的顾虑。勉强强上几节楼梯，就急促地呼吸起来。他常常觉得胸腔剧痛，心脏越来越感到不适。有时心脏十分疼痛，使威廉产生惊恐。

很清楚，这样的健康状况，谈不上做任何工作。他如果能做点力所能及的科学工作，倒是很好的。1809年，威廉决定在哈勒疗养区请约翰·克里斯蒂安·列伊尔教授治疗一个疗程。也许，这会减轻他的病痛。

3月底，马车经过魏玛到达了不久前进行过可怕的激战的奥尔施塔特。在换马的时候，驿站长对他讲述了浴血的战斗。月光照亮了那块土地。在这里的山丘下面，埋葬着两万名死者。拿破仑的进军还需要有多少牺牲品呢？

在哈勒，威廉寓居在哲学和博物学家亨利·斯泰芬斯家里。列伊尔教授访问了他。他仔细听取了威廉关于自己病情的叙述。从教授的面部表情和姿态可以使人产生一种信心，这种信心给予病人痊愈的希望。教授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得出结论：心脏活动不正常，由于心脏负担很重，所以跳动好像很吃力。需要治疗几个月。

教授指定病人用很浓的药草浸液揉擦并用含有铁质和盐质的水浴疗。但他首先建议病人改变生活方式，摆脱紧张的工作，到哈勒的郊外多散散步。威廉遵照教授的建议，经常爬到赫比亨什太因山上，欣赏河谷和山上河流的美丽风光。这对他产生了良好作用，他觉得自己已经好一些了。

雅科布为弟弟感到不安，他对任何事情的希望也没有像对弟弟恢复健康那样强烈。他经常往哈勒写信，告诉威廉不要放弃任何治疗机会，至于钱嘛，他总是设法的。

哥哥的信给了威廉以支持，帮助他自觉地遵照教授的医嘱去做。有时对往事的回忆整夜整夜折磨着他，他总是恐惧地等待着入睡，觉得“在寂静中，久久不能入睡，感到身上的血液在奇怪地跳动，似乎恐惧已悄悄接近了心脏”。教授的浴疗和药疗使他恢复了睡眠。只是奇怪的梦和过去一样使他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

在哈勒，威廉的熟人不多。而且也没有机会结识朋友，因为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治疗疾病上了。作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莱哈尔德是威廉当时所结识的有数个朋友中的一个。维斯特伐利亚王国建立之后，莱哈尔德曾在卡塞尔担任了一个时期宫廷乐队队长。他本人和他一家对威廉特别关心，特别要好。照威廉的话说，音乐家是一个“富有敏感和高尚心肠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威廉所珍视的首先是为歌德诗歌所谱的乐曲。9月，治疗结束了，但是离工作还很远。

雅科布仍旧担任热罗姆的图书馆管理员。难道他能够放弃这个职务吗？虽然他继续为拿破仑的弟弟服务，但是这绝不是承认拿破仑的统治，也不是支持专制制度。雅科布和所有德国人一样，深深感受到了被占领的痛苦。

180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勃拉文什维格斯基公爵和封·席尔少校在北德意志举起了解放的旗帜，这时出现了改变现状的一线希望。1809年初，季罗尔的农民在安德烈阿斯·霍弗尔领导下于南方举行起义。然而无论是普鲁

士政府还是奥地利政府都没有支持解放斗争。拿破仑由于在瓦格拉姆的胜利和根据维也纳和约 夺去大片奥地利领土，这一切使人们认为，欧洲未必能够很快从拿破仑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格林一家的生活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维持下去——雅科布以后每天仍执行自己学者-图书馆管理员的简单职责。正是在这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年代，许多人感到没有丝毫出路而麻木不仁，而雅科布和威廉开始在实现自己巨大的文学计划，而这仿佛是一种英勇行为。

欧洲各强国联盟在结束对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后，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君主会议，会议不顾民族自决原则和各国人民的意志，把欧洲版图进行了重新划分。

7 在古典作品和浪漫主义之间

雅科布和威廉同克列姆斯·布伦坦诺的友谊远在大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这种友谊使格林兄弟同浪漫主义诗人接近。

1805年，在海得尔堡，克列姆斯·布伦坦诺和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在仔细研究了近三百年来的大量书籍和手稿之后，决定出版德国民间抒情诗歌集。第一部名为《小男孩的神号》，于1806年问世。后来，格林兄弟参与了增补的工作。这部集子对多少诗人和音乐家的创作给予了有益的激发！

1807年10月，布伦坦诺在给自己的朋友阿尔尼姆的信里强调指出，在这项工作中，事先得到格林兄弟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你同我在一起，是极端必要的，你来吧，因为编写《小男孩的神号》第二卷的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希望，你把你装诗歌的锦囊带来，而我这里也积累了许多诗歌，我们在这里从事这一工作会特别顺利，甚至比当年在海得尔堡还要好，因为这里有两个姓格林的可爱而又忠实的朋友，从前我曾引起了他们对古代德国诗歌的兴趣。2年以后，经过勤奋而又始终不渝地学习，我发现他们已经是修养有素的人了，不但积累了大量的笔记，掌握了许多知识，而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格林一家的生活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维持下去——雅科布以后每天仍执行自己学者—图书馆管理员的简单职责。正是在这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年代，许多人感到没有丝毫出路而麻木不仁，而雅科布和威廉开始在实现自己巨大的文学计划，而这仿佛是一种英勇行为。且也了解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各个派别，以致我担心，尽管他们很谦虚，但是他们简直不懂得，他们占有的是什么样的财富。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作品比蒂克多得多，他们用秀丽的字迹抄写古诗所花费的功夫是十分感人的，比如，他们抄写了许多德国的英雄传说和大量的手稿，由于贫困；他们是无钱购买这些手稿的。他们的弟弟费尔季南德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他将为我们抄写诗歌。而他们自己经常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这方面的东西是很多的。你会喜欢这些极好的人的，他们为了有朝一日写出一部好的德国诗歌史在默默地而又聚精会神地劳动着。”

《小男孩的神号》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在格林兄弟参与下编写完的，并于1808年出版。

有一次，当威廉·格林在哈勒疗养区的时候，布伦坦诺来了，并以封·阿尔尼姆的名义邀请他一起到柏林去。阿尔尼姆曾经写道，既然威廉已经离柏林不远，他应该去访问。开始威廉感到疑惑：他刚刚付给了大夫浴疗费，而且身边只有十八个塔列尔。可是布伦坦诺并没有真认为威廉手头拮据，因而生气地说，他的钱足够这次旅行用的。如果威廉不愿意白花他的钱，也许可以记在将来的报酬项下。威廉不想使朋友伤心，而且也不能放过在封·阿尔尼姆图书室这样安静的环境里工作的机会。

在1809年9月的日子里，阿尔尼姆“非常亲切和热情地”接待了布伦坦诺和威廉·格林。在柏林，他把自己的客人介绍给了许多朋友，威廉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精通古代德国文学的人。威廉同其中的弗里德里希·封·德尔·哈根就《尼伯龙根之歌》的产生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他们经常到剧院去。威廉对于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

旧德国银币，一塔列尔等于三马克。

利欣根》很感兴趣。大城市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写信给齐麦尔姨母说：“柏林是我曾经见到过的一座最美丽的城市。与大部分都是宫殿的波茨坦一样美。城堡巨大而又富丽堂皇，同弗里德里希大帝所居住的圣苏西一样，不过在这些巨大的宫殿里，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这就是说，这里也是空寞无人，而且我甚至也无法告诉您，在这里会感到多么奇异和痛惜。这里的地势并不好，整个柏林坐落在一块大的沙地平原上，只是在柏林的一边，有一个被伐光的叫做季加尔登的大树林，这里一般说来是相当美的。”

威廉在柏林逗留的几周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他工作室的窗子钉着格子，面对着庭院。他坐在书籍当中，很希望极其仔细地研究这一切。他想给卡塞尔带回某种重要的东西，以便向哥哥证明，他的柏林之行在文学方面也是有益的。桌子上，在其他书籍中间还放着厚厚的一部工匠歌手歌曲集。

当然，朋友们所研究的东西使威廉很感兴趣。布伦坦诺正醉心于《念珠抒情歌曲》，阿尔尼姆写完了剧本《哈勒和耶路撒冷》第一部。威廉·格林认为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这里“散发着芳香和新鲜空气”。

在柏林，威廉工作得很顺手，因为王宫仍然在哥尼斯堡，所以这个城市没有宫廷那种通常的杂沓。王室的成员中只有黑森的继位王妃奥古斯塔留在柏林，她是普鲁士国王的姐妹和路易斯王后的妯娌，后来得到了黑森侯爵夫人的封号，她占有一部分城堡。威廉·格林为证明自己对于王室家庭的忠诚，拜访了继位王妃，对她表示了真诚的敬意，他非常尊重她的智慧、教养和信念。

威廉在柏林的逗留是有趣而又有益的。在这次旅行之后，格林兄弟同浪漫主义作家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友谊更加牢固了。不错，后来布伦坦诺同他们的关系疏远了，可是阿尔尼姆直到死还信赖他们。当时，格林兄弟的创作兴趣同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兴趣毕竟存在着共同之点。

1809年11月，威廉在结束哈勒的治疗和访问柏林之后，最后要返回卡塞尔。阿尔尼姆热情地告别了自己的朋友。威廉在驿车上颠簸了2天3夜，一直没有休息。天气已经转寒了。从柏林到哈勒，马车第一次停脚，旅途是不轻松的。下一程要到魏玛。威廉又开始数日子，现在已是隆冬腊月，他时而坐敞篷的四轮马车，时而坐带篷的驿车。

威廉在魏玛有两件事情要做。首先他想对歌德表示自己的敬意。他同哥哥一样，对歌德怀有最深厚的敬意，还在作学生的时候，他就敬佩这位伟大的魏玛人。

另外，威廉准备在魏玛和离这里不远的耶拿为哥哥找一找古代手稿。

12月11日，他在旅馆安顿好并换好衣服之后，立即请人带他到歌德府上并递交了阿尔尼姆的介绍信。可是歌德在刚刚得过病之后仍然感到不舒服，所以没有能够在这一天接待这位年轻的来访者。然而他考虑很周到，为威廉提供了自己在剧院里的包厢，这时剧院正在上演科采布的剧本《小城市的居民》。

第二天，威廉应邀来到歌德府上。大概，歌德不仅从阿尔尼姆那里，而

德国中世纪行会手工业中出身的歌手。

科采布（1761—1819）德国反动作家，著有感伤主义戏剧。

且也从其他人那里，可能是从萨维尼那里听到了格林兄弟，听到他们有珍贵的收藏品和在古代德国文学方面深邃的知识。

前厅的壁笼里装饰有雕像和画像，仆人在这里迎接了威廉。他们沿着正面宽敞的楼梯上到了二层。在人口处的地板上镶砌着两个黑字：“欢迎”。侧面放着一个壮丽的大形烛台。穿过一间挂着许多画幅的屋子，威廉被带到了主人的书房。这里到处是画和木雕。两面门都涂着暗褐色，门上有两个金色的狮子头形的门把手，一切都给人以异常严格和整洁的印象。在歌德本人出来之前，威廉稍稍等候了一下。歌德衣着庄重，身穿黑色服装，挂着两枚勋章。

威廉向哥哥讲述自己这次访问时说：“我曾常常看他的肖像，研究他的每一个最小的特征，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那庄严和完美的特征，纯朴和善良的面孔。他亲切地请我坐下，然后就开始了友好的谈话。”

歌德把年轻客人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客人进行了谈话。他们谈到了《尼伯龙根之歌》，谈到了北方诗歌，还谈到了伊达和威廉刚翻译的古代丹麦英雄诗歌。话题还涉及了旧时代的德国散文作品，其中也包括《德国古代散文作品》。使威廉大为感动的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如此满腔热情而又如此有趣地同一个年轻人，即无名青年进行谈话。在1个小时的谈话当中，歌德没有表现出一点怠慢和骄傲的迹象，这就更博得了年轻人对他的好感。

第二天，威廉应邀去吃午餐，午餐从1点进行到4点。在就餐当中，歌德以自己另一种天才——出色的主人的天才——使客人感到惊讶。威廉写道：“午餐非常令人高兴，有鹅肝做的帕什捷特，有兔肉和其他肉菜。他（歌德）更加殷勤，说了很多的话，而且不住地向我敬酒，他指着酒瓶子，轻轻地、有点喃喃地说，他总是经常喝酒；有很好的红酒在座的还有歌德的妻子赫里斯季安娜·武利皮乌斯，威廉认为她非常美，诗人的秘书也在座。他们谈到了路德维希·埃米利·格林所画的贝蒂娜·布伦坦诺的肖像。歌德称赞了版画，他认为艺术家精巧的刀法所创作的肖像与本人十分相近、而且结构非常好。

威廉每晚到剧院去，而且通常都坐在歌德的包厢里。他曾多次访问歌德，而且总是受到热情接待，并应邀吃饭。歌德对格林兄弟的研究工作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并帮助威廉得到了公爵图书馆里的许多手稿。

在魏玛，威廉不仅进行了访问，而且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了寻找中世纪德国诗歌文献资料，仔细翻遍了魏玛和耶拿所有图书馆，查阅了写在羊皮纸上的手稿，一页一页仔细地进行阅读。他在翻阅已经变黄的手抄文稿时，好像采金者一样，发现了无数宝藏——被遗忘的旧的文本。

威廉为魏玛之行感到兴奋，因为除了研究之外，他还亲自结识了歌德，并且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我认为，亲眼见到他对于理解他的诗是非常有益的。他的诗同样是最美、最纯洁和最高尚的天性（这是一个思维健全的人立刻就能了解并开始尊敬的天性）和那种最高程度上的独特文化的结合物……他眼睛里那种令人惊讶的视线能博得人们最大的信赖，虽然这种视线使我们保持着一定距离。”威廉一生都信赖歌德的天才，照他的话说，歌

伊达是世界史诗中最伟大的文献之一。伊达分两部，一部是老伊达，或叫诗歌伊达，一部是新伊达，或叫散文伊达。

用肝和其他肉类以及野味做的酥皮馅饼。

德“表现了人民全盛时期的性格”。

从另一方面来说，歌德也为格林兄弟那种谦逊而又忘我的努力大受感动，致使在威廉离开魏玛之后歌德立即给雅科布写了信，并寄去了他所需要的手稿，在信里还写道：“如果您能够在这几卷手稿当中找到有趣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译解和发表出来，我将非常高兴。因而您将更为我们大家所感激，并且您将在这种文学体裁方面建立更大的功勋。”

需要说明，格林兄弟当时一本书也没有发表过。不过他们的文章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在歌德和格林兄弟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个人接触，年龄上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在这之前，歌德已经写出了自己大部分作品，而格林兄弟则刚刚准备发表作品。后来，由于他们希望歌德继续关心他们的创作，所以多次把自己的书寄给他。在一生当中，他们自己不仅是歌德的崇拜者，而且也是他的作品勤奋的读者。

格林兄弟虽然深深扎根于浪漫主义，但是他们始终推崇在歌德的全部作品中所充分体现出来的古典精神。

8 在没人走过的

威廉于 1810 年 1 月初，正好在雅科布生日前回到了卡塞尔。

在这 1 年和以后的几年中，欧洲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拿破仑皇帝的权力和声望正处在极盛时期。1812 年，包括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在内的五十万“大军”开始了反对俄国的军事行动。莫斯科的大火是拿破仑军队的第一个失败，也是这个军队毁灭的开始——命运背叛了这个科西嘉人。1813 年初，腓特烈·威廉三世发表了“给我的人民”的号召书。同年 8 月，奥地利参加了俄国、普鲁士和英国的反拿破仑联盟。10 月，在所谓“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中，拿破仑军队被粉碎。拿破仑不得不退回莱茵河那边。拿破仑的杰作——“莱茵联盟”崩溃了。在这个混乱时期所诞生的国家同它们出现时那样迅速地地图上消失了。被驱逐的诸侯们又都回到了自己的府邸。1813 年底，联军进入了法国领土。1814 年 3 月，拿破仑帝国崩溃……

雅科布·格林继续在威廉堡担任图书管理员。确实，有时他觉得很不得心。如果能够不为面包担心，而能维持中等生活，那么他是非常愿意离开卡塞尔而完全献身于研究工作的。他非常想周游世界，以便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表面上看来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简单而又平庸，可是有时也很紧张。比如，有一次为了某种目的正是要用那个藏有最珍贵图书的大厅。命令雅科布赶快把书柜清理出来，把书搬到黑暗的地下室去。雅科布的责任是保持书籍整齐有序。可是花了几个月顽强劳动所办的事情转眼之间就遭到了破坏，许多珍贵的卷册都堆成了一堆。要找需要的书籍是不可能的。使他十分高兴的是，在付出巨大劳动之后，几千部最珍贵的书籍才从这场混乱中拯救出来，重新摆进卡塞尔城堡。这项工作刚刚完成，1811 年 11 月夜里城堡突然失火。雅科布赶去抢救自己的图书；他虽然被烟熏得喘不过气来，仍然沿着墙根摸索前进，同派来救援的士兵一起找到了通往书库的道路，抢救出了大部分图书。在以后的几天，雅科布考虑了如何把所有的书收集在一起的问题。在这之前还补充了王后的私人图书馆。所有这些书都需要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书籍被放到城堡里的一间房子里，而这间房子的一大半则摆满了镜子和各种玻璃制品。不过国王和王后陛下很少关心这个问题。有一次，王后希望得到几本读物，要把这一大堆书清理出来，而在短时间内要找出需要的书是不可的。他好像一个短工一样，干了 1 天 1 夜。由于这种情况又定做了许多新书柜，于是雅科布又重新使图书馆走上了正轨。有节奏的、有板有眼的生活正是雅科布·格林这样的人所必需的。可是他所缺少的毕竟是这个。他很希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雅科布后来承认：“这种研究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困难的，但也是愉快的。我怀着难以形容的痛苦心情看着德国，看着受侮辱的、失去任何权利的、甚至失去自己国号的祖国。我当时觉得，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所有的星辰都沉没了；我只是慢慢地而又困难地想到，不管周围多么令人失望，必须把已经开始的工作线索联接起来，抓在自己手里。这不是徒劳无益的——我心里豁亮了，工作也就开始前进了。”

关于这几年的情况，雅科布写道：“当然，研究古代德国诗歌文本的工作有助于他克服那个时代受压制的气氛。毫无疑问，那些年代的严酷事件和深入恬静的科学世界的要求促使他回到这个久已被忘却的文学生活之中；然

而这种生活的意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向过去寻找安慰，当然，对于科学工作为新时代的到来多少有所促进也抱有一线希望。”

正是这种希望使得格林兄弟还在拿破仑统治德国时期就勇敢地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格林兄弟作为独特的和杰出的学者，他们不允许自己去利用二手资料，而需要第一手资料，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去查找那些被遗忘和抛弃了的中世纪的手稿，而这些手稿好像远古的遗迹一样在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蒙上了尘土。

威廉带着这个目的于 1810 年进行了“文学旅行”，这使他来到了马尔堡大学图书馆。在这里，他找到了古日耳曼珍贵的手抄文件。雅科布则不能这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他通过另外的途径得到了图书馆的珍贵资料。比如，他曾向往在特里尔的一个朋友提出“坚决的请求”，请他认真地看一看，那里附近的寺院里有没有古代德国诗歌的手稿，他最感兴趣的是从最古时期到 17 世纪的文本。就是在这封信里，他承认，还在 1805 年他同萨维尼在巴黎逗留期间就作出了以最可靠的方法研究古日耳曼文学的果断决定：“从那个时候起，我对于历史和我们祖先的诗歌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在 5 年的时间当中，格林兄弟紧张地工作在新的学术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只是在这之后他们才开始考虑出版自己的书。

格林兄弟最初发表文学和科学作品是在 1811 年，当时雅科布发表了《论古代德国的工匠歌》，而威廉则出版了《古代丹麦英雄诗歌、叙事诗和童话》的翻译作品。同时，雅科布在紧张地研究他在一个古老的出版物里所发现的西班牙抒情诗歌。关于这个集子，他的弟弟曾经写道：“这是一部出色的、非常优美的作品，而且是极端珍贵的。”可是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当时雅科布没有同任何出版者订合同。只是在 1815 年这本书才以《西班牙古老抒情诗歌集》的书名问世。1813 年，威廉出版了他翻译的《三首古代苏格兰抒情诗》。

还在拿破仑垮台之前，雅科布就在威廉支持下着手研究动物叙事诗《雄狐列因哈尔特》（又名《雄狐列因涅克》）和它的题材的发展史。不过这本书直到 1834 年才出版。

虽然格林兄弟在工作上协同一致，一生都保持着相依相爱的手足之情，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且这种个性既表现在性格上，也表现在研究方法，部分地还表现在研究方向上。比如，雅科布具有严格的长于分析的研究头脑，而威廉由于具有更多的“艺术秉赋”，所以主要是从事古代诗歌作品的搜集、分类和出版工作。尽管他对自己古代诗歌出版物补充了学术性的附文，他还为《古代丹麦英雄诗歌》汇编写了有分量的序言，在这部作品中，首先吸引他的是优美的翻译技巧。他在《英雄诗歌》的序言里写道：“祖国诗歌文献正在被重新发掘和公诸于世。”

当时，关于北方各国诗歌，人们了解得很少，所以威廉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曾写道：“荷马的太阳把自己的光辉洒到了这些冰山上，把自己的宝石撒到了碧绿的山谷……在我看来，这就是值得令人惊奇的美丽的史诗——从前某一个时候在人的心灵里所产生的具有内在的最深刻内容的诗。”威廉为充满神话精神的古代北方诗歌的独特性所吸引，所以对这些诗歌评价很高。这些诗歌起源于多神教时代，在威廉看来，它们具有真正民歌的纯朴韵味。诗歌里所反映的是过去很早很早以前所经历过的具有不可思议的鲜明生活气息的时代，这时人类还没有学会隐瞒自己的喜悦和悲伤，勇敢和忠诚，

痛苦和忧患。威廉承认：“在所有这些诗歌里，我们所喜欢的就是其中表现出来的内心的悲痛或喜悦。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某种最高贵的东西，因为所有可以用真理、美、诗或还有别的什么来表达的东西全都来源于此。民间创作与艺术的重大区别就在于民间创作到处都有，它强烈地表现出，似乎整个绿色的和朝气蓬勃的世界完全充满了诗情，并且为诗情所激发，而且在它看来，一切都受天意支配，任何东西都不能脱离它的旨意，直到头上的一根头发。因此，民间创作除了必须的东西之外，不包括其他任何东西，正因为如此，它鄙视像啼鸟的漂亮羽毛那样外表的华丽。”

通过对《古代丹麦英雄诗歌》的研究，威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诗人、翻译家。他在为这部诗歌所写的序言的结尾说道：“瑞士有一个关于老人的韵文故事，这个老人坐在海底，处在音乐环境之中，永生不死，并为爱尔菲的舞蹈轻轻伴奏着竖琴；孩子们来到岸边，看到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唤起孩子们唱歌的愿望。那么现在就让这些诗歌去唤起同样的愿望吧！”

威廉把这部刚出版的《古代丹麦英雄诗歌》寄给了歌德，歌德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对威廉说，他非常珍视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诗歌。歌德很感谢威廉，因为他在北方古代各民族的诗歌中发现了许多至今还为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并且“由于他的成功的安排，从许多分散的作品中创作了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主要学者的好评。

这样，格林兄弟就带着自己已经发表的几本处女作满怀信心地进入了学术界和文学界。在每一本书出版之前，他们都要经过长期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虽然兄弟二人各自都以自己的名义出书，但是他们一直是互相帮助的。有几本书，他们的合作非常密切，以致分不出哪一部分工作是谁做的，所以他们就直接署名：“格林兄弟”。他们就是这样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识。

古代日耳曼人的史诗在他们最初合作的学术著作中得到了反映。1812年，他们出版了两部杰出的中世纪前期史诗：《尼伯龙根之歌》（8世纪末）和《维索勃隆的祈祷》

（9世纪初）。《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曾保存在卡塞尔的手稿当中，《维索勃隆的祈祷》则保存在慕尼黑，这两部值得称赞的作品在格林兄弟之前就已经为大家所知道了。但是只有格林兄弟第一次注意到，这两部作品不是散文，而是从日耳曼诗歌的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用同音法诗句写成的两部珍贵的诗作。

格林兄弟最初的几部学术著作不但证明了他们的合作是正确的，而且也证明了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最主要的问题上。有利的环境也促成了他们的顺利工作：《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保存在卡塞尔，这就是说，第一手资料一直在他们的前面。

格林兄弟高度评价了日耳曼人这部最古老的史诗文献。

他们在该书的序言里写道：“古代德国人的那些无疑是绝妙的、以歌曲为主的诗歌作品几乎丢失殆尽，而且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未必有比

古日耳曼神话中一些待人和善的自然界之神。

这部作品的古老的手写本是在维索勃隆修道院发现的，故以此命名。

这部作品产生于8世纪，是德国“异教”时代英雄传说中用古代高地德语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首诗。

在诗文中，某些词或音节都用同一个辅音字母开头的方法。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的片断更美好的片断。”威廉·格林在后来给歌德的一封信里谈到了《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作为一部最古老的德国的诗歌，幸好，它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它仍然是异常优美的，哪怕它只能提供那个时代的一个、然而明快的画面也好，这种画面虽说有自己的独特性（像伊达的诗歌所固有的那样），看来也是正常的。”

同时，格林兄弟也在研究《老伊达之歌》的文本。1811年他们得到了这部没有发表过的《伊达》，想把它发表出来。威廉认为：“这是一部令人心醉的作品。”他们享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出色的瑰宝”声誉。在一封给歌德的信里，威廉赞叹地写道：“在我看来，这些歌是非常有力、非常宏伟的诗篇，我应把它归入严格而又高尚的文体时代的某一民族留给我们的一部最美好的作品。”

在《老伊达之歌》行将发表的时候，格林兄弟先在哈勒城出版的《公共文学报》上，尔后又于1812年在图宾根的《知识界晨报》上，先后发表了自己出版《老伊达》的打算：“如果需要谈出我们对于这部诗歌的看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是一部在任何时候都会打动人心的最伟大、最美好的作品。就其深度和表现力来说，它可以和任何一部其他优美作品相媲美。这里的情节一方面为我们描绘了非常美好的而又纯洁的生活画面，同时也描绘了由于背叛这种生活而不可避免地接近于毁灭的情景：背叛日益普遍，最后毁灭整个民族。这里的形象都非常美，特别光耀，神话使所有与自己的始祖在一起的人都具有了这种光辉，而这个始祖不是别人，正是神。”

在谈到出版《伊达》的必要性时，格林兄弟引用了歌德的话，歌德在《关于颜色的学说》里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认真地看一看我们以前的某些时代、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那么我们会看到，从黑暗的去向向我们迎面而来的处处是光辉形象，他们是积极、完美、勇敢、漂亮而又善良的人们。神所非常喜欢倾听的献给人类的赞歌从来没有停息，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所有时代和国家时而以合唱的形式，时而以赋格曲的形式，时而又以美妙的、宏亮的歌唱的形式发出的和谐声音时，我们自己也感到极大的幸福。”

格林兄弟希望重新响起为人类增光的赞歌，所以出版了《老伊达》，并且对于这件事作了大张旗鼓的申述，这好像是针对拿破仑的政策，因为拿破仑把罗马国王的王位授与自己新生的儿子，从而认为自己的统治将世代传下去。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这个时代，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变，也不能妨碍他们“努力地耕耘自己的土地”。又过了几年，这部著作于1815年问世了。

哈特曼·封·奥埃的韵文小说《可怜的亨利希》是格林兄弟又一部合写的作品。雅科布在1812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这部作品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美的作品之一”。他在这篇论文中谈道：“这部小说充满了善良和纯洁，它发自诗人的心灵深处，而且诗人的技巧除了可以同作品本身的朴素、纯洁的美德相比以外，不能同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作品中的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词，既不能减，也不能增，而纯洁的、使人精神焕发的印象则好像芳草的馨香一样。”

1813年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之后，日耳曼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在废除了维斯特伐利亚王国和建立黑森公国之后，格林兄弟认为发表与传说近

似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可怜的亨利希的故事，真正成了自己的义务。要知道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人为祖国流血、牺牲。格林兄弟对于把祖国从长期的沦亡状态中解放出来感到欢欣鼓舞，批们发表了认购哈特曼这部作品的号召：“在这幸福的时候，当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祖国作出某种牺牲时，我们想重新出版这本古日耳曼的小说，这是一本关于可怜的亨利希的普通的、充满热情而又真挚的书，书里描写了他如何以赤子的忠诚和爱为自己的主人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因此受到神的厚奖。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使得这部德国古老传说将会成为大家所理解的平民的书。对于学者和专家，我们要说明的是，旧版本有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根据不久前在罗马发现的手稿作了更正，并补充了评注。现在只需研究作为作品基础的神话。”《可怜的亨利希》和《伊达》一起，作为格林兄弟共同发表的作品在1815年才得以出版。

还在1813年莱比锡大会战之前，格林兄弟就决定创办《古代德国森林》杂志，以便研究古老的德国诗歌及其文献，以及过去几个世纪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多少年来，格林兄弟积累了大量资料，这使他们想向读者介绍《帕尔齐法尔》和《尼伯龙根之歌》，介绍英雄诗歌和上流社会纪事，与读者分享自己在语法和作诗方法方面的知识以及民俗文化方面所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写道：“如果有一天我国古老的诗歌的特殊财富能得到承认，那么这将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格林兄弟虽然转向了过去，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的，而渴望有益于当代。他们写道：“我们重视现代优越的政权，而古代应当为它服务，这如同过去伟大的人物不能称为‘死人’一样，因为他们经常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并且迫使我们想念他们。谁如果愿意对于这种生活态度提出异议，那么他就轻视历史的教训，并且把这些古老的诗歌比作大海中的不可达到的孤岛，在那里太阳白白地浪费自己的亮光，而鸟儿啼叫，都不发出声音。”

格林兄弟发表古老的手稿和学术论文，是想以此“把沉睡几个世纪的作品唤醒，使无声无息地埋在僻静的角落里的心爱的古代智慧活跃起来。”使他们不安的是，连年的战争会使古代手稿受到损失，许多手稿可能遗失，因此读者将无从知道过去最伟大的文献。他们在《古代德国森林》第一期的创刊词里写道：“搜集和出版这些手稿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在混乱时代保留某些手稿不完全可靠，过去的风俗习惯消失了，变化了，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所以把方言的独特性和作品的各种不同版本保存下来对于语言和文学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有无数的人使用这种语言，而且又通过这些入把这些优美的古代文献流传到了我们这个时代。”

格林兄弟要保持古代传说的纯粹性并使它成为许多人的财富的愿望不仅得到了同道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像别涅克和多增这样的专家的支持，他们为这个杂志写了许多文章。当然大部分材料还是由格林兄弟本人写的。在“共同的、大大加强了对于古代日耳曼诗歌作品的搜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语言文学的研究以及在这份杂上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当时刚刚诞生的科学——日耳曼学。

1813年出版了《古代德国森林》创刊号。1815年和1816年出版了以后

帕尔齐法尔——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的长篇小说《帕尔齐法尔》中的主人公。

的两期。这样，刚迈上科学道路（在这之前经历了一个沉静的、默默无闻的、细心而又耐心的工作的年代）格林兄弟就取得了初步的、然而也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如果格林兄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他们就会作为科学研究者和科学探索者以及作为日耳曼学家中的两个奠基人而进入科学史册。但是他们觉得这样做还嫌不够，当他们还在研究语文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搜集童话和传说。于是两位青年学者在这方面获得了真正的丰收。

9 沿着童话的足迹

有一次威廉·格林写道，他和雅科布“两个人，十分孤单，因此工作进行得很慢，6年当中”搜集了童话集第一卷，该书于1812年出版。这就是说，这项工作大约开始于1806年，这时拿破仑还统治着德国的土地。这是一个边界遭到破坏、王位不稳定和崩溃、一种秩序很快为另一种秩序所代替的时代。

在这个兵慌马乱的时代，格林兄弟在表面上离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十分遥远的童话世界里发现了某种比震惊世界的大炮还要有力的东西。

就在1806年，格林兄弟的两位朋友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出版了古代德国民歌集《小男孩的神号》第一卷。当然，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同格林兄弟一样，在为后代恢复和保留过去的伟大遗产——童话、传说和诗歌而奋斗。阿尔尼姆当时已经向社会人士提出请求：在收集民歌的同时“不要忘记口头传说和童话”。浪漫主义艺术家菲利普·奥托·伦格响应了这个号召，把大量的童话寄到了海得尔堡。其中的一篇童话阿尔尼姆在自己办的《隐居者报》上发表了。

这样，出版童话集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需要的只是学者细心和耐心的劳动，谨慎地对待普通的口头语言，以便记录民间语言并且把它转达给读者。如果科学研究工作所依据的是图书馆里的手写的和铅印的收藏品，那么童话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还需要点点滴滴地去搜集所有存在于民间的、交相传诵的材料。于是格林兄弟就着手搜集童话集的第二卷。威廉后来曾说：“我们唯一的来源就是口头童话和传说，而且，这种童话和传说真不少，我们顺利地搜集了将近60篇很有趣的作品；所以我们希望发表某些完全没人知道的东西。”当然，他们首先搜集了存在于黑森地区的资料。

卡塞尔有一间药房，这是维利德家的。药房的主人维利德先生有一座很坚固的房子，房子的楼层一个接一个，而许多走廊、楼梯和弯曲的附属建筑构成了一座稀奇古怪的迷宫。这里住着他的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药房主人没有考虑过自己孩子们的未来。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在卡塞尔的郊区有好多土地和花园。格林家同这一家是邻居，所以格林兄弟从青年时代起就同这一家人有着友好关系。

药房女主人弗拉乌·维利德很会讲童话，童话短小而又优美。她坐在威廉的对面，给他讲虱子和跳蚤的故事。虱子和跳蚤“一起料理家务，在鸡蛋壳里烧啤酒。突然虱子掉进了鸡蛋壳里，烫伤了自己，而跳蚤就开始大声地又喊又哭……”

弗拉乌·维利德的女儿们也知道很多童话，特别是格列特亨和多尔特亨。当时，多尔特亨是一个年轻、朴实和天真的姑娘，在花园里或温室里同自己未来的丈夫威廉·格林见面的时候，就给她讲她在家里所听到的童话。这就是《会开饭的桌子》。《密切里查太太》和《六只天鹅》等。

当时多尔特亨想过没有，她将命中注定同威廉和睦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她到底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传说呢？当然，有一些她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此外，药房主人的家里还有一个女管家，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玛丽娅·缪列尔。这是一个60岁的女人，大家都叫她“玛丽娅奶奶”。在她出生的地方，流传着特别多的童话，而且这些童话以原始的形式世代代传了下来。玛丽娅奶奶的记性很好，她慷慨地同格林兄弟分享自己的财富，经常给他们讲童话。这些童话就编进了童话集第一卷。《和指头一样小的男孩》、

《小弟弟和小姐姐》、《没有手的女孩》、《小红帽》和《睡美人》——这些童话都是玛丽娅奶奶讲的，经过格林兄弟的加工传遍了全世界，每一次想起玛丽娅奶奶，耳边就会又听到：“从前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只要见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不过最喜欢她的是奶奶。她甚至不知道再给孙女做个什么东西才好。有一天，她送给了她一顶红天鹅绒的帽子。她戴着非常合适，小女孩简直不愿戴别的帽子了，所以大家叫她‘小红帽’……”

这个老人保留着多么珍贵的财富啊！在这个药房主人的多子女的家庭里，她整天操劳，只有在晚上她才能继续讲王子的故事。这个王子过了 100 年以后在一个带刺篱笆里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一条通向沉睡的美女的道路。“他继续往前走，到处都睡的是内侍官们；再远的地方睡的是国王和王后。这里非常静，连自己的呼吸都能听得到。最后，他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塔楼，这里躺着沉睡的美女。她的美丽使王子感到非常惊讶，致使他弯下身子，吻了吻她，就在这个时刻，她醒了……”这是那个朴实的老人当时所讲的一个关于忠诚和爱情的童话，这种爱情非常温柔、谨慎，又非常纯朴和高尚。它作为格林兄弟的童话流传到了今天，人们已经读了一百多年，而且受到历代的赞美。

第一卷的许多童话也是格林兄弟在哈谢尼弗卢格家里听到的，更准确地说 是从阿玛尼亚（玛利亨）和扎涅塔姐妹那里听到的。她们的父亲是卡塞尔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而她们的兄弟路德维希，后来娶了格林兄弟的妹妹洛塔。阿玛尼亚以特别漂亮和聪明而出名，而扎涅塔则是作为非常可爱的讲故事人而出名的。格林兄弟从哈谢尼弗卢格家的两个姑娘那里记下了一些童话，如《有三根金头发的鬼》、《穿皮靴的公猫》和《德罗兹多鲍罗德国王》等。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也知道很多童话，并且毫无保留地把它告诉格林兄弟。萨维尼家里的保姆弗拉乌·连加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认识她的阿尔尼姆关于她曾经写道：“这是一个完整的宝藏，”并补充说：“我希望做一个很好的矿工，以便发掘这个宝藏并得到这些宝物——童话！”可是，要使这些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老年妇女去给成年人讲童话并不那么简单。

下边是格林兄弟与一个叫做“马尔堡说书女人”所经历的故事。他们从布伦坦诺那里了解到，在马尔堡医院里早就有一个妇女，她有满肚子的童话。布伦坦诺当时从她那里听到过不少，可是许多童话随着年代的流逝都忘记了。于是格林兄弟决定去找这个说书女人。1809 年，他们的妹妹洛塔有机会到马尔堡去，他们就要求她打听清楚这个妇女的下落。洛塔在马尔堡呆了几个礼拜，可是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卡塞尔。情绪不佳的雅科布给当时在哈勒的弟弟写信说：“洛塔礼拜五回来了。童话的事完全落了空。洛塔曾经邀请这个妇女，她第一天说，需要集中思想想一想，可是第二天又说，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后来洛塔就回来了。为了再一次同这个女人谈一谈，派谁到马尔堡去好呢？”

在这几句话里，有一种悲观失望的调子。于是第二年，即 1810 年，为了劝说“马尔堡说书女人”改变主意，威廉亲自来到了马尔堡。他白白地等待她的到来，因为她不能相信，成年人真地愿意听她的童话。她觉得，如果她去给有学问的人们讲自己那些令人可疑的故事，他们会讥笑她。这不过是给孩子们讲的不可靠的传说罢了。至于把这些童话搜集起来，甚至把它们印出书来，她连想也没有想过。她还怕医院里别的妇女嘲笑，担心挖苦她。威廉

总算拐弯抹角地从她嘴里一共探出了两个童话。

医院院长要求她给自己的子孩子讲几个童话，而这个老太太是不能拒绝孩子们的。孩子们又把童话告诉父亲，他记下来，再转告给威廉。真是非常复杂的途径。这又一次证明，搜集民间口头创作是一个困难的过程，童话并没有现成地放在书架上，而知道这些童话的人们又不是到处都可以碰到。为了找到最好的、最珍贵的和最必须的东西，这就需要有耐心和毅力，搜集者必须具有准确的洞察力和热情。

格林兄弟一次又一次求助于讲故事的女人们。弗里杰里克·马涅利神甫的女儿给他们讲了许多传说和童话。其中有一个是《发现宝藏的鸟》，它的结尾是一句非常精采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健康地活到现在。”据威廉的儿子盖尔曼·格林证实，在童话集第一卷的准备工作中，布伦坦诺的妹妹约尔季斯太太，以及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和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神学家和日耳曼学家费迪南·齐别尔特在童话研究工作中也帮助过他。退休的龙骑兵司务长约翰·弗里德里希·克拉乌泽的家离卡塞尔不远，他虽然不是无私的，但是也对格林兄弟讲了一些“真正士兵的童话”。他称自己是“贫穷、笨拙的人”，并且高兴地和以最轻微的谢意从格林兄弟那里拿走了一件穿旧的衣服，作为对自己的故事报偿。当这个衣服褴褛的残废人向他们讲述《关于台布、背包、帽子、大炮和犄角》的童话时，看来他一面回忆着自己在战友面前自豪地说大话的那个年代，一面向他们叙述着什瓦尔增费利斯的传说：“一个士兵敲了一下自己的背包，从里边放出来了步兵和骑兵部队，这支部队把国王的军队全打败了。第二天，国王派了更多的人去消灭这个老兵。而他一直敲自己的背包，直到整个军队出来为止。然后，他又在自己脑袋周围把帽子转了几圈，就出现了几门大炮；敌人被打败了，都逃跑了。之后，签订了和约，让他做了总督，并把公主嫁给他做妻子。”

格林兄弟经常请教老年人，因为正是他们能够说出许多真正的民间故事，而不是捏造出来的东西；这些老年人记得许多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世代传下来的传说和童话——大量的民间传说。丰富的研究经验使他们能够把真正的童话和伪造的童话区别开来。而且作为真正的研究者，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搜集和编写工作。格林兄弟一方面保留重话本来的、原封不动的情节，不破坏它的体系、结构和主人公的语言特点，另一方面又赋予所搜集到的材料以自己的语言形式。他们找到了一种以热情洋溢而又简单朴素为特点的独特风格，因此，这些童话集传遍了全世界。格林兄弟并不企图逐字逐句、机械地照搬从讲故事人那里听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所记下来的传说和故事的全部纯洁性并把它们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出来。格林兄弟与布伦坦诺不同，布伦坦诺轻率地对待童话的情节，根据艺术任务来改编童话情节，而格林兄弟对童话情节不作任何改变，尤其不歪曲它的主题。他们在记录所听到的童话时，也斟酌字句。当然，他们在观点上也存着矛盾。雅科布较多地倾向于科学的可靠性。他作为一个出版者，在涉及自己的方法和原则时，写道：“对于我来说，加工和修改这些作品，永远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其所以如此，因为对我们的时代而言，做这种工作就是为了错误地理解其必要性，而对于研究诗歌来说，这种工作将永远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障碍。”威廉主张进行艺术的和富有诗意的修改，而雅科布是不轻易向他让步的。既然兄弟二人都无条件地承认珍重历史的必要性，所以在童话最后定稿

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重大分歧。两个人都小心地对待童话，所以都渴望不作任何剪裁地、几乎没有改变地记录它们。只是为了使它重新放出自己全部优美的光辉，才按照语言规范进行加工。雅科布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同威廉的形式上的优美感构成了难以代替的创造性的结合，因此，格林兄弟创造了奇迹——把古代的民间创作保存下来，并流传到今天，同时，还使它保持了统一的语言风格。这有利于认识整个童话集的完整性。

格林兄弟写道：“我们力图保持童话的本来的全部纯洁性，其中的任何一个情节既没有捏造，没有渲染，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力图避免对于本来就很丰富的情节根据任何类推法和想当然进行充实的企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指出：“当然，它的风格和某些部分的结构主要是我们的。”

为了证实这点，盖尔曼·格林在自己于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创作的回忆录里写道：“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作为孩子来欣赏格林兄弟的童话，而是在考虑它的产生，于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就产生了一种概念，好像这是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的。因此，如果格林兄弟不超过后代搜集者的话，那么后者就能够以完全同样的成就把这‘民间的财产’据为己有。童话以格林兄弟献给人民的那种形式重新成为人民的财富，这只是由于他们献出这些童话之故。它们在格林兄弟校订之前不是这种样子的。”

因此，格林兄弟在童话集第一卷的卷头所写的“格林兄弟搜集”几个字，是过于谦虚了。正是由于格林兄弟的加工，他们所搜集来的资料——粗糙的矿石，才得到了提炼并融化成了有永久价值的黄金。

1812年，在紧张地劳动了6年之后，终于有了个眉目：他们所搜集的资料能够提炼出一部很不错的书了。阿尔尼姆这时正在卡塞尔访问格林兄弟，他很支持他们，并建议他们马上出书。威廉后来写道：“阿尔尼姆在我卡塞尔的家里呆了几个礼拜，正是他鼓励我们出版这本书的！他认为，这件事情我们不应当长期耽搁，因为事情会在追求完美性当中过分拖延下去。他以善意的讽刺口吻说道：‘要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写得非常精细，非常美’，他一面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一面读着其中的几篇作品，而这时驯服的金丝鸟以翅膀的优美动作保持着平衡，站在了他的头上，看来，站在他的密密的头发当中它觉得非常舒服。”

阿尔尼姆同柏林的拉伊麦尔的出版社有联系。9月底，格林兄弟把手稿寄给了出版者。这本书计划在圣诞节前出版。拉伊麦尔答应，只要这本书卖出一定数量，就付给酬金。这使格林兄弟感到满意。威廉曾经写道：“拉伊麦尔的建议我们非常满意，而他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当时格林兄弟还不能够幻想出第二版，尽管他们十分谦虚，但是也深信，他们编了一本有用而又有益的书。当手稿寄给拉伊麦尔之后，雅科布怀着这种信念写信给他的朋友阿尔尼姆说：“将要出版一本珍贵而又有趣的书，我越来越了解到，这些古代的童话对于整个诗歌史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812年圣诞节前不久，雅科布拿到了刚刚出版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当然，阿尔尼姆也接到了一本，这是献给他的妻子和小儿子约翰·弗列伊门德的。阿尔尼姆以感激的心情写回信对格林兄弟说：“刚刚接到了拉伊麦尔寄来你们给我妻子的童话集。书印得不错，装帧很好，喷金切边，我约略地翻了一遍，并且暂藏在萨维尼那里，以便在圣诞节交给他们。我代表我的儿子向你们表示极大的谢意，这本书非常好，而且一定会出售一空的。”

从这个时候起，与其他圣诞礼物相比，这本童话集每年既使儿童们、也

使成年人感到高兴。直到今天，这部童话集也没有过时，在所有的国家，人们都知道它，阅读它，喜爱它。大概，在这里引几段童话集的序言是适宜的，在序言里，格林兄弟详细说明了这部著作的意义：“当暴风雨或者老天爷送来的其他的灾难毁坏了所有的庄稼的时候，如果在长满由青草和矮小的灌木丛形成的茂盛篱笆的田界旁边哪怕有一小块空地还没有被损坏，而且在这里有几棵谷穗，我们认为这是幸运的。一旦柔和的阳光开始照射，它们就会慢慢地、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而且为了装满谷仓，任何一把镰刀也不会提前收割它们。到夏末，当它们灌浆、成熟的时候，人们那温柔而又灵敏的双手就会接近它们，一个穗一个穗地把它收割下来，整齐地把它捆起来，比运禾捆还要小心地把它运到家里；它们将要成为整个漫长冬季的食物，也许，将要剩下以后播种所必需的种子。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动手搞过去许多世纪的德国诗歌财富时看到，在这一巨大的财富当中，任何东西也没有保留下来，甚至都忘记了它们，而留下来的只有民歌和这些朴素的家庭童话。炉子后边的地方，厨房里的平台，阁楼的楼梯，保留下来的节日，沉静的草地和原野，而首先是清醒的想象力，正好就像一排排篱笆，它们保护了那些民歌和童话，并且把它们一代代传下去……

看来，搜集和记录这些童话的时候到了，因为能够遇到那些既晓得童话而且也还没有忘记它们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作品里的内容充满了无比的纯洁性，因此，我们看来，孩子们好像也是那样一些神奇和幸福的人；好像，他们也有那种蔚蓝色的、闪闪发光的眼睛……

它们这种朴素的、使我们感到亲切的性质或多或少地蕴藏着难以描述的诱惑力，我们宁愿去听星星同可怜的、被抛在森林里的孩子的谈话，也不愿听最优雅的音乐。童话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看来都是最幸福的，而不幸，这是黑暗的势力，可怕的吃人的巨人，但是，它要遭受失败，因为旁边有慈善的菲亚，她知道，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把不幸引开……

这里说明了，现实生活中所体现的美德从童话里可以轻易地推定出来。虽然它们的使命并不在这方面，而且它们也不是为这一目的而编写，但是这种性质是由此产生的，如同丰硕的果实在没有人的任何参与的情况下而由健全的花朵长成一样。一切真正的诗歌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同生活的联系而存在，因为它来自生活，又回到生活，如同云彩在给土地雨水之后又转回到自己所产生的地方一样。”

格林兄弟知道，各个时代的所有民族都富有许多童话情节，这些情节不仅传播于欧洲，而且也传播于文化不够发达的民族之中——比如非洲。

他们用形象的语言谈道，童话诗“来自用露珠蒙住一切有生命东西的那个永恒的源泉，甚至树上最小的树叶所托住的唯一的水滴，也能够朝霞的光线中映出虹的所有颜色。”当然，格林兄弟了解，他们用自己的童话集为人们打开了每一个民族所有的美好而又珍贵的东西。最后，他们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这部童话集的序言：“我们要把这部书交到好心人的手里，并且考虑到他们具有伟大而善良的力量，我们还希望，这部书不要落到那些甚至不愿意把这些诗的一鳞半爪交给贫穷而软弱的人们。”

10 莱比锡大会战之后

在童话集第一卷问世之后，格林兄弟很快就开始搜集第二卷的材料。在书房的幽静地方和书桌前进行工作，这是他们唯一的愿望。

1813年过去了。在这之前的莫斯科大火，意味着拿破仑的失败，但是暂时还不能说，他的运星永远殒落了。春天，拿破仑在格罗斯郭尔琛和包岑附近重新获得了胜利。

格林兄弟已经学会以一定的冷静态度看待外部事件。他们把每天的工作作为必须提出的任务来完成，并且认为这种创作的一贯性具有深刻的意义。虽然下步的战斗进程还不清楚，但是威廉写信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帕乌利·维甘德说道：“我们好像是行踪不定的人一样，既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暴风雨，也经历过晴朗的艳阳天，当乌云遮住群山的时候，我们仍然深信，太阳会照耀群山上空；而太阳什么时候升起——这取决于神的意志。所以我们继续在工作；而且在这一生当中，没有比我们的工作更好的工作了。”

还在莱比锡10月大会战之前，当联军把法国人逼退到西方时，维斯特伐利亚王国的存在已岌岌可危。在9月底的一天，一个俄国将军带着哥萨克冲进了卡塞尔。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国王仓皇逃跑。俄国人刚一离开城市，热罗姆就带援军返了回来，他认为，还没有把所有的东西丢掉。可是，很快国王就感觉到，他已不能在这里久呆，因此决定把艺术珍品和其他宝物随身掳走，即使只运过莱茵河也好。

雅科布·格林作为国王的图书管理员，接到命令：“把在卡塞尔和威廉堡的最珍贵的书籍包装好，待运法国。”办公室秘书勃柳基尔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雅科布同他一起来到威廉堡，企图为黑森抢救一部分图书。但是命令很严厉，甚至勃柳基尔也不能不执行。不过命令没有说要包装手稿。而这些手稿有相当价值，它关系到黑森的历史，而且热罗姆国王对它没有任何兴趣。其他的书籍包装好后运到了巴黎。1814年，联军胜利后，书籍又回到了卡塞尔。

维斯特伐利亚王国面临着末日。国家政权摇摇欲坠，只不过表面上还维持着秩序。10月16日——19日联军在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为了保持自己的威望，热罗姆决定在卡塞尔当众显示一下王国地位的巩固性：

他故意在京城各条大街上由威武的护卫队陪同，徐徐策马而行。这次表演的目睹者，威廉·格林写道：“在他微微发黄的，像意大利人那样清瘦的脸上，露出了故作镇静的痕迹，而他的整个神态表现出了对自己外貌的担心。他时而下达命令，然后又没有一点神色地把脸转回去。看来，失去如此容易得来的王位他是感到遗憾的。当然，他不想有意引起自己臣民的不愉快，但是他对他们也没有善良的感情；大概，他没有真正感觉到这种痛苦，况且他已习惯于命运的更替。”

热罗姆于10月26日最后逃跑了，这对雅科布来说也有不愉快的后果——他失掉了固定的职位。

1813年11月21日，威廉一世侯爵在7年流放之后返回了卡塞尔。雅科布·格林写道：“人们久久期待老侯爵回来，并对此几乎丧失信心，所以他现在回来，遇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欢呼场面；我的喜悦也并不亚于别人，我在侯爵夫人（有一次在戈塔市我曾拜访过她）侍从们当中看到了亲爱的姨

母。在大街上，我们跟着挂有一串串花束的敞篷车跑着。”威廉也欣喜若狂：“大家以最真挚的喜悦庆祝了黑森的光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公爵家庭进城的重场面更动人的情景了。人们以持续高涨的热情引导着马车，好像这是大家所思念的特别心爱的东西回到了祖国。这时我觉得，没有在未来不能实现的希望。”

开始，雅科布还没有指望以优越的薪俸在侯爵身边担任御前图书管理员的职务，但是，他至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侯爵的宫廷服务“情况会好些”，所以他有权希望得到一种工作。联军向前推进不仅需要士兵，而且需要外交官。雅科布·格林是一个会说一口漂亮法语的机灵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是可以发挥他的作用的。这样也好，应当把学术工作放到一边，在外交舞台上显一下身手，况且健康情况也允许；而这对威廉来说，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所以有一件事情——独立进行共同开始的研究工作——就留给了他。

1813年12月16日雅科布向自己的国君递交了如下呈文：“我最希望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外交舞台上为祖国效劳，而且认为，经过努力学习历史，我多多少少总会为此作好准备，我现在冒昧请求殿下仁慈地赐我以外交代表团秘书之职。”

12月23日，雅科布被任命为外交代表团秘书。几天之后，需要他陪同黑森公使克列尔伯爵到联军大本营去。时间很少，他就“杂乱无章”地放下了个人的事情。雅科布走进了对他来说完全新的活动天地。威廉和妹妹洛塔留在卡塞尔的家里，两个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尔和卡尔志愿参加了反对法国的战争。

在拿破仑拒绝接受要他保证莱茵河边界的和平建议之后，联军发动了进攻。大部分军队在什瓦尔增别尔格统帅下在巴塞尔附近强行渡过莱茵河，勃留赫尔将军在考勃和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中游过了河，比尤洛夫在马斯河附近同北方军发生了进攻战。3个月之后，胜利前进的部队已经推进到法国京城的门口。1814年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在丰坦布洛宣布退位，他的公馆被指定在厄尔巴岛，实际上，这个岛成了他的流放地，作为一个被推翻的皇帝，在这里取消了他参加世界历史事件的条件。同年5月30日，在巴黎签订了第一个和平条约，恢复了1792年的，也就是拿破仑时代以前的法国边界。

这几个月来，在雅科布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同新的上司的关系如何呢？

按照雅科布的话说，公使克列尔伯爵“不是黑森人。这是一个已经上了年纪、心地善良、有时古怪、爱发脾气的人。但是，”雅科布补充说，“在那个非常时期，谁还注意他的性格的所有表现呢？”开始，雅科布从卡塞尔去马尔堡。他在1813年除夕晚上11点到达那里，并吃惊地看到，他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熟悉的许多老胡同，现在都点上了路灯。雅科布在忽明忽暗的路灯照耀下于半夜抵旅馆。他周围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眼看着新年礼炮宣告了新的1814年的到来，人们都相信，这将是幸福的一年。

他旅程的下一站是法兰克福。在这里，雅科布拜访了布伦坦诺一家以及其他朋友。在旅馆里，雅科布不得不同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住在一起，他们热烈地讨论各种政治和军事事件。接着抵达达姆施塔特，在这里，他听到了钟楼大钟的钟声。最后他到了海得尔堡。雅科布特别喜欢这座位于内卡河上的城市，它不但有一座座吸引人的房屋，还有秀丽的四郊。他参观

了修尔皮斯·巴乌谢尔的艺术收藏品，巴乌谢尔在浪漫主义画家影响下，为保存许多旧的画派的作品做了大量工作。雅科布过去就认识他，现在他在热情的主人家里看到了“壮丽的画幅，特别是老的佛来米派大师范—艾克和麦姆林的绘画”。他赞赏了绘画精美的色调，景物远近配置、形式的准确性和明确性，画面细节的完备和深刻的含义。他以高度赞誉的态度研究了刻有科隆大教堂的版画，巴乌谢尔对这个大教堂曾进行一系列专门的研究。当然，雅科布经常到图书馆去，参观了不久前得到的珍贵赠书，而且，非常高兴的是，他在这些图书中发现了北欧的史诗，这对他和威廉的研究工作是有益的。因此，在这次西方旅行期间，雅科布不但完成外交代表团秘书的使命，而且，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也注意到了文学和艺术——一切在和平的日子里可能成为他研究对象的东西。

下一站是卡尔斯鲁厄。他又以赞叹的态度参观了这座城市建筑上配合相称的格局，这里的房子“异常舒服和美观”。雅科布还利用机会，拜访了诗人约翰·佩捷尔·黑贝尔，他是以自己的《阿勒曼方言诗集》和《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箱》一书而出名，并且受到过歌德的赞扬。黑贝尔在收拾得整齐的屋子里面对客人来回走着，他一面吸着烟斗，一面热情地谈论着威廉所出版的古代丹麦诗歌集，——这个集子他读过三遍。不用说，在卡尔斯鲁厄，雅科布也参观了当地图书馆和书库。他在五百部寺院手写本中找到了写在羊皮纸上的《提图莱尔》手稿，这是关于《巴尔其伐尔》史诗集中的一部分。

这时，威廉从卡塞尔给哥哥来信，谈到家里的事情：雅科布的书桌摆满了纸张，虽然样子好像在闲着，其实他在哥哥不在的时候还在继续着他们开始了的共同工作。他急切地注意着新闻，希望尽快缔结和约。

雅科布经过弗赖堡，已经走在去巴塞尔的路上。就是在两站之间经过的地方，他也要想法例览所有最有意义、最有趣的东西，并且作必要的笔记。在弗赖堡，他来到了大教堂，他非常喜欢带绘画的玻璃和祭坛上的壁画。在巴塞尔，他又碰到了使他回想起战争的现实，——莱茵河岸上的拥挤不堪的形形色色的士兵。

在1月和2月的寒冷的日子里，雅科布和公使一起坐着马车行走在外国的土地上。当然，这种外交旅行不是没有危险的，在军队慢慢接近巴黎的时候，他曾多次成了政治和军事事件的目睹者。

到达法国之后，雅科布在这里也能找到时间去图书馆，在大量手稿之中寻找需要而又珍贵的材料，并且他再一次相信，有朝一日，这些材料对他是有用的。

这时，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充满了对遭受战争苦难的人民的同情。1814年2月，他从朗格尔发的一封信说道：“当地本来非常贫穷，加之又被过路的士兵抢劫一空……一般说，大部分战俘都被释放回家。”在另一封信里说道：“刚才来了许多俘虏，他们大部分完全是年幼的孩子。天气寒冷，当看到他们受冻挨饿的情景，心里非常难过。”又说：“在巴尔和特鲁瓦，贫穷的景况非常可怕。大部分村庄都空了，在路上我们看到很多被扒去衣服的尸休、警戒的篝火和燃烧着的村庄。”或者说：“需要亲眼看一看，士兵所经受的是

麦姆林（1433—1494）荷兰文艺复兴时画家。

这是一部宫廷骑士史诗，为德国诗人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约1170—1220）所作。

这是一部宫廷骑士史诗，为德国诗人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约1170—1220）所作。

什么。最可怕的是疾病、医院和俘虏。近几天，在科姆鲍方坚镇的外边，我看到一个径直躺在行军路上垂危的年轻奥地利人，士兵们绕着他走了过去。人们都漠不关心地从他身旁走过，他即将死在旷野之中，天知道，会不会有人埋葬他。据说，在巴尔，没有埋葬的尸体都引起了类似鼠疫一样的传染病；在这个不幸的城市，现在总共不过有三十或四十户人家。”

雅科布对于这种遥遥无期的行程感到厌倦，而且不得不做一些真正的小事情，所以不可能把力量集中在重要的工作上。然而，绝不能说，他喜欢这种四处奔波的秘书生涯。两个参加远征的弟弟也使他感到不安。如同所有被战争拉离正常轨道的人一样，他热烈希望和平尽快到来。

“最主要的是得到真正的和平，”在那些日子，威廉也怀着同样的情绪给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别涅克写信说。“除了天国以外，其他一切东西我们完全能够得到，而且我们要真正着手搞我们自己的经济，好满心喜悦地弥补战争期间所荒疏的东西。”

在前往巴黎的最后一段旅程中，战争所造成的可怕情景也一直伴随雅科布。他曾写信给弟弟说：“在这一条路上，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许多从地下挖出来的直挺挺躺在路上的尸体。其中一个赤身裸体，直伸着两手，好像木乃伊一样，而行人从旁边路过，连一把土也不撒上去。古代人民的风俗要正当得多，一般说也是残酷的。在荷马的作品里，战斗之后都把打死的人烧掉，骨灰都干干净净收起来，随身带走，死者的亲人们以为他还活着，也不能很快得到他死亡的消息。而且他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那种可怕的死亡的情况。”

1814年4月的一天，雅科布·格林终于来到了巴黎。自从他那次来到巴黎为自己的老师萨维尼查找图书资料以来，已经过去9年了。现在，雅科布肩负不同的使命——外交代表团秘书——来到了法国京城。来到巴黎之后，雅科布得知他的弟弟卡尔和路德维希都还活着，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

外交代表团的职务并没占去他很多时间，所以雅科布的空闲时间全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这一次，他发现了瓦尔特留斯（瓦尔特）的手稿，这里有一篇过去没人知道的序言和几篇有关动物叙事诗的手稿。关于动物的童话，比如关于狼和狐狸的拉丁伤感抒情诗，他过去就研究过。在这里，雅科布觉得自己如鱼得水，非常如意。与今天的学者们不同，他们有条件拍摄原始材料，而雅科布要一行一行地用拉丁文抄写。在巴黎逗留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要加紧工作。在三个礼拜当中，他抄写了将近七千首诗。而且这并不是简单地机械抄写，他一面抄写，一面还要深入地了解本文和抄写者的笔迹。

1814年5月30日，终于签订了和约。雅科布要告别巴黎。这时，维也纳正进行“维也纳会议”的准备工作，而雅科布和黑森代表团应当参加这一工作。但是，因为会议开幕的时间要推迟一些日子，这就有可能用一定时间回故乡卡塞尔去一趟。

6月12日早晨5时，马车驶出了巴黎。经过艾佩尔涅伊、沙隆、凡尔登来到了梅茨。在梅茨，雅科布按照老习惯立刻就来到了图书馆；这里的手稿不少于六百卷，可是没有目录，他不得不一卷一卷地翻阅，以便确定，这里边有没有使他感兴趣的材料。在斯特拉斯堡，为了寻找所需要的手稿，他也翻阅了整个图书馆，并且得以特别准确地核对了《可怜的亨利希》的原文。在这里，他参观了古建筑遗址，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他很感兴趣：“大

教堂真是美极了，而且百看不厌！”

1814年7月初，雅科布回到了卡塞尔，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还在年初的时候，卡塞尔图书馆第二图书管理员的位置就空下来了，于是威廉就递交了一个呈文。他那时28岁，可是在学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了。实际上，他得到的不是图书管理员的职位，而是秘书的职位，但还是低薪俸。在就职宣誓之后，威廉按照规定拜谒了侯爵。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他都在图书馆：检查所有藏书，登记收到的图书和编制目录，而这些图书的数量很大。他和同事们相处很好，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他的性格很随和。当雅科布在法国的时候，威廉下班回家就继续他们共同开始的工作。他在编写童话集第二卷，收集这一卷的材料比第一卷快得多。同时，威廉还在照料着《老伊达》的出版事宜，同出版者和印刷厂进行交涉。

威廉还有一件操心的事——迁入新居。他希望，雅科布从巴黎回来之后，在新居里能够看到过去熟悉的环境并安静地继续工作。当然，如果公职为此留给他某些时间的话。是什么引起了他搬家的必要性呢？第一，在城市中心都是旧房子和狭窄的小街道，经常有失火的危险，所以格林兄弟对于书籍和收集来的手稿的安全特别不放心。多年的劳动可能毁于一旦。第二，经济拮据。兄弟二人只有菲薄的收入。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们要求房东降低房租，可是房东不同意。同样用这些钱在新市区里能够租到整个一层房子，并且从这里可以尽情眺望花园和山景。当然，同旧房子分手也是依依不舍的：这里舒适，一切布置合乎心意。况且这是他们的母亲生活过和最后去世的地方。搬运所有的书籍并在新房子里布置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家具什物，首先要一件一件检查，然后扔掉不需要的、多余的东西。在再三掂量之后，威廉终于租下了靠近威廉堡林荫道的一所房子的第三层；房子看起来挺华丽，同时房租也不贵。一向在一切方面都很细心的威廉，仔细地检查了那些还是爷爷和父亲留下来的所有旧书和笔记。他所需要的文据——这积累了很多——都放到了桌子抽屉里。这好像是他建立的家庭档案。

在新居里，威廉首先安置了几个书柜和大书架，并且进行了修理。家务由洛塔料理。终于，威廉堡林荫道的房子里的一切都布置就绪了，于是，威廉就写信告诉雅科布：“房子很安静，很像是乡下的房子，傍晚景色很壮丽，和旧房子一样宽敞，也许，比旧房子还要大一些。现在一切都收拾好了，在好多方面甚至比过去更强，比如，我分出了一间小屋只放旧书、许多纸包和我们的《基利杰勃兰特之歌》等等。如果你对这一切感到满意的话，我将很高兴。”威廉像女人那样细心，他在新居创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

雅科布回到卡塞尔的家已经是新居了，这里的一切都作好了迎接他到来的准备。离动身参加维也纳会议还有几个礼拜。雅科布怀着重回故里，和亲爱的弟弟妹妹团聚的心情坐在书桌前，他在写给别涅克的信中谈到自己这个时候的情绪：“我和往常一样在不停地工作，并且对生活很满意，谢天谢地，我的书籍完整无损地回来了，现在在我身边。和这些书籍重逢，过去的学术著作，笼罩德国的一派生机，——这一切完全吸引了我，以致使得我都无暇考虑未来。”这些日子，他全神贯注于创作，没有考虑下一步维也纳的外交职务，他在给帕乌利·维甘德的信里承认：“但愿你能看到我这里有多少工作：《伊达》、《可怜的亨利希》和童话集第二版准备出版；我随身带来的东西，现在甚至都不能考虑。”

11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

1814 年秋临近了，为了去维也纳，雅科布以惋惜的心情离开了自己在卡塞尔的书桌。当然，德意志的许多小国也希望出席会议，这样，雅科布就作为黑森侯爵的外交代表团秘书来到维也纳。他又一次乘坐马车经过马尔堡、法兰克福、阿沙芬堡、哈瑙——他出生的城市——完成了一次长途旅行。他非常喜欢有高大砖瓦建筑的符次堡，特别是诺伊曼的公馆：“这是一座辉煌的宫殿，有别致的阶梯和意大利风格的富丽堂皇的造型。”紧靠宫殿的是一座花园，“幽雅而又清洁”。对于具有长箭般的街道和完美城市格局的纽伦堡他也特别欣赏。在勒根斯堡，他看到“美好的大教堂和宽阔的多瑙河”。离开勒根斯堡，他们沿多瑙河而下。当然，当时还没有大船。船舱里有四个人：太子、两个伯爵，——其中之一是黑森代表团团长克列尔伯爵，——和雅科布·格林。船舱很小，四个乘客在里边刚刚挤下。紧接着还有一个更小的船舱，是供三个仆人用的。除了这几个乘客之外，船上还有一个船长和自己的助手以及几个帮助划桨的人。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同外交官们谈话并不合他的心意，况且他同“惯常以粗暴态度猛烈抨击雅各宾派”的太子几乎争吵了一顿。还不如留在甲板上观赏沿岸不断变化的风光要愉快得多。后来他记下了自己观赏的情况：“当月亮从后面升起，美丽的落日映在水面上，河水好像融化了的银子一样，美不可言。而这时我们正好从有名的多瑙河漩涡旁边驶过，从水里冒出了一块块挺立的岩石，岩石旁边掀起了一层层波浪。”以及：“林茨周围是我所到过的最美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远处群山的轮廓很美……”

1814 年 9 月底，雅科布抵达维也纳。他在这里一直呆到 1815 年 6 月。这座京城连同郊区分布很广，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吃惊的是市中心那多种多样的建筑式样和狭窄街道上那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大概令人不愉快的只有一点：安排他和伯爵住在远离市区的郊外，而会议在市中心召开。他在路上要花去很多时间。

当然，在外交舞台上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好像不说话的配角一样，但是他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会议的工作。会议应当决定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的新安排。出席会议的除签订巴黎和约的欧洲强国代表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将近有二百个国家、城市和其他领地的代表：有已经加冕的重要人物、久于阅历而练达的国务活动家和享有盛誉的大使——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团体。

关于会议开始的情况，雅科布写道：“在允许我们参加会议之前，先由大国之间进行商定；因此，现在全部工作就是听消息，虽然本应是另一种情况。这里有足够的休息日和演出；如果知道，一切会顺利结束，那么可以轻松休息和观看演出；我虽然有票，但是我今天没有参加为上万名客人举办的化装舞会。”

会议是令人开心的！

雅科布对于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忠实仆人所玩弄的手段和阴谋诡计不感兴趣。他在给威廉的一封信里写道：“关于会议的情况没有多少好的可说，因为：1）暂时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2）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也是秘密地，小心翼翼地，平平淡淡而又无声无色，好像我们就没有碰上伟大的时代。任何一个问题都要事先讨论，而且一个接着一个，这些问题搞得越来越混乱，

而我们的需要和要求是很清楚的，坦白地说，如果让天真的孩子发言，他甚至也能找出正确的答案。那些身居高位的一窍不通的大人物却说了好多废话。”雅科布写信告诉弟弟，他对这种政治游戏和卑鄙阴谋非常不满，希望在拿破仑时代之后对许多问题的解决采取更为豁达的态度。他对于在维也纳必须违背自己的意志穿上燕尾顺和皮靴的那种生活，感到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惋惜丢失的时间，贪婪而又夸夸其谈的使者生活使他感到苦恼。

外交工作引起了他的厌恶。他在3个月以后，即1814年12月底，写道：“1个月，2个月——只好如此，但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了不损害我的未来，我渴望体面地摆脱这个处境，因此我想等到会议结束。”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他应当忍耐，以便不辜负侯爵的好意。

这时拿破仑离开了厄尔巴岛，回到了法国并且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开始了拿破仑第二次称帝。这次称帝延续了一百天，直到结束他统治的滑铁卢战役为止。这一次他放逐到了圣赫勒拿岛。

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雅科布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对会议作出某种有益的工作。他为约瑟夫·格奥佩斯所办的《莱茵水星》报写了许多文章，在这里阐述了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观点。但是每一次他都不得不承认这类努力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生活和这类工作全是十分荒谬而没有意义！它们像打没有穗的稻秸一样，明知道没有穗，却又拿起同样的、新的稻捆，勇敢地打起来。”

他也反复考虑了与会的某些著名人物的态度。雅科布称麦捷尔尼赫公爵是一个“精明的，用法语说就是老练的国务活动家，他对待奥地利的态度很好，可是把德国放到了第二位”。在他看来，加尔金别尔格公爵以“坚定、沉着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代表着普鲁士的利益”；他认为威廉·封·古姆鲍利德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施泰因大臣的“特点是对于德国具有纯正的愿望，进取心强，并且令人尊重”。雅科布遗憾地发现，在这里，即维也纳，人们好像忘了“胜利和得救应该归功于谁”。

雅科布作为外交代表团的秘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得不“起草许多不需要的文件”。不过，在维也纳的几个月中，他也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他长时间地呆在图书馆，寻找需要的手稿，他抄写了中世纪诗集《沃尔弗基特里希》的一部分。雅科布对于藏在私人手里的《尼伯龙根》手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暂时得到了这个手稿，并判定手稿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发表过，也没有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但是他只能抄写一部分，因为这个手稿的主人担心，抄去副本将会降低手稿的物质价值。他还从得到的寓言中作了一些摘抄。

对于雅科布来说，维也纳时期是卓有成效的。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够在这里出版他的《神秘的道路和神秘的柱子》一书和西班牙古代抒情诗集。他往家里写信说：“我的西班牙抒情诗已经超过了三百页，正在用非常好的大型字体和优质纸张印刷，总的说，我把这些诗带来是非常正确的。”他原考虑在维也纳逗留期间只能读到校对稿，可是没有发生任何耽搁，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书就出版了。在这里，他还着手进行斯拉夫语的研究并结识了许多大学者。

这时，威廉一个人在继续编辑《古代德国森林》杂志。校对《老伊达》和《可怜的亨利希》这项需要非常细心而又耐心的工作也落到了他的头上，为了对弟弟所表现的功绩表示赞扬，雅科布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感到非常

遗憾，你现在不得不一个人承担全部重担，而且还要编写《伊达》、《森林》和《可怜的亨利希》，我时常想念你；从内心希望帮助你。然而我应当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抄写外交文件上；仅在上个礼拜就抄写了二十一页——而且完全是无效的、徒劳无益的工作。”威廉的努力得到了褒奖。他们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文坛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格林兄弟的名字。

1815年4月，根里耶塔·齐麦尔姨母，卡塞尔侯爵宫廷的使女逝世了。在格林兄弟中学和大学时代，姨母为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好事。雅科布和威廉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痛。只是在不久之前，全家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不在家的雅科布的生日，为他的健康喝了潘趣酒。齐麦尔姨母也在场。为了庆祝自己的外甥，她带上了钻石戒指，随身拿来了放在匣里的姐姐的照片。她当时为自己的外甥们多么高兴呀，尽管是在困难年代，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可突然她就死了。她总共病了3天，她的病被认为是无害的卡他性发炎。头一天晚上她还一面笑，一面总在重复说，她多么为自己的外甥们感到高兴。第二天就因肺水肿去世了，照当时的说法就是死于“气喘”病。当威廉走到她床前时，她刚刚断气。然后为她缀上了花束。早晨的太阳出来了，接着来了好多人，以便再一次见见这个善良的女人，并同她告别。侯爵夫人承担办丧事，慷慨支付了一切开支，因为她知道，格林家庭没有能力负担这笔费用。她还以极大的同情心要求格林兄弟今后像他们从前经常找自己的姨母那样向她提出自己的各种操心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仁慈，她赠给了他们的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利六百塔列尔，以便使他能够继续上学。

雅科布得知姨母去世的消息之后，给弟弟写信说：“她对我们如此善良——她是爱的化身。”而且他好像在进行判断似地说：“我们家简直要死尽了，我们再也没有亲戚了，再过不了几年，我们大家也要同我们的爱好、我们所操心和张罗的事情一起变成小土丘；现在我感到特别留恋你，我甚至不能想象，没有你还能做些什么。也许，老天爷还要给我们一段呆在一起的时间。看来，最后的年代，在我的心里将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忧思。”

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的死对这个30岁年轻人所引起的“忧思”……不过姨母的死同时也使雅科布决心摆脱黑森外交代表团无益的秘书事务而只从事他认为重要的工作。他承认：“这种混乱的、对我来说在各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生活方式可能要损害我的力量以及毁灭我，如果我还要长久地在那种气氛中继续生活下去的话。”

“我下定决心要从这里脱身，并且和过去一样依靠上帝。”

雅科布曾上书侯爵，请求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免除他外交代表团秘书的职务。

1815年6月底，这次漫长的会议终于结束了。奥地利收回了最近几十年所失去的大片土地。普鲁士又推进到了莱茵河，这样它的领土就分成了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之间插进了黑森和汉诺威。这时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着39个主权国家和自由市，它们根据1815年6月8日的《维也纳联邦议定书》建立了《德意志同盟》。当然，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德国人对于维也纳会议这种结果是不满意的；一些人希望《德意志同盟》具有更集中的形式，有强大的权力；另一些人则仍然要求加冕的统治者接受宪法，以保证人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权力。这两股潮流——民族的潮流和自由的潮流——决定了德国以后几十年的历史。

雅科布也希望，维也纳的决议将促进德国的统一，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

实现。为了不浪费时间，应当尽快地回到卡塞尔，回到弟弟妹妹中间！

这一年夏天，威廉·格林游历了内卡河和莱茵河，这是两条在当时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河流，两岸有许多山峦和城堡；在海得尔堡他同他的弟弟从前一样，也欣赏了巴谢尔所收藏的绘画。

雅科布在结束了维也纳无数奇遇和惊险的经历之后，返回了卡塞尔。有个时期他还同亲人们讨论了维也纳会议那些模棱两可的决议，不过家里人对他的关心和支持使他慢慢地平静了下来。1815年9月，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说道：“我清楚地了解，由于我们社会的境况所造成的这种悲观情绪；有时我感到自己就是这样，这时我个人的情绪也就不知所终了。只有我们在追求最高尚、最美好事物时每天所碰到的那些普通的人们，不希望了解这一点。亲爱的哈克斯特豪森，让我们保持良好的情绪，因为大多数德国政府还没有从那种陈旧的、缠绵不断的腐朽事物中脱出来；要使美好的信念成熟并且占据上风，尚需时日。要知道这是不可能在1天之内实现的。我们现在得牢固地站稳脚跟，因此我们不当把一切都看得过分认真，都放在心上，而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处境善意地促进一切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为了服从命令，雅科布在回家之后很快又要到第二次为盟军所占领的巴黎去。在这里他应当确定在军事行动期间都有些什么手稿落入了巴黎，并且还要完成自己的侯爵所委托给他的一系列外交任务。这一次他认识了最高法院顾问埃伊霍伦，他后来出任了普鲁士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

1815年10月间，雅科布在巴黎执行外交使命时，他又一次，而且这一次很坚决，决定结束这种职业，决心在安静的书房里从事他所心爱的工作。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卡塞尔来了一封公函，公函通知说，他被编进了出席法兰克福《德意志同盟》会议的黑森代表团。雅科布声明：“无论如何，我将再也不担任外交职务，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就上书侯爵。”在侯爵夫人帮助下，一切都顺利解决了。主要的是，这次没有使侯爵受到侮辱。不仅如此，雅科布还能够要求其他更适合于自己的职位。他希望在卡塞尔得到档案管理员的职位，或者在威廉担任秘书的那个图书馆里谋到一个职位。他过去的领导者什特里杰尔于1815年去世了，留下了一个空缺。

1815年12日，在结束了巴黎的一切工作之后，雅科布乘驿车路过布鲁塞尔回到卡塞尔。他在法国和奥地利几乎漫游了2年，在巴黎和维也纳呆过，现在终于迈进了老家的门坎。兄弟们又在一起了！

雅科布和威廉走到了书架跟前，雅科布又体会到了愉快和满足的感情：同学著作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在一起的还有一本今年出版的书，书上写着：《格林兄弟》。这就是《童话集》第二卷。

许多为第一卷提供了宝贵材料的人又帮助格林兄弟准备了第二卷。其中有多尔特亨·维利德和卡塞尔药房主人家的老玛丽娅。下边就是多尔特亨所讲的会唱歌的云雀的童话：“从前有一个人准备到遥远的地方去旅行，临走前告别时，他问自己的三个女儿，要给她们带回什么来。大女儿要珍珠，二女儿要钻石，而三女儿说：‘亲爱的父亲，给我带回一只会唱歌的云雀来。’原来，得到珍珠和钻石要比得到一只会唱歌的云雀容易得多！”

在老玛丽娅的童话宝库里，有一个童话是关于国王和他三个女儿的故事。她讲了关于青蛙王子的童话。小女儿碰到了一只青蛙，它变成了一个童话里的王子，因为公主不害怕同青蛙睡在一张床上：“青蛙跳到了枕头下边，公主就睡着了。早晨，她睁开眼睛，心里想，大概青蛙跳着跑走了，可是她看到在她眼前的的是一个漂亮的年轻王子。王子对她说，他曾被魔法控制，她使他摆脱了魔法，因为她答应了做他的情人。于是他们一起来找国王，国王为他们祝福，然后就举行了婚礼。”

布伦坦诺的姐妹约尔吉斯太太曾参加了第一卷的准备工作，她还知道一个被魔法控制的青蛙的童话（《狮子和青蛙》），这个童话也是以盛大的婚礼收尾的。《聪明的小裁缝》的童话是日耳曼学家费迪南·济别尔特寄来的。在这个童话里，有一个外表难看的裁缝用巧计胜过了非常骄傲的公主，并且娶她为妻：“我们说的那个小裁缝安心地坐着马车到教堂去，同公主举行了结婚典礼，他和她一起生活，幸福得像田野的云雀。谁要是不相信这个故事，就让他马上付一个塔列尔！”

多罗捷娅·菲曼住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尼杰尔茨维连村，她为第二卷讲了许多黑森的童话。像卡塞尔药房主人家的年老的玛丽娅为第二卷讲了许多优美的故事一样，菲曼也讲了许多故事——大约二十个，丰富了第二卷的内容。关于这个讲故事人的情况，威廉·格林曾经写道：“这个叫菲曼的女人身体还硬朗，五十出头，面目清秀，两只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看来，她年轻时代是很美的。许多古老的传说她都记得很牢，讲起故事来平静、坚定而又异常生动，并且兴致勃勃；第一遍她讲得很流畅，如果要求她的话，她就接着再慢慢重复一遍，因此，有的故事在重讲的时候，可以跟着她记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可以逐字逐句记下来，因此记下来的东西不会在真实性上引起怀疑。如果有人认为：在转述故事的时候，有些歪曲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故事都是讲故事人随便记下来的，因此，一般来说，故事的生命是不可能很长的。那么他不妨听一听，她在重述讲过故事时是多么准确，她多么认真地注意着故事的准确性；在重述时，她一个字也不改变，如果发现错了，她自己马上停下，把错误纠正过来。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那些世代代把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传下来的人们，在转述故事和传说时，与我们这些喜欢反复变化的人相比，更忠于转述的准确性。正因为如此，像多次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传说在结构上是无可指责的，在内容上也使我们感到亲切。”

虽然多罗捷娅·菲曼掌握着这么多童话的财富，可是她本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过去的战争期间，她失去了大部分财产，而且她还要帮助自己的女儿，她是一个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寡妇。到底还是碰到了非常可幸的情况，这个妇女遇到了格林兄弟，而格林兄弟把这个饱经忧患的讲故事人所赠给他们的全部财富都保留了下来。她没有机会看到那本载有她的许多童话

的书，因为她在 1815 年底就去世了。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如《万能博士》、《可怜的磨坊徒弟和他的小花猫》、《鬼和他的祖母》、《放鹅姑娘》、《懒惰的纺织妇人》、《清白的太阳要透露这件事》，未必能够想象，这些故事是由一个曾度过贫困生活的妇女讲的。是的，他了解贫困，但是当她讲述三个副工长的故事的时候，声音里流露出了同情：“当他们什么也没有再挣到的时候，他们的衣服都变成了破烂……”她也见到过期满退伍和倒在路旁的残废士兵的痛苦情况。她有一个故事叫《魔鬼的脏兄弟》，开头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士兵被遣散了，没有办法生活，他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困境。”

这个慷慨好施的妇女虽然被战乱搞得精疲力竭，家务操劳把她折磨得痛苦不堪，但是她建筑了一座座黄金般的空中楼阁，并且都分别赠给了别人。她以轻轻的、娓娓动听的声音给格林兄弟讲了一个《可怜的磨坊工人和他的公主》的故事：“开始他们来到一栋小房子里，这座小房子是他用银斧子修建的。眼看着房子就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堡，而且城堡里的一切都是用金子和银子做的。这时她就嫁给了他，而他就成了一个财主，他所拥有的财富够他用一辈子。”在《放鹅姑娘》里，国王的女儿许配给了王子，在结婚的时候，当然，给她“收拾了许多非常贵重的家具和装饰品，金子和银子，杯子和珍宝；总而言之，王室嫁妆中的东西，无不应有尽有”。

这是幻想吗？当然是幻想！但是这不是与人民生活不相干的臆造。在她的记忆里，保存了许多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传说，在这些传说里，劳动和贫困都变成了黄金和宝石，金钱和财富。她的那些富有哲理的童话反映了人民的不幸和痛苦。

不管是卡塞尔药房主人家的普通佣人玛丽娅，还是卡塞尔附近乡村里的多罗捷娅·菲曼，在一定意义上由于格林兄弟采用了她们的童话而载入了史册。这两位妇女最少考虑到未来的荣誉。但是，不管多罗捷娅·菲曼考虑到还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她同其他讲故事人一起对于使黑森的童话财富大量出现在格林兄弟《童话集》第二卷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童话集》第二卷提供材料的第二个源泉在维斯特伐利亚。哈克斯特豪森和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两家都住在这里，他们共讲述了二十多个故事。雅科布和威廉多年来就认识奥古斯特和维尔涅伦·哈克斯特豪森一家。这个男爵家庭的祖籍是帕杰尔鲍伦，他们经常住在帕杰尔鲍伦和晓克斯捷尔之间的标肯多尔弗。哈克斯特豪森一家很早以前就表现出了搜集维斯特伐利亚民歌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们和格林兄弟是志趣相投的。1811 年，威廉在标肯多尔弗住过，这时他就同男爵全家，首先是哈克斯特豪森的几个姐妹认识了，并且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保持了整个一生。在领地庭院里，姑娘们每天晚上唱民歌，讲故事，她们知道的民歌和故事很多。因此，在开始准备《童话集》之后，威廉很自然就找到了这几个讲故事的姐妹。1813 年 1 月，威廉写信给柳多维娜·哈克斯特豪森说：“小姐，请允许我再次向您和您的姐妹们提醒这本不大的童话集，我希望您高兴地读一读它——无论是为了童话本身，还是为了回忆起您当时听这些重话的年代；我和我的哥哥（他虽然不认识您，但是也在向您表示问候）都非常喜欢这个集子，我们希望使它完整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想请您告诉我们一些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童话，以及对于原有童话的补充和更正。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巨细，我们都会以感激的心情接受每一个与童话有关的、甚至小的材料；我不怀疑，您想必还会告诉我们某些东西；而且在美好的独特环境里（由于这种环境，

民歌在您那里仍然生机勃勃)，您将把一切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可靠而又简单，连同它所有特点，包括方言的特点，并且不加补充和渲染，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不久前，您的哥哥曾来到我们这里，对于您参加我们的工作，他当时就答应了我。请向您的可尊敬的双亲大人及您的所有姐妹转达我的问候，我请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看作是写给他们的。”

很快，威廉就接到一封“附有很多童话和歌曲”的信。他在给小封·哈克斯特豪森的回信里写道：“我认为您叙述的方法是无可指责的，在这里，一切如同我所希望的那样，可信而又简单，如果您将继续像您所答应我的那样的精神做下去的话，那么您参加第二卷（《童话集》）的工作将是大量的。”

编入第二卷的许多童话并不是格林兄弟本人，而是他们的朋友们听到和写下来的，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他们是不怀疑的。

和从前一样，格林兄弟保留了对《童话集》的语言本身进行校订的权利。

为了亲自去听取还保留在标肯多尔夫及其周围的童话，1813年夏，威廉来到了哈克斯特豪森家的领地。在这一家的孩子们当中，除了奥古斯特、维尔涅尔和柳多维娜以外，还有费尔季南季娜（丈夫姓封·佐伊德维克）、安娜和索菲娅。他们每一个人在搜集童话上都给了格林兄弟不少的帮助。他冒着倾盆大雨沿着维斯特伐利亚泥泞的乡村上路走了很久。为了把马车从泥泞中拖出来，他不得不经常下车步行。在走了好多小时的路程之后，终于到达了标肯多尔夫。哈克斯特豪森全家热情地迎接了他。在他作客期间，姐妹们都殷勤地关心他。他们都住在一个大宅子里。这时，娘家姓封·哈克斯特豪森的封·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男爵夫人带着女儿热尼和安涅塔正在哈克斯特豪森家里作客。威廉就同她们认识了。照威廉的话说，在大女儿热尼的身上有“某种非常令人高兴和可爱的东西”。这两个“闵斯特尔的小姐”知道许多童话。威廉感到吃惊的是，当时只有16岁的安涅塔所知道的童话数量，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认为，不幸的是，她的判断过分绝对，她的聪明超过了她的年龄。只是在临走之前，威廉才取得她的允诺：要把她再回忆起来的一切记下来，并且寄给他。温柔而安静的热尼负责关照妹妹遵守自己的允诺。这样，就又铺设了一条通向富有童话的闵斯特尔的小路。

在访问标肯多尔夫之后，威廉通知哥哥说：“我的时间过得很愉快。他们知道许多童话、歌曲、传说、传闻等等；我记下了一大部分，另一部分是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记的，他希望把它们再誊一遍，有些甚至是孩子们讲的，也有些是裁缝和佣人讲的。为了准确地和在安静的环境里把它们都记下来，我不得不在那里待四一六个礼拜。从早晨开始和午饭之后，经常是抄写，每天晚上我们到近处的树林里去散步；晚饭以后，大家唱歌，直到天黑。他们兄弟都吹弯筒喇叭，奥古斯特有时吹长笛，而姑娘们都唱歌；某些民歌的旋律特别美。”

标肯多尔夫的朋友们以越来越多的童话充实了格林兄弟第二卷的准备材料，有的童话则是从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家得到的。为此，格林兄弟对他们表示无限感激。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曾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1813年底，他甚至在行军途中寄来了他在夜里和同伴一起站岗时听到的童话。几个月以后，即1814年春，威廉为柳多维娜·封·加克斯特加乌津所寄来的她在标肯多尔夫为格林兄弟所搜集并记录下来的童话，传说和轶事深表感谢，他写道：“您，可尊敬的小姐，给了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喜悦。首先，我想为寄来的童话向您表示感谢。它们对我来说是加倍的可贵，因为这些都

是您搜集来的，还因为它们可爱的童话情节；它们将使第二卷增色。您不能想象，由于准备第二卷，特别是由于其他人的参加和帮助我体会到了什么样的感情。”

1814年9月，又及时收到了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的童话。第二卷收入了从封·哈克斯特豪森家寄来的下列童话：《森林里的老太婆》、《小羊和小鱼》、《国王的孩子》、《六个仆人》、《活命的水》、《白新娘和黑新娘》、《乌鸦》、《玻璃瓶里的妖精》以及其他等等。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幸福的结局，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用以下的话收尾的：“……如果他们不死的话，那么他们今天仍健康地活着。”这些童话经历了许多世纪和时代，在童话的情节上都留下了它们的痕迹——痛苦、灾难和不幸的痕迹。在维斯特伐利亚的童话和传说里，令人感到有一种追求解放、摆脱凶恶的魔法的愿望，并且一定都带着美好的结尾。如童话《小羊和小鱼》的结尾就是这样：“女预言家给小羊和小鱼念了解魔咒，他们又恢复了小哥哥和小妹妹的人形。然后女预言家带他们两人到一座大森林中的小屋里去，他们在那里，虽然很寂寞，但是生活很幸福、满足。”一切都这么简单——念一个好的咒语就变成了人，变成了幸福的人。这看来很简单，不过在这些简单的故事里同时也感觉到了人民生活的智慧，因为为了成为幸福的人，人们需要仁慈和善良。

从闵斯特尔的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家得到的并且收入第二卷的童话大致上也讲的是关于幸福的内容。在一个童话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可怜的士兵，负了伤，再也不能服役了”，他得知了“一双破鞋”的秘密。由于这个士兵掌握了这个秘密，他能够得到任何一个骄傲的王子也得不到的成功。在童话的末尾，士兵得到了国王的大女儿，她做了他的妻子：“在当天就举行婚礼，并且答应在国王死后整个国家都给他。”在《士兵和木工》的童话里，有两个徒弟来到了城堡主人这里，“他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他们得到这两个女儿做他们的妻子，并且一生好像有钱的骑士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多少世纪以来，人民的命运总是最苦的，因此，在他们的童话里幻想欢乐和光明，这是不足为奇的。纵然是在幻想当中，他们也想过一过自由的生活。这些幻想虽然充满了神秘的奇事，但是它们并没有失去现实性。在老爷们混战时期，老百姓所遭受的整个灾难和痛苦后来在童话故事里反映了出来。在幻想中，人民由于正义、勤劳和善良才得到幸福。所以这符合人民对于一个更完美、更纯洁的宇宙的强烈渴望。有谁能因这种渴望而责备人民及其童话呢。

这样一样，格林兄弟《童话集》第二卷的主要部分是来自黑森和维斯特伐利亚不同地区的童话。从数量方面来说，黑森的重话最多。同第一卷一样，格林兄弟的任务仍然是对于从不同的讲故事人和抄写者那里所得来的全部故事进行校订和语言规范方面的加工，以便保持统一的童话体裁。一方面，应当保留和保持原来的内容，另一方面，叙述的风格应当统一，并且韵味也应和谐。诗学方面对于威廉的吸引力比起写序言和注释来说要大得多，所以雅科布，在更大程度上是威廉，经常一面工作，一面对每一个句子进行提炼和润色。在语言上直到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谨慎而又精细的修饰，使这本书不但成了新型的选集，不但是一本集子，而且成了格林兄弟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

1814年秋，《童话集》第二卷交给出版者拉伊麦尔付印，12月印刷完毕，

这本书于1月份问世，标有1815年出版的字样。格林兄弟收到了应该送给作者的一份。其中包括“两本用高级的光滑优质纸”印刷的书，他们就把这两本书送给了自己的朋友。

这本书的开头是威廉所写的序言。在阐述出版的意义时，他说搜集童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保留古代人民的诗歌遗产；第二，向成年和青年读者介绍这份遗产。格林兄弟希望，这一卷《童话集》和第一卷一样，能够永远成为一部好的、生动的儿童读物：“我们不但希望这个集子为诗歌史服务，我们还希望这本书里所具有的诗歌本身能够给读者以影响——使凡是能够使其高兴的人都感到高兴，除此之外，它还要成为一本真正有教育作用的书。有些人反对后者，他们说，在这本书里，不少地方与这一目的是矛盾的，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不适宜的，或者说是不成体统的——比如当谈到某些情况和关系的时候，要么就是谈到魔鬼的时候——因此父母不愿意把这本书给孩子们读，也许，在个别情况下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不过要知道，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童话来读，这是非常容易的；就整体来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这里，任何东西也不会比大自然本身能够更好地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大自然把所有花朵和叶子染上各种颜色，这种合适的颜色就正是大自然所赋予它们的形式；如果有谁因为他们个人的爱好不同而不喜欢这种颜色和形式（大自然是不知道这一点的），那么他可以不看，但是他不能要求把一切都改变过来，染成另外的颜色。又比如：天降雨露，这是对大地万物的恩泽；如果谁不愿意把自己的植物摆出来，担心它过于敏感，也可能受害，那么他就在家里浇灌它，但是他不能要求大家都这样做。自然界的一切都能够成长和发展，而我们应该力求达到这一点……在正确阅读的情况下，不会从童话中读到任何不好的东西；相反，按照恰当的说法，它会成为‘我们的心声’。孩子们无所恐惧地用手指去指点天上的星星，可是根据民间的迷信，有些人却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天使的侮辱。”

格林兄弟是对的。当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本印数不多的童话书（第一卷第一版共计约九百册）注定以千百万册的巨大数量胜利地风靡于全世界。儿童童话集作为“我们的心声”，从民间来到了我们当中，因此它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也因此直到今天老老少少都在读它。

13 紧张的日常生活

格林兄弟的头几篇学术论文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而他们优美的童话集却大大地丰富了文学宝库。

在 1814 年初，威廉获得了卡塞尔图书馆秘书的职位，与此同时，雅科布于 1816 年离开外交部门之后有一段时间待业。不错，薪俸照付，他本想把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但是他想尽快地找到工作。

1816 年 4 月 14 日，雅科布又给侯爵写信说：“自殿下恩许免除我外交职务以后，数月来，我还在继续领取外交代表团秘书的薪俸，而我只不过一直在等待尽快得到与我疏浅的才能相适应的新的任命。我接受这份恩赐，内心惭愧之至。而这种恩赐是违背我的原则的——我不能无劳受禄，况且它会把我束缚起来，迫使我处在这种不明确新职务的状态之中。因此，我拟以我过去的呈文里所恳切陈述的理由奏请殿下实现我最诚恳的请求，任命我去补充宫廷档案管理员的空缺。”这一次很快作出了决定。虽然雅科布没有获得档案馆的职位，但是他却于 1816 年 4 月 16 日被任命为卡塞尔图书馆第二管理员。这是一个不错的职务。每月六百塔列尔，同他担任外交代表团秘书时所得到的薪棒一样。第一图书管理员由约翰·路德维希·弗奥克利利担任，他比雅科布大二十多岁，所以格林兄弟并不认为这对自己是什么侮辱。他们同他很友好，工作十分协调。

雅科布和威廉现在在一起工作，实现了他们的夙愿。关于这件事威廉曾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我哥哥可能获得职位（在卡塞尔图书馆）的希望比对我提升还要重要。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始终要在一起，这样在一起共同工作符合我们的夙愿，而这种请求能够得到满足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对格林兄弟来说，在卡塞尔的工作条件非常优越。图书馆有一个漂亮的大厅，可以在这里接待读者，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谈话的题目非常广泛，因为愿意得到问题解答的人常常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除了礼拜天和假日之外，格林兄弟每天都在图书馆。图书馆对读者开放 3 个小时、其余时间用于纯粹的辅助性工作。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还可以从事个人的研究工作。关于这几年的情况威廉曾写道：“谢天谢地，我们享受到了幸福，这个时期我们找到了在组织得很好的工作机关里从事令人高兴的有益的工作，而且还有从事研究工作和实现某些文学方面计划的空余时间。”雅科布又补充道：“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我生活中最安静的，充满紧张工作的，看来也是最有成效的时期。”

格林兄弟也遇到了困难。1821 年，在黑森侯爵威廉一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威廉二世命令把他父亲的私人图书馆和卡塞尔图书馆合并。从威廉堡的图书馆里运来了成千上万卷书。不得不在一个个狭窄的房子里打开各个箱子，编制枯燥的图书目录，寻找图书复本，重新布置所有的书架——简单说来，就是井井有条而又从容不迫的工作进程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王位更换之后，图书馆从属于宫廷主任官署部门，这引起了图书管理员们的极端不满。因此，为了进行监督要求重新抄写图书目录。很明显，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格林兄弟非常反感。但是，他们同老图书管理员费奥克利利一起不得不服从命令，一行一行地复制整个八十大本的目录。这种令人厌倦而又毫无意义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雅科布写道：“人总是高兴做某种有

益的工作，然而我应当承认，这项工作在我的一生中是最不愉快的，它使我感到难受，长时间破坏了我的情绪。”

不过，这种不愉快是暂时的。而总的来说，格林兄弟对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正是图书馆使他们有可能一起在家，一起工作，而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年来他们住在城门前的威廉堡林荫道上的漂亮的宅子里。冬天，刺骨的寒风在窗外悲惨地呼啸。随着春天的来临，凉台又用绿色装饰了起来，种上了向日葵、青豌豆、旋花和桂竹香。在这半城半乡的住宅里，夏天特别好，这时，从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晴朗的天空，郊外群山的峰峦，总而言之，正如格林兄弟所说的，“充满幸福和欢乐的大自然是欣赏不够的”。

如果没有几个小弟弟和料理家务的妹妹洛塔同他们在一起，雅科布和威廉的幸福就不那么完满。《我们生活的家庭日记》谈到了他们兄弟姐妹强烈的相互依恋的情况，雅科布曾在自己的印书馆印刷了这部日记，上边还附有洛塔的照片，并在圣诞节分赠给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在日记里他记载了自己的亲属的生死日期，留下足够的空白以便今后续写。后来这本日记成了他们的家庭纪事。在前言中雅科布对弟弟和妹妹写道：“亲爱的弟弟和妹妹，在这个圣诞节，我把这部不朽的家庭日记送给你们大家，对这部日记我不得不花费一些劳动，进行编辑工作，并请你们确信，这里所叙述的情况和事件在我的心里所占有的地位比我脑子里萦绕的其余任何问题都要大。感谢你们以前和今后对我的关心，请宽恕我身上凡人所具有的东西，这种东西有朝一日终会结束，而主要的东西——我们相互间的友爱将继续下去。至于说到我，那么我将努力改正我所有的错误，铲平自己所有缺口，哪怕因此磨薄我的刀口也好。每一个人都能够写下他所愿意写的一切。小星星意味着诞生，十字架意味着死亡……每一页都留下了足够的地方，以便画上上升的星星或者栽入土里的十字架；这些标志哪一天出现，这只有上帝知道。但愿上帝帮助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也不要成为你们中任何人的障碍。”

这个时期，格林兄弟同学者和朋友进行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同时又从事了大量的劳动。一天，威廉从标肯多尔弗的童话之家接到柳多维娜·封·哈克斯特豪森寄来的一个“用青苔和化学涂料做的小花环”，威廉把它和贴在上边的善良的祝愿一起放在桌子上自己的手稿前边。

1822年，格林兄弟不得不离开坐落在威廉堡林荫道上的家。新侯爵对于自己的恋爱事件比对学者们的成就更感兴趣，他建议格林兄弟另找住宅。新住宅同旧住宅是不可相比的。搬家打乱了兄弟二人一般的日常工作。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挑看父亲和祖父留下来的东西。扔掉那些与许多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困难的。结果，同上次一样，只是留下了那些在新居不可缺少的东西。雅科布一面装东西，一面沉思：“我这时才深信，有许多零星物品都是心上的宝贝。”

搬家以后雅科布写道：“3天以前，我们彻底地搬家了，现在的住处大不如前；我得到了一间有一个窗子的狭窄的小屋，这里除了放书和桌子以外，只能放两把椅子；屋子里的窗子不是向北而是向西开的，所以我再也看不到我所喜欢的大熊星座和北极星了。”不错，从雅科布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有草畦和苹果树的花园。对威廉来说，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承认：“我不能忘记过去的住宅，在那里可以眺望美丽的群山和辽阔的原野，在这里，我在背景所看到的是不久前修好的兵营，每天从这里出现的是穿着同样制服的士兵。我什么都能够喜欢，但是司令部的司号

员除外，他每天晚上练习他的号，把周围人的脑子都搅乱了。”白天非常喧闹，以致有时不可能集中思想。在这一座房子的下层，有一个铁匠铺。沉重的锤头叮叮当当地落到铁砧上，每一次都引起颤动。

1822 年，格林家里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当他们安排好新居之后，料理家务的妹妹洛塔离开了兄弟们的家。她的丈夫是汉斯·达涅利·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哈先普弗鲁格法官。威廉写道，这是一个“绝对正派、严肃的诚恳的人，他有很好的职业，后来成了卡塞尔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并且还据有其他显赫的职位”。洛塔在结婚典礼那天告别了哥哥们。她身上穿着新娘的盛装，头上戴着香桃花冠；她那两只眼睛的严肃表情和苍白的、多少有点病态的脸色使哥哥们想起了母亲。所以哥哥们只祝愿一点——希望她健康。此外，但愿没有任何东西会损害她同诚实而善良的哈先普弗鲁格的美满婚姻。

令人不安的不仅是妹妹。威廉又开始抱怨自己的胃病和心脏病，而雅科布则充满了疑惑，他写信对自己的朋友拉赫曼说：“我本来非常害怕他的老病要多次发作，可是逐渐见轻了，并且使我产生了希望——凶恶的病一定会好的。”但是希望没有实现。几个月以后，即 1823 年春，威廉又开始发烧了；他们害怕转成神经性热病。雅科布夜夜守在有病的弟弟的床前，而白天上班完成两个人的工作。后来病情终于好转了，雅科布给朋友写信说：“感谢上帝，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关于威廉会死的念头可能要毁灭我的整个一生，它刺入了我的心；甚至现在我还仍然害怕写这个词。我将耐心地经受由于这种病所引起的一切痛苦。”

威廉在城外休养的时候，雅科布承担了家务：自己扫掉书上的尘土，把书分放在书架上，他把所有房间打扫干净，擦地板、窗子和家具。在威廉回来之前，不但住宅已经扫除干净，而且，正如雅科布所写的，这时由于可喜的巧合，在房子的窗前“充满了不可比拟的初春的透澈、清洁和纯朴”。

只不过雅科布很少从窗口向外眺望，在郊外的田野和草地上散步成了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当他谈到自己的情况时说，他“能够闭着眼睛在每一条小径上走和过溪流上的小桥”。1823 年夏，雅科布曾徒步来到那些他（现在已经是 38 岁的人了）曾经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在路上走了 12 天。

1824 年，他不得不重新搬家，雅科布写道：“我们从狭窄的储藏室做到了‘望景楼’——城里一座最漂亮的住宅，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眺望天空、山峦和树木；这里没有打铁的叮当声，而可以听到夜莺和其他鸟类的婉转歌唱！”从 1816 年格林兄弟一起到卡塞尔图书馆工作以来，差不多过了 10 年。10 年来的生活是：图书馆里的工作、学术研究……健康人的幸福和病日的繁忙。

这 10 年在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巨大变化。

1815 年，在彻底赶走拿破仑之后，各个胜利的大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了“神圣同盟”。欧洲其他国家也依附于这个同盟。各国人民都希望长期和平。他们再也不愿意受到专制王朝和官僚们的统治。他们要求得到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要求主权宪法。德国的许多公爵实现了这些要求，在宪法里确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利。比如魏玛大公就是这样。1818 年，巴伐利亚效法他的榜样，也这样做了。但是麦捷尔尼赫所领导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千方百计拒绝这些要求。还在 1815 年在耶拿出现的大学生社团（“青年核心组织”）和雅恩所创办的体操学校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他们都提

出了“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在 1817 年的瓦尔特堡纪念会上，在黑—红—金三色旗帜之下显示了大学生们反对反动政府的国民意志。但是反动势力更为强大。所谓 1819 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规定了对书刊付印前的检查和对大学的监督，取缔了大学生社团，停止了具有革命情绪的教员的工作。当时的波恩大学教授埃伦斯特·莫里茨·阿伦德被停止了工作，“体操学校之父”雅恩被逮捕。反动政权和时代新精神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不仅如此，人民提出的制定宪法的要求和限制公爵权力的要求遭到了否决。1820 年—1822 年分别在特罗帕乌、拉伊巴赫和韦罗纳所召开的历次君主会议号召巩固国家体制中的专制思想。改革的主张被武力扼杀了。看来，反动派永远要扼杀人民当中任何自由思想和统一的渴望。

的确，在其他领域，人类在这 10 年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技术的世界开始了。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发明，虽然它们的结果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乔尼格发明了第一台平板印刷机，大大减化了印刷过程。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铅字印刷品。从 1810 年开始，有的地方出现了煤气喷嘴，虽然所有的路灯从十分简单的油灯变成煤气灯又过了好长时间。电报的试验已经开始。1814 年制造蒸汽机车的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孙已经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难道以后旅行将要乘坐驿车，而要坐别的什么东西不成？1818 年，人们惊讶地了解到，在那条向大海滚动着微绿色波浪的莱茵河上行驶了第一艘装有蒸汽发动机的轮船。更令人吃惊的是，差不多就在同时，类似的轮船从纽约到利物浦横跨大西洋。大家慢慢地了解到，蒸汽和电的力量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对于文学来说，19 世纪是真正繁荣的世纪。19 世纪头 10 年末至 20 年代初，在德国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品，它们都成了世界文学最有价值的一部分。1816 年—1817 年歌德出版了自己的《意大利游记》，1819 年出版了东方题材的抒情诗集《东西合集》，1821 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19 世纪第一个 10 年和第二个 10 年之交，是以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为标志的，这些作品是德国晚期浪漫主义发展的一个顶点。阿尔尼姆于 1817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皇冠的保护者们》的第一部，布伦坦诺于 1818 年出版了《小学生漫游记事》，1819 至 1821 年霍夫曼出版了四卷集的《谢拉皮翁兄弟》，1820 至 1822 年出版了他的著名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和两本为成年人写的童话《勃拉姆比拉公主》与《跳蚤师傅》。1819 年艾兴多尔夫出版了短篇小说《大理石雕像》，而 1821 年青年海涅的第一部诗集问世了。

在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大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写了很多作品。1819 年叔本华发表了自己一生中一本主要著作《世界是意志和表象》，但是，这部著作在长时期内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这之前 1 年，黑格尔应邀到柏林大学任教；大约 1820 年，在威廉·封·古姆鲍利德的著作中表现出了语言哲学的基本特征。1821 年，弗里德里希·吉茨（歌德曾建议他研究拉丁语系语言）开始在波恩任教。到处出现了更完善更深刻地了解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从而也更好地分析现代的愿望。1823 年出版了什洛谢尔的《18 世纪史》，同

1817 年瓦尔特堡纪念会——是德国所有大学的代表为纪念宗教改革运动 300 周年和莱比锡“民族大会战”4 周年而举行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为大学生社团奠定了正式基础。

年拉乌麦尔开始编写《霍亨斯陶芬王朝史》，而尼布尔则研究《罗马史》，1822—1824年，达利曼发表了两卷集的《历史研究》，而列奥波利德·封·兰克则于1824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拉丁语系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史》。

在这10年当中格林兄弟看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宪法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他们当然也发现，在各种发明的影响之下，文明的形式，虽然是缓慢地，但是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同过去突然决裂的。在卡塞尔图书馆，他们每天同新出版的文学作品接触，同时代的精神潮流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正是在这10年出版的。

日耳曼皇帝的一个朝代（1138—1254）。

在卡塞尔时期，格林兄弟对于德国古代诗歌和语言的重视不但符合时代精神，而且也符合他们的爱国情绪，对于这 10 年，雅科布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著作继续存在，在德国解放和黑森复兴之后，它们大概要给我带来巨大的鼓舞，从前，社会舆论对我的学术研究不予理睬，现在这些著作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并得到了他们的厚遇。多少年来，我们——我和我的弟弟——以尽可能的谦恭态度进行工作，我们无所奢求，我们经常感到自己的命运和著作之间存在着深深意识到的、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我们彼此相互帮助，并且注视着在那块虽说狭窄但是仅仅属于我们的小畦上，我们的创作成果在渐渐成熟。”雅科布承认，开始，他们只能耕耘学术研究中的“狭窄小畦”。他们为下一步的劳动所选择的土地并没有耕耘，还需要开垦。他们以开拓者的自豪感说道，他们不是走在别人的，而是走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1816 年，威廉在给歌德的信里写道，许多学者认为“对于研究德国古代文学不予理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高等学校仍然为古希腊罗马语的古典语文学所统治。德国学者研究自己的本民族语言，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当然，格林兄弟已经意识到，需要重新揭示的远非过去所创造的一切。有时令人感到，毁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个问题，雅科布曾写道：“人世的的东西不断在毁灭，甚至最美好、最人道的东西也不能长存，——这一切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同样根据上帝的意志，在肥沃的、施过肥的土壤上长出新的、也就是高尚的精神产物。所以悲伤与喜悦交替存在，不过喜悦毕竟是主要的。”

的确，喜悦更多一些。每当雅科布在图书馆的手稿里找到任何新的、与时代对立的東西，他总是感到高兴。他曾经在信中对一个朋友说，“善良的别尼迪克特教团的教士们为我们抄写、保留和确实拯救了的”一切，我们都应该阅读并抄写下来。

在这些年代，格林兄弟不只是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寻找和保存。他们还想完成基本上以口头传说形式存在的童话的搜集工作。新的技术发明进入日常生活，使得人民急于加快步伐。人们对旧的童话和传说不再感兴趣的時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所以在年老的讲故事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之前，必须把他们所知道的童话和传说记录下来，并且编入已经开始的新的童话集。格林兄弟从柳多维娜·封·哈克斯特豪森和她的姐妹们那里以及从热尼娅和安涅塔·封·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那里收到了许多童话。标肯多尔夫童话爱好者小组的参加者奥古斯特·封·哈克斯特豪森对于搜集童话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格林兄弟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的助手表示感谢。1818 年初，威廉写信对柳多维娜·封·哈克斯特豪森说：“小姐，您送给我的礼物使我感到非常满意，同时也感到非常不安；我有时确实觉得，您已经忘了这件事情，可是您所寄来的童话和传说，内容相当丰富，所以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心情来阅读它们；它们将为我们的童话集增加光彩。”

广泛的舆论界对于个宝藏的真正价值理解得非常缓慢。《童话集》第一卷出版以后已经过了 7 年，第二卷出版也经过了 4 年。在这个时期，《童话集》总共只销售了几百册。只有到 1819 年才有可能对这两本书进行再版。不

是指黑森侯国的复辟。

能说，格林兄弟的《童话集》立刻就不胫而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相反，在它征服少年儿童的心并且成为一本最普及的德文书之前，经过了一个不短的时期。

1819年，这两本书进行了再版。而且格林兄弟和上次一样，也把它分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在书上写道：“请接受它（书），望勿见笑。如果您认为这本书值得更深入地了解的话，那么您会发现，这里许多地方有了改进并作了修订，而第一卷则全部进行了修订。”修订过的新版，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威廉富有诗意的风格的痕迹。对于这种作品的形式赋以富有诗意的风格是符合他的性格和爱好的，所以他就找到这种朴素而又正确的叙述风格。

格林兄弟同时在研究童话理论；他们对称之为“扩大并修改过的”新版本附了一篇文章：“论童话的实质”。这篇文章说道：“给孩子们讲童话，是为了使最初的信念和心灵的力量在他们纯洁而又温柔的世界里萌芽和成长；因此，每一个人对于童话那富有诗意的纯朴感到高兴，而它们的真实性又使每个人受到教益，由于用于家庭，并且产生了影响，所以又称之为《家庭童话集》。童话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它舒服地处于优美、安逸而又平静的环境之中，对于外部的世界不想一望。因此它不知道外部世界，不知道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它也没有固定的故乡；对于整个祖国来说，它是某种共同的东西。”童话不单纯是对那些为一时需要而制成的幻想的花纹所进行的五彩缤纷的、任意的编织，而在其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意义、因果联系和思想。这里有对上帝和宗教的见解：对于同人民的历史一起产生、接受洗礼并且物质化的庄严的自然力抱有的古老信念。

所以，《童话集》于1819年出第二版之前已进行了12年以上的工作：格林兄弟不仅搜集、抄写和发表了这些童话，并且对这种文学体裁理论意义的理解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在《童话集》第二版出版之后，威廉写道：“接着将是第三卷，这一卷应当包括对某些童话的注释以及文学简评。”1822年第三卷出版。这一卷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只愿欣赏诗歌的儿童们，而是学者。

在注释里，格林兄弟不但指出了他们的童话和法国与意大利童话的同源关系，并指出了这些童话与动物童话情节上的相似情况以及古代神话的影响。所以，附有格林兄弟注释的第三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童话研究打下了基础，而这种研究不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在继续，而且可以说发展成了一个广泛而又重要的学术活动领域。格林兄弟的功绩不仅仅在于他们对古老的童话进行了搜集，并以优美的形式把它们固定了下来，而且还在于他们成了科学领域奠基人之一。特别是威廉·格林对这部书的理论部分提出了基本思想。雅科布在这一时期主要忙于复杂的、基本语法问题的研究，他曾承认：“我很少参加《童话集》第三卷的编写工作，也就是说只是偶尔提些意见。”当然，他的建议都得到了弟弟的采纳和重视。

包括第三卷在内的《童话集》完成了，这是16年巨大劳动的总结。1年以后，即1823年，格林兄弟看到，他们这部三卷集的书开始博得了普遍的称赞，其中部分童话很快就翻译成了英语。而且在完成了这部大容量的作品之后，格林兄弟仍在继续对童话进行研究。他们为以后出版搜集了材料。

1824年，雅科布告诉封·哈克斯特豪森姐妹，他们“和以往一样，等待她们寄来的童话”。在他们整个一生当中，格林兄弟编写了一版又一版的童话。而威廉做的工作特别多，他经常研究有关资料，对作品进行润色。

同时，格林兄弟还在研究另一个选题，这一选题似乎可以和《童话集》

相提并论，这就是《德国传说集》。与童话相比，传说是某种崭新的东西。童话里能讲的是些充满幻想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些虚构的、富于神奇的、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在地理上，它没有局限在任何一个固定的地区。传说则不然。当然，在传说里也叙述非同寻常的、特别的、有时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叙述同鬼神、同巨人以及同地精会面。不过它们要么同一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要么同一定的地点有关，它们并不存在于想象的世界。格尔杰尔就曾谈到早已被忘却的传说，认为搜集和保存这些传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格林兄弟之前，就已经有了搜集和出版传说的尝试。不过这方面的主要功绩属于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根据理查德·胡霍的定义，浪漫主义作家“这是在没有意识到的黑暗地方有意识的蹑踪追捕的野兽的猎人；他们所说的是神话、童话、传说和迷信故事；他们并没有在其中消失，如果他们发生迷惑，那么很快就能重新寻找正确的道路”。

格林兄弟也属于这种“蹑踪追捕野兽的猎人”，他们差不多从1806年，也就是说与编写童话集同时，就开始搜集传说了。同研究童话一样，开始他们也企图从亲自知道传说的人们那里得到对这些传说的口头转述。弟弟费尔季南德知道一些传说，有一些则是从童年时代的朋友帕乌利·维甘德，从班格神甫以及从很多熟人那里得来的。同编写童话时一样，封·哈克斯特豪森一家特别积极地参加了这一工作，告诉了格林兄弟许多传说。

作为“蹑踪追捕的猎人”的格林兄弟的人格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精诚团结得像一个人，埋头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和忠诚的理想。格林兄弟为后人树立了一座精神和力量的丰碑。

除了口头传说以外，他们还利用许多书面资料。在颜色已经变黄的手稿里和很少从书架上拿下来的落满尘土的旧书籍里，保留有不少传说。许多年来，格林兄弟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从塔西佗的著作开始研究了许多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从普里尼和卜洛可比的作品当中作了摘录，他们不但从格里高里作品里查找了法兰克人的传说，从约尔丹的作品里查找了哥特人的传说，而且也从保罗·狄康的作品里查找了朗哥巴尔人德人的传说。在从巴黎到维也纳的图书馆里，他们查找了许多手写编年史、民间传说、回忆录和描写卓越人物趣闻的集子。而且他们多次碰到许多无人过问的传说——沉睡了多少世纪的睡美人。格林兄弟仔细而又准确地抄写了这些被重新发现的材料。他们翻阅了16和17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少是路德和格里麦利斯加乌津，费沙尔特和阿勃拉加姆以及桑克特·克拉尔的手稿。同编写童话一样，后来他们在家对它们进行润色加工，力图用通俗无饰的然而却是他们所习惯的流畅语言叙述这些传说。不论是口头的或是书面的，这两种来源都为格林兄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09—1810年是他们特别富有成果的一年。雅科布曾告诉他的朋友阿尔尼姆说：“我这里有许多传说，我现在把最大注意力

理查德·胡霍（1864—1947）德国近代女作家。

塔西佗（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志》。

普里尼（33—79）古罗马作家和科学家，以著自然史而著名。

卜洛可比生卒不详，6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写有《秘史》、《查士丁尼战史》。

格里高里（约540—594）都尔城主教，编年史家，著有《法兰克人历史》。

约尔丹生卒不详，阿兰尼族人，6世纪历史学家，著有《哥特族的起源和历史》。

保罗·狄康（约720—？）德国巴尔德族的历史学家，著有《巴尔德人的历史》。

转向了它们。”

1811年，格林兄弟写信对格奥列斯说：“我们收集传说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看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同任何人竞争。”但是他们又补充说，这件工作对他们本人来说暂时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决定等几年以后再发表，况且这个时候他们正准备出版《童话集》。但是到1815年，当两本《童话集》出版之后，正如格林兄弟在写给歌德的信中所说的，他们想“也按照《童话集》的样子，来准备德国传说”。

1816年，他们顺利地出版了传说的第一卷，而在1818年复活节前出版了第二卷，即最后一卷。这部新书，和《童话集》一样，向世界打开了非常美妙的、几乎被人遗忘、而且有被埋没危险的宝藏。

威廉的儿子盖尔曼·格林非常了解他父亲和伯父的工作方法，关于这一点他后来曾经这样写道：“《德国传说集》是他们兄弟二人完全在一起工作的年代出版的；因此，确定发表的东西属于他们每人的部分主要是根据思维方法，而很少根据材料……他们两个人的叙述语气，虽然在更仔细地比较时也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则好像两种钟声一样，彼此是互相补充的。

《德国传说集》在许多世纪当中将以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所赋予它们的语言而存在下去。”

在研究传说的语言时，格林兄弟是以编写童话时同样的认识为出发点的。他们当时写道：“尽可能地、而且必须保持原来资料所具有的内容和形式。”因此，他们希望准确地、不加歪曲地表达原文，表达他们从手稿和书籍中所得到的东西，表达他们在黑森、加尔茨、萨克森、闵斯特尔、奥地利、鲍盖米亚和其他地方所听到的以及从学者、牧人和林务员那里所了解到的东西。但是，格林兄弟并不是所听到的和读过的材料的奴隶。在这里，雅科布的语文的准确性和威廉的诗人的洞察力又结合了起来。所以，他们相互影响和合作的结果就产生了从某种意义来说独特的语言熔合物。

在这两卷当中，他们收集了几乎六百个传说。第一卷专门收集了各个地方的传说，第二卷是历史传说。

在这些传说里，家神和幽灵到处游荡，人鱼公主和爱尔菲使自然界生机盎然，神鬼和地精在家庭储藏室里跑来跑去，矮子从地洞里钻了出来，巨人迈着大步跨过群山，高祖母复活了，由魔力控制的王子在等待自己的时刻。而且还常常出现过去很久以前的历史人物形象：有时是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公爵或者是较晚时代的皇帝和国王，有时是传说中的人物，比如人民的庇护者热涅维耶娃或者豪杰人物济格弗里德和洛埃恩格林。不仅出现了古代的宫殿和城堡，地穴和坟墓，而且还回复了历史本身。

关于格林兄弟对于《传说》具有何种意义的认识，这一问题可以根据他们在这个集子出版前所写的序言进行判断：“祖国给每个人一个善良的天使，从他降生那一刻起，它就以忠实伴侣的形象无形地伴随他整个一生：谁如果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幸福，那么当他刚一离开祖国的边界，他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善良的天使在祖国的边界上就会离开他。这个善良的伴侣就是童话和传说，这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它们并存在一起，依次以新鲜而生动的图画把遥远过去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各有特点。童话比较富有诗意，而

3—7世纪欧洲民族大迁徙。

圣徒热涅维耶娃（约422—502）是匈奴入侵时传说中的人民的庇护者。

传说色调简单，它的特点是：依附于某一个有名的和熟悉的事物，某个确定的地点或者由于历史而保留下来的名字。

为了说明他们多年来是以什么样的分寸感研究这个集子的，格林兄弟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传说搜集者的劳动很快证明是有效的，而成功的发现最能使人联想到在青苔上和密茂的灌木丛中碰上正在卵雏的母鸟时的那种童年时代天真的欢乐；寻找传说同样像不作声地摘下干叶，小心翼翼地拨开树枝，以便不打破这里的栖居者的安静并偷偷地窥视一下自然界本身——非同寻常的、隐秘的和散发着叶丛、牧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下过雨的气味的自然界。”

格林兄弟能够有充分的权利像《童话集》那样向“德国诗歌、历史和语言爱好者”推荐《传说集》。正如威廉以满意的心情写信对阿尔尼姆所说的，《传说集》成了一本“不可缺少的指南”，或者像他在给歌德的信里所称赞的那样，它是一部“必要而有益的作品”。

很快，其他许多传说搜集者也都在模仿他们。学者们承认，研究传说是一个新的、富饶的活动领域。许多诗人为创作自己的作品在《传说集》里寻找鲜明的情节和丰富的材料。

对于格林兄弟来说，表面上平静的卡塞尔年月，即“图书馆”时期，不仅充满着繁重而紧张的合作，而且他们每个人又在从事自己的工作。

在这些年代，雅科布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研究语言。人类语言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自然勿庸赘言，而且也完全不足为奇，可是对于雅科布来说，人类语言是一种多么异乎寻常的东西，他在自己的《论语言的起源》这篇作品中承认：“在所有事物中，即在人们所发明的、想出的、保存的和转给别人的以及在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和由他们创造的大自然的结合中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中，看来语言是最伟大、最珍贵、最必需的财富。但是完全掌握它并且了解它的全部深刻性也是极端困难的。由其他的神秘和奇异的事物所围绕的语言的起源是神秘的和不可思议的。”

雅科布以他所固有的对造物的神秘现象的虔诚态度着手研究德语的规律性。他不但对语言特别敏感，在古典和现代语言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以难以置信的勤奋态度，更准确地说，以发现者的癖性钻进问题的本质之中。在像雅科布这样大的研究者看来，在语法及其规则中隐藏着人的精神的最美好的表现。

在当时，用比较法研究语言刚刚开始。不错，对于匈牙利语、印度语、北方语和拉丁语已经着手研究。雅科布·格林几乎用了20年——从1819到1837的时间写了一部四卷集的巨著《德语语法》，这部著作奠定了对德语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他成了日耳曼学，从狭义上说是日耳曼语文学奠基人之一。

在下班之后，这位谦虚的卡塞尔图书馆管理员就坐在书桌前，研究词和句子。他进行了忘我的劳动。1818年威廉写道：“我的哥哥以难以置信的勤奋态度在研究包括所有日耳曼语在内的历史语法。”当时威廉就已经认为，“这将是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1819年，《德语语法》第一部问世了。雅科布把这部书献给了当时在柏林担任司法顾问他的大学老师萨维尼。雅科布写信对他说：“亲爱的萨维尼：我始终怀着深切的愿望，把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所能创作的美好而又有益的东西献给您——而不是任何人。”不过，他以他所固有的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认为这部著作也有不少缺点，他同时又承认，它也值得适当的嘉许，因

为它是“在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在过去几个世纪当中所精心研究的仅仅是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而现在出现了这种了解祖国活的语言的转变！

雅科布在说明自己的语法著作第一部时，强调指出，他不企图建立德语理论。他认为，如果使人们牢牢记着他们自己语言的语法，这是一种“难于表达的迂腐习气”。按照他的意见，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应该得到完全自由的发展。祖国的语言应当作为某种正常、自然而然的东西，同母亲的奶汁一起吸收。雅科布反对那种把自己看作是语言方面立法者的、公认权威的教导方法，不希望建立“学校和家庭日常生活用的本族语”的语法。他认为，人民和诗人没有语法规则知识也能正确使用语言。这里所谈的完全是某种另外的事情、不应制定指示和命令，而应当在经过检验的科学基础上研究语言规律性。他用以下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编写德语历史语法的念头完全吸引了我。在认真阅读德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时候，我每天都能发现这样的完美形式：它完全能够同那种引起我们对希腊人和罗马人产生嫉妒的东西相媲美。同时出现了所有同族方言之间完全意想不到的近似情况和从前所没有发现的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的条件和状况。在我看来，彻底研究和说明这种不间断的、持续的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最后作出结论时，雅科布写道：“考虑到所有日耳曼语都是同族关系，我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它们到底是以什么方法联系起来的，并且证明，如果不弄清楚更早的、旧的、完全是古代的语言形式，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的语言形式，所以，现代的语法结构只能从历史上得到解释，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一目的是完全不能达到的。”

仅《德语语法》第一卷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映。对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曾亲自进行过抽象研究的威廉·封·古姆鲍利德，对于作者深表尊重，曾以讲授文学和艺术课程而引起人们注意并奠定古印度语文学基础的波恩大学教授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也对，《德语语法》表示称赞：“我高度评价这部著作对于问题的纯历史态度和摆出整个思想时细节上的独特的准确性。”

雅科布从自己的马尔堡大学获得了语文学博士学位。这部著作在专家们的小范围内也引起了兴趣。从这个时期开始，雅科布就同克尼格堡大学教授、日耳曼学家和古典语文学专家卡尔·拉赫曼建立了内容广泛的通信联系。格奥尔·别涅克第一个开始讲授德国古代文学，并且是德国语文学主要专家，他在对这部语法写书评时，在《格廷根学术论丛》上写道：这里的“见解，它的系统性和论述是这样透彻、审慎和它展现的渊博的学问：每一个评论家都应当把这部作品称为巨匠之作。我希望称这部语法书是一部语言自然史，而且，如果我们的读者允许的话，我还希望在本来的和真正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史’这个词。我们必须有一部德语语法，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是任何人也没有料到，我们的愿望竟如此出色地得到了实现”。

尽管这部书受到高度赞扬，但是都不可能预测到，它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能销售一空。于是雅科布采取了有些出乎意料的决定。他没有编写《语法》第二卷。而重搞第一卷，对它进行修改。每个礼拜他必须一方面“完成公务上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同时在经常的神经紧张的情况下”为印刷厂编写出一个印张。他写信对卡尔·拉赫曼说：“已经有好几次我只能寄出半个印张，然后又急忙寄出后半部印张。”雅科布在不间断地工作，因为他在“世界终将看到，什么是我们的语言”这句话当中，看到了巨大的意义。当然，犹豫

也是有的。这时，他把自己的劳动叫做“粗糙的木工活”，不然就叫做“没有尽头的琐碎小事”。他有时几乎绝望地承认：编写这部书的愿望落空了。当雅科布从拉赫曼（雅科布对他的意见有高度的评价）那里听到，“已经非常敏锐地发现了书中的某些因素”，他才又满怀信心地着手编写第一卷的新稿。他以他所固有的非常严格、勤奋、几乎是残酷的态度一页一页地编完了这部书。于是工作顺利地前进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房子——语法的房子——已经立起来了，可以进到里边，继续修整，使它竣工。”他不打算对这座语法建筑物的所有细节彻底加以修饰，他只想打下地基，立起墙架。下一步的补建和竣工则是他的同事和同行的任务。

1822年，《语法》第一卷第二版出版了。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有一千多页，同第一版相比，某些东西完全是新的。

这一卷只是格林语法体系的开始，后来他的语法发展成了四大本，雅科布把自己的著作谦虚地叫做《德语语法》。既然他把哥特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把从早时到现代的许多语言文献作为本源资料吸收了进去，那么他的著作勿宁称为《日耳曼语语法》。他从“字母学说”开始，也就是说从语音，从研究每一种日耳曼语语音结构及其变化规律开始，然后对这些语言的变格和变位方法进行精细的分析。他作出了对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的发现。对于德语中重音，词意转变和元音交替的规律作出了新的论断。

雅科布的特殊成功是在丹麦语文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季安·拉斯克事先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之后而对辅音演变规律的发现，关于这个问题，雅科布于1821年4月1日告诉了拉赫曼，因为在编纂《语法》过程中，雅科布经常去征求他的意见。

雅科布著作的崇拜者之一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他在语言上的发现对于日耳曼学的意义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对于物理学”的意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意见未必可以看作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有像雅科布这样通晓多种语言的、知识渊博的学者才能够发现并提出这些规律。

在《德语语法》中，雅科布论证了语言的形成及其变化的复杂过程。由于这部著作，雅科布大大丰富了语言学，其中包括词源学，即关于词的起源的科学，雅科布的特殊功绩在于他以学者的洞察力挖掘各种语言之间的联系，说明了语言同使用它的民族的精神是一致的，并且还说明，某些规律在各种语言中都以惊人的方式发生作用。

这部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注意。各个学术团体和科学院都把推举雅科布·格林为自己的成员看作是一种光荣。年老的歌德称他为“强有力的语言天才”，让·波利称自己是“侏儒哥利亚”，而称赞雅科布是语法中的“巨人大卫”。只有黑森侯爵对自己图书馆管理员的“副业”没有丝毫认识。雅科布没有把自己的书呈献给威廉二世侯爵，他害怕产生对自己不十分有利的副作用。这个微不足道的暴君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宠姬，而在看到这部厚厚的著作时，只不过是摇头而已。他所需要的是那些驯服的、唯唯诺诺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研究的思想家。不仅如此，正如在给拉赫曼的信里所看到的，雅科布和他的弟弟几乎是唯一没有增加薪俸补贴的人，而在当时其他所有的国家的官员都得到了大量的补贴。

据圣经传说，哥利亚是非利士族的巨人，与青年大卫决斗时被杀。

当然，这部书不是为不学无术的公爵们写的。然而，对于那些在搜集童话和传说中忠实而又无私地帮助过格林兄弟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这本关于“字母和词形变化”的书大概是一块“未知的土地”。关于这部《语法》，雅科布半真半假地在写给封·哈克斯特豪森姐妹的信中说：“几个礼拜以前出版了我的《语法》的新版本，这是一本计有一千一百页的厚书，但是印的很不好，而且用的是次纸；我不敢把这本书寄给你们，因为你们可能会说：‘对于这些字母和词怎么这样故意刁难啊！’不过我应当为自己辩护：‘上帝既然创造了小的东西，也创造了大的东西，而人所认真研究的一切都是美的：语言、词和声音。一颗沙粒为我们说明了无数巨大行星的意义，我们的地球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在第一卷新版本出版之后，雅科布还在继续编写他的《语法》。1822年伙，他只是考虑了这部书的续集，可是在1823年5月前，他已经写满了五十页有四分之一大小印张的页码。现在他的动机不只是尽快完成这部著作的愿望，而且死亡可能使他跟他父亲一样过早地（他父亲只活了45岁）离开书桌的念头在这个38岁的学者的脑子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然而他正是不愿意使这部研究语言的著作成为未竟之作，所以他仍在劳动。雅科布丢开悲观的念头，给自己的同行别涅克写信说：“如果您等不到我的《语法》完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将来出了五卷或六卷厚厚的语法书的时候，您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像我们常说的，好好地散一散步，用我的遗骨去打树上的苹果。”

雅科布一方面编写《语法》第二卷，另一方面还找出时间翻译并出版了武克·斯捷凡诺维奇的《塞尔维亚语语法》（1824年）。当年在维也纳时他曾研究过斯拉夫语，这也是扩大他的视野的一个条件。一个大的语言学者在研究塞尔维亚语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特别注意这种语言的优美性。

在雅科布研究语言史的时候，威廉仍旧在始终不渝地搜集和补充新的童话和传说集。因为有病，当然威廉不能与雅科布并驾齐驱。不过他在这些年毕竟写出并出版了《论德国古代民歌》（1821年）一书，在这里，特别展示了他对古代手稿的知识。与哥哥不同，对于威廉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还不是形成语言发展的规律性，而是这一语言在其发展现阶段上富有诗意的潜在力量。他很早就想写中世纪德国史诗的历史，并且搜集了必要的材料。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构想：“主要使我感兴趣的是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的出现和发展。”

1825 年。自从威廉被任命为卡塞尔图书馆秘书以后，11 年过去了，从雅科布在外交舞台上周旋一段之后回到这个图书馆以来，也有 9 年了。格林兄弟一直这样充分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只是妹妹不在这里。兄弟二人已远非青年：雅科布 40 岁，威廉 39 岁。他们的名声已经超出了德语国家之外的文学界和学术界。在现有收入的情况下，他们在图书馆的表面上的地位是极其低微的。

20 年代的政治形势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德国向何处去，仍然不清楚。各个国王所操纵的唯命是从的政府到处在排挤人民参加国家生活。在格林的祖国，黑森侯爵国，仍然可以尖锐地感觉到没有宪法保障。尽管处于停滞和压迫的环境，但是在人民当中，要找到使分散的德国存在于统一形式之中的愿望，以及更准确地确定统治者的权利及其权利所达到的范围的要求，并没有消失。市民们怀念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但是在所有这些要求当中，已经没有解放战争之后头几年所看到的那种高涨的热情了。

格林兄弟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深感不安，只有从工作中寻找安慰。雅科布埋头于解决研究任务之中，详尽地研究新的学术领域，照他的一个同时代人的话说，甚至像“同科学订了婚”一样。他作为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在了解学术真理之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几乎有点像苦行僧。对于他来说，放弃个人家庭的幸福并不是一种牺牲或者一件勉强的事情。他担负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繁重的工作，好像一个无论如何也要竭力通过陌生地的旅行者和第一个开拓者一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前进。但是，雅科布并没有变成一个厌世者和孤独者。他与自己的亲戚朋友友爱相处，苦乐与共。

威廉不赞成他哥哥禁欲主义癖好。他 39 岁结婚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狂热的激情爆发造成的；它是长年逐渐形成的。他所爱上的人是卡塞尔药房主人的女儿多罗捷娅，或者，像人们经常称呼她的那样叫多尔特亨·维利德。她生于 1795 年，也就是说比威廉小 10 岁，而且到结婚的时候，她已经 30 岁了。格林兄弟还是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马尔克街上的“太阳药房”的姑娘，药房主人鲁多利弗·维利德的这个女儿。在她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多尔特亨就经常到格林兄弟家去。多尔特亨对洛塔，雅科布和威廉唯一的妹妹，特别热情和恳切。格林的母亲像喜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喜爱药房主人的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儿。

当格林兄弟搜集童话的时候，当时 12 岁的女孩多尔特亨给他们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在家里听到的，特别是从年老的玛丽那里听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多尔特亨了解到了许多新的故事，并且把它们都告诉了威廉，当时他们经常一起在城外谈，在花园里谈，而冬天则“在厢房的火炉旁边”谈。这个善良而温柔的姑娘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格林家庭的成员。她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照顾着自己早死的姐姐格列特亨的几个孩子，而且以前她还尽心地侍奉了她有病的母亲和父亲。

威廉·格林看到，多尔特亨的景况很困难，所以很关心她。

1815 年初，当雅科布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时候，威廉写信对他说：“老维利德在圣诞节的早晨，经过痛苦的折磨之后去世了；还不知道一切将怎样料理，也不知道多尔特亨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完全消瘦了，而最近两个礼拜她甚至都没有睡一会儿；这样，整个冬天她恐怕支持不了，我深深地怜悯她，

真的，这是颗如此可靠、如此诚实的心。”

《家庭日记》也证明了格林一家同维利德一家的良好关系。这个《家庭日记》是雅科布在 1820 年赠给自己弟弟和妹妹的，要求他们把亲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写在上边。日记上保留有多尔特亨的双亲生死的日期。那里也记着多尔特亨本人的生日。在《家庭日记》的前言里，雅科布不仅对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而且也对多尔特亨说了以下的话：“亲爱的多尔特亨：你可要原谅我，我把你也列入了这本日记之中，这一方面是为了使日记的内容丰富一些，因为我们整个家庭几乎都死绝了，没有留下根苗，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像喜欢我的弟弟妹妹一样喜欢你。”

威廉也以亲热而温柔的态度对待她。几年过去了，友好的同情也好，柔情也好，都发展成了爱情。1824 年 12 月，他和多尔特亨订了婚。1825 年 1 月，雅科布把举行婚礼的消息告诉了威廉·卡尔·拉赫曼：“事情拖了很久，只是圣诞节前才最后决定了；他的未婚妻是我们大家所喜爱的、期望的和诚实的姑娘，她叫多尔特亨·维利德。对于我们家庭生活来说，这将是有益的，因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在由来已久的、牢不可破的、虽然是沉默的但是和睦的基础之上组织和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兄弟二人（雅科布和威廉）生活在一起，并且管理着共同的家务。因此，您可以祝愿威廉幸福。我所以给您写信，因为他不好意思谈这个问题。”

雅科布赞成弟弟的选择，因为多尔特亨善良和谦虚，他尊重这个少年时代的女友。而兄弟二人仍然生活在一起这件事，同样也是重要的。对威廉来说，结婚并不是热烈的青年人的激情的结果。他曾长久地考虑和掂量这一步骤的合理性；关于自己的未婚妻，他在给班格神甫的信里说道：“她是最老的、最亲爱的女朋友，我从童年时代就了解她，而且我们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很久以来就像亲妹妹一样喜爱她。这绝不是赞美，在所有其他方面您也可以无忧无虑地祝愿我幸福。”

1825 年 5 月 15 日，在卡塞尔举行了结婚典礼。出席典礼仪式的有兄弟、姐妹和最亲近的亲戚。大家在一起喜气洋洋地庆祝了这个小规模的家庭喜日。几天以后，威廉给自己的朋友、马尔堡语文学教授祖阿别季先写信说：“我觉得这个月不像通常所说的蜜月，不过，我有这样一种认识：我整个一生将如同这 8 天一样的幸福。她诚朴、自然、聪明和快活。她对于人世间的一切都感到高兴，并且准备随时献身于我们所追求的，但是生活现在还没有使我们得到的任何高尚和美好的事物。”当他终于有勇气把自己结婚的事通知卡尔·拉赫曼时，他的语气变得更加热烈：“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同任何另外一个人结婚或者同任何另外一个人能够幸福。”

格林家庭生活的节奏并没有因为这次婚礼而遭到破坏，相反，随着多尔特亨的出现，这种生活变得更加巩固了。他们仍然住在卡塞尔别列维龙什大街上、欣赏“窗外豁然而又美好的景色”。

在他们家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和在乡村一样。雅科布和威廉每人一间工作室，小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尔得到了一间窗向着院里的屋子。他想要这个地方是因为太阳照不到这里，而他这种绘画工作正需要均匀的、稀疏的光线。过了一个时期，格林兄弟又换了房子，不过仍然是在同一条街上。

多尔特亨在这个兄弟友爱的环境里是一个“重心”。对威廉来说，她是亲爱而又忠实的妻子；对他的兄弟来说，她是个妹妹。有件事也是个很好的预兆：1825 年，即威廉结婚那一年，出版了一小本《儿童和家庭重话集》，

这里收进了 50 个最好的童话。和“大本”一样，“小本”后来翻印了好几次，也成了孩子们喜爱的书。

但是威廉不可能是彻底幸福的，如果他知道有一个人因为他而痛苦的话。这个人就是热尼·封·德罗斯捷—休利斯霍弗，她对他怀有极为友好的感情。他使热尼相信，他已经把多尔特亨作为他的生活伴侣。还在结婚之前，他就慎重地写信对她说：“从我见到您那个时候起，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后来，在我们得到因同您见面而高兴的机会之前，也过了许多年，而且每当同您在一起的时间，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很早就相识的感情。因此，我不能想象，您会完全忘掉我们，您对我们的回忆能够淡薄下去。”

威廉在结婚几个月以后写信给对他怀有极好感情的热尼说：“我希望您同多尔特亨认识。您会喜欢她的，她那颗纯洁、无限温柔的心和她的严整性与您是相似的，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外来的、违反她的本性的东西，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她也早已把它摆脱掉了。如果您知道，上帝用什么样的神奇方法使我产生了这种爱情，那就好了。多年来，一直到最近，我不知道，这一切将何以结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将平静、顺从地接受任何结局。”后来，威廉在自传里承认：“为了我极其美满的幸福婚姻，我始终感谢上帝。”

威廉必须和妻子同甘共苦。1826 年春，多尔特亨在难以令人置信的痛苦之后给他生了一个“健壮而又非常可爱的男孩”。当然，请求雅科布做孩子的教父，所以给小孩起名叫雅科布，这个当教父的伯伯自豪地用大而清楚的字迹在《家庭日记》上写道：“雅科布·格林诞生了。”4 月 16 日，他用同样清楚的字迹写道：“雅科布——威廉的儿子——已接受洗礼。”

但在同一年格林家里一下子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妹妹洛塔在生了第一个男孩卡尔之后，于 1825 年 12 月又生了一个女孩，名叫阿格涅斯，她命中注定活不到 1 年，1926 年 10 月，雅科布舅舅给帕乌利·维甘德写了一封信，写到以下句子把信突然中止了：“今天一行也不能再写了——现在我不能不这样忧郁地写这封信。今天我碰到了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洛塔的非常可爱的女儿阿格涅斯去世了。”

在洛塔的女孩夭折的那一天，威廉的儿子（人们亲切地把他叫做雅科布列）患了黄疸病。雅科布伯伯对于自己的教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且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对于他的病，雅科布深深感到忧虑。小孩病了一连好几个礼拜。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1826 年 12 月初，雅科布对拉赫曼诉苦说：“我可爱的教子已经病了五个礼拜，我担心他好不了。因而这些日子我们都不高兴。多尔特亨由于经常彻夜不眠已消瘦不堪了。”12 月中旬雅科布的小乖乖死了。两个孩子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们葬在雅科布和威廉母亲坟墓的旁边。威廉曾写道：“我几乎同样喜欢的两个孩子现在并排躺在我母亲身旁长眠了，我总觉得他们在天上也是在一起的，总这样一起玩。活着的时候，他们彼此非常相爱，他们用小手抚摸自己的小脸蛋，然后都笑了。”

但是，他并不是总是这样镇静地写的，他常常以难以形容的痛苦，回忆着自己儿子的死：“在他那两只善良的小眼睛已认不出我们之前 2 小时，他还用手去够银铃当，想玩一玩，可是马上就从手里掉了下来。这样一个善良的、温柔的孩子再也没有了。当他觉得疼痛的时候，他就哭，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脸上出现凶恶表情。他死的那个夜里非常可怕。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个小小的心脏在我手下边多么顽强而又多么吃力地跳动着。他同死亡斗

争了 12 个小时，只是随着最后一息，他才闭上了两只小眼睛……”

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威廉承认，他经常梦见这个长长的、可怕的夜晚。痛苦的考验又清楚地使悲哀的父亲想起，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珍贵的、永恒的事物：“我内心感到，爱，这是唯一的、真正能够安慰人的东西。”他以感激的心情看到，在这痛苦的时刻，他妻子的“非常善良的心”更进一步向他展现了出来，他也看到雅科布的忧伤，他“在孩子的床前坐了 12 个小时，伏在他的身上，直到最后一息”。

不幸的时刻过去了，格林一家又感到欢乐。1827 年洛塔妹妹生了儿子弗里德里希，而 1828 年 1 月 6 日威廉和多尔特亨也生了一个儿子——盖尔曼，他后来成了一个艺术理论家。

这个孩子的出生重新勾起了威廉对于死去的孩子雅科布痛苦回忆。他写信对祖阿别季先说：“小男孩很像死去的孩子，看来，上帝的仁慈使损失得到补偿，我们曾经为这种损失而忧伤并且在圣诞节和新年都感到自己很孤单；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借助上帝同样的仁慈保留住这份命运的礼物。”

产后苍白无力的多尔特亨穿一身白衣服躺在床上，威廉一次又一次小心而又默默地来到这个屋里。屋子很暗，拉着窗帘。多尔特亨说话还很困难。她非常难受，只是偶尔要求人递给她盛着科隆药水的小瓶。当她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威廉就到大屋里来，小孩在这里躺在生得旺旺的炉火旁边的小藤床上，自豪的父亲发现：“圆乎乎的小脸蛋好像小糖人的一样”。小孩很安静，很少哭，他很喜欢，只是鼻子打着呼哧，低声地哼着，好像自己跟自己说话似的。“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生中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和看到很多事情。”当时威廉就在思考，他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人。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说道：“就我的心愿来说，他不要成为图书管理员在卡塞尔的这些年代，威廉同哥哥一起每天到图书馆去上班。当然，以他们这种很高的学者的威望本来可以指望得到更令人尊敬、报酬更高的职位。但是，在一个城市里，而且在同一个部门很难找到两个职位。因此，格林兄弟仍留在卡塞尔，等待着更好的时机。

这些年代德国出现了各方面的文化繁荣。比如，1819 年根据封·施太茵的倡议建立了“德国古代史研究会”，着手探索和研究历史文献。1826 年在格奥尔格·亨利·佩尔特茨的领导下出版了《德国历史文献》第一卷，这部书成了德国中世纪史的基本资料。这些年也出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由施莱格尔所开始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工作在蒂克的领导之下几乎都完成了。歌德在着手写《浮士德》。在艾兴多尔夫的笔下出版了中篇小说《一个废人的生涯》，海涅创作了《歌集》，格拉伯创作了《唐璜和浮士德》，威廉·豪夫创作了长篇历史骑士小说《列希登施太茵》，格里利帕尔采尔写了历史悲剧《奥托卡尔国王的兴盛和衰落》，而拉伊蒙德则上演了《人类的阿利亚和弗拉格国王》；弗兰茨·舒伯特写了《冬日的旅程》和《天鹅之歌》；贝多芬在完成第九交响曲（1824 年）之后，又写了自己最后的乐曲。

尽管当时政治形势非常黑暗，创作的精神和热情仍得到了非常强烈的表现，这种精神和热情也影响到格林兄弟。1826 年出版的他们共译的《爱尔兰的爱尔菲童话集》就是共同合作的一个成果。格林兄弟又作为一个人出现在社会舆论面前，不过这一次是作为重要作品的译者出现的。和从前一样，经过认真考虑过的《爱尔菲序》是由威廉写的。也正是他研究了爱尔菲的形象——由人民所创造的童话的优美形象。在这部著作中又一次表现出威廉的诗

学的天赋，而雅科布的更为严格的善于分析的头脑则在研究语言学问题。

威廉对温顺的爱尔菲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描述了他们的来历、外表、衣着、住处和生活方式，他们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敏捷性；讲述他们经常做人们的好邻居，然而他们·有时也能够作出凶恶的越乎常轨的举动；讲到这类神奇的生物的神秘莫测的力量。爱尔菲的国家的全部的魔力和诱惑力，所有的颜色和气味都展示了出来。在这篇作品里，威廉主要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而是作为一个语言艺术大师出现的，他掌握了语言的所有细微差别，比如，在描写苏格兰的爱尔菲的外表时写道：“就美来说，任何另外一个超自然的生物都不能和爱尔菲相比。一般说，他们的身材很小，但是他们的体格特别好。特别是他们的妻子，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她们的眼睛好像星辰一样，闪闪发光，她们的双颊泛起最细腻的红晕。嘴唇很像珊瑚，而牙齿像洁白的象牙；密密的栗色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垂在肩上。”当一个学者，特别是具有这样敏锐的、富有诗意的感觉的学者，能够描写神秘莫测的东西，即描写那种“当它落在露珠上，露珠只是颤动颤动，而不会洒落的”又轻又小的东西时，是其乐无穷的。

在合译完《爱尔兰的爱尔菲童话集》之后，紧接着是其他一些著作。威廉写了一篇《论古代金石文字的文学》（1828年）的论文，用它充实了他从前写的《论德国古代金石文字》（1821年）一书。在上述论文中，他提供了古代金石文字的字母和哥特人手稿的残片。威廉·格林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了用中古高地德语写的古代诗歌文献。在这之前，许多专家已经得出了有必要出版古老的手稿——中世纪诗歌财富的基础——的结论。在威廉·格林的出版物中描写中世纪十字军远征的诗集《鲁道尔夫伯爵》（182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阅读、加工和出版已经变黄的、部分已被毁坏的12世纪的手稿，这是又一部中世纪文献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威廉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是1829年出版的《德国英雄的传说》。全书有四百多页。这部著作仍然是多年搜集和研究工作的结果。它收进了一千多年期间的，即从6世纪到17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德国英雄传说材料。在这部书的第二卷里，威廉叙述了德国史诗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后来，在这部作品的影响下，许多作者为人民，特别为青年描写了关于尼伯龙根、西格夫里特、谷德仑、埃尔夫里希、埃特采尔和其他英雄的德国英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了19世纪的许多大诗人、大艺术家和作曲家。总之，这部书是进一步研究英雄传说的直接来源和基础。正如日耳曼学家卡尔·缪连霍弗所写的，在几十年当中它是“这方面进行一切研究工作的依靠和基础”。威廉也认为，《传说》是一部必要的和有益的书：“对于人类的精神史来说，研究德国史诗的产生和发展同研究荷马一样重要！”他高度评价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因此他曾这样写道：“许多作品，即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传说，不管它们是来自古希腊或印度，来自德国人、法国人、斯拉夫人的远古时期或来自拉丁语系民族基督教的过去，虽然它们在词句上和叙述方法上彼此极不相同，但是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透露出可以使我们看到其共有的同源特征。出自无名作者之手的最具有诗意的出色作品，它们朴实而自然的形式，极为深刻而丰富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幅新的、纯洁的、朝气蓬勃而又繁荣兴旺的生活图画。

当威廉在研究关于德国英雄传说的古代文献时，雅科布在继续他的语言研究。1826年《德语语法》第二卷出版了，计一千多页。他在紧张编写这一

卷的时候，曾抱怨说，虽然许多同行和学术团体都承认他的著作的价值，可是卡塞尔的上司对这部著作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不过雅科布仍以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继续进行工作。第二卷基本上是专门研究构词法的。在这方面他也进行了大量有趣的观察并彻底研究了“德语的内部结构如何能够把词粘合在一起，并使它们溶合为更复杂的语言构成物”。雅科布证明了这种“内部结构”和“语言的精神”是如何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过去发生作用、构造和形成语言的。他的著作所包含的不仅是语言学上的论述，内行的读者可以在这里发现语言的哲学。

在二十五个月当中，雅科布写了一页又一页，把一个又一个印张交去付印。当时他说：“德语要求我付出极端紧张的劳动。”他对这一工作的效用抱有信心，这使他产生了力量：“我在语言中所发现和揭示的一切，将有重大的价值……”

《语法》第二卷发表之后，雅科布决定把这一工作暂停1年。1828年他出版了另外一本，也是容量很大的著作——《古代德国法律》。很难相信，这本几乎有一千页的书也是雅科布一个字一个字手写的。还是在马尔堡大学的学生时代，他就开始搜集古代法律文件的文本，从这些文件里可以了解有关那个时代的语言、民间风俗、习惯、信仰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他想在这本书里说明：第一，应当如何以正确的方法对待古代法律文件；第二，在注意罗马法的同时也应注意本地的法律形式，并寄希望于逐渐临近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因而雅科布又一次证实，他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沉湎于自己工作的书斋里的学究。他的作品应当对由于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而渴望进行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改革的舆论界产生影响。

在这部书里，有许多可靠的推论和引文，许多丰富的材料，诸如关于自由和独立，关于果树和家畜的贡赋，关于结婚税和土地税，关于建房费，关于结婚和买卖，关于共同财产和父亲的权利，关于继承、分田地 and 界限，关于偷窃、杀人和其他犯罪行为，关于惩治和罚款，关于法官、诉讼程序和神意裁判以及关于其他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这本书成了德国法律史方面的真正宝库。雅科布曾说：“这是这一方面创作的第一次尝试，这一尝试的特点是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无论编写《德国语法》，还是编写《德国古代法律》，他都对工作的意义有广泛得多的理解并且吸收了斯堪的纳维亚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料。

雅科布的历史观点在他以下的话里表达了出来：“对遥远的过去值得研究并且值得全面地研究。”

他把当代的法律关系同过去几个世纪的法律关系进行了比较，并对当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写道：“古代农奴的从属地位和奴隶生活，在好多方面比我们的农民和工厂短工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生活要轻松；现在穷人和仆人结婚的困难同农奴法是相联的；我们的可耻的监狱与过去使人致残的体罚相比更是一种侮辱人的痛苦。”

由于格林兄弟《童话集》和学术著作的出版，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尊重和科学界的称赞：他们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被选为受尊重的学术团体的成员，而且大概他们这时能够指望在自己故乡得到相应的地位。可是出乎意料，在他们生活道路上要发生的变化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还是在 1823 年，当威廉二世侯爵在卡塞尔掌握政权时，雅科布·格林曾抱怨说，国家丝毫不关心卡塞尔图书馆，在给拉赫曼的信里他谈到了工作上的恶劣条件：“当国家所有其他工作人员都获得许多必要的薪俸补贴时，我们仍然一无所得，并且还要穿上重新规定的价钱昂贵的制服，这种制服谁都不愿意穿，而且也不要求每天穿，这种不必要的金钱浪费为了什么是很明显的。如果您能看到，我穿这种衣服的样子是多么可笑，就好了。”

6 年以后，即 1829 年初，看来好像出现了改善格林兄弟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可能。1 月 31 日，当时的侯爵图书馆馆长约翰·路德维希·费奥克利逝世了。格林兄弟的生活和工作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去世之后，兄弟二人曾期望：雅科布任第一图书馆管理员，威廉任第二图书馆管理员。到这时为止，雅科布已经担任了 23 年的国家公职。自从 1816 年他担任第二管理员职务以来，一次也没有得到过薪俸补贴。他的收入仍旧是六百塔列尔。威廉是从 1814 年开始在图书馆工作的，收入更少。

除了自己的直接职责之外，格林兄弟还经常完成其他各种光荣的任务。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有提升职务的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要知道，尽管他们简朴而又节省，这些钱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也是很不够的。

名誉问题也并非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提升问题，1829 年 2 月 2 日格林兄弟曾上书侯爵，其中强调指出：“由于我们的条件，我们把自己的部分生命献给图书馆的管理事业，极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忠实而又主动地作对图书馆有益的一切可能的事情。”

3 天以后，即 2 月 5 日，侯爵亲笔批示：“两份呈文不予受理。威廉·K。”馆长的职位由多年在马尔堡任职的过去马尔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季特里赫·克里斯托夫·罗麦利担任。他曾负责宫廷档案馆并兼任国家档案馆馆长。他从来没有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员。格林兄弟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只是每人增加了一百个塔列尔。

很快就清楚了，新任命的馆长在这之前的一个时期被授予了贵族称号，可是对图书馆的工作一窍不通：他所需要的历史方面的书都找不到。过去的档案馆长和历史教授连文件也不能正确理解。

在这样一个由于误会而担任馆长的人的领导下工作是有失尊严的，格林兄弟感到极大的侮辱。雅科布懊悔他不该在 1816 年曾拒绝波恩大学的聘请。

可是，1829 年夏，意想不到地得到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格林兄弟被光荣地邀请到格廷根去。这虽然可以摆脱困境，但是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十分容易的。雅科布曾说：“离开亲爱的祖国，这个念头本身在我们心里，就有一种非常痛苦的味道，失去已经习惯的工作的节奏和放弃有成效的业余时间，这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关于自己当时的感受，雅科布曾写信给莫伊泽巴赫说：“我，我的弟弟和妹妹，从童年时代起就对黑森感到依恋，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和先辈那里继承了这种依恋性。近来我更常常觉得生活在异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大半生是在这里，在黑森度过的，而我的一切念头仍将留在这里。”

尽管他们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感到依恋，但是格林兄弟终于接受邀请到格廷根去。正如雅科布所说的，他们屈从了“荣誉感”。10 月，得到了来自汉威诺的国王的正式邀请：在那里，雅科布要担任格廷根大学编内教授和图书

馆管理员，威廉在同一个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对起码的生活资料的操心终于要结束了：雅科布将得到一千塔列尔，而威廉将得到五百。

格林兄弟向黑森侯爵递交了辞呈。第二天请求就得到了满足。威廉带着尖刻的讥讽说道：“这是我们在卡塞尔任职的整个年代所得到的一次迅速而又对我们有利的决定的唯一的一件事。”关于这个问题，侯爵曾这样表示：“这就是说，二位格林先生要走了！这是很大的损失！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给我做！”侯爵仍旧把全副精神寄托在专制制度的理想上。他的格言是：“朕即国家！”

兄弟二人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亲爱的黑森，同他们周围多年来朝夕与共的一切分手了。1月2日，雅科布交出了图书馆的钥匙和印章。他说道：“但愿我再也不要来到这个长长的大厅里，当我从它的窗前经过，沉思地看着它们之间的书籍摆放得如何时，许多窗子好像悲伤的眼睛一样看着我。”

威廉补充说：“在那里（格廷根）我们将遇到另一种条件、另一些人，我最不容易习惯的是另一个地方。在这里，即在别列维尤大街上所度过的6年当中，我同山峦、河谷和河流结下了缘。我倒想把在新地方熟悉的过程跳过去，而从在那里扎下根的时候开始。”

在临行之前，格林兄弟曾同侯爵夫人奥古斯塔书面告别，他们对她十分忠诚。她是同丈夫分居的，因为侯爵与列伊亨巴赫伯爵夫人的同居关系就同她分开了。

威廉·格林在给侯爵夫人的信里写道：“我敢请国王陛下相信，人们不能够指责我们不爱祖国。我们将怀有最深沉的痛苦离开我们家族多少世纪以来光荣地为之服务的黑森，而我们对度过了大半生的卡塞尔的依恋之情也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我们的母亲和我的儿子长眠于黑森的土地之上。但是，我们确信在这里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晚年（如果上帝赐予我晚年的话）将得不到生活保证以及因为我们辱于无法摆脱那种不应有的鄙视态度，——这就是促使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唯一原因。”

侯爵夫人当时住在富利德，她以极大的同情给他回信说：“亲爱的格林先生：我认为，您和您的哥哥会想象到，我听到你们要离开黑森的职务和祖国是多么痛苦。也许，我再也不住在卡塞尔，甚至因此而感到幸福。当我悲伤地想到也许卡塞尔将永远失去你们二人时，我就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由于新的任命，你们对于整个德意志祖国的功绩将得到更大的赞扬，而这一光辉哪怕有几缕光线将来能落在你们出生的这块土地上也好。”

完全出乎意料，列伊亨巴赫伯爵夫人找她那身居高位的靠山为格林兄弟辩护，在这之后，国王怀着宽恕的态度授雅科布以第一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威廉为第二管理员的职位。但是他们拒绝了。同时他们又接到了赴慕尼黑的邀请。格林兄弟没有改变决定，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表示犹豫。在卡塞尔，必须的工作时间每周只有18个小时，因而有足够的学术研究时间。而在格廷根，他们不得不工作36个小时，或者最低限度32个小时。雅科布有时患病，他担心长时间讲课对他来说嗓音或气力将不能适应。使他感到不安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在这样讲课的时候，学生们能不能仔细考虑问题的深度和他们是否关心所有的对科学来说非常重要的细节？对于藏书20万册的格廷根图书馆来说，他的力量是否适应？在这样沉重负担的情况下，他还能不能为每天习惯的散步抽出时间来？

1829年12月到了。没有功夫犹豫。打行李的时候到了，他们应当在1830

年初接任格廷根图书馆管理员的职位，而第二年夏季学期雅科布需要开始讲课。

他们没有放弃卡塞尔的房子。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尔留在这里。他同女房东的女儿订了婚，并且很快准备结婚。

在 12 月末的一天，马车离开了卡塞尔，途经缪恩坚涅尔别尔格到格廷根。多尔特亨因为小孩有病，只好过几个礼拜以后才动身。

迁到格廷根之后，格林兄弟头两个礼拜住在自己的朋友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贝涅克的家里，他在格廷根担任教授和第一图书管理员。贝涅克所出版的许多中古高地德语诗人的原本考订本就其水平来说，与格林兄弟语文学的著作完全相适应。虽然贝涅克比雅科布和威廉大好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牢固的友谊。

然后搬到了一座改建的房子里，在这里没有住多久：因为不舒服。1830 年 5 月，在一条宽阔而又阳光充足的所谓“林荫道”上找到了另一座房子。这座巨大的建筑与图书馆——格林兄弟工作的主要地方——相邻。两个大房间用作工作室，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的景色。威廉一家的房子也很宽敞。

兄弟二人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习惯新的环境。在卡塞尔，由于每周的工作时间不多，当然他们就有比较有利的工作条件；他们在那里是“相当自由的先生”，并且基本上只是由于侯爵不了解而感到痛苦。在格廷根，每天要在图书馆呆 4——6 个小时，而且照他们的话说，整天是些“兴趣不大的工作”。此外，他们与同事们并不总是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以及还有其他的东​​西开始也是陌生的，如地点，甚至他们住的房子，他们责备自己“精神萎靡”并努力克服这一缺点。

几个月过去了，格林兄弟的生活也开始好转。他们到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除了贝涅克以外，被认为是大历史学家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利曼也在大学工作。1830 年他出版了《德国历史史料学》一书，从而为自己的学派奠定了基础。格林兄弟同他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同许多大学教师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比如法学家古斯塔夫·古戈，他是德国法学历史学派奠基人之一，由于对罗马法文献资料的详细研究而博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古代史研究家奥特弗里德·缪勒同格林兄弟住在一起，他们经常见面。他出版了许多书，有：《希腊各个民族和城市史》、《多利斯人》、《马其顿人》和《伊特拉斯坎人》、而在 1830 年他重新证实了自己所具有的专门知识，出版了《艺术考古学指南》，在朋友当中还有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勃柳麦，他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罗马法史方面的著作。法学家威廉·埃杜阿尔德·阿利勃列赫特一方面写了许多德国法律方面的著作，同时还在研究日耳曼学方法论。东方学家和圣经研究家埃瓦利德同格林兄弟研究日耳曼手稿一样，在各个图书馆研究了东方手稿。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家奥格尔格·戈特弗里德·盖尔维努斯大概是格林兄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格林兄弟逐渐习惯了格廷根学者们的环境。当然也有不太令人愉快的因素——日常生活使他们感到厌倦。但是当雅科布回顾往昔时，他承认，格廷根在他们面前展示了“更加受人尊敬的而又更有保证的生活”。他们牢固地在这里安了家。1830 年 3 月，多尔特亨第二个儿子鲁多利夫，后来又生了女儿奥古斯塔。

1831 年 2 月，威廉·格林被任命为大学编外教授，同时保留图书馆管理员职位。兄弟二人和在卡塞尔一样，紧密配合，继续工作。现在他们既是图

书管理员，又是大学教授，不仅可以通过出版的东西，而且还可以通过生动的语言向青年一代日耳曼学者传授自己的知识。

在格林兄弟的这个所谓格廷根活动时期，德国以至于整个欧洲的形势仍然是动荡不定的。1830年7月，就是在格林兄弟搬到格廷根的那一年，要求民主选举权和出版自由的法国人民在巴黎举行了起义。国王查理十世逊位，波旁王朝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自由派的路易·菲力普公爵被宣布为法国“国王”。人民再也不愿同专制统治妥协并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七月革命”也使德国人民群众行动了起来。统治集团作出了某些让步。由于其专断和妄为，布劳恩施魏克公国的大公被废除了。黑森侯爵国以及撒克森王国和汉诺威王国（也就是格林兄弟当时的所在地）不得不向人民情绪让步而接受宪法。但是不满的情绪还继续存在。为纪念巴伐利亚宪法1周年于1832年召开的“汉巴哈大会”进行得很热烈，在自由派和急进派演说家的演说里表现出了共和政体的调子。这种情绪在掌权人物看来是危险的，于是他们采取了反对政治结社，反对大的集会和示威的严厉措施。1833年成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一个很大的成功，通过这一“同盟”，奥地利除外的大多数德国邦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在经济上联合了起来。这只能期望，联合的意志将能终止各个小国的分散状态。当时许多人对于真正的自由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并且宁愿离开古老的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向往海外，向往美国，希望在那里得到自由。

这种海外旅行不是对格林兄弟说的。他们的道路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而且这条道路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狭窄的。要知道书本把他们带到了多少世纪的过去和遥远的地方。在带有烫金书名的书脊背后他们看到了整个世界。

当然，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也有许多琐碎的、无益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使这样富有创造力的人浪费了时间，本来他们可以用这些时间做出某种更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开始，雅科布曾抱怨说：“这个图书馆是个轮子，我每天都要在这个轮子里转动整整6个小时，并且没有任何内在的工作乐趣。而我做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些书要找，另一些书要分放在原处，做这些事都得经常跑来跑去；把全部英国史的目录抄到另外的卡片上，以便以后根据它编写新的目录，也就是再抄一遍。”原有的手抄目录写得非常密，一行接一行，需要重写。而这种工作是看不到头的。此外，还需要注意阅读拍卖的旧书目录，寻找图书馆所需要的书，以备以后购买。使雅科布经常感到苦恼的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所需要的书。在图书馆里，新收到的零页的出版物整年不装订，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当它们经过装订工人装订和评论者的评论之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常常经过3年新书还不能得到利用。

在冬天，工作时间比较短，在四周的假期里图书馆的办公时间也缩短了一些。照雅科布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只永远饥饿的野兽”。仙写道：“这里有许多很好的、珍奇的书；可是它们对我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不能阅读它们，甚至不能翻一翻的话；我只得把它们登上目录，然后分放到书架上。”只是在1832年，为了使他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讲课，才把图书馆午饭以后的时间给他空了出来。1835年他才对朋友说，他现在只是在每礼拜三和礼拜六到图书馆去，因为学校领导交给了他更多的讲课任务。在几年当中，雅科布在图书馆上班、教学工作和创作活动之间转来转去，简直忙得要命。

威廉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在30年代初，当人民反对警察和政府暴力，维护宪法权力的时候，在格廷根实行了公共建筑物的守卫制度。在1831年严

寒的1月，威廉一次在图书馆守夜，患了重感冒，体温升高，出现了肺炎。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雅科布对弟弟的病感到不安，他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我非常恐惧地坐在桌子前他的作品旁边，所有进入我眼帘的东西——他的书和手稿——都使我动心。到处都很有条理，很整洁，于是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转瞬之间一切都可能成为泡影，而我一生将感到悲痛，一生将怀念他；关于这一点我是不能写的。我只能说：最虔诚地祈祷上帝，非常感谢他对我们所表现的仁慈。”

当威廉病情好转的时候，他写了这段笔记。正好在这个时候威廉听说，他的朋友阿希姆·封·阿尔尼姆正是在1831年1月的一天去世了。后来，在编写好的阿尔尼姆文集的序言里，威廉写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注定要比他活得长；就是在他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自己由于神经受到刺激而感到震惊，也处在死亡边缘，这个讣告也是我恢复知觉后所看到的第一个讣告。”

只有每天的、有秩序的劳动同休息交替更换，才使得威廉的健康得到恢复。早晨5点他就起床，喝了埃姆斯矿泉水，然后去散步。午饭前和午饭后的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在晚上，用他的话说，觉得自己是“一匹马，整个一天的工作量都给驮上了”。

在以后的年代，威廉的病经常复发。1834年到1835年冬季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次他不得不停止图书馆的职务达半年之久。在又一次恢复健康之后，威廉觉得自己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孤僻的人，陷入了忧郁，而且机械地完成自己职责。这个人敏感的、美好的心灵受到了威胁。雅科布这样描述了威廉的状况：“虽然上帝几乎完全恢复了他的身体健康，但是依然神经错乱，精神沮丧，甚至越来越明显。”

1835年威廉被任命为格廷根大学编内教授，这样他就具有了与自己的哥哥平等的地位。现在可以期望，这将赋予他更大的精力，并将恢复他对生活的兴趣。

格林兄弟作为大学教师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像日耳曼学这样一门年轻科学的大学教师，在当时不得不克服许多重大的困难。教科书，各科文本和参考书都很缺乏。古代文本的出版刚刚开始。甚至雅科布·格林，虽然他充分地掌握了材料，也曾承认：“第一个小时的课都要作新的、认真的准备。”另一方面，当时的教学过程比现在容易，而现在，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的有几百名学生。因此，教师和学生之间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系和个人接触。在当时，如果有二十名、三十名、最多四十名学生就已经很不错了。有一次雅科布对自己的同事拉赫曼抱怨说：“我已经计划好的关于奥特弗里德的课程没有讲，因为连二十名学生也没有，所以我不愿意开课；开始报名的只有七个人，后来又有两个，而这个礼拜，当我已经把它置诸脑后时，又出现了两个……”后来他对莫伊泽巴赫说，报名听德语语法课的有二十四名学生，而且当时就承认，学生听课的越来越少。

在这种家庭般的、几乎是亲切的环境里，格林兄弟利用了他们的邻居、考古学家奥特弗里德·缪勒的客厅。威廉在谈到他哥哥的时候，这样描述了这种几乎是太古时代的情景：“当他（雅科布）第一次走进教室之后，我把门稍稍打开了一点，看着他平静而又善良的面孔……看着他如何慢慢地走下台阶——这种情景我将永生不忘。教室的窗子是向街上开的，而盖尔曼（我的儿子）这时和保姆一起站在门前，他几次跑到窗前，大声喊道：“阿巴巴站在那里！”小孩刚开始学说话，他想出了这句话，并且经常这样称呼雅科

布，从而博得他的称赞；因此，在讲课的时候，我们把小孩抱到楼上。”

雅科布在讲课的时候，态度自然、从容，不善于掩盖自己的感情。有一次，他的弟弟病了，他突然把课中断了，默不作声，考虑什么事情，然后，好像向学生道歉一样，轻轻地说：“我弟弟得了重病。”

1830年11月13日，在就职时他所发表的作为传统的经院式的演说，则完全是另一种官方的演说。他讲的是拉丁语，这个演说的题目叫“思念祖国”。在这篇演说里，流露出了对于家乡的怀念。看来，选择这个题目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即在格廷根，他经常想到自己的祖国——黑森。在演说里，虽然没有举出个人状况的例子，但是他表明了，语言本身怎么样能够表达这种怀念。他认为，本族语具有这样一种力量：当一个人刚一离开祖国，它就使他留恋家乡，使他了解自己身处异乡。语言能够在人们的心里唤起或者加强相互团结的感情。

雅科布所讲的课程首先涉及的是日耳曼学的问题、古代法律文献、文学史和文学资料的研究。塔西佗的“日耳曼地方志”也编进了自己的讲义之中。

文学历史学家卡尔·格奥杰克这个时期在格廷根研究哲学，后来曾著有《德国文学史概要》，他曾这样描述过雅科布·格林教师的讲课：“有一个人还记得讲台上的那个身材不高但是富有朝气的人，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操一口很重的黑森口音。他讲课不是根据教案，而是一块不大的纸头，上边记几个名字、几句话和几个数字，对于他那种任何人的记忆力也无法比拟的记忆力来说，这就足够了……但是所有的课讲得都不理想。的确，在讲义中常常出现准确的形象和美好的图画，这些形象和图画都是他的作品所富有的，不过在口头叙述中它们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书本上那样；他匆忙地，有点儿焦急不安地描绘这些形象和图画，有时打断了源源而来的事实材料，从而引起人们不愉快的感觉。而在书本里边，由于同上下文结合得很好，所以不但有助于以新的方式恢复原有的思想，而且还发展和丰富了这种思想，如：‘思想如同闪电，语言如同雷鸣；辅音，这是语言的骨骼，元音，这是语言的血液’。他外表脆弱、身材不高，在某些方面很像解下钢盔、在新鲜空气中休息、以便在振作精神之后投入战斗的老战士。”

雅科布·格林的课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1833年甚至还有两个英国人也听了他的语法课，虽然他们只懂得一点德语。而在1834年他已经给“三十二名勤奋的学生”讲课了。他每周讲四课时的文学史，听课的人数甚至达到五十多个人，这在当时来说听课人数已经是够多了。

由于自己的大量著作，雅科布·格林获得了当时特殊的“戈弗拉特”官衔——七品文官。

这些年威廉经常患病，他不得不在备课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沉着而坚定的讲课方法使他博得了优秀教师的荣誉。威廉同哥哥一样，不是从很少有人懂得的、要求具备很多知识的课程开始讲，而是选那人人都懂的、富有诗意的题目。他第一课讲的是《尼伯龙根之歌》，在他的《德国英雄传说》里，他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部“已经完成的，完美的作品”。后来又讲了史诗《谷德伦》和弗赖塔格的《理解》，这是十三世纪初，即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参加十字军东征时期所出现的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威廉把纯语言的问题留给了哥哥，而他则非常喜欢研究语言的卓越成果

——诗歌作品！在论历史和诗歌作品关系的引言里，他说了以下的话：“诗歌作品，这是为表达感情的高度和认识的深度而给予人类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好的工具。诗歌作品，是人民用自己的精神成果所丰富的一座宝库。由于诗歌作品运用了从一开始就赋予它的简单而又极其完美的工具，——我这里说的是称为人的语言的奇迹，——所以它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找到表达竭力追求内心完美的方法，能够借助于简单而又自然的方法以及通过华丽的、极其文雅的方法找到通向人的心灵的道路。”

兄弟二人的学术道路在“称为人的语言的奇迹”上又走到了一起。

来到格廷根的头几年，格林兄弟遇到了不少困难。他们不得不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工作。首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图书馆，此外，作为教授，他们还在大学讲课，最后，他们还希望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自然，这样的安排引起了他们的神经紧张和忙乱，可是要知道格林兄弟已经习惯了在精神安静和镇定的条件下有成效地进行劳动。雅科布曾抱怨说：“我应当学会较多分散而较少集中地工作。”后来，情况向有利方面发生了变化：格林兄弟摆脱了图书馆里的工作，这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较多地用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

威廉的健康情况又恶化了。可是疾病也没放过格林家里的其他人。1833年5月威廉的妻子多尔特亨为了帮助临产的洛塔料理家务到卡塞尔去了。严重的流感使洛塔病倒在床上，然后病情复杂化了——发生了肺炎。小孩早产了，不过总算活了下来。母亲非常虚弱，大家都为她的生命担心。不过由于多尔特亨的精心护理，她逐渐恢复了健康。可是多尔特亨这时传染上了流感，而且病得很重。

看来，危险已经过去，多尔特亨慢慢恢复了健康，可是洛塔的体温又升高了。大家徒劳无益地企图用最有力的方法同她的疾病进行斗争。她身患不治之症，默默地躺在床上。1833年6月15日洛塔去世了，给丈夫留下了四个幼小的孩子。她遭受了与她母亲一样的命运，她的母亲也是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孩子们。

关于那些痛苦的日子，雅科布曾写道：“她没有苏醒过来，于早晨9时去世了。她失去说话能力之后，在12个小时当中还有知觉，而且整个这段时间都在哼着动人的旋律，尽量做到要使人们了解她。关于我们的巨大痛苦，我什么也没有说。她面部的特征表现出了难以描述的善良和可爱。这个面容也同她一起消失了，如果它不能在她任何一个孩子当中重新出现的话；而暂时她的孩子们都不像她。”威廉也为妹妹的去世深深感到震惊，他好长时间都在回想，她在已经失去说话能力之后，还如何在吻他，他如何最后一次给她吃药，如何握着她的手直到感觉不到脉搏为止。威廉当时写道：“人心这个东西是奇怪的和不可理解的，但是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爱是唯一值得纪念的，当其余的东西都消失的时候，它也永远存在。”洛塔埋葬在卡塞尔墓地母亲的旁边。

孩子们都很健康，这是一个安慰。小孩由保姆照顾，这是有病的母亲给了他一条生命。多尔特亨给丧失母亲的孤儿作过洗礼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格廷根。对于格林兄弟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只有每天的劳动和相互关心才帮助他们战胜了这一痛苦并保持镇静，多尔特亨不仅是威廉亲爱的伴侣和孩子们的慈母，而且也是哥哥雅科布的好妹妹。他无需为吃饭发愁——随时有得吃。他喜欢晚上散步，当他在古老的土城散步之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他发现屋子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格林兄弟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愿意与他们兄弟相会。威廉如果不受到疾病折磨的话，的确，他是特别好客和容易与人接近的。

格林兄弟越来越经常地发现，技术在不断地进入日常生活，使生活变得简单化了。刚刚出现了钢笔，再也不需要削鹅毛笔了。如果要点灯，可以用不久前发明的火柴。这都是些小事，但是日常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变化

的。1835年在德国纽伦堡和菲尔特之间第一次铺设了铁路，这个事实成了一件大事。当时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已经在制定德国统一的铁路网计划。这一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各个城市之间和整个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还在30年代初，如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旅行，不得不坐祖先传下来的旧式驿车慢慢爬行。雅科布曾经描述一次到南方德国作这种旅行的情景：“我又一次坐着二轮轻便马车走了一段不长的路程，我一直坐在马车的前头；我看到前边跑着的马匹和邮驿员，他们开始是穿红色礼服的，后来是穿蓝色礼服的，最后是穿黄色礼服的，每个人都带着号角，号角在他们的背上合着马车运动的节拍不住地往上跳动，不过他们都没有吹奏它；我坐车经过一块块牧场，牧场上散发着（特别是在夜里）新割下来的青草的气味，又经过一片片树林，树林里到处散发着凋谢的树叶和云杉球果的芳香。”

经过南部德国到瑞士去的旅行走了几个礼拜，不过对于雅科布来说这样的旅行是难忘的。他曾登上里加山，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壮丽的景色。当然，他也到过各个图书馆，寻找他所需要的文件和手稿。

1833年，困难的夏天过去之后，威廉也开始准备旅行——他想再一次欣赏一番诗歌中所歌颂的莱茵河，而且他同意一位诗人对于莱茵河的赞扬：“当我又一次看到莱茵河和它那使人心爱的两岸、肥沃的土地以及伸延的树木时，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在一个美好的傍晚，我们坐在约翰尼斯堡古城的阳台上，喝着莱茵葡萄酒，看来，我们比麦捷尔尼赫公爵还要幸福；的确，买这种酒是需要付黄金的，而所有其他的酒和它相比，不过是好醋而已。”这是在休息的时刻。

在一切自由思想仍然受到压制的德国，不管怎样，科学和文化却得到迅猛的发展。比如，慕尼黑图书管理员和教授安德烈阿斯·什麦列尔在格林兄弟的学术著作的基础上编写了《巴伐利亚语词典》。弗里德里希·吉茨根据格林兄弟的语法著作继续研究了拉丁语系语文学，并于1836年开始编写《拉丁语系语言语法》。在1834年兰克发表《罗马教皇》一书之后，历史科学向前迈了重要的一步。文学上出现了许多不朽的作品。1831年格拉别再现了《拿破仑的一百天》，同年，格里利帕尔采尔的《海洋和爱情的波浪》问世，列瑙出版了一部令人感到凄凉的《诗集》（1832年），麦里克出版了《艺术家诺利坚》（1832年），涅斯特罗伊把《恶魔鲁姆纳齐瓦加邦杜斯》搬上舞台（1833年），拉伊蒙德创作了《浪费者》（1834年），而比尤赫涅尔的《丹顿之死》，使同时代人又一次想起了法国革命的事件。

在格林兄弟的工作室里也充满了创作精神。格林兄弟认为为后代保留人民在几千年当中所创作的语言和文学珍品，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的劳动成果就是为《格廷根学术论丛》所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些书仍然是主要的。

雅科布继续从事语言领域的研究，而且应该说，他非常好地掌握了这一科学领域。按照他的学生格杰克的话说，“工作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手上飞起来了”。

在格廷根，雅科布又一次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课题，这就是：“我们原先的语言、诗歌艺术和法学”。而且他认为，为了表示对祖国的热爱，这是值得的和重要的事业。

尽管雅科布在大学和图书馆工作非常忙碌，但是他在到格廷根的头一年

就开始为《德语语法》第三卷搜集材料了。他一周又一周一页又一页地、顽强而又有步骤地准备付印的稿子；稿子一部分一部分地陆续送到印刷厂进行排印。1831年末，第三卷问世了。和第二卷一样，这一卷基本上也是专门研究构词法的。

雅科布曾以他所固有的谦虚态度说，现在已经取得的东西只不过“比起那已经开始并应当继续的感觉”稍微多一点罢了。另一方面，引以自豪的是，在工作中“他会用自己的翅膀飞行了”，完全形成了自己著作的独特风格。

雅科布打算，《语法》的下一卷专门研究句法。他对这一部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果只研究13世纪，那么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研究工作来说，至少还必须出版十万首诗，并且要人人懂得，单是这一点就说明，在编写德语历史语法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多少错误和缺点。”

雅科布懂得，由于缺乏材料，不能使他把这个问题研究透。但是他那开拓者的天性正好表现在他敢于这样做：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的人是要经常冒风险的。雅科布·格林的敢于冒险的闯劲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在古典语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使德语具有了与古典语言同等的地位。

在这部重要著作的引言里，有一些话说得很好，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雅科布的为人。对有病的弟弟，他曾写道：“亲爱的威廉：当你在去年冬天患重病时，我曾感到，你不会看到这部书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写这部书仅仅是为了你，如果你不在的话，那我也许就不能把它写完了。由于上帝的仁慈，疾病被战胜了，于是你又活下来了，因此，这本书照理还是属于你的。虽然常说，书都是为后代写的，但是莫如说每一本书注定都是为同时代少数人写的，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懂得书上所写的后代所不懂的问题，这样说要正确得多。至少是这样：当你读我的书的时候，由于你非常了解我的长处和短处，所以你就能知道这些书的优点和缺点。这使我比对以下情况要满意得多：上百的其他人可能读我的书，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不了解我，或者对他们来说我的著作在好多方面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你不仅对我的著作而且对我经常地、始终如一地抱着同情的态度。你为它感到兄弟之间应有的高兴吧！”

《语法》第三卷没有前两卷容量那么大，但是仍有八百页。这部《语法》出版之后，雅科布把这项工作暂时搁了下来，决定研究另一个他很久以来就感兴趣的问题。

狐狸列伊涅克的故事从1811年起就引起了雅科布的注意，他在各个图书馆里寻找了许多材料，不但在德国，而且在意大利和法国，也搜集了各种手抄本，从其中摘录了几万首诗。威廉也曾帮助过他。兄弟二人准备共同出版这部书。但是其他工作总在妨碍实现这一计划。于是在格廷根，雅科布一个人重新抓起了这部著作，把它完成并且发表了。在《狐狸列伊涅克》中，把罗马的、中古高地德语和中古低地德语的关于这一动物故事的各种文学版本都收了进去。这本书是在1834年初出版的。不过在这之后雅科布对于动物题材仍然饶有兴趣。所以在同年9月为了搜集狡猾的狐狸列伊涅克和狼伊泽格里姆的材料曾到比利时和巴黎去了一趟。

雅科布·格林同时还在研究《德国神话》。关于自己“对德国神话随便要写点什么东西”的打算还在1832年就告诉了自己的朋友。1834年他用他所特有的形象的语言对莫伊泽巴赫写道：“正如您所知道的，神话之子正在我的心里成长，不过我只能在每个礼拜三的上午、礼拜天的上午和午饭后才

能研究这个问题，因而要使它出世，还需要不少时间。”但是，没有过多少时间，这个连礼拜天也不给自己一个喘息机会的，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在同一年，即1834年夏天就把这部书交付印刷了。他写这部书同编写《语法》一样，也就是不等全部手稿写完，他就一个印张一个印张地交给印刷厂了。1835年10月这部书就出版了。

这又是一部一千页的著作！在这部作品里展示了许多非常出色的富有诗意而又完美的古代神话。奥金和多纳尔，巴利杜尔和洛基，齐乌和格伊姆达尔，弗列伊亚、霍利达和别尔赫塔以及古日耳曼神话中的其他诸神都活神活现。许多神怪：诺尔内、瓦尔基利亚女神、天鹅姑娘、人鱼公主、女神、水怪、爱尔菲、矮子、巨人，当然还有恶魔、女妖、幽灵和巫师，也都一个个跃然纸上，许多神话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在这些神话里保留了古代各民族人民对于各种现象的认识，诸如对于创造世界，对于自然力，对于植物和动物的起源，对于日夜的更替，对于死亡、命运、犯罪和赎罪等等。虽然雅科布从科学的观点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系统分类学者，他吸收了非常广泛的材料，并以鲜明、形象的语言写了这部著作。

雅科布在写了这样一部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之后，曾以他所固有的谦虚态度给朋友写信谈到了这本书：“如果这本书将是有益的并将为那种已经成熟和仍准备成长的新事物开辟道路的话，我将是高兴的。”看来，他并不认为这部著作已经结束，而希望今后更加完善。事实上，这部著作成了许多研究工作的推动力并且成了一门新的科学——神话学——的基础。后来，许多诗人和艺术家经常求助于这部大部头著作，从中寻找他们所感到亲切的情节和主题。

正如日耳曼学家舍列尔所说的，从这部书中“简直可以得到极大的享受”。和威廉·格林的《英雄传说》一样，雅科布·格林的《神话》推动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创作。雅科布本人为这部著作也感到特别满意。他广泛地、以丰富的幻想和准确性巧妙地揭示了主题。雅科布作为卓越的散文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把完美的形象同明确的叙述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他被称为“卓越的优美语言的大师”。

雅科布在出版前言里这样表达了自己所提出的目的：“为了比较古老的、现在仍然没有被人注意的、比较晚期的资料，我努力在其他著作里证明：我们的祖先，直到偶像崇拜时代为止并没有用野蛮、粗鲁、没有任何规则的语言说话，而是用灵活、发达、从远古以来就适用于诗歌的语言说话的，他们并没有过着混乱、野蛮、乌合之众的生活，而是根据自古以来保留下来的关于正义的合理认识，过着自由联盟的生活，遵守着严肃而又美好的风俗习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想用同样的而不是任何别的方法证明：他们的心充满了对于上帝和神的信念，他们的生活对于主宰者，对于胜利的喜悦和死亡的鄙视……充满了简单而又美好的（虽然是不完善的）认识。人民没有宗教是无法生活的，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从远古时代起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健全的形式。”

雅科布在自己的作品里也谈到了塔西佗，他把日耳曼诸神都取了拉丁名字。雅科布对塔西佗的创作非常了解，他曾在格廷根大学讲过关于这个罗马作者的课程。在出版《神话》的同一年（1835年），雅科布作了出版塔西佗的《日耳曼地方志》的准备，这又是他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副产品”。

《神话》和《日耳曼地方志》刚一问世，在1835年10月，出版者季捷

里赫就要求雅科布·格林立即做出认真的选择：要么编写《德语语法》第四卷，要么再次修改第一卷。由于雅科布一直都非常愿意搞新的东西，所以在冬季到来的时候，他就一面讲课，一面着手编写最后一卷，即《语法》第四卷。虽然他有时抱怨“第四卷难度大”，但是在1837年10月，他已经能把印好的书赠给朋友了。同时，他已考虑好把这本书作为纪念格廷根大学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的献礼。

在前几卷论述“词和词素”——“语音、词根、构词法和词尾”之后，雅科布这一次就转到了句子结构——句法方面。篇幅大约也有一千页。尽管如此，雅科布并不认为工作已经完成，照他的话说，“只是达到了一半的目的”。

在语言研究的艰苦过程中暂时得到喘息的时候，他曾写道：“傍晚，当旅行者把荒凉的原野抛在后边，送走了炎夏的白天，在回家的花园小径上一面走，一面把身上的尘土抖落到露珠上，这时，这最后的几步是很轻松的。大概写作品的结束语，在报告已经做完的事情时，也具有同样的心情。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想起了读者，而在创作过程当中，由于陷入了沉思，我们几乎没有考虑他们。”

好像是在总结自己多年研究德语语法的劳动，雅科布写道：“凡是从事德语研究并有足够的力量把这种研究继续下去的人，他会高兴地发现，我们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如何反映在我们民族语言的性质和命运中。这里存在着两个基本对立的、突出表现德国智能的性质的特征：一方面对于传统事物的迷恋，另一方面则是对新事物的敏感。德国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天性所固有的东西，他们随时准备吸收精神上的一切。”对这本关于句法的书，雅科布正是这样编写的：一方面高度评价已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认真注视着新生的东西。

毕竟，问题没有彻底揭示出来，所以还在酝酿另一卷，即最后一卷。他想引用他那个时代的经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例子作为实证，以便说明“德语语法的高峰和辉煌成就”。然而并没有做到这一步。

在第四卷的前言里，使人感到了某种悲观情绪：“不是工作的愿望减少了，而是信心；当我们在语言的森林里开始探索和铺设最初的几条小路的时候，我对于成功满怀信心，并且比现在还感到高兴，而现在我把船修完了一半，它还不能出航，而且还要用缆绳把它拴在水里好长时间。”

雅科布企图囊括无限的东西：单枪匹马地完成语言学家几代人所能够完成的东西。他有一种这样的天才，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这种天才使米开朗琪罗不得不“用雕刀雕刻整个峭壁”。有天才的人能够使自己的作品达到完美的程度，但是天才性质的作品同它的构思对比永远只是一些片断。然而没有完成的东西继续存在，并产生新的东西。“没有完成的交响乐”（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像雅科布·格林这样严竣的语言学家的著作的话）激励后代去进一步研究。雅科布逝世100年以后，《新德国史》写道：“他为新科学奠定基础的创作具有独特性的勇气”，他研究语法的著作被称为“革新的、革命化的著作”，《勃罗克高兹大百科全书》称雅科布是为“日耳曼语言的历史研究”奠定基础的“日耳曼语文学的奠基人”。的确，雅科布·格林作为语言学研究家，为这门科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里引证在文学史上创

造了自己学派的威廉·舍列尔的话将是适当的，他说：“如果认真看一看整个这部著作，那么可以说，雅科布·格林的《德语语法》是一部至今很少有人考虑过，更少有人打算编写的著作。这里存在着德语的灵魂，并且占有统治地位。任何人也没有像雅科布·格林那样如此深刻地了解它的实质，任何人也没有探索出它那么多的秘密。”

雅科布教人们研究古代语言之间的联系，从这里对于早已消失的民族的生活作出推论。按照舍列尔说法，他善于利用比较词源学“作为研究远古历史各个重大时期的完善的望远镜”。

威廉没有创作成千上万页的著作。但是他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哥哥的工作。在格廷根的年代，威廉时常生病，然而他仍然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古代和中古高地德语的诗歌，从而促进了这两位教授兄弟学术威望的增长。

还在1812年，格林兄弟就合作出版了卡塞尔图书馆的瑰宝《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一部最古老的日耳曼英雄史诗。1829年底至1830年初离开卡塞尔之前，威廉又一次非常细心地研究了它。他曾写道：“这个希尔德布兰特的片断是现在以这部手搞形式存在的并唯一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卡格林王朝时代史诗的古代文献。”威廉希望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以便把这部作品给后代保留下来，免得传下来的不多的几页真本遭到损坏和遗失。1813年一枚手榴弹落到了图书馆大厅，这一事实是对于可能发生类似事件的一个严重警告。在着手工作时，威廉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搞好原本副本质量。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使映像完全符合原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全部手搞都移印到了合适的薄纸上。威廉感到高兴的是：“每一行，每一个字母都保持了原样，一个细笔道也没有漏掉，一个磨破或损坏的地方也没有，褪色的地方也都用浅淡的绘图墨水复制好了，和原文一模一样。”威廉在抄写千万首各种手写的古代诗歌中获得了丰富经验，这帮助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工作。9世纪初所写的手稿后来都用石印法复制了出来。100年以后，即1938年出现了用现代方法所完成的真迹复制的版本。1945年《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确实丢失的事实证明，威廉·格林担心手稿可能遗失是多么正确。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部手稿通过各种困难的途径，而且这也只是部分地回到了卡塞尔。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于1830年出版。4年以后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弗赖塔格的《理解》。还在1832年至1833年冬季学期，他就在格廷根大学讲了这部13世纪的有劝善意义的诗集。威廉对这次出版采取了历史批判的态度，即非常仔细地“分析了所有主要材料和次要材料，还包括两部不大的手稿”，他不但研究了16世纪的印刷本，而且还利用了18个中世纪的手本。写弗赖塔格的《理解》是一部描写一个旅行家的作品，这个旅行家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用押韵诗的形式叙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威廉·格林认为这部作品是中世纪的一面镜子，而编入该书的无数民间谚语对他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威廉曾说：“这样一来，我们同时也收集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谚语，或者也可以说是通俗的哲学叙述，13世纪初，它们主要在德国南部得到广泛流传。”

1836年，威廉发表了描写季特里赫的英雄史诗列传之一——《玫瑰花

即法兰克王朝，在8—10世纪间统治法兰西、日耳曼西部和意大利北部。

园》。这是一个描写齐格弗里德和季特里赫二人在克里姆希利德守卫的沃尔姆斯旁边的玫瑰花园前进行厮打的故事。威廉·格林发现了这部 15 世纪关于玫瑰花园的无名史诗文本，并细心地把它抄了下来。他想把这个文本改写成一部通俗科学作品。那篇论述中世纪诗歌产生和发展的序文大大地丰富了这部作品。

由于在格廷根的年代发表了这些作品，因而威廉就补充和扩大了哥哥活动的范围。同时，他在准备两卷《童话集》的新的，即“补充和修订的第三版”的工作中承担了主要部分。1836 年他写信给波恩语文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勃·维利克尔说：“我正在埋头于更加扩大的童话集新版的工作，在这个版本里将要有些更新，许多方面将得到修改并更趋完善。”威廉现在不得不一个人从事童话集的工作，因为雅科布的工作担负过重。威廉早就想回到这项工作上来，以便使童话集具有完善和优美的语言形式，同时不破坏它的纯粹的民间性质。

《童话集》第三版作为两部巨著于 1837 年出版。威廉·格林在《格廷根 学术论丛》上就这部刚出版的《童话集》写道：“这本书出版了，在 25 年当中我们没有放过对它进行增补的机会。现在这个版本不仅扩充了一系列新的童话，而且对许多已经熟悉的童话进行了修改，有些地方得到了某种改进或补充。”

从第一部《童话集》出版的时候起直到第三版“大本的”《童话集》出版之前，终究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期间，《童话集》已由外文出版，其中包括英文和法文。在以后的年代，“大本的”和“小本的”《童话集》出版越来越经常。这本书的印数曾经只有几百册，而现在却开始空前畅销。到 1886 年前，“大本的”《童话集》出了二十一版，“小本的”出了三十四版。后来，重版的次数和印数增长到简直不可胜数的程度。这种世界性的成功，格林兄弟当时甚至是不能设想的。

格林兄弟始终是非常谦虚的人。在 1837 年第三版问世之际，威廉·格林在给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勃柳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寄给您一本新版的《童话集》，请您把它放在您的书柜里，当您有兴趣和时间的时候，您将会在这本书里读到新的东西。您似乎以为我寄给您的是某种旧的、非常熟悉的东西，好吧，那就请您把这本书作为对您始终不渝的爱戴的表示吧。”

布伦坦诺的妹妹贝蒂娜·封·阿尔尼姆也接到了这部作品，书上写有以下献词：“亲爱的贝蒂娜：这本书又一次回到了您的身边，好像已经飞走的鸽子，经过寻找而又找到了故乡，它在找到故乡之后，充分地享受着安静和阳光。25 年前，阿尔尼姆第一次放在其他许多圣诞礼物之中把这本书转给了您，这是一本切边喷金的绿色装帧的书。可尊敬的阿尔尼姆已经去世多年，至今回想及此使我非常不安，好像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就是在昨天，好像他仍然站在绿茵铺盖的地上，像一棵迎接早晨阳光的大树一样。您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再也不需要童话了。您也未必有重新阅读它的理由，但是您的心里的不可战胜的青春会高兴地把这个礼物作为忠实的友谊和爱戴的表示来接受的。”

于是，到 1837 年底，格林兄弟不仅在孩子们当中，而且在那些保持“不可战胜的青春”的成年人当中也找到了自己的童话和传说的读者。这些童话集在人民中间赋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在欧洲学术界的威望也是无可争辩的，许多科学院和学会把他们认作是自己的成员。比如，他们是柏林科学

院的成员，而后来，时而一起，时而分别地作为名誉会员受到意大利、荷兰、丹麦、法国和瑞士许多学会的邀请。格廷根大学的许多教授和教师对他们都很重视，学生们尊重他们。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已经巩固的地位而感到满足。看来，任何危险也不能使他们，使他们的学术探索受到威胁。

而突然，出现了晴天霹雳！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到，命运的打击正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的。

格林兄弟所发生的事情以“格廷根七君子”事件而载入了史册。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王国宣布建立格廷根所归属的汉诺威邦与大不列颠合并。1830年，威廉四世做了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汉诺威联合体的国王。19世纪在德国各邦广泛开展了争取宪法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国王于1833年批准了汉诺威宪法。这事实上意味着核准了不再保护国王专断和绝对权力的法律，并且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建立了法律关系。人民完全不依赖于一个人的统治。国王也应当遵守制定出来的法律的原则。可是1837年6月20日威廉四世逝世，并且没有指定合法继承人。随着国王的去世，大不列颠和汉诺威的合并也就终止了。威廉四世的弟弟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做了汉诺威的国王。

新的、专横的统治者根本不考虑他哥哥在全国所确立的宪法自由。国家职员，其中包括格廷根大学教授，当然也有格林兄弟，宣誓效忠宪法，国王对此不感兴趣。他于他哥哥死去一周以后来到汉诺威，不愿意进行宣誓。相反，却延期召开根据宪法所选出的代表大会。国王——大家了解他的性格是毫不受拘束的——的行为触犯了大家。7月初，仅仅一周以后，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发布命令，在命令中宣布：在他看来，对于国王来说，宪法是不必要的。他还命令垂询民意，以了解修改现行宪法或者恢复旧宪法的可能性。他以他所固有的狡猾的手法宣称：“朕相信汉诺威人民依然热爱并忠于自己之君主，朕亦相信，朕所亲爱之臣民将以平静和对朕之善良愿望抱充分信赖态度期待朕就上述问题之垂询，并将坚信，垂询之时，朕当顾及共同之幸福与繁荣。”

爱恩斯特·奥古斯特所称呼的是“臣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负有维护宪法使命的大臣们无所作为。他们没有予以反对，而采取了沉默态度，从而牢固地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而且他们曾经宣布，国王有权取消宣誓。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维护宪法？国王预先得到了顺从他的人们的支持，这些人证实，1833年制定的宪法好像是不合法的。尽管社会舆论表示愤怒，而且普鲁士和奥地利发出了警告，但是1837年1月1日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废除了1833年宪法，并强令实行对他更有利的1819年宪法。职员们都没有宣誓。这显然是君主破坏了法制。他当时讲的话是甜蜜的，可是这里包藏着欺骗和奸诈：“忠顺于朕之臣民可以深信，朕对臣民之情即父亲对子女之情。”与此同时，他明确而又严厉地宣称：“朕既然否认宪法于朕之可行与必要，故朕断然不可与依照此法所选之代表举行谈判。是故，朕以为解散代表大会并宣布1833年国家宪法从此停止生效，乃朕之责任。”

真是大失所望！

社会舆论为之哗然，难道国王有权取消人们对上帝的宣誓吗？愤怒的气氛也笼罩了为学生讲授法学课的格廷根大学。正是在那里“大家都特别尖锐地认识和感觉到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善和恶”。学生要求老师们以实际行动维护他们经常向他们讲授的原则。

雅科布·格林为发生的事情所激愤，他写道：“公法教师和政治教师应当从自己的信仰和科学研究的最纯粹的源泉中获得社会生活的原则；历史教师应当不惮其烦地说明宪法和政府对于人民的幸福和痛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哲学教师经常研究那些创作非常有趣的古代统治者故事的古典作家，他

们应当以历史上的实例证明，人民自由和压迫人民对于诗学的发展，甚至对语言状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渴望揭开宗教和自然界秘密的神学，甚至医学，应当促进青年人对于神圣的、纯朴和真正的事物的要求和向往，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以想象，听到废除国家宪法的消息后，大学的震惊多么巨大。”

于是雅科布·格林要求科学不仅教给人真理，而且在必要时还应捍卫现实生活中的真理。否则，何以面对认真听课的学生！要知道青年人能够特别敏锐地感觉到违法行为，能够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教授是否愿望同新政权合作，或者他们漂亮的言论是否能付诸行动。

那么教授们是怎样表现的呢？当然，国王破坏法律，他们对此都是不满意的。有几个年老体衰的人到底不愿望使自己已经受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另一些人则表现出完全冷漠的态度，而且只是关心个人的利益。也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失宠于国王是难以忍受的不幸”。当然，这些卑躬屈膝的人们为了证实自己沉默的正确，向他的同事们列举各种各样的虚伪的理由，有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考虑的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应当关心大学的威望。不过大多数教师十分清楚，大学处于十字路口：要么屈从于国王的操纵，要么理直气壮地起来反抗。总之，教授们的意见不一致，虽然在废除宪法的头几周“那些愤怒而又羞愧得面红耳赤的人们，即那些要遵守誓言而不愿违背誓言的人们的意见占优势”。

但是后来，许多教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而另一些人则完全胆怯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个人决定坚持完成自己的义务，不顾个人利益，忠于自己的原则。当官吏们都在保持沉默的时候，七教授决心采取大胆行动——对国王的行为表示不满。或者，像雅科布·格林所说：“在这个折磨人的、经过反复讨论而且持续下来的局势中，几个保持着自制力的人终于决心冲破这个好像冰层一样漫无限制而且可耻地笼罩着全国的沉默的僵局。”

1837年11月18日，七教授的抗议信送给了大学国王监督委员会。学校的七大学者彼此各自得出确信的结论，法律应当依然是法律。抗议信的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国王废除1833年宪法，犯有破坏宪法罪。签字人不能允许根本法在强压下取消。他们写道：“而且，您的义务是公开宣布，今后将始终不渝地遵守对国家宪法的誓言。”他们坚决宣称，不只他们的科学成就，而且还有他们自己、他们本人，在学生的眼里是白璧无瑕的，学生始终信任他们，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够教育青年。如果他们（教授们）是作为异常轻率地背叛自己誓言的人出现在青年学生面前，那么他们的劳动将是无益的。

那些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信念正确的人都是哪些人呢？这就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达利曼，法学家威廉·埃杜阿尔德·阿利勃列赫特，雅科布·格林，威廉·格林，文学研究家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盖尔维努斯，东方学家格奥尔格·根利希·埃瓦利德和物理学家威廉·埃杜阿尔德·维勃——“格廷根七君子”。

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公开回答国王？对于专横为什么不能提出抗议？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不能警告君主，杜绝他准备作出的非正义行为呢？历史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向国王说明真理，有时会带来好处。当然，教授们知道，历史上也有另外的情况，有时，而且相当经常，真理的捍卫者遭受到残酷的惩罚。但是，教授们引以自慰的是，虽然那些为真理而斗争的

战士不得不遭受痛苦，而他们的名字却永远会活在后代的心里。

怒气冲冲的国王来到离格廷根不远的一个供打猎的城寨罗坚基尔亨，以便从这里去开导那些难于驯服的教授们，并且“用对待不受赏识的属下的一切手段回击提出抗议的人”。对于那些虽然没有签署抗议书，但是同情他们的人也施以种种压力。那些签署抗议书的人们应当到负责调查这一案件的委员会受审。七个敢于反抗的教授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的签名。12月11日在给大学监督委员会的信里，他们又一次证明了这一事实：“我们毫不隐瞒，相反，我们使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同事们都相信，我们基于法律完成了我们最后的唯一的一步。”

如果力量在国王一边，法律又算什么？就在当天，1837年12月11日，国王下达了命令：“抗议书之作者宣称不臣服于朕，不臣服于其合法之国王与主宰。上述诸教授似全然不懂，朕乃唯一之主宰，且就职宣誓一事唯与朕有关，而无关他人。唯朕具有全部抑或部分免除宣誓之权利，该等以其声明彻底断绝至今与朕所存在之君臣关系；据此，该等离开所委其格廷根大学国家教席之职位，当可视为必然之后果。据朕所负神圣职责之天命，不允许忠于上述原则者继续占据所委其极负盛望之教授席位，故朕有充分理由担心其逐渐而不遗余力地破坏国家之基础。”

国王不得不一方面想起了“天命”，以便掩盖其个人专断，另一方面故作姿态，似乎七教授的抗议书使国家的基础受到了威胁。国王和国家是统一的。对于爱恩斯特·奥古斯特来说“朕即国家”也是不容置疑的。

12月12日，又继续发布了命令：以下停职之教授，即以达利曼、雅科布·格林与盖尔维努斯为主谋者，应于接到解职通知书之后3日内离开汉诺威王国。倘被放逐者违反此期限，据法律严格规定则有被追捕之危险，并必将其“置于王国之某地”。其他被解职之教席：阿利勃列赫特、威廉·格林、埃瓦利德与维勃——倘“其表现绝对安分”，准继续留居格廷根。

雅科布已经53岁，威廉52岁，当他们参加抗议之后，立刻失去了一切：地位、工作和生活费用，并且成了被驱逐者。敬爱的教授在这样的年龄没有任何人的支使和强迫，只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竟遭此横祸，真是难以设想。而没有财产的人，在这样的年龄很难找到新的生活出路。况且威廉已有家室，而雅科布没有学术研究工作是不能生活的。于是家庭，心爱的工作——一切都受到了打击。格林兄弟以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向同时代人和后人表明，他们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学者，他们研究严格的科学，并没有置身于社会生活现象之外。他们已经年逾五旬，竟以自己的地位相许，这种勇敢献身精神是值得尊敬的。“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在当时德国学术界的史册上是一起光辉的事件，而爱恩斯特·奥古斯特却成了一个可耻的人物。

“格廷根七君子”充满了为法律观念献身的决心，此外，他们无所顾及。达利曼代表全体被解职人员对学生所作的告别演说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刚刚接到国王陛下解除我的职务的通知，因此我必须停止授课。如果诸位学生对我真正怀有热爱之情——你们曾经常令人感动地证明了这种热爱之情，——那么我请你们安静地散开并遵守法制，而且以此来证明你们非常珍重我在你们中间还要度过的几天。”

达利曼起初想在萨克森找一个栖身之地。盖尔维努斯前往达姆施塔特。雅科布·格林为了避免已在威胁他的监禁，也决定在规定的期限之内离开这个国家。他来到了自己的故乡卡塞尔。他的兄弟路德维希·埃米尔住在这里，

在这里，他可以暂且栖身。

1837年12月17日，离圣诞节没有几天，一辆马车离开了格廷根。达利曼也坐这一辆车。教授们只随身带了最必需的东西。大学生的同情是在被驱逐者一边的，他们本想为离去的教授欣然送行。可是所有的马车主人在这几天被禁止把马车出租给学生。于是有几百名学生冒着冬季的严寒，在老师们临行的前夜，已经沿着通往边境的道路慢慢地走了。黑森的侯爵领地离汉诺威王国不远，贝拉河形成了两国之间的天然国境线。大学生们就在贝拉河桥上等候教授们的到来。将近中午才看到了马车。守信的学生们以宏亮的欢呼声迎接自己的老师们。青年人们卸下了马，他们亲自把马车和坐在车上的老师们拉到边界。他们发表演说，投掷花束，高唱爱国歌曲——颂扬大家的共同祖国。教授又一次感受到了表示感激和爱戴的力量。分手的时间终于到了，精神振奋的大学生们泰然自若地踏上了归途——向格廷根走去。马车继续进发。车上坐着两位教授。

雅科布，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感到痛心：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住地，正是在那里他成为侯爵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一个出版过《古代德国法律》的人，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他不是作为“七品文官”或者额内教授，而是作为被驱逐者回到了坐落在别列维尤大街上的家。“跟先生握手，他是一个逃难的，”当他越过国境的时候，一个老太婆对自己的孙子说。当他回到家里，才明白，政府当局完全不愿意在故乡接待他：为了他而招来汉诺威国王的愤怒值得吗？

对于那些失去职位的、被驱逐的教授来说，唯一的安慰是：他们的行为在所谓臣民当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当中得到了同情。在德国广大范围内，对于当局行为的不满意情绪发展起来了——“德国人民的政治良心已经觉醒”。

在格林兄弟这一国难的时期，他们的亲密朋友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雅科布来到卡塞尔之后，想向他表达自己同情态度的人们马上就来找他。国外的朋友们也都表示了支持。例如，莫伊泽巴赫从巴黎给威廉一家写信说：“我不能耽搁了，我想向你们大家表示自己最热烈的、最亲切的、最真诚的同情。在生活中无论发生任何情况，请你们信赖我的忠诚、爱戴和尊敬。如果你们，我的亲爱的被驱逐者们，能够在我这里过圣诞节就好了！我会为您的孩子们点燃我刚刚点缀好的圣诞树上的蜡烛。”

当然，这种同情和了解帮助格林兄弟度过了这个困难时期。但是，对于被解职的教授来说，某些身居高位的、在公众面前对汉诺威国王的行为进行谴责的人的支持并非是不重要的。例如，萨克森国王发表声明，全体七位教授是他的王国所期待的客人。在德国许多城市，像莱比锡、柏林、耶拿、马尔堡，出现了“格廷根协会”。为了支持七教授开始募捐。雅科布是不是接受这些协会的钱呢？开始，当达利曼还没有给他写信，告诉他“不应当拒绝”为了不辜负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真诚的、善意的同情”之前，他感到犹豫不决。达利曼继续写道：“在德国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每一个参加我们事业的人，为此会感到自己与我们亲近多了。”

在卡塞尔，在亲弟弟家里，雅科布企图在书桌上找到安慰。但是他的思想混乱了，很难集中起来，其实雅科布具有难以置信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控制自己的本领。他知道：朋友们热情很快会过去，以后，新的事件和新的问题将会把“格廷根七君子”的事件推到一边。前途未卜。威廉暂时还留

在格廷根。由于国王的“开恩”，他没有被驱逐出国，而且他也不需要急急忙忙地把家庭、什物、家具和书籍聚集在一起。在格廷根，威廉和他哥哥一样，经常感到朋友们的关怀和注意。研究加尔茨方言的神学家格奥尔基·舒尔茨曾写道：“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您，这事使我非常痛心。请不要认为没有在汉诺威王国为您组织募捐就是对您漠不关心，监狱不是住人的最好的地方，而君主是永远正确的，因为他永远能够借助刺刀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话指的是汉诺威国王。

还有这样一件事：威廉的儿子，8岁的鲁多利弗·格林在格廷根跟一个改良主义的教师学习。这样的教师是完全依靠给学生授课的报酬生活的。可是当小鲁多利弗把父母给的应缴的马克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却亲自来到了教授家里，并且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接受这些钱。多尔特亨·格林把手伸给他说：“教师先生，我们非常高兴，您是信任我们的。”“太太，我对你们的友谊至死不变！”老师答道。这不是漂亮话，这是感激教授们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义务摆在个人幸福之上。

几个礼拜过去了，而威廉仍然不清楚他今后怎么办。只有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善意的同情使他产生了信心和希望。积极赞成和支持的热潮不只是表现在某一个城市和某一个邦，而是遍及德国所有的邦。

1838年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在社会舆论的鼓舞之下，威廉写道：“我感到这个时期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从未想到过的爱和真挚；这一点在我的心里将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会出现真正的信念，而且我所了解的一切好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我痛恨的东西。”

威廉怀着浪漫主义情绪痛苦地感受到了同粗暴的政治现实发生冲突的后果。他所不理解的是，怎么能够只是因为他反对一个破坏法律的人，就这样把他和他的全家抛在街头！应当说，统治者们的倒行逆施并不非常使雅科布感到惊讶。因为在以前，当他担任黑森驻巴黎和维也纳的外交代表团秘书的时候，就多次看到老奸巨猾的政客们所施的狡诈的伎俩。所以雅科布想描述所感受的一切，好像这就能够卸下这个重荷并开始探索未来的道路似的。于是就出现了他在几天之内写成的文献性纪实《谈谈我的解职》，他在这里准确地如实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在书面叙述之前引用了《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一句话：“宣誓又怎么样呢？”

雅科布强调指出，他本想非常高兴地在“不断地为科学服务”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同时他也表示遗憾，由于同有势力的人物发生磨擦和冲突，“他的生活道路不止一次遇到障碍”。他写道：“只是在当局强迫我熄灭我心中的火光，并且强迫在新的地方把它点燃起来的时候，我才引起当局的注意。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任何一个政府，任何时候，都没有给过我或者我的弟弟以支持或奖励：至于说到支持，有时我感到需要，而奖励，则从来没有过。这种独立的处境把我锻炼得坚强了。”

在这里有必要引用关于他解职纪实中的几句话，因为这些话说明雅科布不但是一个出色的掌握了语言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他写道：“雷电的打击震惊了我安静的住所，激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什么呢——是普通人的怜悯心，还是由于这种打击波及越来越远，在许多人的心里产生了对他们本人生活的危险感？不是正义的行为，而一种暴力强迫我离开了那个我曾被邀请去并且在那里度过了8年以及忠诚地为其克尽

职守的国家……世界上到处都有能够公正地思考并教给别人以正义的人，但是只要一到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作了疑惑和胆怯的俘虏并且向后倒退。他们的疑惑好像大道上长出来的杂草；如果有人把它拔掉，那么过不了多久，它又重新长满了所有的地段……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来到我孤僻的住处，破门而入，然后又把我抛到街头？全部原因在于我不愿意违背邀请我并且接待我的那个国家所赋予我的义务：当有人强迫我去做那种不可能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违反誓言，而是毫不犹豫地听从自己良心的感召。一种从前我既不关心，也不曾思考的东西，突然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且以确定不移的必然的力量吸引了我。好像一个平静的散步的人突然听到打架人的呼救声，急忙跑到他们跟前一样，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参加社会事业的人，而且一步也不能从这里后退。”

雅科布以下述自白结束了自己的纪实：“现在我把我的思想和行为公诸于世。我没有考虑这个纪实对我是有害还是有益；如果这篇文稿能够传给下一代，那么就让他们读一读由我这颗早已冷却的心所写的东西吧。然而，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为我所作的一切而感到高兴，而且如果我所作的某些工作能够在我死后还继续存在，那对我就是巨大的安慰，这些工作因此不但毫无所失，而且只有得到好处。”

雅科布并不愿把自己被解职和被驱逐的历史纪实束之高阁，社会公众应当了解他的自白。他不需要读者的掌声，他只是想“开诚布公和毫不虚假地”说明自己的行为，并且认为它不仅对于各大学的历史，而且对于整个历史都是有意义的。很快，雅科布又遇到了另外的困难：在德国任何一个邦要把他那篇一个字也不愿改动的手稿印刷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之前，其他几位被解职的格廷根大学教授达利曼、阿利勃列赫特、埃瓦利德也决定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达利曼的文章《关于我们的相互了解》，萨克森的书报检查官不敢说一个“是”字，就把它转到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从这里又把稿子送到内政部，然后又送到公共事务部。推说由德国各邦联盟决定，根据这些决定，“手稿侮辱了德国各邦宪法和行政当局，不宜发表”。“检查机关让我跑得好苦啊！”雅科布抱怨说。达利曼对雅科布的稿子非常感兴趣，他虽然对这一措施能否成功也感到疑惑，但还是决定把它交给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可是很快，他不得不通知自己的同事：“亲爱的朋友，从附件您可以看出，检查机关处理您的稿子多么糟糕；我刚刚把它拿了回来，把解决这类事件的权力交给如此低能和具有如此卑贱性格的人，实在可悲。”

也许，可以试试在德国其他邦发表这个稿子，哪怕在符腾堡也好。也许，那里的检查官不那么严厉？终于手稿在瑞士和巴塞尔付印了，并于1838年问世。雅科布和他的朋友们期望，如果这个薄薄的小册子有几本落到南部德国，从那里再转到北方就好了。后来，这个小册子真的在莱比锡、汉堡、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城市出现了。

在格廷根，开始，当局要求购买者把书都交出来，后来终于允许不交书，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写一个由本人签字的特殊声明。政府当局想用这个办法把可能的“国家敌人”暴露出来。可是谁敢走这一步呢？

在经受过这一件事之后，格林兄弟想休息休息，超脱这些事情。于是，于1838年夏天雅科布就到法国去了，途中拜访了当时在巴德—基辛根疗养区休养的达利曼夫妇。他曾到过法国许多古城——符次堡、巴姆堡、埃兰根、

纽伦堡、菲尔特。他坐着驿车，沿途的河谷、森林、牧场使他悦目怡神，这给了他以安慰，使他有了精神和力量，在他的心灵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当他同朋友和学者相遇的时候，到处都感到所表现出来的友好感情。在旅行期间，他研究了法国的建筑术，拜谒了阿尔布里希特·度勒墓。还是在 1805 年第一次到巴黎旅行的时候，他就曾表示非常喜欢纽伦堡的艺术家。在这里，在纽伦堡一种崭新的东西——在这之前不久，即 1835 年通车的纽伦堡——菲尔特铁路在等待着这位旅行者。而雅科布，当然享用了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1838 年 6 月他给弟弟威廉写信说：“午饭过后，我坐上了去菲尔特的火车，10 至 12 分钟就可以抵达。这是一个与旧纽伦堡迥然不同的新的繁华城市。它在各方面都显得优越，我累了，在等待回去的火车的时候，我在菲尔特附近的一个桦树林里休息了一刻钟。在火车上，车轮发出轰隆隆和咚咚咚的声音，走得非常之快。”

旅行结束之后，雅科布回到了卡塞尔，来到了路德维希·埃米尔的家。现在应当考虑一下，他和威廉一起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威廉的孩子们需要上中学，科学工作需要图书馆。他们在卡塞尔见面了，这里有很多熟人，而且大自然也好像是亲切的、如意的。威廉和多尔特亨一起来了。他们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就来到了墓地。在格林母亲坟的墓石上早已爬满了匍行植物，布满了青苔，并且由于风雨的侵蚀，墓石已经损坏。他们路过洛塔妹妹生前所住的房舍。他们真不愿意回想 8 年前他们为什么离开卡塞尔图书馆。在记忆里还保留着与他们的创造性工作有联系的一切，他们回想起在家里所度过的日子。最后，他们终于决定租一所住宅，在没有出现任何安排工作的可能性以前，先依靠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重新组织起共同生活。

结果是这样，就在坐落在别列维尤什特拉斯的路德维希·埃米尔的岳母的那所房子的一层腾出了一套房子。雅科布住在进门右首的两间屋子里，威廉一家住在对面的一排门对门的房间里。格林兄弟从前，在 1826 年到 1829 年也在这座房子住过。

1838 年 10 月，他们把各种盒子和箱子都装满了，准备搬家。雅科布对于很快有可能收到自己的手稿和书籍感到特别高兴。

10 月 17 日多尔特亨和孩子们来到了卡塞尔。第二天，三辆马车运来了家具什物和书籍。10 月 20 日威廉也终于来了。大家都在这所住宅里安顿下来。

雅科布曾在笔记里写道：“为了在我的心里尽可能地感到轻松，我愿意勇敢地与可能发生的一切相对抗。但愿我不会遇到任何贫困。”

1838年过去了。德国社会公众依然关怀七教授的命运。人们经常写信给他们。由于莱比锡援助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可以不断接到给他们的钱，因此，在短期内，两兄弟的生活得到了保证。

他们又习惯了卡塞尔的环境：带着队鼓进行操练的士兵和大钟的叮当声。街道清洁，风景优美，这使人感到高兴。他们住在一层，像威廉所说的，这也有优越性：可以从窗子里伸出手来向过路的朋友致意。朋友们经常来。雅科布有时抱怨朋友的到来影响他的工作，可是比较善于交游的威廉却愿意接待朋友。雅科布写道：“我想更有成效地并且在安静的环境里重新工作。”两兄弟认为：“我们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安静地生活。”

在他们被解职的第二年，雅科布就同安德列阿斯·施麦勒出版了《十和十一世纪的拉丁文的诗》（1838），德国作者用中世纪的拉丁文写的诗集的出版说明，德国诗人在更早的时期就创作出了出色的作品，虽然是用异族语言写的。这里收入了三部作品：叙事诗《铁腕的瓦利特里》和《鲁奥德利卜》以及动物世界的寓言—历史《俘虏逃跑》。雅科布认为关于瓦利塔里·阿克维坦斯基的叙事诗具有“真正史诗的魅力”；在《鲁奥德利卜》中，它的艺术的完美性使他赞叹不已；《俘虏逃跑》增补了动物的诗篇。按照雅科布的话说，这些作品好像填补了“民间诗歌作品的缺陷”并且对德国英雄传说和关于动物的叙事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专门为选集写的一篇文章中，雅科布·格林写道：“但愿由于它们的出版，对于被人忘却的、用中世纪拉丁语写的诗歌作品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作品好像一条同自然河道并排流行的运河一样，是同民间诗歌作品一起发展起来的。”

由此看来，雅科布仍然忠于自己所喜欢的题材。他不但醉心于瓦利塔里·阿克维坦斯基和他的未婚妻希利杰贡达·布尔贡德斯卡娅的情节复杂而有趣的故事，而且神往地伴随着青年骑士鲁奥德利卜在作困难的旅行或者津津有味地欣赏动物诗篇中狡猾的狐狸的勾当，从而雅科布就忘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

在解职几天之后，威廉就曾说过：“虽然我失去了公务时间，但我要出一本关于12世纪诗歌作品的书，并且期待，最严厉的检查机关也不能改变书里的任何一个字。”

的确如此，那些过去在学者们的作品上用红笔乱涂乱画的检查官们，对《罗兰之歌》（1838年）却一字未勾，因为这部古代文学作品在许多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在查理大帝退却穿过牛利比斯山时，罗兰处于后卫的首列，中了埋伏而牺牲了，检查官们认为他的惊险故事并没有危害性。因为威廉对现实没有进行任何影射，相反，这个出版物是纯科学的，没有“任何当代事件的影响”。

这部作品在这次发表之前，人们只是知道它的一些片断，威廉在重版这部作品的中古高地德语版本时，遵循的是宫廷的稿本。不过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稿本，而是采用了他所知道的其他许多稿本，这有可能清楚地证明不同的抄写者是如何使这部古代作品发生变化的。

尽管格林兄弟陷入了骑士们惊险故事的浪漫主义世界，但是他们同时也

意识到，这些出版物都不能够成为长久生活费用的可靠源泉。而且也不能指望援助委员会长期的捐助。

这时，再凑巧不过了，1838年3月，莱比锡的日耳曼学家兼古典语文学家莫里茨·哈乌普特和魏德曼书记老板兼出版家卡尔·拉伊莫和索罗门·希尔采利建议雅科布承担出版《德语详解词典》的任务。开始，雅科布表示犹豫，他曾给拉赫曼写信谈到这一点：“工作看来是可以完成的，不过太费力气了。况且我没有研究这个的愿望，再加我的知识也不足，尤其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语法》正在修改，将要完成。因为新本第一部出版人已经折磨了我2年，而且还要在所有其他工作之前对语音进行全部修改。”

拉赫曼对雅科布的疑虑表示异议。他认为编写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词典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当然，无论雅科布，还是威廉，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前应当进行多方面的考虑。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部德语词典，它不是日常用的袖珍读物，而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

说明德语科学基础的最初的认真的尝试是16世纪的事。在这以前，语文学家几乎只是研究古典语文。在路德翻译圣经的影响之下，人们才开始以较为尊重的态度对待德语。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埃拉兹姆·阿利勃于1540年编了《新德语词典》一书，从而奠定了德语词典的基础。克拉伊又在1578年写了《德语语法》。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最初的新德语语法。问题是，不论是这部著作，还是后来的几部著作，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科学性的材料有限，当列伊勃尼茨考虑编一部包罗万象的词典的时候，由于资料的广泛性，所以 he 不想只吸收一个人，而是吸收整个科学院来参加编写工作。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直到14世纪初，这一任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致力于德语词典编写工作的有约翰·克里斯托弗·阿杰隆格和约阿希姆·根里赫·卡姆佩。以《爱国主义幻想曲》闻名的尤斯图斯·苗泽着手研究本族语，而约翰·根里赫·福斯和路德维希·晓利季只参加了编纂德语词典的准备工作。德国文学古典作家也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赫尔德在《论德国现代文学片断》（1767年）中对平民语言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并称平民语言为“民族的财富”。克洛普什托克写了《论编纂德语词典的必要性》。编纂德语词典的问题引起了启蒙家莱辛和弗里德里希·尼古拉的兴趣。歌德认为“在一部统一的词典中表现出德语的全部丰富性”是绝对必要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支持编一部包罗万象的词典。

总之，所有知名人士都赞成编纂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词典。如果能够使具有语言天才的雅科布·格林对此产生兴趣并参加这一工作，就好了！当然，这里说的并不像杜登编的一卷本现代词典，这部现代词典带有最常用字的正字法诠释，可以说像是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目的而编的。而这一部应当是以详尽无遗的完整性囊括现代德语——在人民和文学中所使用的语言——中所有基本用词情况的巨著。开始，雅科布犹豫不定。可是，这个建议是多么诱人！而进取的勇气始终在激励着他。如果他能够在弟弟和其他学者的参与之下，把德语永久保存下来，难道这不是他的劳动和努力的顶峰吗！同时对一个失去了讲坛和主讲的课程的教授来说，难道这不是他终生值得做的工作吗！这一工作要是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保证他们的生活费用，这也是非

指古希腊和拉丁语文。

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路德主义创始人，他把圣经译成了德文。

常重要的。

雅科布曾这样考虑过：他现在 53 岁；如果每年出一卷，那么这件事情要用去 6 年到 7 年的时间。这样，在 60 岁时，他将对日耳曼学和自己的人民作出一件不朽的事业。何况，这样的著作还将留给后代。

这就是最初的设想。当时无论是格林兄弟，还是负责实现这一庞大计划的出版者都不怀疑他们的生命太短，要完成这一计划，需要 100 年以上的时间。

不管怎样，1838 年夏，格林兄弟终于决定接受这一工作。

1838 年 8 月 24 日，雅科布给卡尔·拉赫曼写信说：“你瞧，终于决定了。我们真是鼓足了勇气，但愿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再也不要打扰我们了。”雅科布把这项巨大的工作看作是自己的“支柱和独立精神的表现”。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编纂词典的工作。他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必须以充分的容量收集有生命力的中古高地德语的全部词汇，而且还要把 16、17、18 世纪那些已经由于正常原因或不正常原因而过时的全部词汇也收入词典之中。如果有人希望在词典里只收集那些没有过时的、现在正在使用的词汇，那么他所提出的目标就不够大。从路德时代开始的一切响亮的、有力的词汇，在必要的时候都可能在现代语言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作家们借助词典能够看到这些词汇的全部丰富性和美，并且现在也完全可以使用这些词汇，在这种情况下，这部词典才是成功的和积极有效的……这部词典应当包括中古高地德语在天才的作家们于 3 个世纪的过程中所提炼的一切。”

1838 年 8 月 29 日，即给拉赫曼写信之后过了几天，格林兄弟还通知《莱比锡公共报》向舆论界发表了自己的计划。在他们看来，生活是这样安排就了：即使时令不佳，人们也必须播种和收获。他们希望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获得美满的、令人愉快的成果。他们写道：“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共同遭受了命运的严重打击，他们在长期无望的等待之后，没有受到德国任何一个邦的任用，于是他们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未来，并使自己的未来有生活上的保障。他们承担了编纂德语大词典的任务，词典的出版者是魏德曼书店。

这是一部巨著，而且由于还有其他繁重工作，所以对他们来说承担起这项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部词典应当包括从路德到歌德的我国民族语言的全部无限丰富性，而对于这种丰富性，任何人也没有衡量和斟酌过。”

在谈到详细内容的时候，兄弟二人确定，应当把上述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家所使用过的词都收到词典之中。应当提供词的全部意义，对于词在俗语和谚语中的使用情况应当通过各种来源的实例加以证实。为此，应当把生动的德语的全部形式和表现吸收进来。格林兄弟又一次表示希望，如果健康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一定完成这部著作，并且它将分为厚厚的、由密排的铅字印刷的六卷集或七卷集。

他们写道：“就是在其他民族，编纂词典也常常被认为是一项对本族语言的纯洁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全民族的事业，也是一件服务于神圣目的的事业。在许多国家早已耗费巨资并在王国科学院多方支持之下所完成的事情，而在德国则纯粹是一些没有任何人支持并只是指望朋友自愿援助的学者私人来企图完成这件事情。”

这部德语词典不是根据有钱的宫廷的倡议进行编纂，而是根据那些“没有任何人支持”的、除了知识和勤奋劳动之外别无所献的学者们的倡议来进行编纂的，这在德国科学史上将是光荣的一页。当然，格林兄弟已经意识到，

他们承担了一项要求为其实现而付出全部力量的事业。但是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因此将送给祖国一分较之在大学授课和在图书馆抄写图书目录更为珍贵的礼物。

雅科布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他当时曾经写道：“在我心里几本书的腹稿正在成熟，要实现它们，我这一生是不够用的。”

1838 年最后几个月，格林兄弟着手工作。12 月初，他们的自愿助手已经有三十多位语言学家、朋友和学者。这使他们有权期望：“如果词典搞成的话，它将长期发挥作用；这就是在我们被放逐时为祖国而献出的成果。”

凡是表示自愿帮助他们的人，格林兄弟都对他们说明，应当阅读哪些作者的书以及如何选择资料。问题不仅是从读过的作品里摘出词汇；把它们抄到卡片上，而且必须摘出整个段落，以便了解每一个词都用于什么意义。格林兄弟除了作出明确指示之外，还附上了卡片式样。格林兄弟建议他们注意词的特殊搭配、语法形式的例外情况，注意正字法，等等，一般说，格林兄弟表现出自己是出色的、能为越来越多的助手队伍指出统一方向的组织者。所以，所有资料都以同样的卡片形式出现在格林兄弟面前，并分门别类装在卡片盒里。

格林兄弟在格廷根的难友盖尔维努斯称这项作为“赫拉克勒斯的”工作。他在 1839 年初写给雅科布的信里说道：“这部著作在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将占有光荣的地位，如果说格廷根岁月的代价换来的是这部著作，那么这又一次证明：因祸得福。后代将加倍地颂扬您。您以新的壮举——一部巨著，来回答祖国加给您的屈辱，而类似这样的著作在其他国家都是在君主和整个科学院支持之下完成的。”

必须详细地研究工作方法，比如对收到的资料如何分类和加工。的确，威廉当时已经感到疑惑，尽管四面八方都来帮助，他们未必能够完成编纂“词典”的工作，况且要是他们一旦复职呢。

开始是起草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他们发现大量的词后来都不使用了，18 世纪诗人的语言所用词汇极其有限。只有歌德是个独特的例外。然而，格林兄弟并没有只限于对助手们送来的资料进行加工和概括，而他们的助手在 1839 年 9 月已近六十人。他们亲自对某些作者的语言进行分析，亲自从这些作者的作品中摘抄词汇。

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离第一卷出版还很遥远。1839 和 1840 年 2 年都用在搜集必要的资料上了。兄弟二人越深入到工作中去，他们越清楚地感觉到，这项工作将作为沉重的担子长期落在他们肩上。威廉写道：“这是一部有时使我产生恐惧的著作。我们走得越远，就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要走的道路渺无止境。”雅科布认为：“我们近几年要干的工作已是绰绰有余了。”两兄弟始终忠于已经开始的事业。而且他们在承担这项工作之后，就渴望他们的产儿从某一方面看是十分完美的。编纂过样一部大规模的词典，除了其他一切工作之外，要求大量的抄写工作，况且，并不是所有的合作者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可是前边还有大量搜集资料的工作，格林兄弟感到高兴的是，如果他们的助手不泄气的话，卡片就能得到补充。

应当说，在这几年，即从 1838 到 1840 年，格林兄弟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与词典有关的困难，还有其他许多既需要时间又需要精力的日常要办的事

情。然而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失去勇气，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彼此互相支持。威廉甚至想寄希望于上帝，他曾说：“我越来越信服，他正在寻找办法，对此我们并不怀疑。”雅科布甚至还说：“我认为，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但是，在表达这些充满信心的话的同时，我们从雅科布的许多信里了解到，在1839年后4—5个月当中，他的健康情况并不是那么好。多尔特亨也得了重病，威廉又在为她不安。她由于肺炎和肾绞痛，几个礼拜躺在床上。有些天，兄弟二人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她的健康恢复得很慢，拖得很久。

在迫不得已的中断之后，雅科布和威廉又投入了工作。虽然在他们的心里常常痛苦地掀起对于格廷根的回忆，但是对于自己反对破坏宣誓的国王的行为，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认为：“除了诚实和勇敢之外，任何东西也不能给人民和整个民族带来好处”，这些品质应当成为一切政治的基础。他们确信：“我们民族的未来会建立在大家共同的荣誉感和自由感的基础上。”

格林兄弟在卡塞尔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时，加强了这样一种思想：最好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依靠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比在格廷根从事教学活动时期好得多了。按照性格来说，他们是研究者，都不喜欢多说话，不过比较愿意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寄托在纸上。雅科布与威廉相比，是大不喜欢交游的，他曾写道：“我是这样的性格，在独立钻研的时候，我会比学习年代和同周围人交往得到的东西更多。”现在，兄弟二人变得更加沉默了。在谈论学术问题之外，他们就坐在自己书房里的书桌前工作。当然，他们的关系仍然同过去一样融洽。

雅科布从前就不喜欢喧嚣的社交界，现在则更少与人交往。而且经常谈论那些世界安排得如何不好，社会上有多少不成体统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呢。甚至在一家人都聚到一起吃饭的时候，雅科布也是沉默寡言的。威廉也很沉默，只有那些半大孩子们，像常见的那样，吃饭时总很活跃。

两兄弟毕竟没有失去欢乐的机会，虽说是很小的机会——休息的时候，可以欣赏晴朗天气的景象，呼吸浸满椴树芳香的空气。

因为暂时谈不到《词典》第一卷出版的问题——还没有搜集好全部资料，——格林兄弟就放下了这项工作，抓起了另外的工作。在“卡塞尔流放”的以后几年，他们一方面继续那已经开始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准备了许多新的工作。

1839—1840年，雅科布又全部修改了《德语语法》第一卷——语音部分。1840年出版的第一卷已经是第三版了。他曾给英国人约翰·米特切尔·凯姆勃写信说：“我在勤奋地耕耘着语法这块田地：大部分犁沟都是按另一种样子耕的，大概我扶犁的方法不同，所以有点儿深了。”威廉每天都在注意着这本书的新稿的诞生情况。他在1839年11月写道：“雅科布在修改《语法》第一卷，这成了一本崭新的书，因为在十三个印张上，旧书上的一个字也没有保留下来。”

1840年，雅科布出版了《法院判决》头两卷，这是他惊人的工作能力的又一个证明。在1828年雅科布以发表《古代德国法律》一书而为德国法学史作出重要贡献之后，他在古代书籍和手稿里寻找并抄写了那些略能说明古代各民族法律惯例的一切材料。这是在村社时期基本上已经存在的德国法律观念形成过程的重要史料。雅科布决定把这个内容丰富的材料搞成一个法学家们易于了解的东西。他认为，“德国最老的法律应该完全出乎意料地具有新鲜的色彩”。这两卷排满密密的铅字的书就是他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顽强探索

的结果，而且每一卷都是几百页。

1840年，雅科布同时着手出版盎格鲁撒克逊古代文学作品《安德烈阿斯和叶列娜》。是的，他的智慧和笔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在卡塞尔离群索居的岁月里，威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研究中世纪的诗歌作品。1839年，他向读者介绍了一部作品《维佩尔·封·尼杰尔拉因》，这是一个至今不出名的早期中古高地德语时期的诗人。这位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采用了新约的情节，认为人爱人应当是第一条圣训，基督为救赎人类而牺牲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后来出版了一部关于13世纪伟大诗人之一（符次堡的）康拉德的作品。威廉发表了《金匠铺》——一部有许多宗教内容的讽喻作品。颂扬圣马利亚的那种优美语言是诗人的工具，借助这种工具制作出与圣马利亚相称的黄金和宝石的异常优美的装饰品。

当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威廉首先渴望恢复被忘却的德国的诗歌作品。正是在这些年代他接近了宗教题材，这毕竟不是偶然的。

威廉同意为阿尔尼姆全集的出版进行准备，可以认为这一事实是极其重要地纪念朋友的一种表现。他在前言里写道：“我非常激动地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已故朋友的全集之前。阿尔尼姆的诗篇在喷流着源源不断的生活的泉水。他不是一个由于内心冲突而沉醉于痛苦之中的悲观失望的诗人；他俯视着慌乱与黑暗；像向着晚霞飞去的云雀一样，以自己的歌声欢送落日的余辉，并且坚定地期望着新的一天的到来。他认为自己的诗的才能好像清澈的流泉，响亮而从容地从他的心田流出。一般都认为阿尔尼姆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因为他所感兴趣的是旧时代的精神，并且他非常认真地熟悉了自己民族的传说、历史、法律和风俗，不过他了解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消遣——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对同时代人都是有益的。”

在威廉的这些话里，难道没有承认同阿尔尼姆精神上的相近之处吗？他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同样不是为了使读者消遣，他希望过去的伟大成就为现代的利益服务。人类在漫长的道路上所创造的一切有重要意义的东西，都应当成为人类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他的朋友逝世之后，他一直把人们纪念阿希姆·封·阿尔尼姆之事放在心上。而他的遗孀贝蒂娜·封·阿尔尼姆也同样地关心格林兄弟一家人的生活。由于这个出色的女人过分热情，所以雅科布把她叫做“横溢的泉水”。在1838—1839年困难的岁月，她经常来到格林兄弟家里，关心他们。1840年威廉又以巨册“童话集”第四版献给贝蒂娜，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感激的表示。这一次，从上一版问世时起，只过了3年。威廉的献词是以富有诗意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并且与格廷根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自从破坏了我们平静生活的非常不幸的时刻起，您以温情的忠忱同情我们的命运，这种同情对我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影响，好像穹苍的温暖沐浴着我的房间，我从这里看到，太阳早晨如何升起，傍晚又如何落下，而在山脚之下，河流在闪闪发光，缓缓流动；从公园里传来一股茂盛的橙树和椴树的芳香。为了重新开始研究我的童话集，我能否希望有一个更合适的时代？”

时光虽然匆匆地过去了，但是“格廷根七君子”并没有被人遗忘。各援助委员会和汉诺威当局的专横所激起的社会舆论经常想到自己的责任。许多人想帮助被驱逐的教授获得新的工作。这些人的诚实和正派博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尊重。况且这都是些大学者。很快，东方学家埃瓦利德应邀去图宾根，法学家阿利勃列赫特在莱比锡得以恢复授课，达利曼担任了波恩大学教授，物理学家维勃应邀来到莱比锡，而文学研究家盖尔维努斯开始在海德尔堡大学任教。格林兄弟命运中的变化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在柏林，他们有许多在普鲁士宫廷有影响的朋友，其中有贝蒂娜·封·阿尔尼姆和当时在柏林大学据有重要地位的萨维尼。

暂时，格林兄弟只有准备忍耐。1838年8月雅科布·格林给拉赫曼写信说：“现在还没有发现获得新的职位的可能性。我对于到普鲁士，到背叛我们诚实的事业的国家去的前景丝毫不感到高兴，这个国家处于卑鄙和愚蠢的恐怖统治之中，而且它认为可以掩饰和缓和非正义行为。如果联盟议会的决议对汉诺威国王施以压力，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反对宪法的行为，那么国内就会出现安定局面，整个德国就会得到稳定和信赖，可是现在在这里出现的却是混乱和压制真理。”

雅科布非常了解普鲁士情况的复杂性。在那里实行统治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与汉诺威邦的国王爱恩斯特·奥古斯特有亲戚关系。谁会为了那些教授同如此高等官阶的亲戚反目，并且违背王朝的戒律呢？

过去，雅科布曾经在柏林科学院担任过科学院正式院士，威廉担任过通讯院士。1839年，萨维尼曾企图争取柏林科学院对格林兄弟的帮助。为了预先得科学院的支持，萨维尼曾建议格林兄弟写一份有关《德语词典》的计划。要知道对于解决科研任务来说，科学院是有特殊基金的。可是格林兄弟拒绝了这一建议，不过这并没有使萨维尼抱屈。威廉写道：“科学院只有对那些有绝对成功把握的事情，才能够动用自己的基金。但是现在情形并不是这样：只有当搜集资料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这一工作才值得给以支持；较早地接受帮助似乎是难为情的。况且最近贫困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威胁，而科学院除了保证我们进行工作的物质条件和给予我们安心工作的可能性和时间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因此，我请您暂缓提出申请。”

1840年6月7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格林兄弟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承了王位。当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人民就对他寄以希望。他是一个有名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承认报界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使许多学者、诗人和艺术家都靠拢在自己周围。

新国王在登上王位之后没有几天，关于格林兄弟就发表了热情的意见。

在这时贝蒂娜和萨维尼可以在宫廷运用自己的影响，以争取向格林兄弟提出邀请。亚历山大·封·古姆鲍利德也在促进这件事情，他的意见在宫廷里是受重视的。他赞成格林兄弟“在受到这样不应受的痛苦和如此长期的侮辱性的轻慢之后，终能获得职位，以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有些报纸也曾论述过邀请格林兄弟到柏林来的可能性，可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害处。原因是汉诺威国王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大发雷霆，并开始制造阴谋，以便阻止邀请格林兄弟到柏林。从普鲁士的京城传出消息，说新国王很难作出决定，因为他要考虑与汉诺威的亲戚关系。古姆鲍

利德又给国王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里他又一次表示赞成邀请格林兄弟和“格廷根七君子”中的其他学者到柏林来。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身居王位的浪漫主义者”，他没有受汉诺威亲戚的影响。加冕不久的国王从监狱里释放了大学生联盟的成员，恢复了爱恩斯特·莫里茨·阿尔恩特的教授席位，所以对古姆鲍利德的意见表示同意。雅科布在巴黎时就已经认识的埃霍伦这时担任了教育文化大臣。新大臣在1840年11月2日给雅科布·格林的信里通知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国王陛下，极仁慈的君主，多少年来高度评价您和您的弟弟在研究德语、文学艺术和历史方面巨大的创作成就，因此，陛下表示希望，您和您的弟弟能够在国家的帮助和促进之下，无忧无虑地解决巨大而又极其困难的任务——详尽地研究有批判力的德语大词典。”

接着，埃霍伦又建议格林兄弟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具备必要的条件之后从事德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只要一有机会就把他们正式列入大学或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所的编制之内，不过暂时还没有空额。

对于格林兄弟来说，埃霍伦的建议是有益而又体面的。格林兄弟希望无论如何今后也要在一起，他们事实上也没有条件选择保证常年生活的其他可能性。来到柏林是解决他们共同工作的最好的办法。任何东西也不能使他们离开研究工作。由于他们获得了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因而也就恢复了自己的教授荣誉。在格廷根，他们被宣布为不体面的人，并禁止他们今后在大学生面前出现，而是在这里，他们可以在柏林大学广大学生面前讲课。

对于这个建议雅科布答道：“我们以感激的心情和对未来愉快的坚定信心遵奉国王的邀请，国王的声誉远远超出了普鲁士的国界，全体德国人都对他抱有希望。”并补充说，他和他的弟弟除了继续并完成共同的研究语言和历史的著作之外，没有其他打算。

尽管这几个礼拜是不安定的并且有明显的“动身的”心情，他们仍然做了很多工作。威廉从日耳曼学家格奥杰克的著作里为《童话》的下一出版搜集了许多新的资料。雅科布一方面考虑了语法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在今年冬季准备《法院判决》第三卷，作为前两卷的补充。除此以外，他们还在继续整理送来的卡片，并用以补充《词典》卡片。

但是住在哪里和如何搬家又成了问题。1840年12月，雅科布来到柏林寻找合适的住房。他希望在圣诞节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威廉和妻子完全信赖作为一家之长的雅科布，他一定会找到正是适合于料理家务的地方。

雅科布一大早就来到了柏林。在令人疲劳的旅行之后，他的关节酸痛起来了。天还黑，而且是冬天的严寒。这时，他在邮局旁边租了一辆马车，要到住在卡尔什特拉大街上的莫伊泽巴赫男爵家去。他同这一家很早就认识了。莫伊泽巴赫在柏林据有很高的官职——莱茵上诉法院主席，他是一个热心的藏书家，他藏有16和17世纪德国文学的许多稀有版本，这是真正的珍宝。他同格林兄弟的友谊是建立在兴趣相投的基础之上的。雅科布一面寻找着住址，一面希望能够很快在一个舒适而又暖和的屋子里取取暖，休息一下。然而，在黑暗中，在暗淡的路灯照耀下要寻找这个住址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终于在更夫的帮助之下找到了所要找的门牌——36号。把东西从车上卸了下来，而雅科布冻得发僵，就带着行李站在门前。尽管时间还很早，他终于下决心拉动了门铃——没有一点回音。在整个房子里，没有一点有人的迹象。窗户依然黑着。周围非常安静，这在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是

很难想象的。一个拿着提包的小人物，拉了半个钟头的门铃，他希望，即便能叫醒家里一个人也好。

在等待了好久之后，雅科布终于从矮矮的几乎临着地面的窗子里听到了不愉快的声音：“什么事啊？”雅科布问，莫伊泽巴赫主席先生是否住在这里。门开了，把早来的客人让了进去。雅科布上到三层，到了一间房前，又是一阵叫门。一切又跟原先一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除了在这里，在楼梯上等待以外，毫无办法。二层终于闪了一下亮光，雅科布又转到二层。有一个人打开门说道，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莫伊泽巴赫太太在家，可是，大概就她一个人在屋里，而且她睡得很熟，在女仆到来之前，格林先生只好等着。这个告诉他这些情况的人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把客人请到了自己的房子里，为他准备了咖啡，还把当天的京城的报纸递给了他。当然，这不是今天给知名人物举行的那种招待会——有报界人物、鲜花和镁光灯。

当莫伊泽巴赫太太醒来以后，一切情况都非常好。女主人解释说，很遗憾，她没有听到铃声，然后把他带到了早就给他准备好的房间里，并且说，马上通知她丈夫关于他到来的消息，午饭后他就会回来。疲劳的客人终于可以在午饭之前躺上几个小时，休息一会儿，以解旅途之劳。

在柏林，雅科布遇到了热情的、随时准备伸出援助之手的贝蒂娜·封·阿尔尼姆。她和莫伊泽巴赫太太经过多次的正式的访问和活动（雅科布也不得不参加）帮助他寻找一处适合于格林一家生活的住房。

在长时间的和折磨人的寻找之后，经过观看和斟酌，雅科布在提加尔登区连奈大街八号选定了一处“令人高兴的、舒适的房子”。他暂租了2年——从1841年复活节到1843年。房租每年475银币，如果考虑到收入暂时只有两千银币的话，那么这房租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过住在这里倒是满宽敞的：共十间房子，有阳台。房子是去年盖的，而且相当不错。雅科布还考虑到侄子们要上学，15至20分钟就可以走到最近的、坐落在波茨坦门附近大街，这里有弗里德里希·威廉所上的中学。伯伯认为，这样一段上学往返的路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天气如果不好，可以雇一辆马车。雅科布也没有忘记多尔特亨，对于料理家务所不可缺少的店铺就在附近。总之，这是一座处于闹市之外的“安静、宽敞而又明亮的”住宅。房前有几棵老的、美丽的橡树。

1840年底，雅科布回到了卡塞尔，并告诉弟弟，他在柏林曾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接见。他把住宅的平面图铺在弟弟和弟媳的面前，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一切。威廉和多尔特亨都很满意。雅科布虽然咳嗽很厉害——他在冬季严寒的柏林长时间寻找住房的时候患了感冒——但是回来情绪很好。柏林大学春季课程表上已经排上了他的课程。

一切都很顺利。由于贝蒂娜·封·阿尔尼姆和亚历山大·封·古姆鲍利德的努力，以及教育和文化大臣埃霍伦的支持，兄弟二人的年俸提到了三千银币。正如雅科布给达利曼的信中所说的，他们的物质状况“终于好转了”，而且他们“在这方面交上了好运”。

1841年2月，在格林一家准备离开卡塞尔和他们的祖国——黑森之前不久，他们得到了奥古斯特侯爵夫人逝世的不幸消息。这个女人很早就离开侯爵的宫廷独自生活，她与她的丈夫不同，始终以充分理解的态度对待格林兄弟。所以，当30年代威廉把一部《童话集》寄给她的时候，她用以下的话对他表示感谢：“我亲爱的教授先生！由于您寄来的自己的童话集，博得了三

代人的欢心：最高兴的是老太太，她高度评价您的任何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此外，女儿和几个外孙因为您的礼物感到惊喜。”正当格林兄弟行将游向新岸的时候，获悉这位善良的女人逝世的消息，这引起了他们内心的悲痛。还是在不久以前，侯爵夫人曾对格林兄弟说过：“如果你们终于要走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最好到柏林去。我有机会到那里去的话，一定去看望你们。”要知道，她出身于普鲁士王室。威廉写道：“因为她曾吩咐要像普通市民那样安葬她，所以我有机会跟着送殡的行列，把她送到了最后的安身之地。”

这样，在 1841 年 3 月，格林兄弟就带着全部财产到柏林去了，他们不但告别了自己的故乡，而且也告别了使他们同故乡联系起来的一切。不过，这样的搬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百三十五公担 的行李必须装两个大车。按照格林兄弟的计算，这些行李在难走的路上，需要在两周的行程之后才能到达柏林。

格林全家是在几天之后，即 3 月 14 日动身的。3 月 19 日到达柏林。立刻到家里去是不可能的，在他们对那所像威廉所说的“非常令人喜欢，但毕竟不大的房子”进行适当的安排的时候，只得在旅馆里住了 6 天。

来到柏林之后，兄弟二人应马上走访几家。人们到处都“友好而又尊敬地接待他们”。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埃霍伦，亚历山大·封·古姆鲍利德对他们表示祝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接见了他们。在接见的时候，兄弟二人对他们未来的君主的见解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甚至发现，“在他的面部表情上，一般说在他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自然友好的、敏锐的东西”，他们向他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最好的感情”，但是他们受过去同国王交往的教训，终于决定：“要听其言，观其行。”

格林兄弟在新的地方同过去的年代一样（不过现在更是成熟的年龄了），马上就开始了工作。在休息的时候，他们熟悉了新的环境：“合理地又有审美感地”布置的房间和漂亮的住所。他们经常在远离喧嚣的城市的地方散步——住宅附近就是提加尔登公园。这里的草地绿了，新长出来的树叶已经成荫，鲜花开得五彩缤纷，一条条金鱼在池塘里追逐嬉戏。在这里还有他们特别高兴的事情——“城外的令人惬意的寂静，而在城里马车的辘辘声则经常使人不得安定”。在离提加尔登公园不远的大街上，大都住的是学者；因此人们把这一地区叫做“拉丁区”。格林家周围都是些亲切友好的人们。

威廉处在昂扬的、春天的心境之中，所以他对盖尔维努斯写信说：“就个人方面来说，我们要多么幸福，就多么幸福。充分的自由以及在大学工作的有利条件；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意识到了这一点。”

德国一公担等于五十公斤。

19 世纪 40 年代。这是一个技术和技术革新越来越积极、明显地开始成为生活现实的时代。过去作为长距离基本交通工具的驿车，现在为“蒸汽马”所代替。如果说在 1840 年德国有五百四十九公里的铁路，那么到 1850 年铁路的长度已经超过六千公里，也就是说在 10 年之内铁路延长了十倍多。工厂和工厂式企业的数量同样急剧地增加了，这里的劳动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39—1840 年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实行了禁止工厂使用重工的命令，在矿业和冶金企业还规定少年 10 小时工作日。不过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经济制度和社会如何对待正在开始的工业化？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0 年）一书中曾企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技术发展的同时，自然科学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家和旅行家亚历山大·封·古姆鲍利德以自己的作品大大丰富了对于地球的认识。他的著名的《宇宙》，于 1845 年开始出版。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依靠经典著作的唯心主义精神，随着已经发展了的自然科学的要求一并前进。普通比较地理学的作者之一李特尔 多次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地理对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一书，李比希 先后写了化学方面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如：《有机化学》（1840 年），《动物化学》（1842 年）和《化学书简》（1844 年）。“格廷根七君子”之一的韦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高斯 都致力于物理学的研究，高斯不但找到了行星轨道计算法，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物理学《普通原理》（1840 年）的研究。

这些情况的变化显然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可是社会科学暂时仍占统治地位。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艺术流派。例如著名的被称为“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派别 的拥护者表现得越来越积极。革命诗歌的声音更清晰，这些诗歌对德国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表示不满，甚至反对现政权。1841 年，格奥尔格·赫韦格 发表了战斗的《活人的诗》，而弗朗茨·金格利什坚特 则发表了讽刺的《世界主义守更人的诗》。在海涅的作品里则表现出了尖锐的政治语调，如《阿塔·特罗尔，仲夏夜的梦》（1843 年）、《新诗集》（1844 年）和《德国，冬天的童话》（1844 年）。裴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的诗集《信念的象征》（1844 年）是针对反动政府的。新文学，即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批作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例如：贝尔托里德·奥艾尔巴赫 在《乡村故事集》（1843 年以及稍后时期）里企图描写农民的形象，而弗里德里希·赫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李特尔（1779—1859），德国地理学家。

李比希（1803—1871），德国化学家。

高斯（1777—1855），德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19 世纪 30 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批激进文学青年的总称，后来其作家大部分脱离了革命。

乔治·赫韦格（1817—1875），德国诗人。

弗朗茨·金格利什坚特（1814—1881），德国作家和戏剧活动家。

裴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848 年革命诗的主要作者之一。

贝尔托里德·奥文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

倍尔 在悲剧《玛丽娅·玛尔达利娜》（1844 年）则现实地描写了旧的风俗习惯和市民荣誉感的破灭。语言大师安东在剧本末尾像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出指责：“我不再认识这个世界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浪漫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浪漫主义内容仍然存在于文学之中，只不过改变了形式。比如理查·华格纳 在格林兄弟所搜集的传说基础上创作了《坦华瑟》（1845 年初次上演）。他有意识地把这部作品称作浪漫主义歌剧。

1842 年决定按照旧的图纸建成科隆大教堂，这意味着渴望国家统一。

于是，在生活、科学和艺术许多领域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1848 年 3 月革命发生之前的时期——“3 月前的时期”——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但是，在反动诸侯和政府同人民热爱自由的渴望之间，和过去一样，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许多问题上具有自由主义情绪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虽曾邀请格林兄弟到柏林，但是对于积极解决关于宪法的重要问题，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格林兄弟来到柏林的头几年，没有可能积极干预这些问题。信守自己的创作方向，只是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他们到这里来的责任。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之前几周柏林王室图书馆馆长逝世之后，内阁提议雅科布领导这著名的机关，他拒绝了。

1841 年 4 月 30 日，雅科布对于自己在柏林大学开始讲的课程，没有选语言题目，而选的是法律题目。根据格廷根的经验，他想指出在国家生活中，法律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讲授的课程叫做《论古代德国法律》，并且具有科学—历史性质。在柏林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坐满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当他登上讲台时，学生们以非常热烈的欢呼声欢迎他。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是非常激动的。雅科布怀着巨大的热情开始了讲课。他讲述了他所受到的那些考验，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动摇，相反，却坚定了他的精神力量，从而坚持了正义事业。他叙述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并且讲了，他的活动是从什么开始的。当拿破仑的军队占领德国领土的时候，他在对古代的研究中找到了安慰，而且对未来具有了信心。他认为，研究古代的语言、诗歌、宗教、法律，不仅仅可以丰富知识。这种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为现代的实际目的服务的——“弄清本地法律的方法和精神，并且发扬热爱祖国的感情。”

当然，雅科布·格林是为纯科学服务的，但同时他并不是不关心自己的时代。他相信，他是在以自己劳动的成果帮助德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统一的斗争。他不是一个守旧的和从形式上研究历史的研究者，他更愿意把现存的东西同将来需要做的东西结合起来：“语言和法律有共同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座把古代和现代，必然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桥梁。谁……如果不仔细了解过去，谁就会给现代带来危害，并且赋予将来一种可能性，即同他一样忘记过去。相反，谁如果顽固地企图抓住过去不放，那么他就会奇怪地在现代失去正是将来再回过头来承认现代的东西。也就是他自己在挖自己的墙脚。”

雅科布完全无条件地承认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不但能够发展和完善流传

弗里德里希·赫倍尔（1803—1863），德国戏剧家。

理查·华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

到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而且也能够发展和完善新的法律规范。关于这一点他在讲稿里是这样说的：“我既不否认我们的时代，也不否认其他任何东西能够根据其高尚的或微不足道的观点改善法律，从而建立新的法律规范，因为人类的自由和现代的法律在促使我们去做这种尝试。”

在教室里听课的学生们感到自己就是与发生的事件有关的人。他们认为教室范围之外的事件正在他们眼前发生。按照达利曼的话说，这是“公众赞成的证明”。学生们感激那种把理论同实际生活协调一致的人。

几天以后，即1841年5月11日，威廉·格林上了第一课。他选了用中古高地德意志语写的长篇英雄史诗《谷德仑》作为自己讲课的题目。这是他热爱诗歌的又一证明。《奥格斯堡公共报》报导说：学生们像欢迎他的哥哥那样以热烈的欢呼声来欢迎威廉。教室里座无虚席。威廉感谢学生们对他命运的真正同情，他说：“人们说，花好像是在夜里生长，以便在早晨争芳吐艳；如果我还年轻的话，可以说我也是这样；而现在，我只能够使你们相信，夜里的微冰并不能伤害我。”

在这两次讲课之后，格林兄弟成了柏林舆论界的人物，并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当中占了有令人尊敬的地位。现在汉诺威的任何阴谋也不能伤害他们。

贝蒂娜·封·阿尔尼姆非常满意：一切问题都非常顺利地解决了，而且格林兄弟在柏林住得离她非常近，她给自己的兄弟克列姆斯·勃连塔诺写信说：“雅科布是一个最普通、同时最安静的人，然而他既重视法律，又重视义务，在各种社会舆论，秘密诽谤和政治阴谋的冲突中成了一个带有圣徒光圈的人，而且对此不应作比喻性的理解。为了回答他曾为之花费了许多时间的重要问题，只有他所需要的极大的安静，才能使他的面容具有战士的力量和坚定性以及受难者的乐观精神，所以有些人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不到受窘的感情。”

这好像是表示爱情。或者这强烈地表示了人们幻想公正社会的那种苦闷心情。

以前，威廉是柏林科学院通讯院士，1841年春天他获得了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这更加巩固了格林兄弟的职位。兄弟二人与科学院的大学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同年7月8日，威廉作为科学院院士发表了第一次正式演说，在演说的开始提出了以下口号：“德国所有科学院应当把科学提到更高的水平；它们不仅应当为科学增光，而且应当使它富有成效，把个人创作成果用于实际生活之中。”然后，他把很早以来就在大学里存在的科学同他和他哥哥所提出的，当时还是一门新的科学——日耳曼学作了比较，并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在几个世纪的研究中打下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充满信心继续发展的科学，现在处在非常好的情况之中。这些科学好像一个人，他在自己作为遗产继承下来的并且早已翻耕好了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收成，他并不担心，每年夏天是否都是好收成；他知道：如果一年没有收成，第二年就会多收一倍。德国古代的研究者暂时还没有处在这样幸福的地位。他们面临的是艰苦的工作——耕耘和开垦荒地。”

说到这里，他也提到了雅科布编纂《德语词典》的工作。他说：“但愿科学院对于实现这一计划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注意到，这部著作将要概

括近若干世纪的德国语言，而这种语言自从被路德的富有生机的精神所“唤醒”，摆脱“冬眠状态”的时候起，就开始扎下了新根。这一工作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这个时代将如何促进语言的纯洁性、优雅性、正确性和感情力量的提高，祖国的感情能不能因此而得到加强——这都取决于精神自由和现代生活的积极性。果实所以成熟并变成富有营养的果实，只有在阳光照射，清风吹拂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格林兄弟很快就证实，在这里，在柏林大学，同时从事教学和大量科学研究活动并不那么简单。雅科布习惯在每天晚上考虑自己的工作。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常常有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来找他们随便聊聊或者商量事情。更多的时候是闲扯。这只有浪费两位学者的时间，使他们感到生气，特别是雅科布，每天在这座大城市街道的长长路程上也要花很多时间。甚至科学院的会议也成了一种负担，或者照雅科布的话说，在这里，许多时间都耗费在不大重要的事情上了。雅科布抱怨说：“白天在工作和操劳中匆匆地过去，而晚上，按照老习惯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写东西，可是都花费在没完没了的接待上了。”

格林兄弟一方面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安静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他们经常感到许多的义务重担。雅科布曾说：“表面上，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并且受人尊重”，可是“内心里，我觉得自己经常不舒服”。同时，他抱怨自己“疲惫，明显感觉体力不支”。是的，命运的打击过去了，但并不是没留痕迹——那种几乎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越来越经常地思考：他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各种任务。

还是 1838 年在格廷根，当死亡为期不远的思想折磨雅科布的时候，他写了一份遗嘱。考虑到他的许多著作还没有完成，便吩咐把他“所有记着文学笔记的本子都烧掉”，只有《法院判决》以及已经出版的几册续集例外。所有的财产要转给弟弟威廉或他的孩子们。

1841 年 9 月，他又重申了这份遗嘱，并又补充了一封给威廉和多尔特亨的信。从信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使人对他产生有极大自制力印象的学者，但是他也有发作忧郁病和产生不可避免的死的念头的时候。在给弟弟和弟媳的信里，他首先谈到，他认为重要的是，任何人也不应当由于他所没有完成的工作而受苦：“如果因为我的死，而使《词典》工作停下来的话，那么我希望对出版者希尔采利和拉伊麦尔赔偿损失。”至于说到他所表示的在他死后烧掉其他所有科学研究材料的愿望，他还是坚持认为：“其他任何人一般说都不能处理我这些笔记。”他接着写道：“我的思想和理智这时是平静和清醒的，但是我的身体近几天感到沉重和疲累，我渴望去见上帝，渴望与以创造我的那个样子来接我的上帝融为一体，他知道为什么让我的双眼紧闭，双手僵硬，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请相信我，热爱亲人，这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情，所以请不要忘掉我，像我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妈妈一样。”

但是，暂时还没必要把这个遗嘱交给威廉和多尔特亨，因为雅科布感觉自己已经好些了。不过就是在以后的年代，他的忧郁病不止一次地发作过。是的，1843 年，大夫不但指定他进行水疗，而且还暂时禁止他讲课。他当时曾写道：“胸部觉得非常闷，暂时还没损及肺，但是说话的时候，感到疼痛和嗓音嘶哑。”

从童年时代就得过病的威廉身体更坏。1842 年 2 月，他已经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不安的雅科布给达利曼写信说：“不久以前似乎又恶化了。脉搏 1

分钟增加到一百三十多次，手和脚几乎变得凉了，可是没有发疟子，而出现了一种好像是麻痹的状态。”这一次他病了几个月，身体消瘦了，大家担心，这是肺结核。整个夏天身体很弱。看来，这几个月他是在某种忧郁状态中度过的，有时甚至失去知觉。清醒过来之后，就抱怨脑袋痛得厉害。他说：“我甚至连最清楚的事情也回忆不起来，只是在梦想，好像在海上飞翔的一只鸟儿一样，哪里也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土地休息，除了这样的梦想以外，什么也没有。”后来，他得出结论，只是由于精神的力量他才活了下来。直到秋天，威廉才走出位于提加尔登公园附近的舒服的住所，拄着拐杖，到老橡树和水青冈树下边散步。

兄弟二人的病使多尔特亨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她本人身体也并不特别好。她要关心和护理病人，不但坚持下来了，并且依然是全家的主脑。

当格林兄弟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当然，他们已经不能以原有的精力从事劳动了。可是，当他们稍微好一些的时候，马上就着手工作。

就其内在素质来说，雅科布不如他弟弟更适合教师工作。他是一个天生的研究者，绝不是在听众面前显示口才的演说家。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备课的时候，我发现，与在学生面前叙述表面上的成果相比，我更喜欢安心而又平静地研究各种问题。我觉得，就天性来说，或者说由于环境娇惯的原因，我具有较大的单独劳动的天分，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就缺乏勇气和自信心。”有一次他曾说：“我经常怀念我在黑森那个旧房子里所过的离群索居的生活。”

但是，一个人既然能够习惯一切，所以他也习惯了教学工作。每一天他要众提加尔登步行走到大学，然后在接待室里与自己的同事们相会，20分钟之后上课，又随着宏亮的钟声下课。课程讲的是在格廷根大学讲过的那些题目，并且也涉及到了他本人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塔西佗的《日耳曼》，神话，古代法律文献和德语语法。

雅科布作为一个教师，人们谈论到他的时候，说他讲课不稳定，是跳跃性的，学生很难跟上。

威廉则相反，人们称赞他是一位天生的教师。确实，他讲课更直观，更容易理解。威廉大部分也是讲的他在格廷根大学所研究的题目。他对弗赖塔格的《理解》进行了评论，讲了史诗《谷德伦》以及哈尔特曼·封·奥埃的小说《埃雷克》，把学生吸引到了中世纪的骑士世界——这个世界有许多奇闻轶事，复杂而错乱的生活际遇，有骑士的荣誉和对于意中人侠义的爱情以及男男女女的高尚品质。古代的理想栩栩如生地出现在19世纪学生的面前。

威廉在讲史诗《谷德伦》的前言里说道：“我讲的史诗应当是准确的，语文学的讲解。但是如果我只给自己提出语文学的目的，那么我就不会选择史诗《谷德伦》来讲解。这部关于谷德伦的史诗直接来自德国人民的最底层，反映了德国人民的本质，德国人民乐观愉快的形象好像在洁净的镜子里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重新认识和直观地描写早已淹没在时间海洋里的人民精神，这是古代世界史的任务，而语文学在这里只是一种工具，虽然是很好的、优雅的工具。此外，对我们来说，它实质是上可以达到目的唯一的途径。”

他说，写《谷德伦》这部史诗和写《尼伯龙根之歌》一样，需要很长的

时间，为了说明问题，他作了如下比较：“名贵的树木生长得很慢，在这些树木开始开花之前，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些微不足道的植物则铺满了田野，而且它那粗俗的花朵每年夏天都在开放。”

他颂扬了《谷德仑》之歌：“它把我们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亲切温暖之中；它展示了高尚的女子的灵魂。叙述的中心形象不是男主人公，不管他被描写得多么好，多么出色，而是他的妻子；而且我不知道，对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处于屈辱之中的伟大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有过如此完美，如此深刻和如此真实的描写。”

当然，威廉本来可以讲授中古高地德语诗歌作品的一个长时期的课程，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西不得不去掉或压缩。于是，他像他哥哥一样：更愿意深入到内部，不愿意在表面上徘徊。对他来说，详细地研究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比浏览整个世纪的作品可贵得多。

作为一个对语言非常敏感的学者，一下子就认清了《谷德仑》这部诗的伟大，对它赞不绝口。他说：“这部诗很像一面洁净的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模糊的镜子；这是因为它从自身清除了一切偶然的，虚假的和昙花一现的东西。它的事件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的，并把它提高到了纯洁的思想境界，从而保证了其更高尚的存在。这部诗把可能的想象和经历结合到了一起，所以它既不同于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现实。它不同于这种现实，好像铸成的模型不同于真的、随便凿成的大理石雕像一样。”

在讲哈尔特曼·封·奥埃的作品《埃雷克》当中，威廉也暴露了对诗歌作品的类似的主观主义认识。他把描写阿瑟国王 的小说中的这部史诗作品评价为“骑士史诗中的优秀作品之一”。同时，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通过过去了解现在对他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作了这样的比较：“人们把被弄脏的水井弄净，不是为了使人高兴地把它作为镜子欣赏自己的容貌，而是为了使它重新喷出泉水，既可以吃，也可以使已经干枯的不毛之地变成适于生长植物的土地。”

除了在大学讲课之外，在柏林的这些岁月格林兄弟在科学院的许多会议上作了很多报告。这是真正对各种问题所作的科学报导，后来，这些报告都在科学院学术丛刊上发表了。

格林兄弟虽然很忙，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从前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雅科布继续埋头于《法院判决》的工作。1842年出版了第三卷。1844年，他准备出《德国神话》两卷集第二版。他曾以形象的语言写道：“如果我努力设法使德国神话这棵幼芽现在能够再一次枝叶纷披，那么这就可以对它未来的、自由自在的生长寄予更大的希望。”雅科布深信，研究古代不仅具有经院意义。过去的光辉应当在现在反映出来，对于过去的任何轻视都会在未来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德国神话》的新版本里，他想指出，对每一个民族来说，相信神，如同语言一样，是不可缺少的。雅科布又一次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到处都是神和神灵的丰富多彩的世界，说明了过去世世代对各种超自然现象的信仰，并且把这种信仰看作是创造性想象力的表现，他否定了曾经存在的见解，好像“许多世纪的生活都是在呆板，没有欢乐和野蛮时代的昏暗中度过的”。他写道：“这与我们的创世主的博爱和善良的精神是矛盾的，因为创世主曾

阿瑟国王，传说中古代大不列颠人的国王，克勒特人神话中的英雄，连续武侠小说《圆桌》的主要人物。

让太阳照亮所有时代和所有的人，照亮他所创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并且创世主还赋予了人的身体和灵魂以高尚的素质，使他们感到最高主宰的意识；神的祝福涉及到所有时代，甚至那些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而这种祝福为具有高尚素质的民族保留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权利。”

由于希望对过去的时代说句公道话，他反对那种据说似乎是“黑暗的中世纪”的见解；对他来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世纪都充满了创造力。

《德国神话》第二版问世，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对于神话，以及英雄的和传奇形象的兴趣的增长。

同时，雅科布还在修改《语法》和埋头于《德语词典》的工作。工作量非常大，致使他有时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我们这些人常常卷进这样的计划之中，即那些以后不能够像我在制定它时所想象的那样去实现的计划。”可是，有一次在他给达利曼的信里看到，他又有了信心：“在我的思想里，有五本或六本书又酝酿成熟了，我似乎能满意地把它写出来，而且写这几本书的材料也已经搜集好了。”

雅科布仍埋头于工作，在他生活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之前不久，他曾通知维甘德：“下一个月（1845年1月4日）我将60岁，可是我觉得自己和往常一样准备从事新的研究工作。”

作为不疲倦的探索的证明，年老的学者把发表在科学院丛刊上的自己的两篇新作寄给了朋友；其中一篇是《德国的古代》，另一篇《论霍亨斯陶芬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的诗》。

在柏林的头5年，威廉和以往一样，仍在出版中世纪诗人的作品，使它成为人人能懂的新文本。并又重新研究康拉德（符次堡的）的创作，在《金匠铺》之后发表了《西尔维斯特》——一本关于同名罗马教皇的传说诗。1844年，威廉以新的版本出版了从前发表过的《鲁多利弗伯爵》。当然，还在继续研究《童话集》，并对它润色、修改和补充。

需要重新出版博得越来越大声望和赞誉的《童话集》，曾谈到出版“大”版本，不过“小”版本也很受欢迎。

1843年春，《童话集》第五版问世了，而且威廉把这一版又献给了贝蒂娜·封·阿尔尼姆。阿尔尼姆几乎是格林兄弟的同龄人，她同他们几十年友好相处，在柏林与他们又是近邻，一切与他们甘苦与共，所以威廉又找到了美丽的语言作为他的献词：“我没有把那种在这里，在提加尔登所受到特别护理的名贵的花献给您，也没有把旁边竖着微笑的希腊之神的雕像的深水里的金鱼送给您，可是我为什么不再一次把这种一次又一次在地上新长出来的朴素的花束献给您呢？我曾亲自观察到，您是多么恬静地站在一棵非常普通的花前，并且怀着青春时代的喜悦仔细观赏它。”

1年以后，雅科布在谈到这部童话和传说时写道：它们“一直到今天在供给青年和人民以丰富的精神食粮，不营供给他们多少其他菜肴，这种精神食粮任何人也不会拒绝。”这正是雅科布对这部童话和传说的永久的未来所作的预言。

这样，格林兄弟在柏林生活的头几年每天忙于教学、科学研究和文学工作。在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德国词典》的工作就有些放慢了。当然，他们并没有把它忘记。不过，第一卷的校订和印刷还为时尚早——还没有搜

西尔维斯特（？—约1566年卒），罗马教皇。

集到全部资料。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社会舆论对格林兄弟的态度。在柏林，他们和从前一样享有崇高的威望，并接到邀请到沙罗腾堡参加国王的宴会；国王和王后陛下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对格林兄弟——二位学者喜欢呆在柏林表示满意。

学生们特别喜欢他们，1843年2月24日，在威廉·格林生日那一天，也是为了祝贺他们的教授在重病之后恢复健康，学生们举行了火炬游行。这一天兄弟二人没有邀请什么人，可是有许多朋友和熟人来到了他们在提加尔登公园附近的家里，使得屋子里挤满了人。

工友在房前清扫街道，传来了消息，说学生们打算搞什么事情。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他们出现了，在住宅周围形成了半圆形。明亮的火炬划破了夜空。格林兄弟同客人一起来到了露台，于是学生们唱起了歌。这时街上已经没有车辆。清脆而又宏亮的歌声传到了远方，邻居们都从窗口向外张望。在家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学生代表团，他们是来递交贺信的德国各邦的代表。贺信里还有一首庄严的歌和一首诗，这首诗是一位挪威大学生为了表示称赞格林兄弟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方面的功绩而用丹麦语写的。祝贺声不绝，大家都互相握手。从下面响起了宏亮的祝贺健康的欢呼声。

为了对学生们的爱戴和同情表示感谢，威廉对他们说：“1年以前，我重病在床，并且没指望我还能够站在你们面前为你们讲课。我只能祈求苍天保佑我能活下来。可是，我得到的却多得多，并且我今天能够在你们当中，为你们对我们的友好祝愿而感到高兴。我们不愿意把这种祝愿仅仅归于自己，而把它看作是你们珍爱我们的著作、珍爱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一种表示。这些著作是专门研究我们祖国的。对德国古代的研究要求采取认真的和真诚的态度。这里也需要热情，而你们有足够的热情用来进行一切工作，这是你们的年华的最好礼物，未来就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安静下来的学生唱了一支《我们要欢乐》，然后熄灭了火炬，经过提加尔登回家去了。

随着铁路和汽船的出现，遥远而又辽阔的世界就开始诱惑人了。对于同驿车一起长大的一代来说，新的交通工具具有新的无限可能性。不过交通网还没有那么多支线，以便完全取消驿车，所以蒸汽的力量毕竟只能代替马车承担长途运送工作。

穿过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各城市去一趟，仍然是遥远的旅行，并且远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要很快地到罗马或者那不勒斯作一次旅行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旅行，哪怕只是为了随便看一下，也要花费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虚弱的威廉·格林并不想到遥远的地方去。他离开柏林只是为了作短途旅行，于是，1841年偕同妻子在哈脑呆了几天，当他从开着的窗子向房子里边看时，由于新式样的优美的环境，他觉得这所房子完全陌生了。而在施太诺一切仍是老样子。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旧胡同里散步，在面包铺前站了一会儿，从前，穿着白色短上衣的妹妹洛塔，常常从这里买回甜面包；他路过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房子。在城外的墓地上，他读了爷爷坟上的碑文，这个碑文由于风雨浸蚀已经模糊不清。最后，威廉和多尔特亨以游莱茵河结束了他们在科隆市的旅行。

假期，他们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了加尔茨和绍林吉亚森林。在这里，在夏天清新的绿荫之中，许多安宁闲逸的地方吸引着他。岗峦起伏的地形和新鲜的森林空气，对于教授的健康有着良好的影响。德国国土上的大自然对威廉是很珍贵的。因此，他一直没有到外国去。

雅科布则相反。当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外交官的时候，就欣赏了巴黎的豪华和维也纳的魅力。1831年他访问了瑞士，1834年又访问了比利时。不得时常冒着冬季的寒冷，经受马车的颠簸，多瑙河上极其简陋的客运船只，他也很熟悉。

1843年，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访问了意大利。有时，他不得不雇用马车，不过长途旅行则乘坐火车。当然，当时的客运火车没有现在这样舒适。坐火车的时候，雅科布常常抱怨车上的过堂风。有一段路程还要坐汽船，比如从美因兹沿莱茵河上溯到曼海姆，或者过菲尔瓦尔德什特湖和拉戈—马泰列湖。在炎热的8月里，雅科布借助各种交通工具，经过法兰克福、巴塞尔、圣哥达山口和米兰终于来到了热那亚，在这里，他坐上轮船，经过3天4夜的路程到了那不勒斯。原来从米兰坐马车到热那亚，比海上旅行要劳累得多。

由于炎夏的酷热，58岁的雅科布·格林没有去攀登维苏威火山，不过他参观了赫鸠娄尼恩城和邦贝城。在9月的一天，他乘公共马车来到了罗马，下两站是佛罗伦萨和波伦亚，亚平宁山的乘车旅行又一次感到劳累。在很陡的山路上，五匹马也很难拉动一辆沉重的马车，有时不得不再套上几匹公牛。

南方的风景使北方人感到惊讶。在从热那亚到那不勒斯的路上，雅科布欣赏了两岸的风光，整天可以看到无云的碧空、蓝色的海洋和船头前边飞溅的白色泡沫，每天傍晚，在回到自己船舱之前，总要仔细观察一番布满群星的天空。在岸上游览时，他很赞赏南方的植物。他曾在橄榄丛里散步，曾不

两个都是意大利名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溢时被毁。

两个都是意大利名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溢时被毁。

时地在意大利松前停步，也曾仔细观赏葡萄藤、肥沃的土地和绿荫如盖的花园。他曾说：“自然界统治一切，我们一代一代就是在自然界永恒的青春面前消逝的。”

在旅行时，他的想象力把他带到遥远的过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罗马，对他来说是一座“骄傲的城市”。他沿着阿毕雅之路走去，走近了水道弓架结构的废墟，这时他抚摸着古代的石块，想到：“如果它们能够活的话，能讲述多少事情啊！”然后他说：“在罗马，什么也比不上集会场的风光好。”他想象着，在一个个耸立的圆柱之间，罗马人怎样在进行辩论、交易和审理诉讼案件。他写道：“在罗马集会场，我常常避开惊慌和不安，在这里，那些处于难以形容的、肃然寂静之中的、古代罗马人半遭毁坏的建筑物都在注视着我，神殿、圆柱、拱门和科洛西姆斗兽场——所有这一切，都呆在原来的地方，并且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我多么想在这里逗留几个月。”

不用说，他参观了著名的贵族的宫殿、教堂和庙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达·芬奇和替善的作品使他感到震惊：“他们那些充满生命的画完全吸引了我。”他以同样喜悦的心情游逛了熙熙攘攘的那不勒斯大街，欣赏了佛罗伦萨的祖遗堡垒和威尼斯的宫殿。

自然、历史和艺术结合成了异常优美的和音，特别在罗马。

下边就是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近郊的印象：“在这座城市里，当眺望近海、烟雾腾腾的维苏威火山和一直伸延到城市正中心的山峦时，无不众口称绝。凡是登上卡马利多里山岗，眺望城市、湖泊和大海的人，大概，不能注定他会在欧洲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哪怕略可与这里比美的风光。”

这位学者不但欣赏大自然、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而且还颇有兴趣地观察了这里的人民——忙乱的那不勒斯人、充满尊严的罗马人、自信的佛罗伦萨人和文雅的威尼斯人——的日常生活。他曾写道：“意大利人具有一种最自然的、毫无拘束的生活方式。”并且断定：“毫无疑问，意大利人的某些优点应是受惠于在优美、柔和的自然环境中长期定居的结果。”

当然，意大利的语言本身也吸引了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雅科布的注意力。他认为这种语言“特别美，特别柔软”，并且深信，“意大利语言居整个拉丁语之冠，是其中最丰富、最悦耳的语言。”雅科布在细听意大利语发音的时候，很自然，他对那些比别人更好地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诗人产生了最深厚的感情。他注意到了但丁的“形式的优雅”，彼特拉克的“愉快的温柔”，但是，凭心而论，他认为最重要的毕竟是卜卡丘，“无与伦比的故事叙述人”，“他完全掌握了意大利语的魅力”。

9月底，雅科布到了威尼斯。在3个月的旅游之后，经过韦罗纳、因斯布鲁克和慕尼黑，于11月回到了柏林。

旅行得来的印象使他扩大了对于世界的认识。在他给柏林科学院所作的报告里说道：“在意大利，一个具有开阔心灵的人能够享受三样东西：宏伟而壮丽的大自然，丰富的国家历史和分散在各地的大量的艺术遗迹。”

作为一个观察者，他不仅从审美方面对所看到的东西感到兴趣，而且还渴望从自己的印象里得出结论，从而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他曾对柏林科学

古罗马城市举行人民集会的场所。

彼特拉克（1104—1374）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

卜卡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

院讲道：“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得非常紧密，他们长期使对方遭受痛苦，现在终于应该言归于好了。”

意大利之行以后过了1年，即1844年夏，雅科布又向“大世界”出发了。这一次他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他乘船经过什切青达到了哥本哈根。渡海是很困难的。每一个船铺上睡十二个以上的人。由于船颠簸得厉害，许多乘客都晕船了。幸好，雅科布没有晕船。

下一个地方是哥德堡。在一个坐着五十个乘客的小船上，经过4天到达了斯德哥尔摩。雅科布在大学城乌普萨拉逗留了几天，现在，这里有一个因藏有他的手稿而出名的图书馆。然后，他又经过哥本哈根回国。

在这次旅行期间，雅科布会见了许多从事与他相类似的研究的学者：比如在哥本哈根他会见了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克里斯季安·拉封，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瑞典考古学家和帝国古玩家基利杰勃兰德。根据普鲁士外交官加连伯爵的倡议，在王宫里他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这证明，雅科布同弟弟一起专门研究北方语言和诗歌的著作得到了承认。

在这里同在意大利一样，引起他兴趣的也是大自然、历史和艺术。他把北方海的灰色同地中海的发光的蔚蓝色作了比较，并且认为，就是这样晦暗的颜色，“海上狂风大浪的力量”，也完全“没有失去它崇高的性格”。他还把北方国家微斜的坡岸同意大利多山的海岸作了比较。他观察了植物世界，曾注意到，更靠近北方的水青冈和橡树比不上白桦树和深绿色的松树。他觉得：“自然界荒凉而又僻静。”他也发现了当地景观的魅力：“瑞典是有着长而明亮的夏夜的国家，我很喜欢它的绿色的草地，草地上，到处扔的是像被南方一样炎热的天气摧残了的枯萎的鲜花。”北方的太阳放出更柔和、更疏散的光线，很是招人喜欢。

雅科布·格林还以一个历史学家有经验的眼光来看待北方一望无际的辽阔幅员：“对于一个德国研究者来说，期堪的纳维亚如同意大利之对于每一个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人一样，是一块富饶的土地。”

对他来说，古墓和刻有北欧古代文字的墓碑是历史的见证。瑞典国王葛斯塔夫·瓦萨、葛斯塔夫·阿多夫和卡尔十二世统治时期所遗留的一切东西都使他很感兴趣。卡尔十二世轻率大胆的骑士行为通过雅科布的描写以想入非非的惊险故事“纳入了他那个时代的平淡无奇的现实之中”。

在寒冷的北方，有重要意义的艺术作品虽说没有意大利那样丰富，但是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不少令人很感兴趣的古代文献。他参观了哥本哈根附近的弗里德里希堡，在乌普萨拉，赞扬了图书馆的巨大建筑和哥特式大教堂，他认为斯德哥尔摩的国王城堡是很有气派的。在艺术家当中，他特别注意雕塑家托尔瓦利德先，1840年为他的作品在哥本哈根建立了博物馆。

当然，雅科布不愿意放过在这里，在当地更好地研究地区语言的机会。在瑞典语里，他对于声音宏亮的元音和富有表达力的语言形式很感兴趣，因此，“瑞典和丹麦诗人的诗歌可以给人民带来喜悦和庆幸”。

然而，雅科布的思想一次又一次从北方转到南方，从白桦树林里露出一座座褐红色的房子转到意大利的花园，而且他都力求了解清楚它们特有的风光。他用以下的话对自己的印象作了总结：“这些北方人安静而庄重，他们能够而且愿意了解人的精神的全部深刻性。在麦洛连湖旅游，人们的举止安静而优雅。一条小船载着十个意大利人，可能由于喧哗和吵嚷而颠簸。同意大利人可以亲切地谈谈一切，同时可以欣赏他领会问题时的易于激动的感

情，不过只能谈到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他的矜持性和习惯就不允许了。在南方，一般的日常生活是在轻松和愉快的状态中度过的。我认为严肃的北方人都是些对生活具有更严谨观点的人，而且他们还具有意大利人所不能意料的欢乐。”

在这两次国外旅行期间，雅科布访问了许多图书馆。他曾说：“我的眼睛简直盯住了米兰、那不勒斯和乌普萨拉存在的所有哥特人的手稿。”

在完成这两次旅行之后，——同时这两次旅行是某种特殊的东西，而且不能够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雅科布的印象丰富了，发现了有关这些国家的许多新的东西。

他又回到了自己柏林的世界，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来到了弟弟和多尔特亨身边。回来时，他每一次都高兴地注意到，他的侄子们都长大了：16岁的老大盖尔曼已经比他高一头，14岁的鲁多利弗认为自己是一个敏捷的跳舞家，而12岁的奥古斯塔常常难于确定自己在两个中学生哥哥中的地位。雅科布父亲般地关怀他们，当两个侄子往家里带回优良的学习成绩时，他总是感到高兴。

1845年初，从沃利芬比尤捷利传来了不幸的消息——费尔季南德弟弟逝世了。他是一个作家兼书商。雅科布在给维甘德的信里悲伤地写道，这个弟弟“从来没有幸福过”。

同年春，从卡塞尔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小弟弟、艺术家路德维希·埃米尔第二次结婚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是在1842年去世的，这使他非常悲伤。现在由于新婚，他又得到了安静和家庭幸福。

在这个家庭里，死人和结婚接踵而来。他们都了解事情的过程，知道这里的惊慌和痛苦，不过他们不愿意更多地谈论这些。

40年代，兄弟二人住在提加尔登已经没有他们从前在卡塞尔所习惯的那种安静了。照他们的意见说，时常，甚至过分经常应邀到其他学者家里去作客，参加宫廷宴会，或到沙罗腾堡或者圣苏——西去听音乐会。就是在学生们为了对自己的教授表示尊敬而举办的纪念日或科学院邀请外国人或其他贵宾的时候，上述活动也不能拒绝。无论在“大”世界，还是在“小”世界，柏林都是过着紧张的生活。格林兄弟在社会上处于显要地位，他们应当遵守这个传统。他们很惋惜花费在上流社会招待会上的时间，但是，他们对此既不能轻视，又不能不恭，因为格林兄弟早已不是默默无闻的童话讲述人或者不足挂齿的一般学者了。

他们自己也常常接待客人，在这些客人当中，当然有贝蒂娜·封·阿尔尼姆、马尔堡的老朋友萨维尼、藏书家莫伊泽巴赫和同事卡尔·拉赫曼；有时还有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埃霍伦和当时曾经帮助他们搜集童话材料的封·哈克斯特豪森家的女士们；哲学家谢林、艺术家科尔涅柳斯、历史学家兰克也经常来访。来访的也有国外客人，比如，1844年秋，童话作家汉斯·霍里斯蒂安·安徒生访问了他们。

但是，书桌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他们一个珍爱的世界，他们仍然希望避开社会应酬，安心工作。

1846年初，雅科布已满61岁，而威廉已满60岁。还考虑什么呢！他们的父亲只活到45岁。他们许多小学的同学都已相继去世，而且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比较年轻。雅科布自己曾承认：“摆脱开折磨我们的那些操心事的时候不远了。”

这样的操心事之一，就是《德语词典》，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在柏林时期进行得非常缓慢。1846年1月3日，雅科布给维甘德写信说：“明天是我第六十一次庆祝我的生日。我已满鬓白霜，但精神抖擞，还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而且我真是渴望这样一直坚持到死，因为我还需要完成某些有趣的和我所珍贵的任务，如果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话。有些人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但是，他们常常只能打下一个基础，至于把计划进行到底和润色，那就谈不上了。”

雅科布写这些话时，想的是《词典》。“进行到底和润色”，这一点他未必能够做到，但是他毕竟想打下基础！

很快出现了各种困难，格林兄弟一直住着并且非常喜欢的那所坐落在提加尔登公园附近的住宅，对于他们一家来说，已经拥挤了——威廉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在多罗坚大街勃兰登堡大门附近四十七号找了一所房子，并于1846年3月搬了进去，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加尔登公园，而且这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可是，同年底，房东吩咐他们腾房，原因是由于他们一时疏忽，房租缴晚了。房东完全是以合同条款为借口，要以更有利的条件，把房子租出一层。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寻找住处、破坏已经安置好的设备和改变工作地点。这给好不容易熟悉了新环境的格林兄弟又招来了许多不方便和不愉快。1847年3月，他们就搬到了林克大街七号的一所房子，这是他们在柏林最后的安身之地。现在他们住的比从前方便多了。年老的雅科布住在比较暖和的几间房子里。搬迁之苦很快为好的方面——新房的优越条件所代替。在高大、宽敞的房间里，兄弟俩满可以舒舒服服地工作。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收藏的并且为两个人所共有的图书，摆在雅科布房间里沿墙的书架上。书架不太高，最上层的书不用登凳子就可以用手够到。书籍都包上了漂亮的彩色硬书皮，有的还包上了红色天鹅绒。这是他们心爱的藏书。他们常常在书架旁边骄傲地踱来踱去。威廉的儿子盖尔曼后来写道：“他们好像图书馆管理员一样，关心这些细心摆好的书籍，并且像对待那些值得倍加关怀的臣民一样对待它们。”由于书架没有接到天花板，就在书架上方挂了几幅用油料画的并且因年久发暗的画像，从这上面可以看到祖先们的严肃面孔。

在工作室当中，摆着又重又大的书桌、椅子和小书架，书架上放着随手使用的参考书。在书桌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石头镇纸。雅科布使用着一块贝壳化石，而威廉则特别喜欢水晶石。笔和墨水常备无误。在雅科布的书房里放着雕塑家拉乌赫雕塑的歌德的塑像。在威廉的书房里，则放着歌德的半身塑像。窗台上摆着鲜花。雅科布更喜欢桂竹香和天芥菜，而威廉则喜欢散发出清香的报春花。散步回来，兄弟二人常常带来一些鲜花和叶子，把它们夹在书页当中——留作纪念。他们很不愿意把自己的书送给别人，因为他们在书里作了很多记号，夹了许多记着笔记的小纸条，所以这些书永远放在手头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他们的小世界和反映在书里的、可以看到多少世纪的大世界。他们想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后的年代。不过他们只希望一点——摆脱大学的教师活动和退出熙熙攘攘的社会，以便完成自己终生的著作。不过，这样的问题不是一天所能解决的。

19世纪接近了中期。要求“统一和自由”的渴愿越来越强烈。保证基本权利的要求发出了更强有力的呼声。在许多政治集会和会议上——到处都在讨论全德国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抹掉。法院的官员要求制定全德国统一的法律，日耳曼学学者们则提出了统一全德国文化的要求。

日耳曼学作为一门科学获得了生命，并且在决定性程度上是由于格林兄弟而确立下来的。从他们的第一批作品问世以来，过了许多年，出现和成长了整个新的一代。格林兄弟的作品得到了像阿尔尼姆、蒂克和布伦坦诺这样浪漫主义大师的支持，同他们的学生一起加入上述人的行列里的还有其他作家和学者：乌兰德、盖列斯、拉赫曼、列涅克、什麦列尔和盖尔维努斯。对新学科发生兴趣的不仅是社会舆论，许多大学里也设立了讲座，制定了大纲。

由于历史——批判资料的出版和对语言学某些问题的研究，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日耳曼学家代表大会提到了议事日程，1846年，在法兰克福市过去的旧市政管理局召开了第一次日耳曼学家大会。在请帖上签字的除格林兄弟以外，还有达利曼、盖尔维努斯、乌兰德、拉赫曼、阿伦德、兰克和别泽列尔。

在庄严的恺撒大厅，聚集了许多卓越的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共计近二百人。

路德维希·乌兰德比雅科布·格林小2岁，由于经常出版《诗集》（1815年出第一版）和其他作品，如《瓦尔特·封·得尔·弗格外德》（1822年）、《古日曼诗歌史》（1830—1831年）等，而被认为是主要日耳曼学家，他在宣布大会开幕时说：“我认为，可以毫不拖延地选出大会第一届主席；我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我特别高兴地同意这个意见，就是要选这样一个人当主席：多少年来，德国历史科学的一切线索在他的手里连接起来，而大部分线索，其中还有诗歌的金线，又从他的手里伸延了出去。我的意见是以我们一致赞同的方式选出这个人来。恐怕不需要我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雅科布·格林。”

这个建议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雅科布被选为日耳曼学家第一届大会主席，于是他在社会舆论面前也就成了这一学科的奠基人。

他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主持大会的任务，并且谈论了“大会上所提出的三个学科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的问题，他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语言、历史和法学的研究工作。

他忠于自己的本行，开始他就对语言给予了应有的赞扬：“从很早的时候起，语言的敏感性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并促进了他的个性的发展。因此，对于一切高尚的民族来说，语言永远是一种最大的欢乐和财富，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一棵多么大而且又多么坚实的树，我们可以通过几乎两千年的历史来彻底研究它的成长和发展！”

他对于历史科学也发表了热情的意见：“如此热心和顺利地出版历史资料 and 解释这些资料来源的文献的时期，过去还不曾有过；这些历史资料发出的亮光还点燃了一门新的学科——历史编纂学，它证明了最大胆的期望是正

瓦尔特·封·得尔·弗格外德（约1160—1227），德国宫廷抒情诗中最杰的诗人。

确的。在我们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出现了对于历史的向往。”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法学问题大概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他谈到了罗马法的意义和早期德国法律的形式，表示赞成制定新的法制：“根据旧法和新法，可以重新制定牢固的祖国法律。”

雅科布的提纲决定了自己的发言和报告的主题。他把大会引出了狭隘的专业问题的范围，并使人们注意到整个德国的命运，最后，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在这个城市时开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个城市自古以来就是德国历史的中心。德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就是在这里，在法兰克福发生的。一千多年以前，卡尔一世经常从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街道上走来走去；人们经常把期待解决德国命运的畏葸的希望提到我们现在在这里开会的地方来。”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雅科布作了《论非精确科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把精确科学，即数学、化学和物理同人文科学区分开来，因为人文科学不能够把自己活动的成果表述为一种精确的、公认的公式。

威廉作了关于编写《词典》情况的报告。他叙述了奠定编写基础的一些原则，并强调指出，他们渴望最充分地掌握资料，同时希望在这个“活档案”里包括德国标准语全部词汇，他再一次指出，这部词典从路德的语言编写起，到歌德的语言为止，同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正是处在这部词典的开头和结尾的这两位语言缔造者使德语变成了“火一般的、令人喜爱的”语言。威廉承认，编写工作还处在搜集资料的阶段。但是他又满怀希望地补充说，对于搜集到的资料的整理加工，还有印刷的准备工作，在可望的将来即可开始。

他用以下的话说明了编写《词典》的目的：“我们不想填塞语言的源泉，因为语言从这个源泉里会经常得到补充和更新。我们不打算把词典编写成某种类似法律汇编的东西。我们想使语言成为由它在三个世纪过程中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形成的那种样子。语言的例子我们只能选自作为活的语言而表现出来的那些作品。我们的词典将包括某些词的博物学方面的知识。”

威廉把自己的思路发展下去，接着谈到了歌德，他认为，没有歌德的精神，就没有这部《词典》：“在语言中，歌德也是作为一颗新星出现的。他用敲打岩石的拐杖从岩石里打出了新泉，泉水流满了干涸的草地，草地重新开始发绿，又重新出现了春天的诗歌之花。很难确定他为提高和纯洁语言作了多少工作，而且不但通过细致耐心而又困难的探索，而且是遵循真正的爱好。在语言中最好和最经常地保留着的德国人民的精神，在他的笔下重新获得了真正和充分的自由。”

他一方面谈到他们编写词典的真正目的不只是为了保留和保存什么东西，同时表达了格林兄弟的夙愿——编写出某种新的东西：“不但使词典能够有助于科学研究工作，而且使它能够焕发语言的生命力。”

在日耳曼学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时，雅科布希望将来“以同样的尊严和泰然心情”进行科学研究，并且希望“在这一过程当中，不要失去我们已经感觉到的真正的、精神上的激动”。

“精神上的激动”不单是由于讨论各个专门问题和确定人们研究项目的新领域而产生的。在暂时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德国各邦统一问题，重新以更大的力量响彻了旧市政管理局的恺撒大厅。

1847年9月，在律贝克市召开了日耳曼学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雅科布又一次几乎是违背自己的意志被选为大会主席。这一次，来自中小国家

的人们，越过各邦狭窄的国界也不是为了作为一个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巴敦人、黑森人、萨克森和汉诺威人来发言的，而都是作为一个德国人来进行交谈的。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雅科布·格林作为同时铺设了通向三个领域——吾言、法学和历史——新道路的学者而受到了祝贺。他的回答简单而贴切，好像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是一个行将入木的人。如果大家将来还会记得我的话，那么我希望大家对于我的评论，就是我本人能够对自己作出的评论：我一生对任何东西的爱，都比不上对自己祖国的爱那样强烈。”

日耳曼学家代表大会洋溢着热情自由的精神。自由派都认为，这是走向人民代议制的第一步。人民积极参加国家生活的代议制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在两次日耳曼学家代表大会之间，于1847年夏雅科布到维也纳和布拉格旅行——参观了“大”世界的一角，重新充实了自己的回忆并且在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

律贝克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不久，雅科布即着手出版《德国语言史》他写这部书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有意地推迟了《语法》和《词典》的编写工作。1848年《语法》两卷本出版了。

很早以前，他就产生了从语言方面来阐明德国各族历史的愿望，他曾说：“我觉得，有必要去尝试一下，历史能不能从无害的语言研究中得到好处。”此外，他很想说明那些缺乏有价值的古代文献的日耳曼语言的性质。他知道，他是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小路，而且必须考虑到有失误的危险。关于这一点，他在前言里曾经写道：“谁不冒险，谁就一无所得。伸出手去摘新的果实，如果那里没有果实，那也不要难过。比如在黑暗中，天刚破晓，新的一天好像踮着脚尖一样就悄悄地走来了。我喜欢在大路旁边的小片褐色田野上徘徊，采摘隐藏在草地上的小花，而别人可能不会为这种花去弯腰的。”

“隐藏在草地上的小花”？雅科布这样写是过于谦虚了。他的书是在1848年激动人心事件的高潮中问世的。他在给盖尔维努斯的信里承认，他的著作是“渗透着政治的”，他谈到公爵们对于德国的“非法分裂”，并且认为，甚至《德国语言史》对于统一也是一个推动因素。

当时的德国地图由于许多小国家而分成了许多颜色。在这之前很久，就出现了风潮。人民到处表达了对于公爵和政府的不满。刚刚发明的电报向欧洲各国发布了一个消息：在巴黎，1848年2月24日，国王已被驱逐。并宣布成立共和国。革命的风潮也波及到了德国各邦。人们产生了一个愿望：他们也有胜利的可能。于是所谓“三月革命”就开始了。在革命过程中，革命参加者不仅希望得到任命忠于人民的部长的权利，而且要求武装人民、新闻自由、实行陪审审判，最后召开德国国会。

权力几经更替。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让位于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安二世。在奥地利，反动的公爵麦捷尔尼赫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政府被迫答应实行更为自由的宪法。最后，在德国各邦，大家对于实现统一和自由的长期理想终于有了信心。

那么，与格林兄弟命运相连的国家——普鲁士的情况如何呢？当1840年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邀请他们到柏林时，他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位君主身上。王国对于那些凡是在其他各地受到迫害的学者都给予支持。只是在解决宪法问题上，多少年来他同其他现在据有德国所有王位的那些尊贵的同行一样，推进得很慢。的确，在1847年4月，为了必须扩大铁路网而通过制定

新税法，他召开了统一的地方自治代表会。但同时，国王对地方自治代表会的演说里，又表示反对通过真正的人民宪法，并声称：“他任何时候也不允许把一张写满字的纸，塞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他说的“一张写满字的纸”就是宪法——根本法。然而，正是这个问题——通过宪法，才是人民所要求的！

国王的演说使许多人，其中包括格林兄弟简直惊呆了。1847年4月，雅科布在给达利曼的信里写道：“国王的演说使我感到苦恼，引起了痛苦的沉思；我想，这个演说会对大部分人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我一直对国王抱有希望，但是现在我深信，他不能正确理解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应当高度评价赖以自由和平静生活的宪法。没有宪法，所有其他计划和著作都是毫无意义和毫无用处的。”

巴黎1848年的二月革命在柏林得到了积极的反应。人民的不满情绪发展为流血冲突，3月18日，展开了巷战，人们建立了街垒。国王不得不在几千名士兵的帮助下保卫自己的城堡，城堡的周围组成了几公里的人环。代表们从宫廷里出出进进，可是国王怎么也作不出任何决定。而街上，枪弹横飞，鲜血流淌。

威廉·格林，作为巷战的目击者，对他的兄弟路德维希·埃米尔这样描写了这次巷战：“这次可怕的战斗是从3点钟开始的。大约两千或者两千五百名士兵在大街上同人民残酷地战斗了整整14个小时。排炮的轰鸣声，大炮的射击声和霰弹的爆炸声非常可怕，特别是夜里。有些地方起火了，如果枪炮声暂时停下来，就会听到可怕的“冲锋”声。当战斗已经越过我们这条——头顶着通航运河的大街的时候，倒是可以放心了，可是离我们这里不远，在安加利特大门附近，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然，我们整夜没有睡觉。”

之后，国王下了命令：军队调出京城，同时答应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宪法问题，并声称，他也渴望“德国自由，德国统一”。

研究和制定全德宪法的运动开始了。经某些邦政府的赞同，人民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1848年5月于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在黑、红、金黄三色旗下开幕的国民会议。代表们怀着确定人民基本权利和恢复德国统一的愿望来参加会议。

雅科布·格林也被选为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他来到法兰克福，感觉到，所有重要问题都陷入了外交式的空谈和冗长而又无味的争论之中，于是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延长了几个月的谈判使人民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受到了威胁。

雅科布想对代表们表达自己在研究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的观点。他面对大会，宏亮而又清楚地说出了每一句话：“我想仅就我有幸提出的条款说几句话。‘自由’的概念非常神圣而重要，我认为把它放在我们基本权利的首位是极端必要的。因此，我建议把草案的第一条改为第二条，而把具有以下内容的条款提到首位：‘全体德国人是自由的，德国不允许存在奴隶制度，恢复留在德国的不自由的外国人的自由。’这样，我使自由的权利产生了对自由的力量，因为不这样，空气本身想必是不自由的，而自由应当使德国的空气也变成自由的空气。”

雅科布·格林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他参加了将近4个月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由于无休止的争论，他越来越感到失望。赞成奥地利并入德国的“大日耳曼人”同所谓“小日耳曼人”发生了争论。

国民大会开始工作时所具有的那种奋发的热情在重重困难压力之下消失

了。有些代表被自己的政府召回，另一些代表擅自离去，其余的代表转到了什图特加特。1849年，符腾堡政府解散了国民大会。

失望的雅科布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斋。

威廉具有与哥哥同样的失望情绪，他写道：“当我乘火车回来，从远处望到柏林，由于心里不得不重新陷入日常的感受、需求和担心而感到一种压抑的感情：这就是现在整个德国的命运。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未来，好像是面对着一个关闭着的大门：好在是，我们不知道门里边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打开。”

但是，“大门”并没有向着光明打开。1849年5月至6月，在巴敦、普法茨和萨克森，革命遭到了镇压。在普鲁士，当局强迫人民接受贵族院和众议院。1850年通过了某种类似宪法的東西。在奥地利，革命活动也遭到了镇压。18岁的弗朗茨·约瑟夫登上了已经重新巩固了的国家的王位。国家恢复了专制制度的统治形式。凡是通过宪法的地方，这种宪法也不过徒具形式而已。现实使得“统一和自由”的理想烟消云散了。

格林兄弟痛苦地经受了自已政治希望的破灭。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科学活动，他们以新的力量投入了研究工作，并且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1849年11月，雅科布对科学院作了《论中小学、大学和科学院》的重要演说。雅科布说：“我们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坏、更悲观了。”正因为如此，未来的教育机关，其中包括小学教育在内，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愿能够把大部分的教育完全信赖地委托给社会机构，而这些社会机构的存在，不但对于家长而且对孩子们都是极大的幸福。他对于大学也给予了赞扬，认为大学在“明显地向前发展”。对于科学院，他作了如下的评价：“这是处在科学尖端的学者们的自由、独立的联合组织。”雅科布补充说：“关于科学，我有一个最高的概念。一切知识都具有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像决堤的洪流，也像熊熊烈火喷出的大量的火和热，只要存在着人类，折磨人的对知识的渴望就不能完全消除，尽管这事是时常发生的。”

但是，在雅科布重新完全献身于如他所说的“最高学府”之前，他曾又一次为政治所吸引。在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当中，讨论了所谓施勒斯维希-霍尔斯坦因问题。丹麦国王想通过制订全国宪法的途径把这两个公国并入丹麦。社会舆论表示反对。事情发展到了双方——一方是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另一方是丹麦军队——发生武装斗争的程度。久佩利的多面堡曾几度转手。最后，根据《伦敦议定书》，两个公国在解决最重大问题时服从丹麦。

雅科布·格林反对丹麦的主张，并且在1850年的德国语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现在人们无论在德国什么地方集会，他们的思想都转向了施勒斯维希-霍尔斯坦因。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忠于自己祖国的更激动人心的先例。虽然我们本身还在四分五裂，但是这些德国人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们应当以诚恳的心和热烈欢迎的态度来迎接他们。”

难道一个谦虚的学者能够改变政治事件的进程吗？政权已经转到了很少关心人民的抗议和愿望的人们的手里。多少年来，他越来越痛苦地看到德国各邦分崩离析。他曾在1851年写道：“我的一生的最大部分曾经充满过愉快的希望，可是在我的暮年我却痛苦地放弃了这种希望；不过我毕竟还保有勇气和信心，虽然这样做的根据变得越来越少了。”

雅科布怀着“勇气和信心”和他的弟弟一起致力于他们共同的研究活动

的末年著作——《德语词典》。

1848年，雅科布离开了大学讲台。威廉于1852年也停止了讲课。格林兄弟仍旧参加科学院的工作。

1850年，他们又恢复了《德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以便把它编完并准备把第一卷付印。雅科布当时已65岁，威廉64岁。按照现在的说法，他们都临近所谓“告老还乡”的年龄。但是兄弟二人仍旧充满着活力和劳动的决心。他们是献身于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研究家。65岁过后，雅科布立即写信给盖尔维努斯说：“我的健康情况，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威廉的健康情况，开始令人担心。”接着补充说：“我完全陷入了工作，我在那些没有完成的计划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几项新计划。”

从1838年正式宣布编纂《词典》和开始搜集资料起，已经过了20年。现在，由于越来越多地摆脱了日常事务和普鲁士京都的社会生活，因而兄弟二人全部检查了所收集的成千上万张资料卡片。

格林兄弟意识到，由于编纂《德语词典》，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早已考虑好的其他工作。编纂《词典》，这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劳动。雅科布曾向盖尔维努斯（他在《德国民族文学史》一书中所研究的是他比较感兴趣的课题）承认：“我所承担的大词典，像铅一般沉重地压着我，因此，我不得不放弃我更珍爱的东西。如果我什么时候曾经感到什么工作开始时的困难的话，那么这就是编写词典的工作；只要深入到工作之中，一切就会立刻感到轻松。”

但是，这一工作既然已经开始，格林兄弟出自纯粹道义上的考虑，已经不能不把它完成。第一，同出版社订有旧的合同，而这一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出版者已支付给他们的助手相当数目的款项。第二，兄弟二人了解，这部《词典》将是一部在意义上同他们的其他著作相等的巨大著作。根据他们的坚定信念，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是一项所希望的任务，而是一项真正必要的任务。

工作并不总是有兴趣的。在这里甚至连一些有兴趣的题目也没有。但是编写《词典》的精神本身要求事无巨细都要采取同样极其认真的态度。必须一个词接一个词地整理加工，而不能凭兴趣选择资料。况且助手们并不总是非常细心进行这种预备性工作的，因此，为了检查填到卡片上的资料，他们本人不得不长时间地查对出处。要找到助手们从中作摘录的原书，常常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这两位极其严肃而认真的学者——格林兄弟不满足于对材料进行快速而表面上的检查，准备付印的文本，从所有观点来看，不仅对于他们那个时代，就是对于以后各个时代来说，都应当是绝对可靠，绝对无懈可击的。

在50年代初，他们作好了头几卷付印的准备，这几卷将决定今后的工作方法和整个出版方向。

雅科布完成了第一卷的准备工作。于是他又像从前对待自己的其他大部头著作那样，根据准备的程度，一部分一部分交给出版者。出版社开始分册出版第一卷。第一册于1852年5月1日问世。同时代的专家们称这部《词典》为“时代之作”。这本书在书市上引起了空前的兴趣。

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彼得·安德烈阿斯·蒙克也走着格林兄弟的道路，在编写北欧古代语和哥特语的语法书，他表达了同行们的共同情绪，曾经写

道，对于他来说，看到“这部天才著作的真正开始”是一件极大的快事，并且表示祝愿：“愿上帝像往常一样赐给您力量，使您能够完成这座‘永久性纪念碑’！”

在 1852 年的莱比锡书市上，《词典》的头几册也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出版者索洛蒙·希尔采利通知雅科布说：“在书市上，词典是书商们交相谈论的内容，除某些怀有妒忌心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对这部书反映非常好。可以有充分根据认为，它是一部最大的合乎语言规范的时代之作。”

当然，雅科布很高兴得到这样的评价。不过，这算什么呢！这个异常爱好劳动的人自己也承认，在开始时他就不怀疑这部著作有这样大的容量。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在 1852 年秋写道：“我每天至少要有 12 个小时编写它（词典），可是，如果准备纪念 65 岁生日的话，这总能说明点问题！对于出版者来说，极端重要的是使读者相信，对于工作的考虑是严肃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半途而废。”

1852 年，威廉也加入了《词典》的编写工作，他承担从 D 开始的词条。按照雅科布本人的说法，他“单枪匹马”编写了第一卷。在这一卷里，正如他所宣布的，“没有一个字母不是他亲手写的”。同时，他还同助手们就所有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通信。而且在惧怕——工作可能超出他的力量和可能——和希望——将创造出某种真正伟大的东西——之间常常发生动摇。雅科布写道：“如果这部作品像它开始那样完成的话，那么任何一种现代语言未必能够包括这样大量的词汇和内容。”

格林兄弟又重新向社会人士和助手们提出寄资料来的请求。他们几乎失望地说：“这里的工作是无底洞。”

1852 年，盖尔维努斯给达利曼写信说：“格林兄弟一直在工作。他们被埋藏在这部词典下边。”

雅科布在 1853 年抱怨说：“但愿我的健康情况良好。近来我的脉搏变得不稳了，或者完全消失了，因此，我常常失眠。”可是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的作息時間。

1853 年 10 月，雅科布收到了出版者希尔采利寄来的第一百印张。他又得写《词典》的序言和编写原著目录表。

可是岁月不饶人。雅科布写道：“当然，乌兰德把我同囚犯作比较，是正确的。他本来还可以把我叫做病号，因为 1 年来心脏的老病感到越来越厉害了。”

1854 年，经过 16 年的搜集资料和准备，《词典》第一卷终于印成出版了。这是第一个完整的成果！只是序言和图书目录差不多就占去了一百页。正文本身共计一千八百二十四栏，它包括字母 A 和 B（到单词“Biermolke”）。

在《词典》的序言里，雅科布论述了正是在整个德国民族苦于彼此分离和隔绝的时候编写这部《词典》的必要性：“天上的星星应当用自己灿烂的星光照亮编写这部词典的起因，如果它注定要成功的话。我所以注意到这一点，是根据两个相近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一般是彼此相距很远的，可是在这里又因同样的内在原因——提高德国语文学和人民对本族语的敏感性——而接近了；这二者都为对祖国的强烈的爱和对牢固统一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所推

动。除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学之外，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雅科布充分意识到，在德国存在着许多国家的情况下，他的著作可以成为统一的象征。他说：“作为一切虚荣心和说大话的敌人，我敢于断定，如果这部已经开始的重要著作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它就会提高我们的语言和民族的荣誉，这会促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恳求：“亲爱的德国同胞们：无论你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你们属于哪一种信仰，请到这里为我们所有的人敞开着的本族古老语言的殿堂里来吧，请把它作为瑰宝来研究和珍惜，并且保持它吧，人民的力量和永久性的生命存在于这种语言之中！”

雅科布说，这部著作给了他本人许多更为深刻的知识：“我总是尽我的所能去努力了解德语，努力从各个角度去看它；我看得越远，我的眼光就越明亮，而且直到现在还是明亮的。”

当他碰到几乎是难以数计的“大批词汇”的时候，就坦率地把那些常常折磨他的疑难问题告诉读者：“我虽然已经年迈，但是我感到，现在还在我手里的一条条已经开始写的或者翻译的书的线索正在非常用力地拉着我。如果纷纷扬扬的大雪整天下个不停，那么整个大地很快就会被一望无际的白雪所覆盖；从各个角落和缝隙向我袭来大批词汇也在这样覆盖着我。有时我很想站起身来，把身上的一切抖落掉，但是后来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如果屈从于微不足道的诱惑而忽视巨大的收获，那确实是愚蠢的。”

一种生活和劳动已为时不多的感觉，为雅科布的情绪加进了一些悲观的色彩：他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他不但为新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再一次证明他非常清楚地了解德语发展史——考虑了很多，而且搜集了许多资料。他非常希望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交给下一代。就是在这种不协调和不安定的心情下，一位年近70的学者对于自己几年前已经开始的工作仍然充满信心。是的，他在继续编写《词典》。当然，已经谈不到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部著作。然而，雅科布完全有权来说：主要的已经做了——道路已经铺好。

雅科布希望，《德语词典》终将完成，“它将不会混灭，它将保留在后代的记忆之中”。同时，格林兄弟并不认为，自己每天的劳动只是狭隘的语文学任务。相反，他们认为，在当时德国民族的命运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它的语言和历史似乎能够最好地“表现出自己无穷的安慰力量”。

在100年以后，托马斯·曼把这部《词典》称作为“英雄的事业”，“一座语文学纪念碑”。他承认，“对我来说，这部词典不仅是一部参考书，而是一部心爱的读物，我能够整整几个小时埋头于这部读物。”

《词典》第一卷出版了，印数四千册，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在这之后，雅科布几乎立即着手准备第二卷。

1855年到了。雅科布在笔记里写道：“从新年开始，我已迈入了70，感到体力衰退，因此，我不大清楚还有没有力量完成这部过晚开始的著作。如果脑子还能工作，而体力不支，虽然也是痛苦的，但是如果体力健全，而脑力衰竭，毕竟更为痛苦。”

但是，雅科布常常感到体力不支，于是他尽力忘却自己的不安。他当时曾说：“我好像青年时代一样还能工作。”

雅科布称威廉是一个“永远的忧郁质者”，他常给雅科布招来不少麻烦。要使他摆脱这种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雅科布仍在努力地使他振作精神，消除他的忧郁。所以在解释“忧郁质者”这个词的时候，雅科布就

遇到了某些困难。好像认为由想象所创作的故事都有美好而幸福的结尾一样，倘认为这些故事的编写者——格林兄弟都是把一大群小孩召集在自己周围的那种无忧无虑而又经常笑容可掬的讲故事人也是错误的。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是从容不迫的、按部就班的，而且外表上也是平静的，但是在他们的内心却燃烧着不可遏制的、吞没所有天赋的火焰。

处于暮年的格林兄弟，还在精神奋发，继续工作。雅科布在完成字母 B 的词条之后，就着手搞工作量比较小的 C 词条，接着就是 E。威廉同时在搞工作量很大的字母 D 的材料。兄弟二人根据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协同一致地工作，但是每人对自己的资料各负其责。

出版者希尔采利在催稿，他希望尽快出第二卷。朋友们也在鼓励格林兄弟。达利曼写信对他们说：“我不能也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希望：这座刻有格林兄弟名字的庄严纪念碑将由为它奠定基础的人来完成。”

好像是作为对达利曼的回答，雅科布于 1858 年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理由，说明了《词典》为什么不能很快出版。而且这种缓慢的进度是早已注定的。准备付印的手稿共计四千五百一十六页，而且是四开本，这只包括头三个字母的材料。威廉也完成了字母 D 的工作。雅科布说：“在这里，每一个字母都必须自己亲手抄写，别人的帮助是不能容许的。”根据他的计算，还要抄写将近两万五千手写页。“前景真是吓人。”已满 73 岁的雅科布说道。

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中，其他的疑虑也在折磨着雅科布。由于让威廉研究语法和词典问题，他一次又一次责备自己：“他如果把自己的天才用在其他领域，将会有更大的效益。”虽然威廉对于《词典》的成就感到高兴，但是，雅科布认为，这一工作对他来说毕竟是一种负担。他如果研究中世纪的诗歌，比起非常仔细地研究和说明每一个词的来源和用法不是更好吗？

雅科布在没有编写《语法》的情况下，就开始编写《词典》，他对于这样做是否正确，这时感到怀疑。他说，我要是编完“这部《语法》就更加高兴，因为我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都应归功于它，但是我现在没有任何可能去编写它，我只好半途而废”，同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这部《词典》何时完成，遥遥无期。不过他应当继续编写，根本没有希望再搞其他著作。

然而，编写《词典》也有其好的一面，1858 年，雅科布写信对达利曼说：“请不要认为词典是一项成效很小的工作，并认为它不会带来任何令人愉快的东西。它迫使我去研究和发现许多‘微不足道的东西’，不然的话，对这些东西我连想也想不到，这对我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

1859 年，他写信对文学家维利马尔说：“在这一项工作中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它迫使你去了解许多一般说来是些遥远而又很少有人能够了解的东西。”但是，他又补充说：“有一个问题一直折磨着我：一个 75 岁的人，大概注定不能全部完成这部著作，而只能完成其中的几卷，其他的部分只好留在心里，虽然他倒是很愿意把自己想的告诉别人。”

格林兄弟是探路的旅行家和探索者，他们看到了前边最终的旅行目的地，但是不得不把路让开，并对其他比较年轻的旅伴说：“我们把道路指给你们，请你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下边谈的是雅科布非常了解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我们以前两卷为榜样已经指出了后几卷应当如何编写，而且这就足够了。归根结底，我们在编写第三卷、第六卷或者第八卷时死去，还不是一样？……”他本想把《词典》放下，研究他更为珍爱的书籍，以便聊

以自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卷也是分几册出版的。这一卷包括雅科布编写的字头 B 的后一半词条和 C 的全部，还有威廉编写的 D 的全部词条。

格林兄弟有点像那些中世纪的无名学者，他们坐在修道院的修道室里，在羊皮纸上孜孜不倦地抄写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作品。这些有教养的人们把一生的许多岁月花费在抄写手写本上，现在这些手写本成了我们图书馆里的骄傲。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自己，而仅仅是未来，是把这些甚至几个世纪所创作的作品保留下来。

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坐在自己“修道士的”屋里，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大概也并不期待赞扬或责备，鼓励或指摘。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只是部分地为现代服务，而其真正的意义只有在将来才能获得。雅科布写道：“我担心，只有对词典感兴趣的一些人，受到新材料的吸引，读过它的前几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读所有其余部分，而把它束之高阁，等将来有机会再读。苦闷的是，明明知道现代的读者不会读这种作品，知道我在某些条目中所写的最好的东西，也许经过 50 或 100 年以后，被那种有才能的、承担重新进行改变工作的人加以利用，尽管如此，我也不得不写。”

自格林兄弟死后过去 100 年了。他们的期望和理想得到了美好的体现。

当格林兄弟在整个后 10 年全力以赴地编写《词典》的时候，德国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事件。德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软弱性在所谓施勒斯维希—霍尔施坦因问题上又重新表现了出来。特别是这些变化涉及了格林兄弟的第二祖国普鲁士。

1857 年，毛奇任普鲁士参谋总长，大约 1 年以后，威廉一世任命他那患有不治之症的弟弟为摄政王。在他在位的时期，普鲁士的政治获得了信心。这是，第一次听到了俾斯麦的名字。他于 1851 年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盟议会公使，而于 1859 年派驻彼得堡。当时获得政权的人们已经注定仅仅在几年之后就会在德国民族史上翻开完全新的一章。

但是，在当时，德国有许多邦，这些邦的政府都在追逐其本身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德国问题，当然任何人也不知道。

雅科布·格林并不隐瞒自己由于现存的形势引起的“忧虑”，他以 74 岁的高龄写信给自己的老朋友维甘德说：“在我们的中年时期，曾经有可能希望发生重大变化的祖国问题已被提了出来；可是现在，当我们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一切都模模糊糊，无从得知，所以，德国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前途。”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雅科布的观点中没有出现一点作为一个市民的满意情绪，甚至完全相反，他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了。还是在 1848 年法兰克福国民大会上，他的一些发言就极不寻常，比如，当时他曾说：“对于我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贵族阶层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应当取消它的存在。贵族阶层，这是一枝没有香味、大概也是没有颜色的花朵。我们希望把自由置于一切之上。什么能够比这更高呢？对于贵族，我建议：废除贵族，废除市民和农民之间的一切法律上的差别，不得授予较高的贵族称号。我认为，这样贵族就会逐渐地自消自灭了。”

1858 年，在给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参加者、历史学家格奥尔格·瓦伊茨的信里，雅科布说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民主化了。”他痛心地说道：“我们祖国的命运多么不幸，我的心都撕碎了，因此生活好像也阴暗了。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寄希望于变革。只有坚决的行动能够有助于事业。”

当然，年迈的学者已经不能走上街垒，然而格林兄弟的著作却能“诚实地、尽自己的力量促进自己祖国的发展”。

他们一再在工作中寻找安慰。从报上了解到，在世界上发生日常事件的同时，也发生了各种改变整个时代面貌的事件。

报上经常报导各种新的发明：不是带脚蹬的自行车出现了，就是电灯突然亮了。人们在开始谈论钢铁铸造、蒸汽犁和阴极辐射。1860 年以前，德国铁路网的长度扩展到了一万二千公里。

在这个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纪元，艺术也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在里哈尔德·瓦格纳的《罗恩格林》（1850 年初次上演）里和捷奥多尔·施托姆的短篇小说《茵梦湖》（1849 年）里，又听到了浪漫主义的回声。像奥托·路德维希的悲剧《世袭林务官》（1850 年）和他的短篇小说《天地之间》（1856 年），古斯塔夫·弗赖塔格描写商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借方与贷方》（1855 年）和戈特弗里德·凯勒的《绿衣亨利》（1855 年）这样一些作品，则证明了新文学，即现实主义文学的建立。

应当说，格林兄弟对这些新作并不十分感兴趣。吸引他们的文学世界仍然是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歌德的作品。当他们有机会放下学术研究或者患病之后需要休息，他们更高兴利用这个时间去散步或旅行。

威廉愿意到乡间绿树成荫的丘陵地带，去呼吸森林中的新鲜空气，他很喜欢绍林吉亚森林区小城市的安宁闲逸：“从对面的松林里常常向我们吹来清洁、新鲜而又令人欣慰的空气。我们眼前到处是林中草地，在这里，人们常常晒白粗麻布。我们过的是完全安静的和离群索居的生活。”

如果说安静的乡村环境使威廉感到完全满意的话，那么雅科布和从前一样，则更喜欢积极的休息。1853年，他又一次来到瑞士，然后访问了南部法国，到达了马赛，又经意大利北部，到达威尼斯。后来取道奥地利，路经布拉格，终于在几周的旅行之后，回到了柏林。虽然已是暮年，但雅科布仍然信守自己的爱好，仍然珍惜优美的景色，他并没有失去观看和了解其他国家的愿望。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这个世界的美了。而且亲人越来越少了，1852年，他的弟弟卡尔去世了，他是一个商人兼大学德语教师，在贫困和孤独中度过了一生。在格林这个大家庭中，现在活着的老年人当中，除雅科布和威廉以外，就只剩路德维希·埃米尔一个人了。

威廉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盖尔曼在顺利地研究文艺史，鲁多利夫通过法学考试之后在柏林刑事法庭工作、女儿奥古斯塔已20多岁。威廉对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

当威廉70岁的时候，有一次说道：“我们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路上蹒跚而行；岁月消逝，过去的东西都抛到了后边，它好象一座座高山一样。山上散发着柔和的芳香，而且在早晨和傍晚的霞光中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词典》仍旧夺去他们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而且格林兄弟终于找到了重版自己一系列著作的机会，当然，这要求对这些著作进行重新审查。除此以外，他们还要为科学院写一些文章和发表演说。

1852年，雅科布·格林的《德语语法》第一卷和第二卷没有修改重新出版了。1年以后（1853年），他的《德国语言史》出了第二版。1854年，雅科布·格林的其他作品也进行了再版：《德国神话集》出了第三版，《古代德国法律》出了第二版，这证明了对他的科学著作的大量需求，在《古代德国法律》的新的前言里，雅科布指出，这就是他过去以特别愉快的心情写的一部书。

《语法》和《词典》的编写工作比他所想象的要困难和缓慢。他曾说：“因为《语法》和《词典》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力所能及的。”现在雅科布了解到，这两部著作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不能完成的。

是的，他开辟了走向研究工作新领域的道路，不过以后在这条路上走的将是别人。这是一个已经看到远处理想境界，但是没有力量达到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感觉。

雅科布在科学院发表的文章，属于50年代具有重大创作成果的作品。特别有两篇作品具有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出色的语言特点，这就是《论语言的起源》（1851年）和为纪念席勒诞生100周年所写的《论席勒》（1859年）。这两个报告在雅科布在世时就已几次再版并且译成了法文。

《论语言的起源》的报告远远超出了语文学的问题范围。这是一篇具有语言哲学精神的学术著作，在这篇著作里，雅科布·格林承认，语言的起源是“神秘莫测而又不可思议的”，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希望从这种神秘之中

弄清某些东西。他指出了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之间的差别：“动物世界的万类，先天具有永远不变的和千篇一律的声音，这种声音和人类语言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人类语言无时不在变化，它在一代一代地变化，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掌握它。在那种人类不需要训练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习惯的东西当中，除所有民族具有的同样的呻吟声、哭声和叹息声外，还有肉体感觉的所有其他表情，只有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和动物的声音列为一类。而正是这一点与人类的语言是不相干的。”

人类语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某种先天的、自身具有的东西或者是上帝的造物？雅科布·格林遵循的是另一种论点，即第三种论点，关于这种论点亚历山大·封·古姆鲍利德已在原则上指了出来，他说：“语言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

雅科布通过以下说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人类的语言既不是上帝的造物，也不具有先天的性质。先天的语言可能会使人变成动物，上帝赐予的语言可能认为人是上帝。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应当认为它是人类的、在其起源和发展中为我们所绝对自由掌握的东西，它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而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遗产。”

当然，雅科布认为，人类所掌握和发展了的语言只有上帝在人类的心灵里奠定这种基础和能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达到高度完善的程度。他在下边说明了这个意思：“语言是作为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作为这种劳动的成果，作为人们迅速而又缓慢地取得的成果出现的，同时，人们应当把自己思维——能使他们分开而又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东西——的自由发展归功于语言，人们应当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归功于上帝，而他们应当把自己在善与恶中所得到的东西归功于自己。好像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样，上帝把灵魂，也就是说话的能力给了我们，只有运用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开始思维，只有学会了语言，我们才能说话。思维和语言一样，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天性所固有的自由，就是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之上的。”

这是雅科布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在这里说明了“原始人类如何发明了自己的语言”；他在研究最早的语言的同时，也阐明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况”，论述了人类没有意识到其存在和力量的那种语言的特征，而且雅科布还提出了自己关于语言是由简单形式到比较复杂形式发展的概念。

雅科布小心地作出结论说：“正在遮掩着的语言起源的帷幕稍稍打开了一点，但是还没有完全打开。”

1859年11月，雅科布在一次隆重的会议上对科学院发表了演说，他这一次的演说是专讲席勒的。

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同法国的冲突遭到了一系列失败，在这之后过了只有几个月，分散的德国各邦对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矛盾本来就缓和了，现在则更加缓和了。尚未解决的德国问题在席勒——一位极力歌颂自由和祖国的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重新极其尖锐地提了出来。

雅科布·格林利用这个机会赞颂了两个魏玛——歌德和席勒。他坚持为这两位诗人建立永久纪念碑——出版他们的高质量的、学术版的文集。他说：“他们彼此并肩争取了光荣，而且在重新出现与他们匹敌的人物之前，100年将要过去了。”

这时，德国为了纪念席勒，到处响起了钟声，雅科布在谈到德国人民的政治期望时，大声说道：“在隆重纪念的时刻，但愿这个钟声能够把妨碍着

我们民族非常必需和迫切追求的统一的一切扫除干净！”

威廉·格林对科学院所作的报告，后来和他哥哥的报告一样，都在科学院的《学术论丛》上发表了。威廉的报告没有涉及那些迫切的问题。他对于较早时期研究的弗赖塔格的作品——动物故事的学术著作作了补充，并就《波利费姆的传说》，就中世纪的长诗《玫瑰花园》中的新的片断和其他作品的研究情况作了报导，因此，都是局限于狭隘的专门问题的。一篇有重要意义的论文是《论韵脚史》，将近二百页，后来出了单行本（1852年）。在这一篇论文里，他试图对于作为独特艺术手段的韵脚及其在各个时代诗歌中的运用进行详尽而全面的分析。威廉过去对民间创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可是这一次却转向了深奥的艺术。

后来，他又着手研究起童话。1855年夏，他去养病的时候，带走了《童话集》第三卷。在疗养区的安静的日子里，他对这一卷进行了改写。1856年，这一卷附有说明的《童话集》出了第三版。接着，他又完成了前两卷的修改工作。《童话集》的某些版本不但在语言形式上各具特色，而且其中所包括的童话数量也互有参差。据格林兄弟看来，许多故事都换成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内容。童话集的数量大大增加了。1857年，“大部头”的《童话集》第七十版问世了。

威廉以巨大的热情编写这部作品，经常运用一些更新的材料进行某些修改和补充。雅科布则为自己提出了向读者介绍“童话本质研究成果”的任务，此外，在“忠实于童话集”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补充。所以，《童话集》是格林兄弟一部共同的巨著。

1859年威廉对自己的女助手，哈克斯特豪森家的安娜·封·阿伦斯瓦利德女士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童话集的声誉：

“这是一个挺不错的男孩，长着一对漂亮的眼睛。开始他在雅科布那里，后来多尔特亨把他领到我的房里来了。他腋下夹着一本童话书，问道：‘可以给您读一篇什么东西吗？’于是他很好地、带表情地读了一篇童话，在童话的末尾有一句话说：‘谁不相信，就让他交付三马克银币。’男孩说：‘既然我不相信，那么我就应该交您三马克银币，不过没有人给我这么多钱，所以我不能立刻做到这一点。’他从一个菊黄色的小钱包里拿出了一枚铜币，递给了我。我对他说：‘我想把这个铜币赠还给你。’他答道：‘不，妈妈说，作为礼物的钱不能要。’”

当年老的威廉了解到，他们兄弟的书在孩子们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他感受到了美好的时刻。

1859 年秋，威廉在易北河休息之后回到了家里。看来，他的健康情况很好。他甚至打算出版弗赖塔格的《理解》一书的新版本，12 月 15 日打算在科学院作《无名诗 玫瑰花园 片断》的报告。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1 月底，在他的背上长了一个疖子。看来这没有任何危险，而且威廉还能够坐着继续工作。由于没有任何严重的危险。12 月 3 日雅科布到了汉堡，而 12 月 5 日接到了令人惊慌的电报，他就回到了柏林，看到威廉处于危急状态。外科手术已无济于事。体温升高了。12 月 15 日到 16 日夜里，威廉失去了知觉。雅科布在弟弟的床前值班，坐在他床头的安乐椅里，仔细地听看病人的呼吸，威廉又一次完全恢复了知觉。他看了雅科布一眼，但是他认为这是哥哥的肖像，并且认为，肖像确实同本人相像。全家人都在这里。威廉认出了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早晨，他说话好像处在半睡不醒状态，他发起了疟子。终于，照雅科布的话说，他得以“用无可指责的方式：说出了关于伟大和美好的最高尚的思想”。12 月 16 日，将近下午 3 点，他的肺部停止了活动，从而终止了他的痛苦。

在林克大街宅子里他逝世的那间书房，停着一具柞木棺材。威廉不久刚用过的书还在打开着。墨水瓶、笔、写字的纸张好像和他在世时一样，都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墙上挂着一些与死者有重要关系的人物的肖像。朋友们送来了许多花圈。

12 月 20 日早晨，送葬的队伍从死者的家里向圣玛特费伊教堂附近的柏林公墓走去。亲人、朋友、同事和许多学者跟在灵柩的后边。这是一个冷风飕飕的 12 月天气。雅科布走在两个侄子——盖尔曼和鲁多利夫之间，当下棺的时候，雅科布伏下身子，抓起一把土，扔到了墓里。在这可怕而又痛苦的告别时刻，他表现得很坚强。

他感到十分震惊，但表现得非常镇静，因为他知道，再过不久，死亡也会使他放弃工作。他在家庭日记里写道：“再过不久，我就会跟着我亲爱的弟弟去了，并和他并排躺在一起，就像我同他几乎整个一生在一起一样。”

威廉的死在德国所有各邦引起了深切的悲痛。报纸和杂志报导了这个消息之后，许多信件从四面八方寄到了柏林。“格廷根七君子”之一盖尔维努斯参加了葬礼。达利曼在信里写道：“亲爱的朋友威廉·格林的逝世使我感到震惊。”路德维希·乌兰德的反应是：“噩耗传来时，我面前正放着一本关于德国英雄传说的书，在我研究这一类文学时，这本书是我经常的、最忠实的顾问。”

盖尔曼在《沃斯报》报上写了一篇悼文。悼文里说：“如果说我们珍惜他的什么和失去了什么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孜孜不倦地为德国增光的人。他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他几乎满 74 岁了，已经有权退休。但是他从一本书到一本书，没有虚度过 1 天。童话故事、翻译的丹麦歌曲、出版的古诗、德国英雄传说、所写的一篇篇科学院论文，最后，参加编写庞大的《德语大词典》——所有这些都好像是为他脸上增光的一片片花圈上的叶子。如果要求他不知疲倦地继续从事这些工作，那就是不公正的了。他有幸感受到了完成任务的喜悦。当他刚刚因患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正好他所承担的字母 D 的部分完成了……

“但是他的亲人们现在所考虑的并不是这一切，而是别的事情，因为有

许多使我们念念不忘的、高尚得多的事情。他们现在都在回想他的温柔、安静、公正和亲切，他所具有的一切好像清爽、纯洁、任何东西也污染不了空气一样。他用以竭力完成自己各种著作的那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扩大到了各方面，从任何情况来说……威廉·格林都是一位真正高尚的人。他能够非常敏锐地理解童话中人民的幻想境界，并通过语言把它描绘出来……他非常善于在最短小的故事里很自然地表达出作品的本质方面。在他的那些严格的学术著作和普及性的文章里以及他的演说和书信里，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他那种始终如一的观察的欢乐和始终具有的那种成功表达这种观察成果的能力……世界失去了一个人，然而另外许多人正在走上他的地位。他的朋友感到快慰，并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少回想起他。但是，他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将更加纯洁。他所做的一切只会越来越集中在他的名字上。只要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语存在着，威廉·格林的名字就意味着是一个把自己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献给人民的高尚的人的名称。”

雅科布也镇静地、克制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同威廉告别。他说：“从童年时代我们就在一起，可是现在，曾经联系我们两个人的一切关系都永远断绝了。”

除了威廉不在隔壁屋里同自己并排工作之外，雅科布的生活表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同威廉的孀妇和孩子们仍然住在一起。他们对他的爱戴是他唯一的安慰。

在威廉的书房里，多尔特亨基本上都保持了他生前的样子。雅科布书房里的藏书常常拿到这里来。威廉的书桌好像是一件怪物，原封未动。

现在，雅科布在自己书房里寻找安慰。损失是沉重的，因此工作成了他唯一的安慰。在没有停止呼吸之前，他认为工作就是他的天职。

弟弟逝世后只过了几个礼拜，即1860年1月26日，为纪念腓特烈大帝诞辰，雅科布在科学院发表了重要演说。但是雅科布·格林没有谈普鲁士的历史，也没有谈正在变化的政治形势。由于他的年龄（他当时已75岁）以及弟弟的死，使他选择了关系每一个人的题目——《论老年》。

雅科布并没有局限于西方诗人和哲学家考虑和描写人的生活的那种方法；他找到了自己理解和表达老年人生活智慧的方式：“老年人应当为他注定要走最后阶段而充满感激之情；在接近死亡之时，他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当然，他也可以以隐隐的忧伤之情回首往事，好像在闷热的白天过后，傍晚坐在自己房子旁边的椅子上乘凉一样，沉思地回想过去的生活。一个比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长寿，而且只有年青的晚辈和他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孤独和被人忘却的人，同时会感到既忧且喜，忧喜参半。”

这些话好像是他个人的自白。他在下边接着说道：“有一点只是为老年人预先规定好了的，这就是一个单独散步。对于老年人来说，每次散步都会是一种满足……散步时每走一步，每呼吸一次，他都会从清洁的空气中获得生活力和休息。他可以安静而自由地进行思考：我根据自己的经验体验到——当我沿着漫长的小路在草地和原野上走着的时候，一些美好的念头常常在我的脑际突然出现。如果在家里有某些疑惑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在这里，它们就会在他逍遥自在的沉思中出乎意料地迎刃而解了。而在路上遇到朋友又是多么惬意啊！”

沉默片刻之后，他突然对可尊敬的科学院院士们谈起了一件最可贵的事情：“当我在提加尔登公园出乎意料地遇到从另一头迎面走来的弟弟的时候，

我感到难以形容的高兴；我们并肩走着，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在自己的演说里，他也找到了安慰的话：“老年人以极其虔敬的心情仰望着头上闪烁发光的群星，它们自古以来就这样照耀着，而且不久将要照在他的墓上。”

但是，对于这位伟大的老人来说，真正的安慰是工作。他问道：“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感到自己精确而又严肃的工作才能？为什么他不适合这种工作呢？他有丰富的经验，这是他一年又一年不断地积累起来的，难道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定要落到别人手里吗？”

作为一种特权，雅科布承认老年时思考的自由，认为，在行将入木之际，应当摆脱“恐惧和疑惑，应当说真情，并大胆承认它”。

在演说的末了，他又一次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他要求通过宪法，这种宪法“能够使大家有最大的保障，能够授予并保证每一个人不可侵犯的行动自由”。

他的宗教信仰是：“对于具有自由情绪的老年人来说，只有这样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它在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后，能够越来越接近上帝和自然的无限的秘密，这种可喜的接近有朝一日可能导致完全的融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雅科布好像是作为对本人的号召，结束了自己的演说：“只要太阳照耀着我们，只要日复一日地赋予我们的时光好像房檐上流下的水滴一样，还没有流完，劳动就要继续下去。”

科学院的会议结束之后，雅科布回到了他的工作室所习惯的安静环境之中。他从书架上很容易找到了所需要的最重要、工作必需的书籍，并把它们放到了椅子旁边的小书架上。书桌的旁边放着专门为他印的带有宽边的《词典》的样本。《词典》还没有装订，一页一页地放着一大叠。这样，雅科布可以取出任何一张，在宽边上为下次印刷进行修改。他也是这样编写《语法》的。

他早晨很早就开始工作，晚上很晚才休息。他工作不知疲倦。然而他不是一个隐居者：当报纸来了，他就休息。他经常关心的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各种报导。当多尔特亨或者侄子们来了，他就高兴地给他们读书里的一些片断。多尔特亨常常专门走过来，为的是让他休息，哪怕休息1个小时也好。有时雅科布接待远方来的客人。对他来说，不存在语言的障碍，因为他掌握了多种语言。有一次，来了几位日本客人，他就用荷兰语同他们交谈。

毕竟，他感觉最好的是在自己工作室，在自己的书籍中间。他柔情地爱着这些书，关心地护理着它们，他常常回忆起，他是如何一本本地得到这些书的。使他不安的是，在他死后，这些书将发生什么变化，只有当侄子们使他相信，他们将把这些图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存下来时，他才感到放心。

1860年2月6日，雅科布为《德语大词典》第二卷写了序言，他自己承认，这正是在“忧郁的思想”包围他的时候写的。同年，第二卷出版。

在序言里，雅科布对自己弟弟的创作态度进行了评价：“他（威廉）工作缓慢而沉着，但清洁而又整齐；如果他有时把材料交晚了并感到读者在焦急等待，那么以后，读者就会因为对材料准确而又系统化的叙述获得极大的喜悦。当我们有机会一起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从容不迫、和表达思想的优雅，总是胜我一筹。”

现在，雅科布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词典》工作的整个重担。在第二卷出版之前，雅科布已经在作字母 E 的词条了。印刷厂送了校样，雅科布进行了检查。他们把印好的页张寄给了订货人，而同事们也收到了《词典》的各个分册，他们得以欣赏这位老行家的新著作。是的，他在完成自己的责任，他对于自己多少年前所承担的工作信守不渝。不过，他知道，自己注定不能完成这项工作。但是，他坚信，已经开始的这部著作对于整个民族是重要的，对于历史是重要而又需要的，当然，如果后代能够把它进行到底的话。他认为这是德国民族统一的起源。

同时，王国科学院举行了同科学院成员威廉·格林的隆重告别仪式。除了雅科布·格林之外，没有邀请任何人参加这个仪式。雅科布放下《词典》的工作，于 1860 年 7 月 5 日对学者们发表了正式演说。

他开始说话时，声音稍微有点嘶哑，还停顿了几次，好像说话困难似的，可是后来，他的话比较流利了，又好像沛然的流水一样。大厅暗了下来，雅科布不得不时常把自己的讲稿转向窗子。

雅科布的这次演说为纪念卓越人物所作的发言的极好的范例，是世界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这篇演说是雅科布怀着对弟弟的深厚的爱写成的，它成了威廉·格林的真正纪念碑。雅科布叙述了他们的生活——“永远往在一起，有共同的财富和书籍”，——叙述了他们“研究祖国语言和诗学艺术的渴望”以及在他弟弟死后也经常“在梦中”同他在一起。他也没有忘记叙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别：“从小的时候起，我身上就有某种坚强、勤奋的东西，而他由于身体衰弱，这种东西比较少一些。以如同白银一样亮堂的观点看待我所不了解的世界是他的著作所固有的特点。他感到喜悦和欣慰是在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的时候，而对我来说，这种喜悦和欣慰却存在于工作本身。”

他详细地叙述了弟弟的科学活动，指出了他作为一个作者和出版者独自出版的那些著作。当然，他也谈到了他们的共同作品，这首先是《童话集》和《词典》。

他们的“兄弟”童话集在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使其他国家的许多研究者和诗人着手搜集童话。雅科布高兴地指出，他同他弟弟一起帮助完整的一门文学获得了新生：“幸好，一整条带有许多小魔杖的树枝落到了我们的手里，当我们用它敲打土地以后，我们在许多地方发现了传说和轶事的宝藏。”童话集是威廉最喜欢的一本书，在一生中他曾多次研究这部集子。

在演说结束时，雅科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只要我拿起《童话集》，我的心就感到压抑，我就痛苦地流出眼泪。我在每一页上都会看到弟弟的模样和他劳动的痕迹。”

关于《词典》雅科布也谈了几句：“几乎每一个人都懂现代语言——而且很少查字典。自从开始搜集和出版最近 400 年的书面文献以来，请问，在哪里和如何能够找到这里所必需的参考和辅助材料呢？虽然在最忠实的助手离开我之后，由首倡者本人完成这部署作的希望由于这部著作同一个人的能力不相适应而变得比一开始更加令人怀疑了，但是，我有充分理由来希望：我一个人做的工作越多，进行工作的结构、方式和方法就解决得越好，而且对可靠的学生和追随者们来说，这一工作也更容易理解，这对我是一个安慰。”

雅科布带着这种情绪继续编写《词典》。整个 1861 年，他日复一日地编写字母 E 的词条，又重新审查了送来的校样。一册接着一册编写，随后雅科

布又开始编写字母 F 的词条了。虽然他一直追求尽善尽美，但是却常常对于自己著作的初步成果感到不满，于是他得出结论，这种书只有在第二版时才能搞好。

第三卷于 1862 年问世，它包括 E 的所有词条和字母 F 到“Forsche”(灵活、敏捷、大胆、矫健)的词条。

之后，雅科布中断了几个月的《词典》编写工作——他不能忍受改变自己工作的对象，一段时间做别的什么工作，比如搞古代不着实际的法律知识。他希望把古代乡村法律的书面文献、法院判决或上几个世纪各种命令保留下来。雅科布写道：“我抢救了几千份这样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尚未成熟的、不受拘束的法律的一种自然表现，因为这种法律是在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风俗习惯，由人民的法院把它上升为坚定不移的、不需要国王任何最高立法的法律。”

雅科布在法律史方面发现了真正的“金矿脉”。在他死后，他所收集的文件经过修改于 1866 年—1878 之间先后出版，结果《法院判决》总共扩大到七卷。这又是他巨大工作能力的例子。

在作好《法院判决》第四卷出版准备之后，雅科布继续开始《词典》的编写工作。他从卡片箱里又重新取出字母 F 的卡片，校对引文，研究某些词的起源、用法和意义及准备出版的材料。他希望工作每天都有收获。

他越来越多地回忆过去的岁月。夜里常常醒来，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就回想起过去。有时，他坐起来，拉开窗帘，望着星空。或者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观察夜色在初露的晨曦中如何慢慢消失。

雅科布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和过去一样易于动身：1862 年秋，他来到慕尼黑，参加巴伐利亚科学院会议。这时他思绪万千，并在会上提出了准备编写德国中世纪历史续集问题。

1862 年 11 月 13 日，路德维希·乌兰德逝世。除了那些成为民族的，也是历史的剧本的诗集之外，他和格林兄弟一样，也在古代德语、传说和诗歌方面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作为一位晚期浪漫主义代表，乌兰德具有像威廉·格林那样的诗人的天性并且是一个像雅科布·格林那样的严格的研究者。多少年来，他是图宾根大学德语和文学教授并且和雅科布一样在 1848 年——1849 年参加了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雅科布和诗人有多年的友好关系。乌兰德的死也使他想起了自己正在接近的终期。

雅科布考虑：“我比乌兰德大两三岁，因此，我好像该先走一步，况且他（乌兰德）除了最后的病以外，差不多总是很健康，而我近年来常常闹小病。”

可是，任何东西也没有能够迫使雅科布·格林放弃工作：天天都可以看到他坐在书桌前。他自己承认，在他的心里，工作的愿望是“无穷尽的”。他说：“只要我活着，看来，工作的力量也应一直保持下去。”在 1862 年圣诞节，他陷入沉思并且清醒地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写道：“我的生活道路正在接近终点，而且越来越急转直下，在日常的劳动中，几个月的时间几乎就像几天一样转瞬即逝。我的健康情况正在恶化，而且常常招来许多麻烦，不过我的精力还没有耗尽，把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的愿望还是有的。”

新的噩耗从卡塞尔传来：1863 年 4 月 4 日，弟弟路德维希·埃米尔·格林于 73 岁时逝世。他是一个美术家，曾在许多幅图画和素描里描绘了格林兄

弟的世界和周围环境。

他还是卡塞尔艺术学院教授。他的逝世使雅科布陷入了深切的哀悼之中。

他脑子里产生了一项又一项新的计划，但是他没有把这些计划告诉任何人。只知道：他想为童话集写新序言，打算继续编写《法院判决》，考虑写一本关于德国风俗、习惯的书，还计划写一篇关于爱尔兰史诗《莪相作品集》的论文。雅科布对一篇专门研究动物传说的文章《狐狸列英哈尔特》写了评论，并考虑对歌德和卡尔·奥古斯特之间的通讯写评论文章。他还找时间阅读新的书籍。比如，在读过希腊童话集之后，雅科布又一次确信，他和威廉共同编写的读物《童话集》值得继续编写下去。1863年6月9日，当雅科布打开《德语语法》第一卷时，他了解到，这本书已经不能继续编写了。他翻了一页又一页，于是脑子里浮现出了愉快的回忆。他检查了自己亲手作的注和补充。在页边的日期下边，都有一定的名堂和不大的故事。这就是压干的叶子和花朵，而在其它书页之间既有彩色绦带，也有鸟的羽毛，还有几张画片：一张是妈妈从摇篮里把小孩抱出来，正在亲吻；

一张是在林间道路上的一个农民正在赶着拉载重车的马匹。而这里是雅科布用粉纸剪的一个小孩的侧像，他就把它贴在了《语法》的一页上。

1863年6月的一天，他在书上注上了日期，好像要同这部他编写10年之久，并且由此打开了通向新科学道路的作品告别似的。现在，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德语大词典》上了。

当他遇到空闲的时候，他就去散步、走到提加尔登公园又返回来。这时，可以看到他身穿灰色的夏季服装，宽边的帽子只是部分地掩盖他银色的长发，他左手放在背后，照直走着，只是稍微向前低着头。他走路不用拐杖，因此他总是避开越来越发展的柏林的喧闹地区。雅科布在提加尔登公园的小路上走着，对于公园安静闲逸的环境感到很高兴，他常常停下来，仔细听着树叶的沙沙声——从某个时候以来，他的听力开始不如过去了。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苦，因为用他自己的话，“从来没有感到过有同许多人打交道的要求”——对他来说，有一个知己的小圈子就足够了。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他在提加尔登公园遇到了一位熟悉的作家、《乡村的故事》的作者别尔托利德·奥埃尔巴赫。他们一边谈，一边并肩走了一会儿。奥埃尔巴赫后来回忆说，我觉得他“外表和气、温柔，其中寓有伟大而又包容一切的精神”。雅科布曾向他叙述了弟弟威廉的逝世使他陷入了何等孤单的境地。

散步回来之后，他又继续《词典》的编写工作。他正编到字母F词条的中间。这里的最后一个词是“Frucht”（果实），他曾为这个词写过一篇文章。他以“果实”这个词结束了自己多少年的《词典》编写工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整个工作……这是一种象征……

1863年夏，他是同威廉一家在哈茨山一起度过的。回来之后，他怀着“真正内心的喜悦重新开始了工作。但是，在1863年9月，他得了一次感冒，就病了。接着，他的状况似乎好转，并且也有了食欲；他整天躺在床上读书，甚至对未来的工作作了某些短记。

是苏格兰作家、翻译家麦克菲森（1736—1796）所发表的《芬歌儿·六古史诗》（1762）和《帖莫拉》（1763）两部古史诗的总称，假托是公元3世纪一位苏格兰说唱诗人莪相的作品。

死亡突然到来了；亲眼看到事情经过的威廉的女儿奥古斯塔（她当时 31 岁）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午饭以后，让他从床上稍稍起来一会儿，他独自走到窗前，坐到平常的藤椅上休息；他没有回答几个问题，就突然倒在我的怀里，然后爱抚而又温柔地看了看我；他非常苍白，我甚至想，他正是要死或者是昏迷了，可是这是右半身中风。他不能说话。夜里昏昏沉沉地躺着……体温升高了，心脏猛烈地跳动，好像马上要断裂一样。”

看来，他仍然处在清醒状态，好像认出了他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们。他伸出了左手，拿住威廉的照片，把它紧紧贴近眼睛，注意地看了看，然后放在面前的被子上。

他在 1863 年 9 月 20 日，晚上 10 点 20 分逝世了，照他的侄女奥古斯塔的话说，他“带着充满他一生的内心慈祥的表情”逝世了。

雅科布被停放在公用房间。那里摆着一个白玫瑰做成的大花圈，白色的挽带上绣着以下几个字，上款是：“献给少年儿童之友”，下款是：“孩子们敬献”。1863 年 9 月 24 日上午 9 点，他被葬在圣玛特弗伊教堂附近的公墓，弟弟威廉的身边。

当为两兄弟建立墓碑的时候，遵照雅科布临终的遗愿，没加任何称号，在生卒日期前刻着兄弟二人的名字：威廉·格林之墓雅科布·格林之墓

附录

俄文版序言

现在介绍的这本书，事实上是第一部俄文版的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详细叙述。对于这本书的需要很早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它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将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并且基本上可以满足广大苏联读者对于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个人生活和科学探索方面的兴趣。

本书为西德作家盖尔曼·盖斯特涅尔所写，他写了许多传记小说，其中包括卡米尔·杰穆连、弗里焦弗·南先、克里斯托夫·威廉·胡费兰德、路德维希·乌兰德等人的传记小说，此外还有青年、儿童读物以及诗集和翻译作品。2.盖斯特涅尔研究格林兄弟的传记材料和创作道路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除了这本《格林兄弟》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两本有关格林兄弟的书：《格林兄弟·插图传记》（1952 年）和《诗歌和语言世界的格林兄弟》（1961 年）以及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期刊上的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至于“梅特罗·格尔德维·迈邦尔”电影制片厂根据 2.盖斯特涅尔的电影脚本所拍摄的艺术影片《格林兄弟的神奇王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是那个时代博学多识的学者，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十分勤劳的奇才，一般人都愿意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天才的”形容词，并且对他们怀有深厚敬意，有时也许还掺杂着模糊的怀疑。

在回忆起拜伦、济慈、诺瓦利斯的时候，人们总会怀有一种沉痛的惋惜之情：这样具有伟大天才的人物的生命竟如此短促。而对格林兄弟来说，命运是比较慷慨的——威廉终年 73 岁，雅科布天寿 78 岁。对威廉来说，创作旺盛时期和衰退时期是互相交替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健康情况恶化造成的，而雅科布则不同，他的一生是不间断的紧张劳动和全神贯注的科学探索的一生，他的成果同威廉的成就在一起，使我们有权把他们兄弟俩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格林兄弟属于这样一类知名人士，大概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如果不考虑他们作为童话搜集者的声誉的话。格林兄弟的活动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包括许多而且非常不同的、乍一看来完全是不相干的领域，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和法律史、集德国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和研究日耳曼语语法，考订德国中世纪文学版本和探索人文科学的可靠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风俗文化和编纂德语历史词典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而且在上述每一个知识领域，他们的贡献都非常大。如果企图用两句话来确定雅科布和威廉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的作用的话，那么应当说，他们正好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科学——包括日耳曼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法学、文化和风俗习惯各个独立学科在内的日耳曼学——的奠基人。

盖斯特涅尔的这本书在风格上具有许多优点：一方面它相当广泛地囊括了包括大量生活细节和“次要人物”资料在内的传记材料，使画面达到了所要求的充实性；另一方面是它的统一的风格和叙述的连贯性。在我们看来，

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

诺瓦利斯（1772—1808）——德国诗人。

准确的事实重于虚构，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优点。叙述“格廷根七君子”事件和紧接着这一事件之后雅科布和威廉流放的几章是成功的，这是我想特别指出的，这几章具有戏剧性，水平很高，读起来也很有趣味。

叙述上的压缩有些不同寻常。盖斯特涅尔为了竭力使自己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读者所理解，明显避免了对格林兄弟的许多科学概念的叙述，更多地从生活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描写，谈论的都是雅科布和威廉生活中那些纯属人所共有的问题。这种艺术手法也是允许的，因为在世界文学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作者敢于更清楚地阐述自己的主人公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描写他们独立思考的紧张活动的话，那么人物肖像的描写就不必占那么大的篇幅（而在盖斯特涅尔这部作品中正好犯了这个毛病）。由于作者始终坚持自己所选定的途径，所以他有时专心致力于作品的通俗化，明显地简化了所叙述事物的实质和格林兄弟在许多情况下所遵循的动机。

在说明历史事件的时候，盖斯特涅尔对待这些事件的评价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叙述与1848年革命有关的事件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于这次革命的原因和动力，盖斯特涅尔作了错误的解释。黑格尔的名字只是在他取得大学教席的职位时才提到，可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作用却只字未提。盖斯特涅尔把艺术、文化、主要是文学的发展同19世纪迅速的技术进步相提并论的倾向也使人有些迷惑不解。同时也不能认为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全面描写的企图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场面有时看来残缺不全和模糊不清。

格林兄弟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在这篇序言里未必能够对它作出详尽的评述，而且这也不是这篇序言的任务；不过提供某些补充的、而且是盖斯特涅尔这部作品所缺少的或没有充分说明的材料看来是适当的。

当我们回想遥远童年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童话，它那色调鲜明的形象和情节构成了童年意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个世纪前，在欧洲艺术的古典主义时代，人们把民间童话看作是不屑一顾的、口头创作的“低级”形式（“保姆的童话”）。就是在文化发展的其他时代，也有不少人认为童话只是刺激，甚至在某种程度侮辱文明人类审美感的极其简单的半原始艺术形式。

这种对待童话的态度，使得很少有人关心童话的保存和研究工作。然而，童话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民间，存在于热心的、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说书人和无数的童话爱好者的记忆当中。

格林兄弟为保存古代口头和书面文学作品的思想所驱使，在搜集、抄写、部分校订和出版日耳曼中部德国童话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年——1815年）的两卷集是历史上第一部很可观的德国民间童话集。

当然，格林兄弟也有自己的先驱者。

在格林童话集问世前一百多年，于1697年，德国诗人沙尔利·佩罗不顾宫廷艺术的提倡者们对于民间口头创作明显的藐视态度，出版了《鹅妈妈的故事》童话集。这个集子篇幅不大，只有八个故事。整个读书界就是在那时熟悉了《小红帽》、《睡美人》、《蓝胡子》和《穿皮靴的雄猫》等故事的。

更晚些的时候，即18世纪后半叶，德国出现了第一批童话集。其中最出名的要算是德国作家约翰·卡尔·奥古斯特·穆泽乌斯的大部头八卷集的《德

国民童话集》（又名《德人民间童话集》）（1782年——1786年）。但是佩罗和穆泽乌斯的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不同，他们对童话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因此它们不应当认为是民间童话，而应当认为是文学童话。

极其细心和谨慎地对待自己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不但保留童话的内容、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故事的主旨，而且还保留它独特的语言形式，这就是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在出版童话工作中几乎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格林兄弟的作用不能仅仅归结为搜集和记录童话，虽然这本身已是巨大的劳动。盖斯特涅尔写得很好：格林兄弟在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他们所搜集的童话来源不同，涉及各种领域，所以，它们在语言的色彩、色调和生活真实方面，在叙述者的风格和语调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格林兄弟决定对它们进行某些校订，以便在不改变童话的精神和结构的情况下，使童话的形式取得一定的统一，并且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的童话都是由一个叙述者讲述的一样。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对于形式和风格具有敏锐的辨别力。并且具有很强的欣赏力。而格林兄弟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重要的任务。

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开始没有明确的目的，因为它是作为一部能够满足各类读者——既有普通的读者，也有科学和艺术工作者——需要的读物而考虑的。

格林兄弟同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有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向“海得尔堡小组”的浪漫派作家，首先是向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坚决劝告作了让步，使童话集具有了更大的文学性。关于童话集的工作，更准确地说，是由威廉承担的，而雅科布没有参加这一工作。

威廉所修改的第二版（1819年），在本质上不同于第一版。后来，威廉沿着“童话风格化”和使童话具有更大的表现力与统一的形式道路对童话集继续进行了文学方面的修改。

格林兄弟童话集以后的一些版本，在科学价值上一版比一版低。但是许多故事仍然保留了第一版的形式，其中有些故事，在语言上还保留了生动的方言色彩，每一个故事在何时、何地、根据何人的转述记录等，在童话集里也都有记载，而且威廉对1822年的版本还增补了注释，在这些注释里，除了对童话的例行说明之外，我们还看到表现出格林兄弟神话理论大致轮廓的理论概括。

对于酷爱民间口头创作的人和学者们来说，自然，对第一版童话集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但是，这一版很快就售完了，而且后来成了珍本。所以，在上阿尔萨斯的一个寺院里发现格林兄弟童话集的初稿的消息，对德国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发现这一珍品的经过是这样的：1809年7月2日，后来又一次，即1810年9月3日，布伦坦诺决定研究童话，要求格林兄弟把他们搜集到的资料寄给他。格林没有理由拒绝布伦坦诺的要求，于是在1810年10月底把手稿的副本寄给了他，并要求用完之后还给他们。但是，布伦坦诺没有把副本还给格林兄弟。多少年以后，他的文件连同手稿一起落到了爱伦堡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并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可是格林兄弟为布伦坦诺准备副本的那个主本手稿没有保留下来。童话集问世之后，这个手稿大概由于不再需要而销毁了。现在所说的“爱伦堡手稿”包括以下的故事：雅科布抄写的二十五个，威廉抄写的十四个，他们的朋友抄写的五个，还有几个传说和民间创作。这个稿本的童话集，1927年在海得

尔堡由约瑟夫·列夫茨出版，并于1963年在莱比锡由曼弗列德·列麦尔再版。

列宁曾经写道：“任何故事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尽管故事的荒诞性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好像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逻辑和事实、生活中的各种操心事和问题以及故意的“不正经”，但是，在童话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利益范围、各种重要制度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文化。尽管故事要保持“编写程序上的”简单性，但是在童话里不难发现反映贫与富，有权与无权之间发生对抗的最残酷的生活现实。

许多民俗学的爱好者都指出了格林兄弟的童话里存在着大量的“残酷场面”，这是难于争论的，但是也不必急于作出仓促的、表面上的结论（比方说，既然童话里反映了人民的精神，所以这种残酷性对童话来说是不奇怪的）。这种现象的性质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格林童话集里，这种现象即便比在其他民族的童话里多一些，但是，在日常生活本身的演变中，死亡、疾病、不幸事件、大大小小的灾祸、战争、天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窥伺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模糊的和无意识的对于存在着残酷性的感觉也就反映出来了。

有时使格林兄弟童话的读者不解的是，在这些童话中有些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复。比如格林兄弟童话集里的《灰姑娘》、《小红帽》和《睡美人》，这是从佩罗最有名的童话里脱胎而来的。应当说，相似的情节和主题的存在，对于民间故事，甚至对于所有民间诗歌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特征。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作为实证。在英国童话里有一个故事名叫《芦苇草帽》，它很像格林童话集里的《腼腆的姑娘》，在法国童话里，它像《西班牙国王的女儿》，在挪威童话里，像《肮脏的卡里》，在日本童话里则像《八件罩头单外衣》等等。斯洛伐克童话《没有手的女孩》与格林兄弟童话《没有手的女孩》完全相同。挪威童话《三个老大妈》和意大利童话《这就是七！》，与格林兄弟童话《三个胡桃》十分相似，英国童话《汤姆·蒂特·陶特》很像格林童话《三个纺线女人》，格林童话《农夫和魔鬼》非常像俄国童话《根和梢》，所不同的只是在格林童话里受骗的仍是鬼，而不是熊。这种现象的出现都还没有充分深刻和全面研究，这如同不同民族的童话史至今还没有研究一样。完全可能，在个别情况下确实有情节借用的现象，同样可能的是，不同民族，甚至彼此没有关系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以及生活情况的重复性在这里起了不少的作用。

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研究。格林兄弟是所谓“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同民族，甚至地理上彼此非常遥远的民族（如德国人和印度人）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的共同性是因为这种创作的起源存在着共同性，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种起源应当从最古老的、印欧各民族共同的神话中来寻找。

另一些学者企图把这种同源现象解释为民族和全人类因素的共同性以及童话情节的简单借用（“转移理论”）和各个种族与民族生物学上的相同性，并努力用民间口头创作的现实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的办法来找到某种解释。虽然在民俗学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学派常常代替另一个学派，并且都希望得到对这种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但是他们也只不过能够对此作出部分解释而已。

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命运同德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浪漫主义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中一种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它产生于欧洲 18——19 世纪之交。30 年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具有高度艺术的完美形象。

1789—1794 年的法国革命，给德国的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它鼓舞了这个时代许多作家革新生活和思想的自发力量，为自由和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已经暴露的犹如花岗岩一样坚固的旧社会基础不可靠性的敏感和对于新时代诞生的预感，尽管还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惊动了它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并且在这个由三百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国组成的“布头封建帝国”成了社会深刻变革的预兆。

德国人对于法国革命的结局有两种反应：一方面，推翻旧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和由雅各宾派宣布的自由与平等的叛逆思想对德国人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形成了新的，进步思想的新鲜气氛；另一方面，由于对革命敌人实行的革命恐怖，许多人在法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头几年就已经对法国革命的结局产生了失望情绪并对实现进步思想的可能性本身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是从耶拿的生气勃勃和有才华的青年文学家小组的活动开始的，（从而有“耶拿浪漫派”之称）。这些人从 1796 年开始经常在施莱格尔兄弟、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的家里集会。参加这一小组的有诺瓦利斯·路德维希·蒂克和同他要好的威廉·亨利·瓦肯罗杰尔、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以及自然科学家李特尔和斯泰芬斯。

耶拿浪漫派重新研究了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和德国革命的思想，渴望彻底从思想上解决人类；他们在考虑使人得到完善的可能途径时，已经不相信理性的无限威力，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因为他们本人看到，理所当然地完成了启蒙时代的法国革命的理性原则，如何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如何更多地相信了感觉和人的创造因素。他们认定具有天才的人的直觉比对世界合理的认识更好。艺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体系中具有特别的作用，他们认为，艺术是人类希望和人类文化最高的表现，而他们认为发展艺术天才就是通向人类完善最高阶段的道路。诺瓦利斯曾写道：“美好的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人们除了读文学书籍中美好的作品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读。所有其他的书籍都是工具，一旦这些书不再是有益的工具，人们就会忘记它，因而，书籍就不会保留很久。”¹对耶拿浪漫派来说，诗和纲领性哲学的结合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耶拿浪漫派的另一个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写道：“……一切艺术都应成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应成为艺术，诗和哲学应当结合起来。”耶拿浪漫派的主要主张的意义就在于号召努力达到天才人物所创作的艺术内在完美的高级阶段。照施莱格尔的话说，浪漫主义诗人所应

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2 卷，第 635 页。

据维纳·洛赫所著《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 年，第 133 页）称：“1815 年 6 月 8 日组成的所谓“德意志同盟”，作为德意志的统一的代替品，可是这个同盟没有统一的德意志，还仍旧存在着或多或少地各自为政的三十八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

讥笑奥匈帝国的绰号。

· 施莱格尔：《片断》，载《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列宁格勒，1934 年，第 171 页。

遵循的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以自由和对自由抱有信心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创造性哲学”，是独立进行思考的人所作的无拘无束的哲理性的即兴作品。根据浪漫主义作家的意思，正在产生的新艺术应当克服“古典艺术”的一切局限性，不但在描写对象上，而且在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应当成为包括一切的艺术，按照施莱格尔的说法，应当成为“进步的、包罗万象的诗”。

虽然耶拿浪漫派也认为天才是新艺术的特点，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这种艺术绝不是上流社会的、专供特等人物的艺术。施莱格尔指出：“对任何人都应当要求天才，同时我们为了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艺术的这种看法是同早期浪漫派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把人看作是有创造性的、具有潜在无限可能性和无穷无尽丰富性和深奥性的人。与耶拿浪漫派观点相近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耶尔马赫尔写道：“任何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都不相同。”“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像劣等金属放出银光那样的时刻，这时这个人不知是由于接近了高级的生物，还是接触了某种电光，常常被提得高于自己本人，并且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

可以把耶拿浪漫派的历史比作文学地平线短促而明亮的闪光。耶拿派的全部艺术和哲学遗产只限于屈指可数的几年之内，即从1798年开始，大约到1805年为止。德国晚期浪漫主义比早期浪漫主义有着较长的历史和更为多样的表现。埃伦斯特·捷奥多尔·阿马杰伊·霍夫曼的创作是晚期浪漫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的创作同耶拿浪漫派的美学有许多共同点，而且根据另一种并且非常独特的艺术方法体系在许多方面对它作了发展。所谓海得尔堡文学小组（“海得尔堡浪漫派”因此得名），在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参加这个学派的有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克列姆斯·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约瑟夫·艾兴多尔夫具有同他们相近的文学观点。在晚期浪漫主义当中，单独存在而与任何文学派别没有联系的有亨利·封·克莱斯特、阿达利别尔特·沙米索和后来的青年诗人海涅。

耶拿浪漫派崇尚富有天才的人的激情，而海得尔堡浪漫派则与他们相反。它向往人民性、古代遗风、“自然的”诗和民间口头创作——民间童话、诗歌和传说。海得尔堡浪漫派与耶拿浪漫派不同，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和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方面是拿破仑战争（1806——1813年）、德国被占领和民族屈辱，另一方面则是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团结。这种情况使晚期浪漫派，特别是海得尔堡浪漫派的艺术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艺术里有时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情调。

晚期浪漫主义（同一般的德国浪漫主义一样）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末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但是格林兄弟与他们在精神上的联系延续了许多年。如果说，就其思想体系而论，格林兄弟曾经并且一生都是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事实。

格林兄弟同浪漫主义的联系不只限于文学方面。这种联系在同等程度上（如果不是更大程度的话）也扩展到了他们的科学研究领域——语文、历史和法学。如果说晚期浪漫派决定了他们对民间口头创作和民族古代遗风的兴

· 施莱格尔：《片断》，载《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史》，列宁格勒，1934年，第171页。

H· 别尔科夫斯基：《德国浪漫主义》，莫斯科，1973年，第56页。

趣，那么早期浪漫主义则对他们的科学方法的形成曾给予重大影响。说出这一点所以重要，是由于语文学、一般的社会科学和整个历史学派的历史比较法的形成与雅科布·格林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认为必须用联系过去的方法进行研究，了解重大历史时期更替的规律性的见解以及关于各个历史时代的形成和继承的观念，都第一次得到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真正拥护。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即作为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有规律的运动来建立文学史的观点是那拿浪漫派重大成就。

格林兄弟的大学老师、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对于他们著作中历史方法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他曾教导说：“只能从过去了解现在。”

对于年轻的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来说，除了在学科中把历史的研究对象作为这一学派的基本戒律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要求摆脱习惯的概念，摆脱大胆的假想和权威的理论，而回到原始资料上来，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研究；第二，要求少搞一般推论和纯抽象议论，而更多地注意具体事实和细节，因为根据拥护这种方法的人们的意见，只有很好地了解“小事”，才能为可靠的概括创造基础。

注意事实、细节和小事，对于格林兄弟、特别是对雅科布来说非常突出。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使人感觉到他通过所有细节的个性和鲜明的色调去进行详细研究最小细节的渴望。在谈到自己发表的头几篇学术论文时，雅科布在1808年10月18日给萨维尼的信里，根据个人的经验强调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在论文中简单地用相应的研究结果发表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全部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在对细节进行从容不迫的和全面的叙述之中，然后才能够对自己的推论作出简单的总结；我深信，谁了解事情的细节，谁才能对这件事情说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那种冗长的推论和对我们的诗学与历史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一般叙述，我是完全反对的。”

德国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历史比较法的确立和整个历史学派的形成，是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明显进步；它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促进了许多新的科学发明，同时，后来这一方法的运用范围及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不难看出，研究一个项目，不研究它的历史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任何一门科学绝不仅限于历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上个世纪中叶，“历史比较学派”在许多社会学科当中逐渐退居第二位。

格林兄弟在实际搜集和保存德国民间创作方面进行了忘我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局限在童话范围之内。对于《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所给予的良好反映鼓舞了格林兄弟，他们决定把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于是把力量集中到搜集民间传说上。这项工作，老实说，他们在很早以前——几乎与搜集童话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1816年出版了一部篇幅很大的集子《德国传说集》。

什么叫童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什么叫传说，则未必尽人皆知。在《德国传说集》序言里，格林兄弟正好指出了民间口头创作这两个类别（或体裁）之间的差异。童话和传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很多方面都彼此

1850年10月31日，威廉·格林在柏林科学院为纪念授予（K·萨维尼法学博士学位50周年而举行的隆重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这是演说中所引的萨维尼的论题。

近似。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童话是自由的艺术虚构，我们就是从这种性质来认识它；而传说，不管说的是多么离奇的事情，都在追求历史的可靠性。传说与童话不同，它不但指出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能比较齐全地说出人物的名字和官衔。如果说童话的情节，通常是发生在“某一个王国，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的话；那么传说则不同，它是以相当真实的语调开头的，比如：“1605年2月，在亨利·尤利乌斯·勃拉温什魏格公爵的领地，离克维德林堡一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银矿产地》，第一六一篇）。格林兄弟指出，童话比传说更具有艺术性，更富有诗意。后者则更多的是历史。童话是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无需广泛的地理知识就可以了解它的情节；而传说则牵涉到一定的地理知识、一定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序言里还谈到，传说具有“比较简单、比较分明的风格的特点，它要求听众有更大的严肃性和更多的思考”。

下面是这个集子里的一个传说——《巨人的玩具》（第十七篇）：“多少年以前，在一个高山上，离瀑布不远的阿尔萨斯的尼杰克城堡，这个城堡的主人都是巨人。一天，有一个少年女巨人为了看看下边的情况，从山下到山谷，来到了吟斯拉赫。她看到农民们正在树林旁边的一块不大的田地上耕作。她觉得奇怪，就停下来，瞧了瞧犁耙、马匹和人，这一切她都觉得非常新鲜，就走到近处，说道：‘你瞧，真好玩，看来我要把这些带走。’于是她跪在地上，铺开围裙，把地上所有的东西用手扒到围裙里，然后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回家去，她跳上一个峭壁又一个峭壁，甚至那些人们很难爬上去的悬崖峭壁，她迈一步就去了。

“她走进屋来，这时城堡的主人正坐在桌子后边。他说：‘我的孩子，看你高兴得满面笑容，那是带回来的什么东西？’她马上打开了自己的围裙，让他瞅瞅。父亲问道：‘那是什么，在那里乱动？’女孩答道：‘这是我心爱的玩具。这样好的玩具有生以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开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样一样放在桌子上，有犁、农民和马匹。她在周围跑来跑去，高兴地不时拍着手，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有趣地来回走动，这时父亲说道：‘我的孩子，这根本不是玩具，我看你这是干了一件蠢事。去把他（它）们送回山谷去。’小姑娘哭了起来，但这无济于事。父亲非常严肃地说：‘农民不是玩具，你不要哭啦。小心地把他（它）们收起来，从什么地方拿来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农民不耕种自己的土地，那么我们这些巨人们，住在这个高高的地方，就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传说和童话一样，对世界和各种世界现象的认识充满了幻想和稚气；尽管这些传说具有离奇色彩，但是它们没有任何偶然性，它总是这样那样地涉及非常重要的人生问题，并且没有超出大家所熟悉和普遍了解的范围。传说和童话一样，反映出了人类这样一种永恒的信念（或者是这种信念的愿望）：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比如，有一个传说叫《瓦伊辛什塔因的宝剑舞》，这里叙述了瓦伊辛什塔因城堡的贵族如何靠行劫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资料，他们对附近的村庄实行掠夺性袭击，直到忍无可忍的农民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报复为止。

有一个传说谈到，在煤矿里住着一个穿着袈裟的、隐藏起来的魔鬼，他严厉惩罚了压迫矿工的工长（《住在山里的魔鬼》，第二篇）；另一个传说讲

了一个魔鬼怎么样带走一个有钱的姑娘，这个姑娘曾答应嫁给一个穷人，可是后来又毁约了（《魔鬼带走失信的姑娘》，第二百九篇）。魔鬼还惩治了一个昧着良心欺骗顾客的饭铺老板（《魔鬼的马掌》，第二百八篇）。传说“警告我们防恶，而在出现善的时候，又使我们充满喜悦”。格林兄弟认为，这就是“德国民间传说的本质和美德”。

传说和童话一样，在日常生活事物和概念方面有一种认识世界的视野的局限性，并且以天真的神话般的观点看待世界。德国的传说有许多超自然的现象（比如，已经死去的妻子又回到丈夫身边，而且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生活，甚至还生了孩子，——《帕萨乌的约翰》，第九十五篇；读者还会看到一个能够砍下许多脑袋，而且还能把它们还原的人，——《百合花》，第九十四篇），在传说里，会见到许多地精、幻影、人鱼公主和魔鬼，等等。

人民生活中完全异乎寻常的生活情节或生动的风俗画面有时成为传说的基础。比如《地界之争》（第二百八十七篇）的传说就是这样：“在维利姆斯豪津，离缪恩坚不远的黑森的一个村庄，关于两个邻近的村社之间的地界应该划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争论。谁也不能准确地把它说清楚。于是决定抓一只虾，把它放在地里，争论也是因为这只虾引起的。虾从什么地方爬过去，就在什么地方树立界石。可是，因为它爬得弯弯曲曲，结果地界就很弯曲，并且有许多拐角。所以直到现在地界还是这个样子。”

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集》分两部：第一部专门讲与地点有关的传说（也叫地理传说），第二部是讲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传说（相对地叫做历史传说）。历史传说也和地理传说一样，在色调上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这些历史传说讲到了哥特人、匈奴人、朗哥巴尔德人和法兰克人，讲到了国王阿尔鲍因、卡尔、路德维希和柳特普兰德以及皇帝亨利和威廉，这里也有关于齐格菲和天鹅武士以及马丁·路德的传说。这里可以把关于朗哥巴尔德的国王阿尔鲍因和他的妻子罗莎蒙达的有名的传说（第四百篇）举出来作为历史传说的一个例子。

“格尔德族的国王图里先德死后，他的儿子库尼蒙德继承了王位，他破坏了从前与朗哥巴尔德人缔结的和约。可是朗哥巴尔德的国王阿尔鲍因粉碎了好战的敌人，在战斗中打败了库尼蒙德本人，并用他的头骨为自己做了一个大酒杯。他还决定把一个女俘虏、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达据为自己的妻子。到处在宣扬阿尔鲍因的功勋和荣誉，不仅朗哥巴尔德人，还有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日耳曼许多其他民族都编了歌曲来赞颂他的名字。而且当时许多能够精巧地锻造武器的人们也都在讲述他的名字。

有一次，阿尔鲍因坐在维罗纳宫，正在吃饭，他吩咐王后把酒倒在用她父亲的头骨做的大酒杯里，并且对她说：‘同你父亲一起喝酒！’听到这话，罗莎蒙达非常痛心，但是她控制着自己决心报仇。她来找自己的同乳兄弟、国王的持枪侍从赫利米希斯，请求他杀死阿尔鲍因。但是赫利米希斯没有同意，建议她只能把这件事情委给勇敢的武士别列杰奥。然而忠诚的别列杰奥坚决拒绝行凶。于是罗莎蒙达只好耍了个计谋，偷偷藏在与别列杰奥暗中来

古代德国民间史诗中的英雄。

13 世纪末德国骑士史诗中的主人公。

与哥特人有同源关系的德国部族的一个分支，6 世纪时被朗哥巴尔德人征服。

往的自己的女仆的被窝里。别列杰奥很快就来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同王后过了一夜。犯下罪行之后，罗莎蒙达就问别列杰奥，他把她当作谁了，当她听到他的女朋友的名字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弄错了，亲爱的，这是我，罗莎蒙达，现在，你既然已经干出了不可挽救的事情，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杀死阿尔鲍因，要么死在他的手下。’这时别列杰奥明白了，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这一杀人行为，就答应杀死阿尔鲍因。

一天中午，当阿尔鲍因睡觉的时候，罗莎蒙达吩咐城堡里保持安静，并把所有的武器都拿到远处，可是她把阿尔鲍因的剑非常牢固地拴在了他的床上，既拿不下来，也拔不出鞘来。这时，她按照赫利米希斯的建议，把别列杰奥放了进来。阿尔鲍因醒来之后，看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他本想拿出剑来，但是没有成功；他就拿起了一条板凳，用它顽强自卫了一会儿。但是，这个曾经战胜过许多敌人的、勇敢而又强壮的国王面对自己妻子的机智和诡计，终于成了一个无力自卫的人。最后，朗哥巴尔德人一面哭泣着，一面唱着哀歌把他埋葬了。他的坟墓紧靠在进入国王城堡的台阶旁边。后来，基齐利别尔特公爵为了取出剑和装饰品，打开了这座坟墓，事后对人说，他看到了阿尔鲍因。”

对于保留和普及像传说这样一类非常独特的民间创作来说，格林兄弟这部集子的意义是丰重大的。但是，这部集子的命运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命运相比是不幸的。虽然在格林兄弟的这部集子刚刚问世之后，其中的许多传说获得了真正的声誉，成了可以列入文选的读物，并且出现了许多模仿者，不过对它的一般兴趣，毕竟不如对童话集那么大。《德国传说集》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相比所保持住的，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再版而已。

1815 年至 1819 年间，在雅科布·格林的创作生涯中所发生的转变是今人吃惊的。13 年来，他一直搜集民间童话。可是，从《童话集》第二卷问世之后只过了 4 年，就出版了另一部巨著——《德语语法》。在这部著作中，他极为详细和系统地研究了从歌德时代开始的德国语言史和语法，而且最详尽地研究了它们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于是童话作家雅科布突然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大师，并且以为自己多卷集的著作使整个学术界为之惊叹不已。

在德语研究史上，他的《德语语法》是一部崭新的著作，它取材内容广泛、论述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部著作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不是格林兄弟那个时代的德语，而是德语形成的道路和它发展的各个主要时代。

雅科布·格林根据已经确定的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原则，运用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语言材料——歌德语言、古代的、中古的、近代的高地德语 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包括古冰岛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其他多种语言。这部巨著作包括德语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构词法学和词汇等方面问题，而且雅科布·格林对于每一部分都进行了许多最有价值的观察和有趣的发现。

关于雅科布·格林在编写《德语语法》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和他对科学的功绩，亨利·海涅说得非常好：“……雅科布·格林对语言学所做的工

德语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古代高地德语在第 8 世纪渐渐形成，它是从西方日耳曼语分化出来的；到 11 世纪转变为中古高地德语；近代德语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

作比黎塞留时代以来的整个……法国科学院做得都多。他的《德语语法》是一部巨大的作品，是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在它的拱门下边所有德国民族好像一个大型合唱队一样，每一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言，唱出各自的声音……为了搜集这些丰富的知识，并且用无数的引文把这些知识联系在一起，一般人的生命力和忍耐力是不够的。”

在《德语语法》的序言里，雅科布·格林叙述了自己编写这部著作的基本原则。他在证实自己与当时这一学科中广泛流行的“哲学”解释对立的态度时，写道：“我是语法学科中一般逻辑概念的敌人，这些一般逻辑概念只是从表面建立了各种严格而完整的定义，但是却妨碍了准确的观察，而我认为这种观察是语言学的灵魂。谁不承认观察，不承认这种观察的不可争议的结果……并且嘲笑任何理论，谁就不能洞察不可思议的语言的精髓。”序言接着指出：“必须用充分列举那些所有与语言或现有的语法规则有关例子的办法，才能够使语法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这不是为了细节本身而堆砌细节，而是注意到对这些例子的直接观察具有完全难以估量的优越性和可能性。”

很难判断，雅科布·格林《语法》的哪一部分是最成功的，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他的著作中语言部分最为宝贵。对德语历史语音的研究如此详细、认真和系统，这在格林之前是没有过的。

在研究日耳曼语族的语音结构的形成时，雅科布·格林除了出色地掌握研究对象之外，还表现出了对语言的惊人的敏感和杰出的综合才能，这种才能至今还使研究德语语言学的最有天才的语言学家感到震惊。因此，企图列举雅科布·格林只在语音部分取得许多新的观察结果是没有意义的。他依靠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季安·拉斯克的著作，更清楚地确定了辅音“演变规律”，即德语中的一定的辅音群与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印度语、斯拉夫语以及其他印欧语言中的一定的辅音群相对应的规律。雅科布·格林还对自己的历史《语法》的其他部分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比如他把动词划分为强弱两部分的原则也扩大到了名词变格。雅科布·格林认为，在与他的《语法》有关的其他问题当中，方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方言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研究，而不应把它们看作研究标准语的辅助手段。雅科布提出了自己的推广和消除方言的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例如，如何在古代语言中确定方言的界限和根据哪些语法成分能够最好地确定方言。12—13世纪德国有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雅科布的回答是肯定的。

雅科布·格林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写成了这部《德语语法》；把这样一部巨著不停顿地编写下去，这就要求他付出巨大的紧张劳动，所以他已经没有力量重新阅读已经写出的东西和进行校对。雅科布本人十分清楚，他的著作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准确的地方，而且懂得，本可以把它写得更严谨一些，把许多方面讲得更透一些。并且应当对德国学者卡尔·拉赫曼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在这一困难时期，是他给了雅科布坚决的道义上的帮助，他坚信，雅科布将创作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尽管他对自己的要求过分严格，但这部著作中的某些差误丝毫不会掩盖它的无可相比的优点，而且这些差误以后将由

黎塞留（1585—1642）——法国国务活动家，专制制度最大代表人物。

引自《海涅文集（下卷集）》，第六卷，莫斯科，1958年，第282页。

他的学生很好地纠正过来。

最后，指出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即对雅科布·格林本人来说，编写《德语语法》的意义并不限于解决纯粹的语言学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多么重要。在雅科布和他的弟弟威廉看来，研究语言及其历史也是研究和掌握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途径。

雅科布·格林在《语法》之后的下一步是对《德国神话》（1835年）进行有重大价值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终于实现了雅科布·格林的宿愿：对德国神话进行改造和解释，并且恢复哪怕一小部分它在德国古代曾经享有的、按照格林兄弟的意见也完全是理应得到的声望。

格林兄弟为自己提出了全面研究过去的传说和完成这方面的著作的长期任务，《德国神话》就是他们根据这一任务所考虑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最重要著作之一。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写道：“神话是传说的主要基础，也就是相信神……没有这样的神话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传说，这就如同不知道过去发生的具体事件，就不可能想象历史一样。”

“神话”一词一般具有以下两层意义：第一，这是任何一个民族传说（神话）中所包含的对世界神奇认识的总和；第二，这是研究神话的一门科学。根据上下文来看，雅科布·格林兼用了这两个意义。

雅科布·格林编写这部著作具有两个主要目的：1. 一鳞半爪地搜集与古代日耳曼人神话观念有关的零星资料，并使它系统起来；2. 说明日耳曼神话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同源关系。

神话是哲学、历史——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研究的一个独立的部门，研究哲学的兴趣是在浪漫主义时代才真正产生；这种兴趣无论在早期浪漫主义当中，还是在晚期浪漫主义当中，都是十分浓厚的，虽然二者完全不同。但是不管怎样，正是浪漫主义对于不同时代和民族的神话，其中包括日耳曼古代神话，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格林兄弟研究神话的意向也正是得助于德国浪漫主义者。

德国浪漫主义者在从事神话研究的过程中，克服了古代——启蒙时代——所存在的对神话的鄙视态度。启蒙思想家们把神话看作是有意的捏造，狡猾的术士和喜欢杜撰的诗人们所散布的无稽之谈和不可靠的传说。

因此，所有发表自己第一批神话作品的人，不但要反对已经确定的对神话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是鄙视态度，而且要战胜学术界所存在的某些保守思想和抵制作用。后来，1842年2月3日，雅科布·格林在柏林科学院所作的《谈谈我所发现的德国偶像崇拜时代的两部诗集》中，说道：“德国的神话命运多舛，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取得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可能。”不过，浪漫主义者研究神话，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把神话看作是与神的启示相近似的人民智慧的神秘而又完美的化身。

神话问题在耶拿浪漫派——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大概主要是谢林——的美学理论当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有一种理论认为，神话可能是某一个人杜撰和捏造的，谢林坚决否定了这种理论。根据谢林的意见，神话，这是表达人民自我意识的唯一可能的古老方法，而且人的意识本身是产生神

雅科布·柏林：《德国神话》，格廷根，1835年。

谢林在《艺术的神话》（莫斯科，1966年，第113页）这部著作强调指出：“神话传说不能想象成是有意地……创造的……”谢林在另一部著作《神话的哲学》中对于神话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话形式的根源。他认为，神话是同各个民族的出现，即同统一的神的实质的分解一起出现的，并且神话本身就是神的实质的残留现象。

谢林关于民族精神是许多物质生活现象的基础和根源的思想给了格林兄弟，首先是雅科布的神话构想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现在，自从雅科布·格林的《德国神话》问世之后，在西欧的语文科学当中把神话看作是“无意识的创造精神”和某种“集体精神”的产物的观点、同时也是人民生活本质表现的观点就彻底确定了下来。

雅科布·格林的作品并不是用古希腊神话风格所描写的日耳曼奥林普山区居民风俗和面貌的德国古代神话集，而完全是科学院的专题论文。在这里，如同自己成熟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雅科布利用了大量的实际材料，根据各种各样的民间和历史的资料，其中包括希腊、罗马许多作者的作品，兴致勃勃地着手进行令人目眩的语言研究和稗史研究。他耐心而又认真地研究了日耳曼诸神的系谱，把它们同古希腊罗马、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方神话中相似形象进行了比较，描述了各种神在面貌、“使命”和“性格”上发生的主要变化，指出了德国不同民族对各种神理解上的差别。

引起雅科布·格林注意的不仅是神和英雄，而且还有以各种方式使古代德国人的幻想体现为超自然性质并在其世界观和自然观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切。其中有几章是专门讲天空和星星，白天和黑夜，世界和灵魂，树木和动物，妖术和幻影以及病和死的。在这里，雅科布使古代的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斯拉夫及拉丁语系各民族的宗教风俗和迷信占有重要地位。

改造德国神话这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由于与德国基督教化有关的情况而更加复杂了。因此，以基督教代替多神教远不是顺利的。

基督教是作为与多神教相敌对的宗教引进德国的，这种宗教用老百姓所不懂的拉丁语举行自己宗教仪式。老百姓举行自己习惯的仪式和相信日耳曼当地诸神都被宣布为犯罪，而多神教的庙宇和圣地必须破坏，或者至少应改为基督教堂。在德国，虽然新教代表人物的这种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十分彻底，而且时常把暴力同局部的退让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其目的是消灭多神教的文化，而且这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曾经指出：“某些民族越是长期不接触新教，多神教世界观的历史就越容易写。”

因此，在恢复古日耳曼神话的过程中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之外，还要善于把从多神教时代就以固定不变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各种因素同多神教和基督教相互影响过程中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因为在互相影响过程中，多神教诸神的威信受到了破坏，并且在日耳曼神话里变成了“下等”人。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写道：“在本书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章列举了许多使多神教时代的优美传说粗俗化和仿造化最典型的例子；爱尔菲和巨人变成了（基督教使他们变成的。——编者）魔鬼，女预言家变成巫婆，甚至沃坦退化成了一个可怕的猎人，霍尔达和别尔塔则完全变成了吓唬小孩的怪物；沃坦的老鸦也被魔鬼所占有。”

雅科布·柏林：《德国神话》，格廷根，1835年，第6页。

古代日耳曼神话中待人很好的一种自然界的神。

日耳曼民族的主神。

雅科布·格林的《德国神话》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国外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赞誉，成了一部很有声望的著作，并且促进了拥有许多信徒的、有权威的神话学派在语文科学中最后形成和确立。

19 世纪后半期，神话学派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部分地受到外来的理论和天文—气象、心理、历史以及其他理论的排挤。

格林兄弟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合作的著作是《德语大词典》。格林兄弟从 1838 年就开始编写这部词典，并且一直继续到自己生命结束。在这之前，没有一部哪怕稍微可以和格林兄弟的词典相媲美的词典，他们除了对日常搜集每一个词的资料付出巨大努力之外，同时必须详细订出编纂这样大规模词典的原则。格林兄弟的这部词典是作为实际上容纳全部词汇的德语历史词典来考虑的，在这里要指出每一个词在语言发展各个不同时代的意义和它的来源，还要用摘引的资料列举这个词在活的德语中使用的例子。这部词典是分成许多小册出版的，然后合成许多大卷。第一册于 1852 年问世。从工作一开始，格林兄弟就很清楚，编写这部词典所需要的时间不是 7 年—15 年，而要多得多，而且要完成这部著作，大概用整个一生也是不够的。虽然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对他们进行了帮助，但是，这部词典只编到了第六个字母 F（编到词条“Frucht”——果实）。雅科布·格林是一个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卓越工作能力的人，他承担了这一极端困难工作的主要部分，编写了从字母 A、B、C、E、F 开始的所有词；字母 D 的各个词条是威廉编写的。

威廉和雅科布去世之后，编写《德语大词典》的工作就由他们的继承者——·瓦伊甘德、M·封·列克谢尔、A·格奥采、M·海涅、P·希利杰勃兰德和其他著名的日耳曼学家继承下来，他们勇敢地、实际上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把格林兄弟开创的事业继续了下去。只有在 1908 年柏林普鲁士科学院才把这部《词典》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1929 年，由于以 A·休勃涅尔为首的语言学家们的努力，《词典》开始在新的词典编辑原则基础上进行改写。在以后，即 30 年代，一大批有才能的年轻语言学家参与了编写《词典》，这个工作大有起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 1946 年开始）已有两个科学院——柏林德国科学院和格廷根科学院（西德）开始编写这部《词典》，不过柏林科学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确地表彰了以科学院院士捷奥多尔·弗林格斯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语言学家们在《词典》完成阶段（1961 年完成了《词典》的出版工作）所建立的巨大功勋。

《德语大词典》编纂了一百多年，它不仅是编纂德国词典和德国词典编辑学的历史上，而且一般说在世界史上也是一部最有充分根据的历史词典。的确，《词典》编写的时间如此之长，参加编写的各个不同学派的日耳曼学家的人数如此之多，各自不可能不留下自己的影响，所以这部《词典》无论在引用的资料范围、叙述的方法，或是对德语中各种现象的解释，都存在差异。这些缺点，其中包括词典编辑原则中的差异，计划在新版中予以克服，而出版新版的准备工作在第一版出全之后立即就开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负责 A—C 三个字母，格廷根科学院负责 D—F 三个字母。现在已经出版了 1954 年开始修改的第一卷（字母 A）和 1970 年开始修改的第六卷（字母 D）。像格林兄弟时代那样，词典分成许多小册出版（大约每一卷分成七册），并且由享有盛名的莱比锡“希尔采利”出版社负责出版。

现在，我们和格林兄弟几乎相隔一个半世纪，我们现在评价这两位学者的活动及其思想遗产不但比 100 年前更精确、更清醒，而且可以避免在认识

他们活动中所存在的不加批评的片面性，同时也可以排除过分草率地作出对立性质的结论。

在认识格林兄弟和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对他们的崇高人品，杰出才华、坚定信念和他们对科学的忠忱，始终满怀尊敬之情。当然，他们的世界观和科学结论中的许多东西，今天不仅有争论，而且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科学概念是在 19 世纪初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积极影响之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还指出了他们对德国的一切所具有的博爱胸怀：“……激起这位伟大的研究家（指雅科布·格林。——编者）创造大批著作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单方面的日耳曼精神和这样的渴望，即通过科学的途径证明日耳曼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以自己的社会发展而远远胜过其他所有民族的民族。”

所谓格林兄弟关于神话和语言起源于宗教的思想也不适合（或符合）现代科学概念。他们的许多其他学术思想和假设也经不起时代的检验，都被其他的，也就是更准确、更接近真理的思想和假设所否定或排斥。比如，雅科布·格林关于日耳曼民间口头创作的所有现象具有非常古老历史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毕竟威廉·舍列尔是正确的，他曾写到格林兄弟的许多主要著作的“永恒价值”，不管这些著作有什么样的缺点和错误：“……会有许多东西在以后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可以形成另一种结果，并且未来的科学一定会认为许多东西是错误的，但是，来自他们内心的那种冲动和他们所指出的那些新的目标是永恒的，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成了与科学发展过程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且每一个新的科学的幼芽都蕴含着这个过程的一分极小部分。”

在结束这个简短序言的时候，我愿意指出，尽管 W·盖斯特涅尔的这部书有某些缺点，但是它的问世这个事实毕竟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为这两位伟大学者的许多苏联崇拜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生平的可能性。

· 舍甫琴科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集）》，第 2 卷，莫斯科，1949 年，第 736 页。

W·舍列尔：《雅科布·格林》，柏林，1865 年，第 161 页。

格林兄弟年谱

- 1785 年 雅科布·格林 1 月 4 日诞生。
- 1786 年 威廉·格林 2 月 24 日诞生。
- 1791 年 从哈脑移居施太诺。
- 1796 年 格林兄弟的父亲逝世。
- 1798 年 格林兄弟在卡塞尔开始读书。
- 1802 年 雅科布入马尔堡大学学习。
- 1803 年 威廉入马尔堡大学学习。
- 1805 年 雅科布第一次到巴黎旅行。
格林的母亲迁居卡塞尔。
- 1806 年 雅科布任军事委员会秘书。
威廉通过法学考试。
- 1807 年 雅科布离开军事委员会。
- 1808 年 格林母亲逝世。
雅科布在卡塞尔任热罗姆的图书馆管理员。
- 1809 年 雅科布任国务会议秘书。
威廉到哈勒、柏林和魏玛旅行。
- 1813 年 雅科布任黑森外交代表团秘书。
- 1814 年 雅科布到柏林和维也纳旅行。
威廉任卡塞尔图书馆秘书。
- 1815 年 雅科布参加维也纳会议以及执行在巴黎的任务。
威廉沿莱茵河旅行。
- 1816 年 雅科布任卡塞尔图书馆管理员。
- 1819 年 雅科布和威廉任马尔堡大学名誉博士。
- 1822 年 妹妹洛塔嫁给 · · · 哈先普弗卢格。
- 1825 年 威廉与多尔特亨·维尔德结婚。
- 1826 年 洛塔的孩子和威廉的孩子相继夭折。
- 1828 年 威廉的儿子盖尔曼诞生。
- 1829 年 兄弟二人应邀到格廷根。
- 1830 年 雅科布任格廷根大学教授，威廉任图书馆管理员。
- 1831 年 威廉任编外教授。
- 1833 年 洛塔·格林逝世。
- 1835 年 威廉任在编教授。
- 1837 年 “格廷根七君子”的抗议。兄弟二人被免去职务。雅科布赴卡塞尔。
- 1838 年 雅科布到法兰克福和萨克森旅行。威廉回卡塞尔。
- 1840 年 兄弟二人应邀赴柏林。
- 1841 年 兄弟二人迁居柏林。在柏林大学讲课。
- 1843 年 雅科布到意大利旅行。
- 1844 年 雅科布到瑞士旅行。
- 1846 年 雅科布主持第一届法兰克福日耳曼学家代表大会。
- 1847 年 雅科布主持第二届律贝克日耳曼学家代表大会。

- 1848 年 雅科布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雅科布放弃教学活动，以便献身研究工作。
- 1852 年 威廉同哥哥一样停止教学活动，完全从事研究工作。
- 1859 年 威廉于 12 月 16 日逝世。
- 1863 年 雅科布于 9 月 20 日逝世。

简要书目

——格林兄弟的主要著作

《德语语法》，第一卷，格廷根，1819年；第二卷，1826年；第三卷，1831年；第四卷，1837年。

《德国神话》，格廷根，1835年。

《塔西佗日耳曼地方志》，格廷根，1835年。

《论德国古代金石文字》，格廷根，1835年。

《德国英雄传说》，格廷根，1829年。

《儿童和家庭童话集》，柏林，第一卷，1812年；第二卷，1815年。

《古代德国森林》，第一卷，卡塞尔，1813年；第二卷和第三卷，法兰克福，1815和1816年。

《德国传说集》，柏林，第一部，1816年；第二部，1818年，第二版，1865和1866年。

《爱尔兰爱尔菲童话集》，莱比锡，1826年。

《德语词典》，1854—1861年。

《格林兄弟童话集》，第一——四卷，莫斯科，1908—1912年。

《格林兄弟童话集》，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8年。

有关格林兄弟的主要评论著作

阿尔比特·顿克：《柏林兄弟》，卡塞尔，1884年。

列因霍特·斯泰格：《歌德和格林兄弟》，柏林，1892年。

卡尔·祖克马那尔：《格林兄弟》，艾宾豪森，1952年。

威廉·绍夫：《格林童话创作过程》，汉堡，1959年。

盖尔曼·盖斯特涅尔：《诗歌和语言世界的格林兄弟》，穆尔诺，1961年。

威廉·绍夫：《格林兄弟在柏林》，柏林，1964年。

曼弗雷德·莱曼尔：《格林兄弟》，莱比锡，1967年。

鲁泽·拉特克里夫：《格林兄弟》，伦敦，1970年。

阿扎多夫斯基·M·K·：《俄国民俗学史》，莫斯科，1958年。

施泰尼茨·B·：《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间创作研究》，载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和语言栏》，1955年，第十四卷，第五分册。

施泰尼茨·B·：《德国民族志的几个问题》，载《苏联民族志》，1955年，第二期。

